

# 盖世太保

纳粹德国秘密警察



4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盖世太保

纳粹德国秘密警察

4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盖世太保

纳粹德国秘密警察



4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92  
K5  
4  
24  
44

# 盖世太保

纳粹德国秘密警察

苏 真 刘平安 编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5 · 北京

1746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秘密警察 / 苏真、刘平安编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5  
ISBN7-80105-261-7  
I. 盖… II. 苏… 刘… I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 — 史料 IV. K7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3)第07683号

书名 盖世太保 纳粹德国秘密警察

编者 苏真 刘平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市安定门内大街 101 号 邮编：100009 电话：6601810)

经销 新华书店

图文照排 北京银河文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数据加工中心

(北京市海定体育场东 3 号 邮编：100080 电话：2570823)

印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202 工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5

插页 16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199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

印数 1—25000

书号 ISBN7-80105-261-7/K·22

定价 16.80 元

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关押  
的骨瘦如柴的小“囚徒”。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违者必究

(京)新登字 1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秘密警察 / 苏真、刘平安编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5

ISBN7-80105-261-7

I. 盖… I. ①苏…②刘… 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史料 N.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636 号

书名 \ 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秘密警察

编著者 \ 苏真 刘平安

出版发行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市委院内大街 40 号 邮编:100009 电话:4000810)

经销 \ 新华书店

图文照排 \ 北京银河文化信息咨询公司数码处理中心

(北京市绿杨体育场东 3 号 邮编:100080 电话:2578223)

印刷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202 工厂

开本 \ 850×1168 1/32

印张 \ 8.5

插页 \ 16

字数:150 千字

版次 \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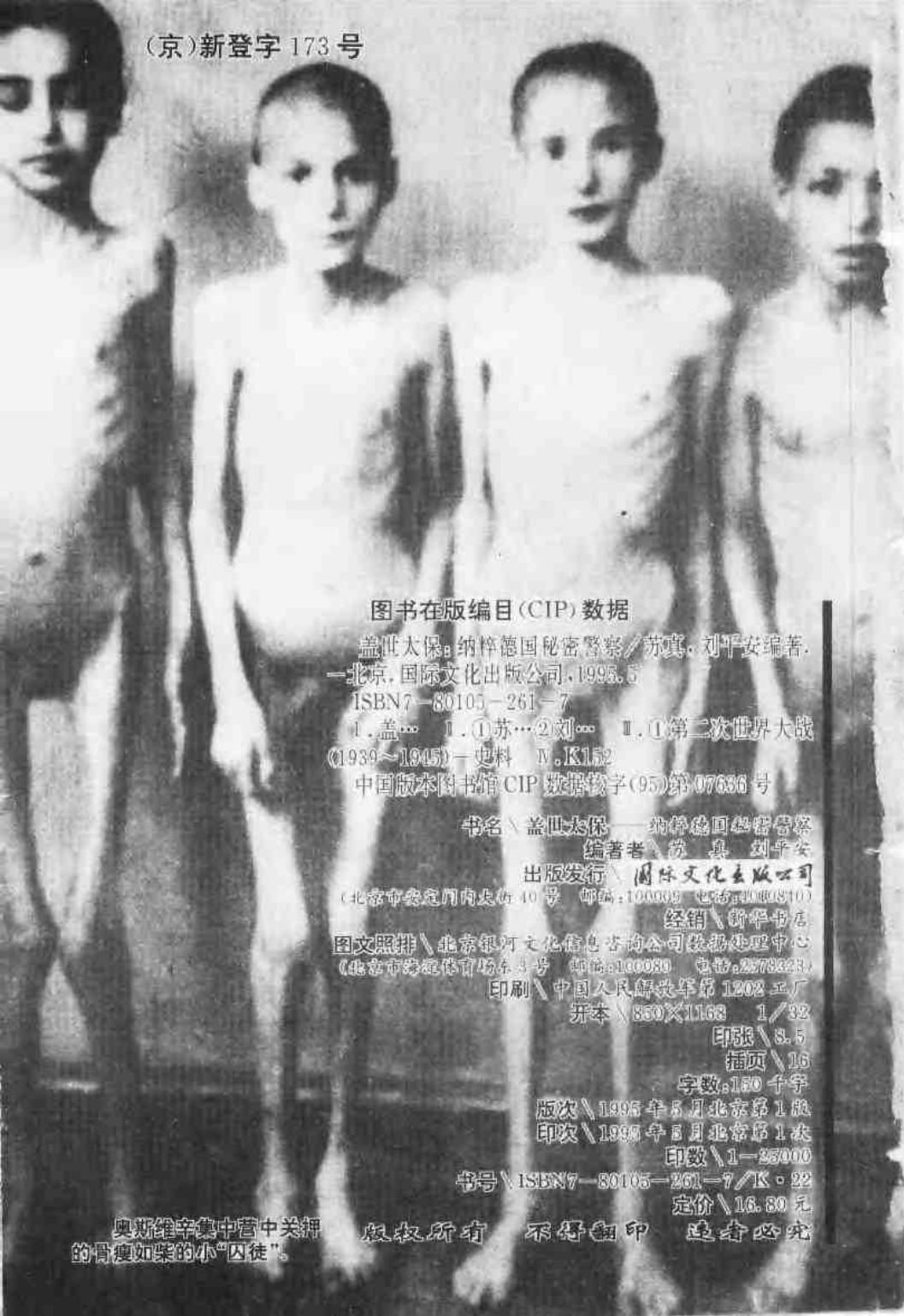
印数 \ 1—25000

书号 \ ISBN7-80105-261-7/K·22

定价 \ 16.80 元

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关押  
的骨瘦如柴的小“囚徒”。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违者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秘密警察/苏真,刘平安编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5

ISBN7-80105-261-7

I. 盖… I. ①苏…②刘… 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史料 IV.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7636号

书名\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秘密警察

编著者\苏真 刘平安

出版发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市委院内大街40号 邮编:100005 电话:4008310)

经销\新华书店

图文照排\北京银河文化信息咨询公司装帧设计中心

(北京市海定体育场东3号 电话:400080 电话:2378323)

印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02工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插页\16

字数\150千字

版次\1993年5月北京第1版

印次\1993年5月北京第1次

印数\1—2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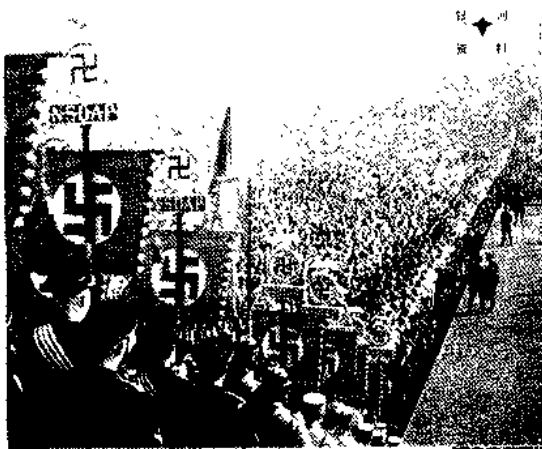
书号\ISBN7-80105-261-7/K·22

定价\16.80元

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关押  
的骨瘦如柴的小“囚徒”。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违者必究





河  
利

河  
利

1933 年希特勒在德国  
多特蒙德接见冲锋队员。



河  
利  
资 料





1937年9月,数十万群众在德国汉诺威参加一个纳粹集会。在路的右侧,希特勒和他的部长们正在会见一个荣誉代表团。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多特蒙德接见冲锋队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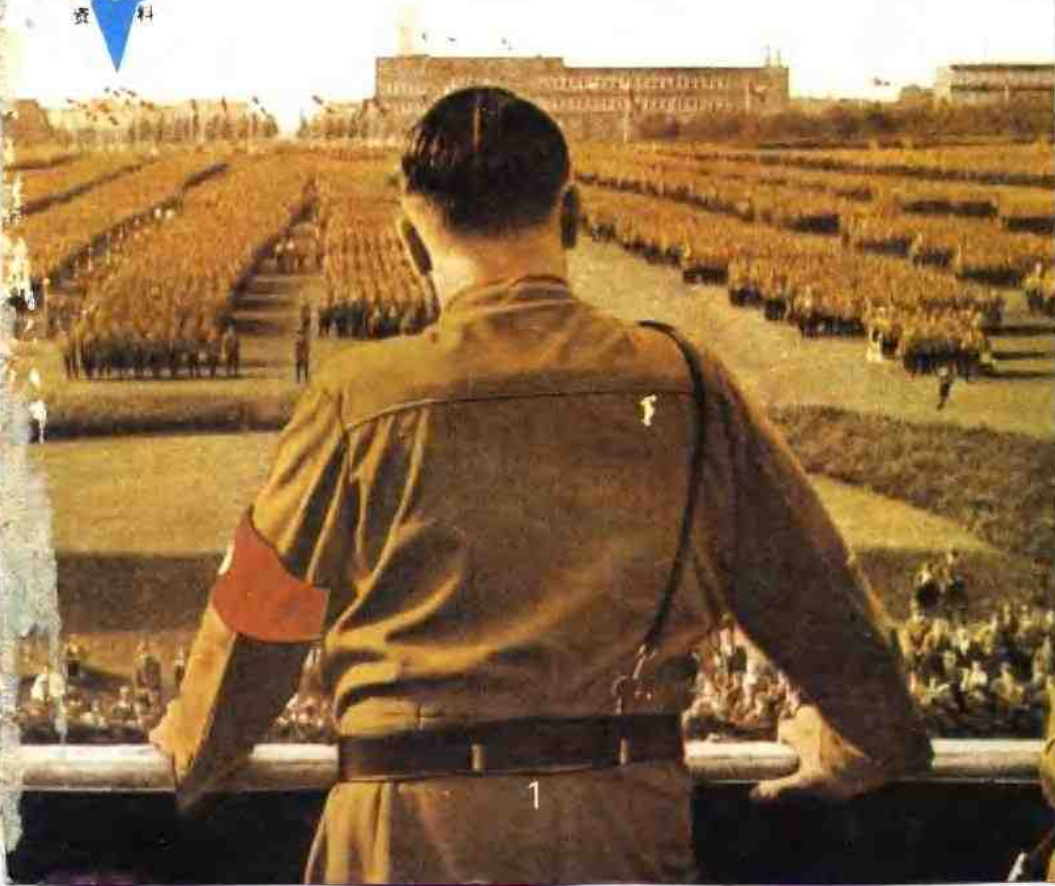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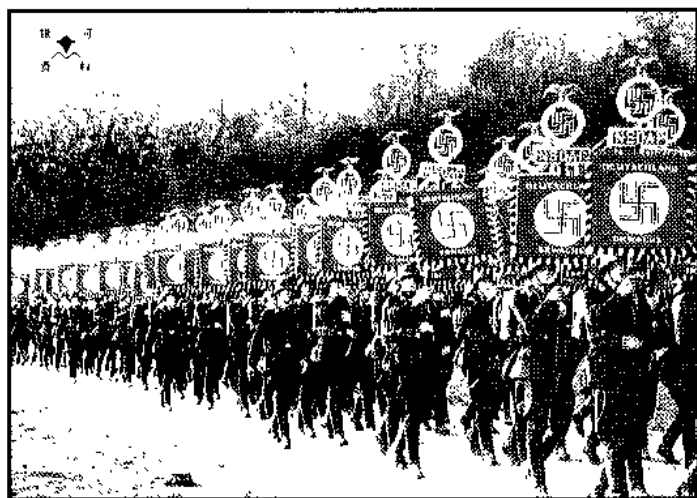
1937年9月,数十万群众在德国汉诺威参加一个纳粹集会。在路的右侧,希特勒和他的部长们正在会见一个荣誉代表团。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多特蒙德接见冲锋队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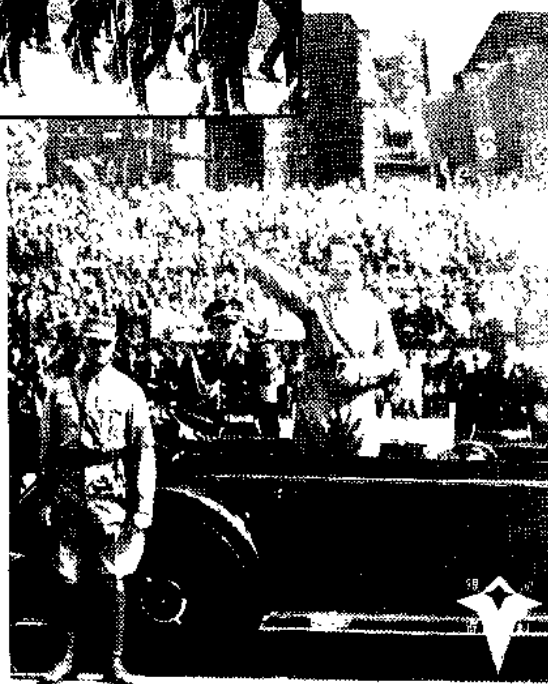




1938 年衣衫鲜亮的纳粹党徒举着卐字旗，从纽伦堡的大街涌向卢普尔德体育馆接受纳粹党魁们的检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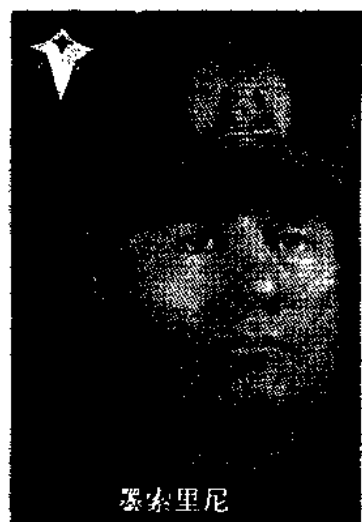
兴登堡元帅



戈林是最早的盖世太保头目，后任第三帝国空军总司令并被授予纳粹德国军队最高军衔——帝国元帅。



银河  
资料



墨索里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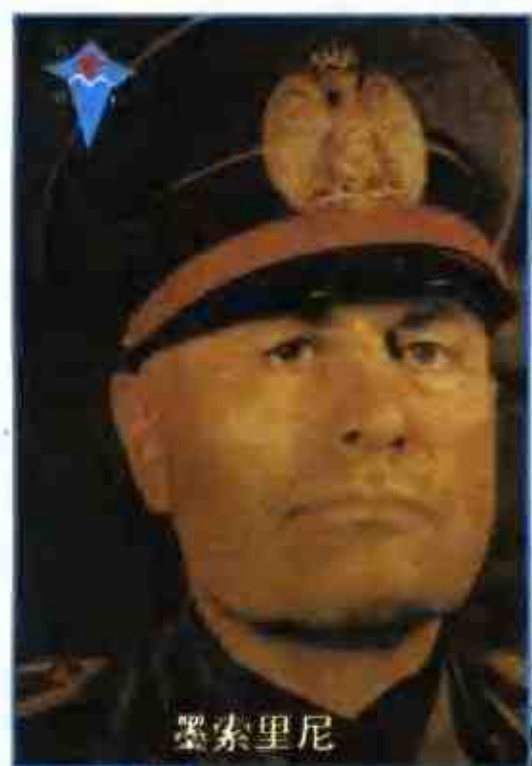
正在阅兵的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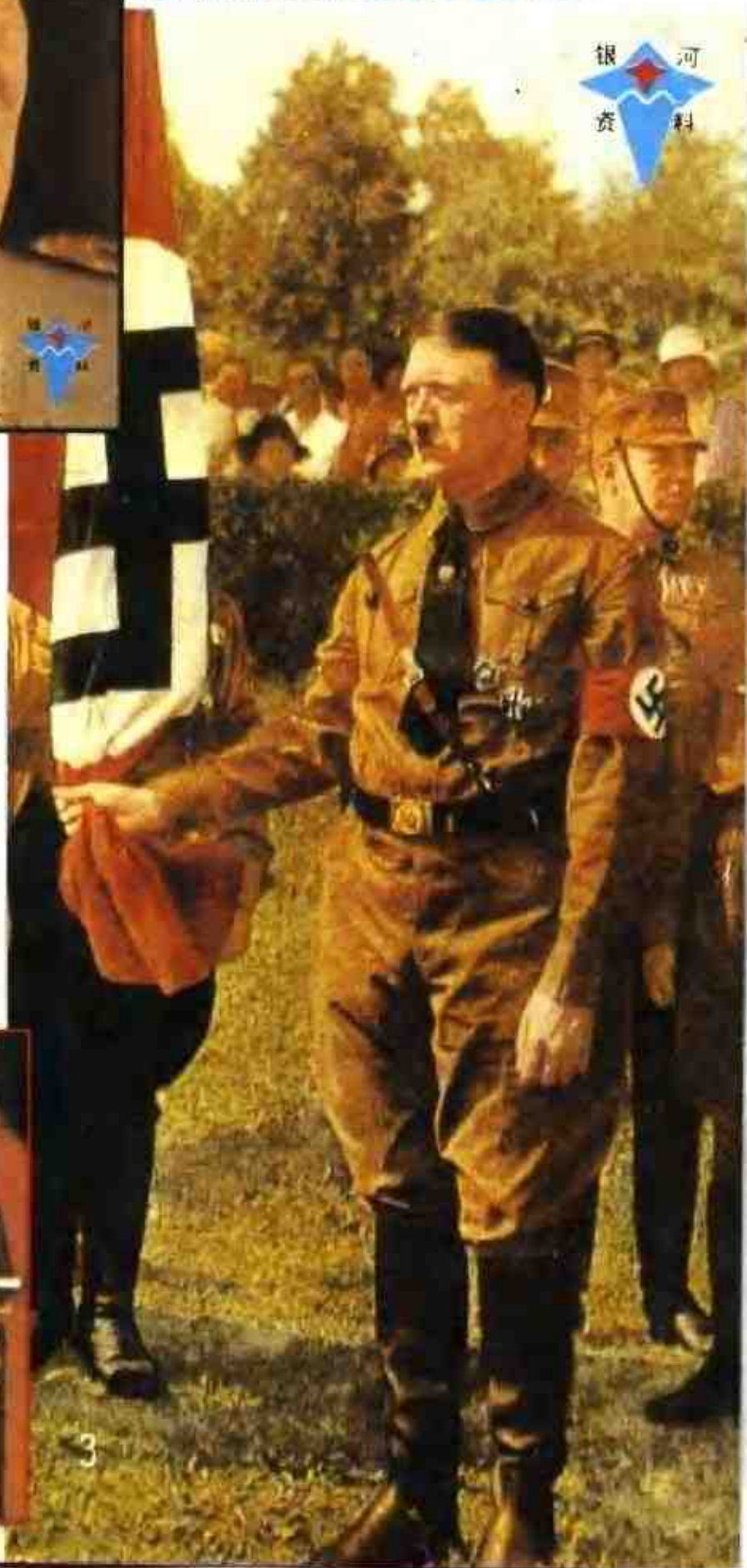
戈林是最早的盖世太保头目，后任第三帝国空军总司令并被授予纳粹德国军队最高军衔——帝国元帅。

在冲锋队的集会上手握纳粹党旗的希特勒，他身后是罗姆。



墨索里尼

正在阅兵的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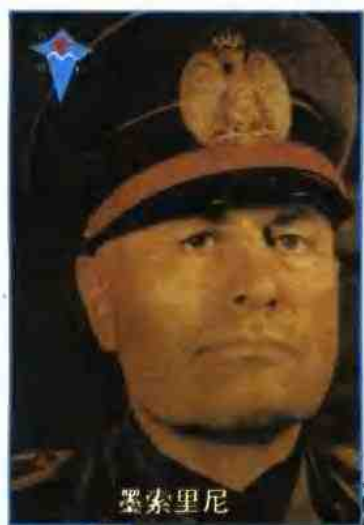






戈林是最早的盖世太保头目，后任第三帝国空军总司令并被授予纳粹德国军队最高军衔——帝国元帅。

在冲锋队的集会上手握纳粹党旗的希特勒，他身后是罗姆。



墨索里尼

正在阅兵的希特勒。





希特勒的这张画像在当时的德国随处可见。

冲锋队队员们坐在饰有圣诞常青树的桌旁欢宴，庆祝圣诞节和“一颗新星（指希特勒）的升起”。







希特勒的这张画像在当时的德国随处可见。

冲锋队队员们坐在饰有圣诞常青树的桌旁欢宴，庆祝圣诞节和“一颗新星（指希特勒）的升起”。







希特勒的这张画像在当时的德国随处可见。

冲锋队队员们坐在饰有圣诞常青树的桌旁欢宴，庆祝圣诞节和“一颗新星（指希特勒）的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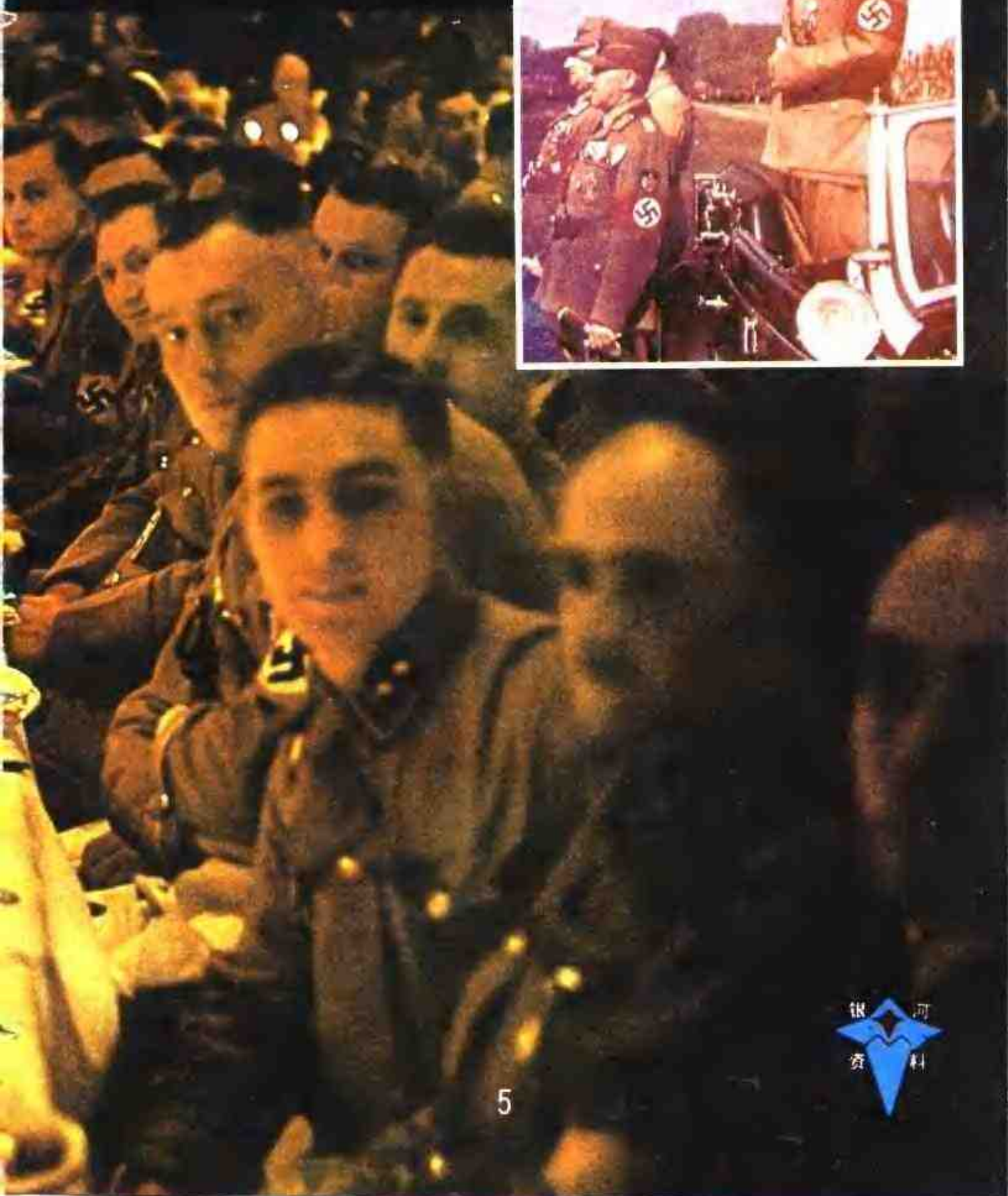


希特勒洋洋得意地视察他的战争机器。他前面站立的是冲锋队头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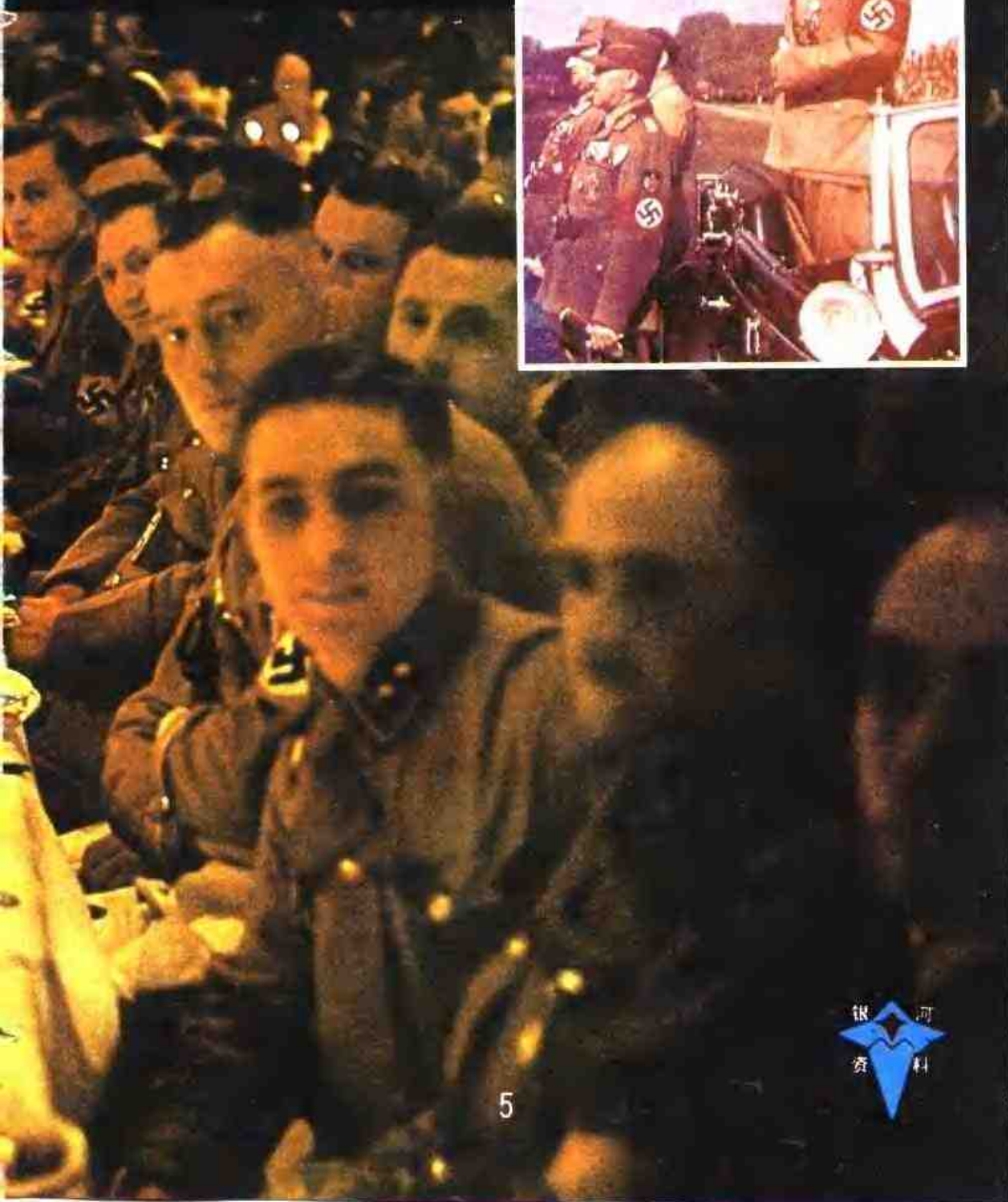


希特勒洋洋得意地视察他的战争机器。他前面站立的是冲锋队头目。





希特勒洋洋得意地视察他的战争机器，他前面站立的是冲锋队头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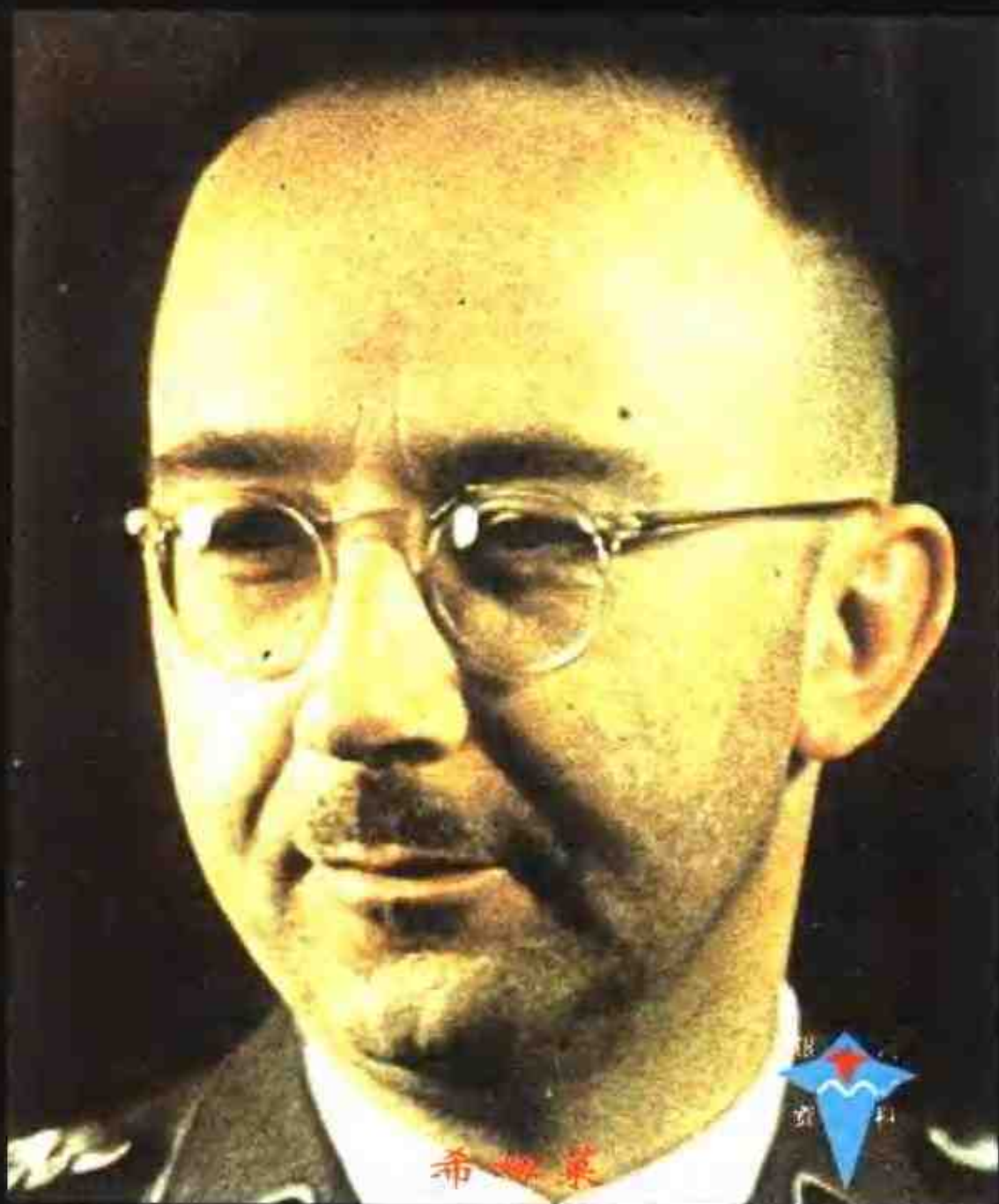




1938年4月10日，希特勒不战而胜，占领了维也纳，下一个牺牲目标，便是捷克斯洛伐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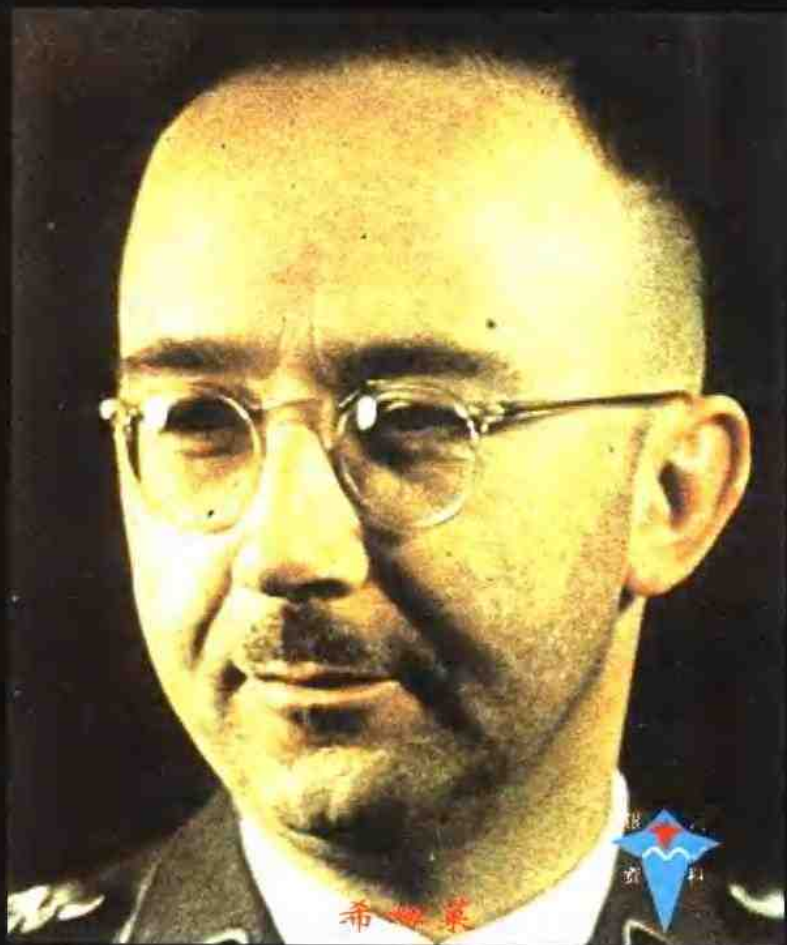


希特勒

1938年4月10日，希特勒不战而胜，占领了维也纳，下一个牺牲目标，便是捷克斯洛伐克。







战而胜，占领了维也纳，下一个牺牲目标，便是捷克斯洛伐克。

1938年4月10日，希特勒不





6 岁的希特勒在柏林的生日派对上，  
向在场的德国军官和士兵们发表讲话。

德国陆海军士兵在柏林  
庆祝希特勒的 50 岁生日。







1939年的柏林街头，希特勒的生日庆祝活动，士兵们手持火炬，背景是巨大的纳粹旗帜和建筑。

德国陆海军士兵在柏林  
庆祝希特勒的 50 岁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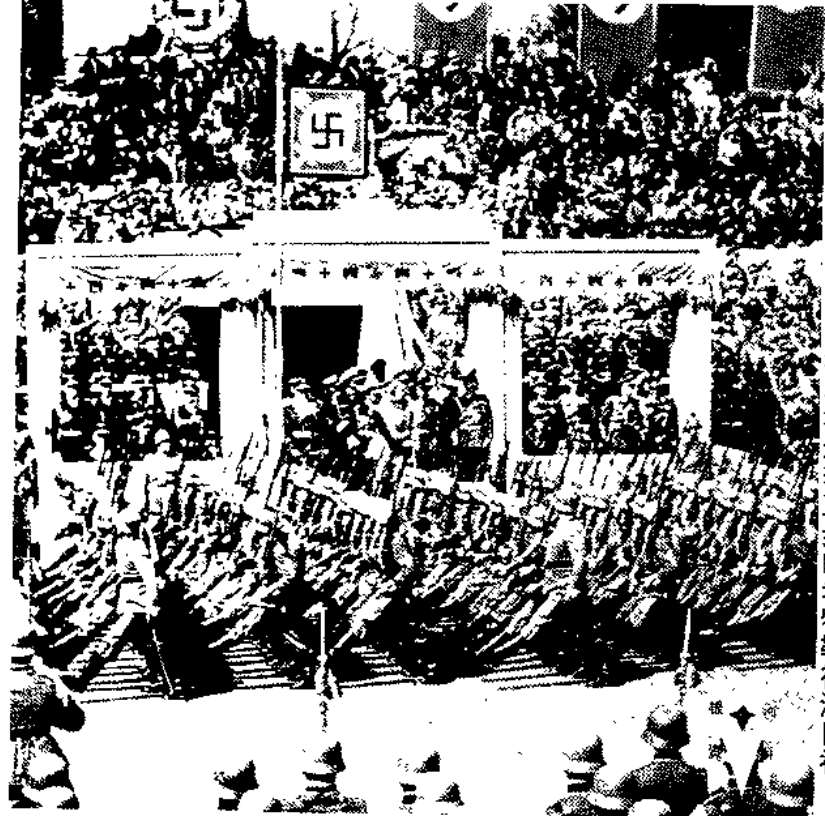


1939年希特勒生日，柏林街头灯火辉煌，人们手持火炬，庆祝希特勒的生日。背景中可以看到巨大的纳粹旗帜和建筑物。



德国陆海军士兵在柏林  
庆祝希特勒的 50 岁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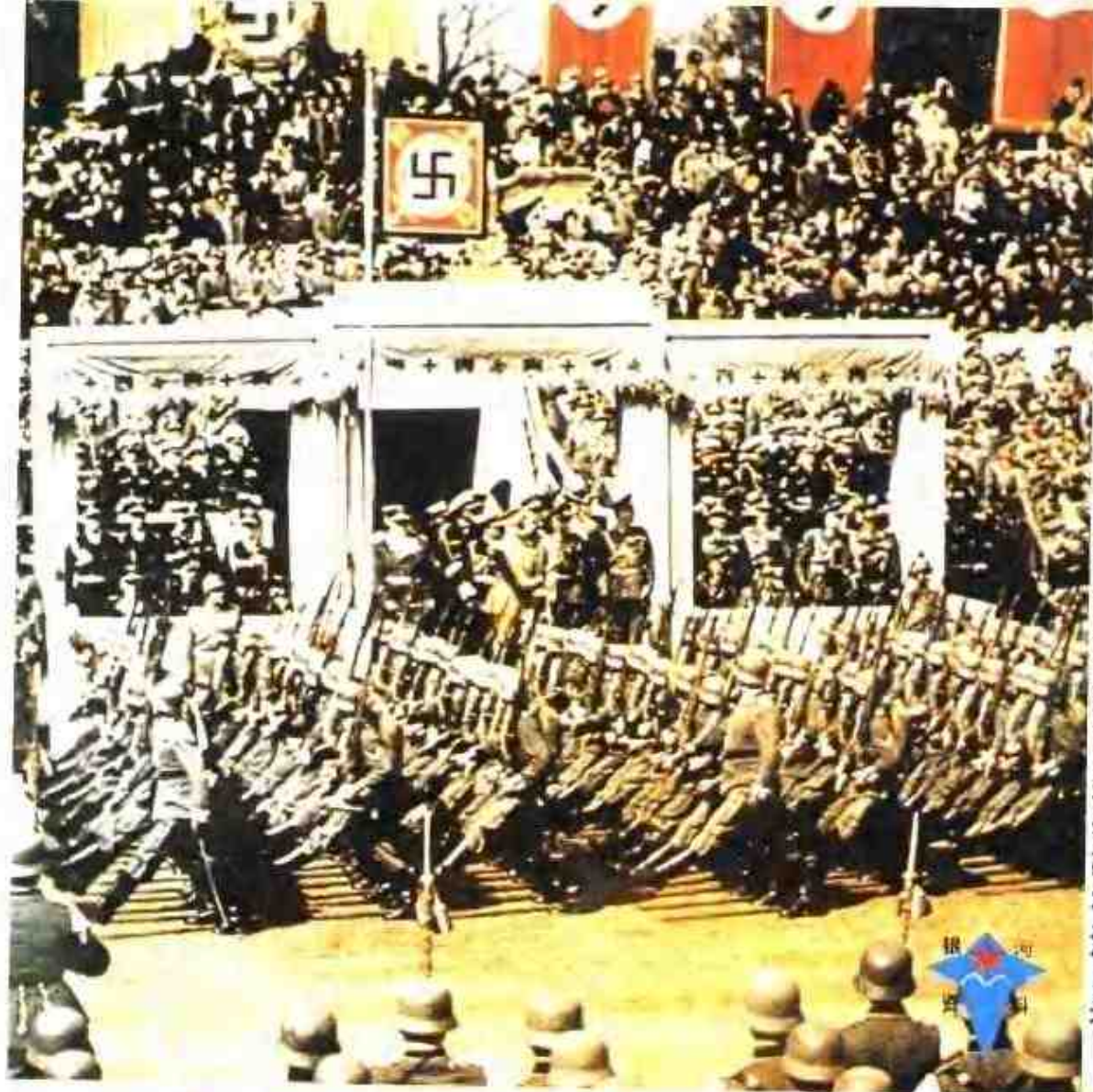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66岁生日时，重建的德国部队在柏林迈着正步向希特勒行注目礼。

一名党卫队军官手握血旗（纳粹党认为旗上的红色是参加慕尼黑暴动的纳粹党员的血染红的），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宣誓词是这样的：「我发誓永远忠于我的元首。希特勒，我将毫无条件地自愿执行您的一切命令，盟旗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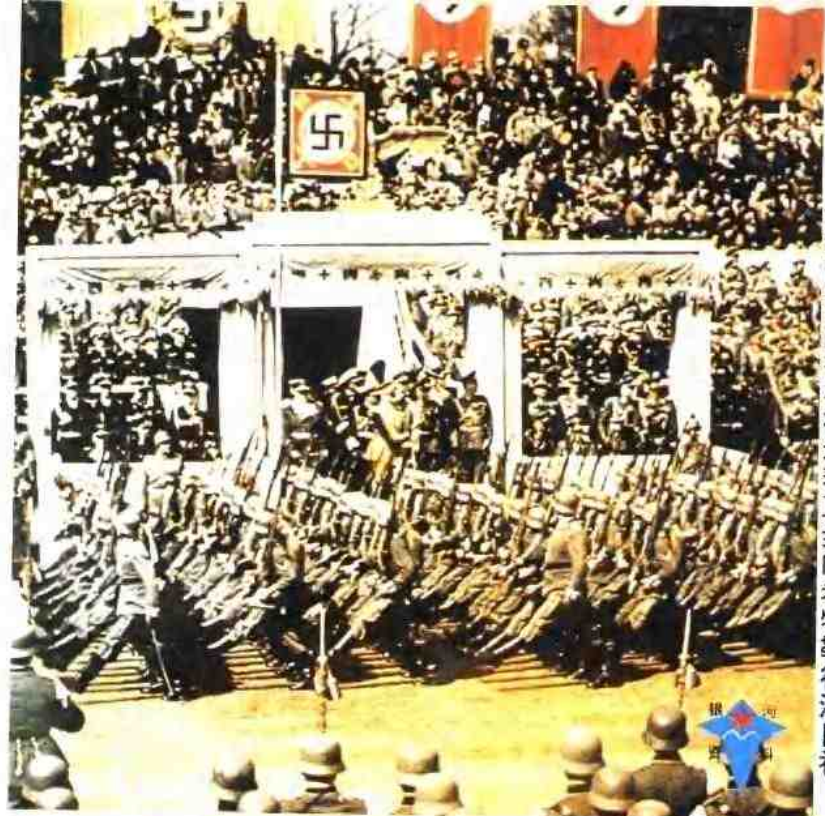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60岁生日时，重建的德国部队在柏林迈着正步向希特勒行注目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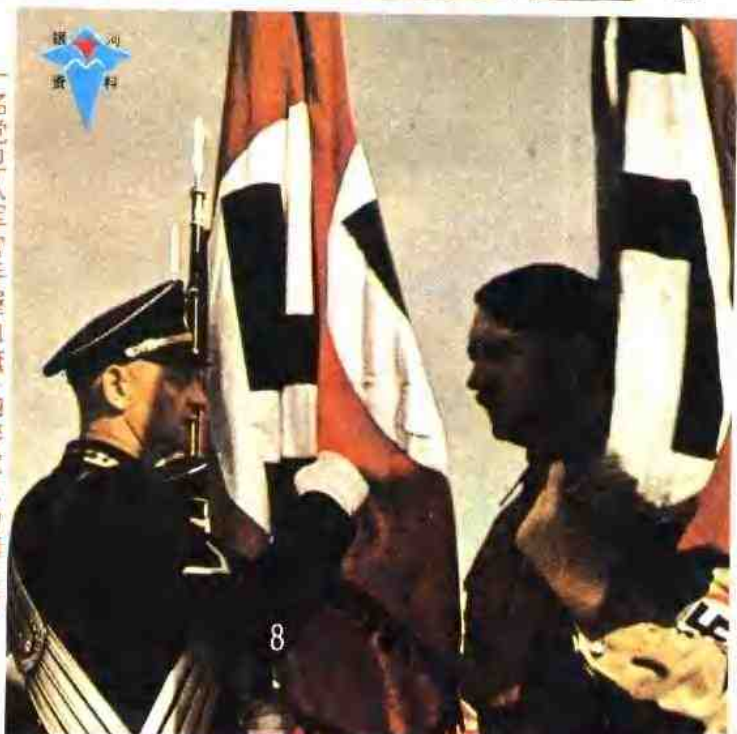


一名党卫队军官手握血旗（纳粹党认为旗上的红色是参加慕尼黑暴动的纳粹党员的血染红的），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宣誓词是这样的：“我发誓永远忠于我的元首。希特勒，我将毫无条件地自愿执行您的一切命令，盟旗为证！”





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50岁生日时，重建的德国部队在柏林迈着正步向希特勒行注目礼。



一名党卫队军官手握血旗（纳粹党认为旗上的红色是参加慕尼黑暴动的纳粹党员的血染红的），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宣誓词是这样的：“我发誓永远忠于我的元首。希特勒，我将毫无条件地自愿执行您的一切命令，盟旗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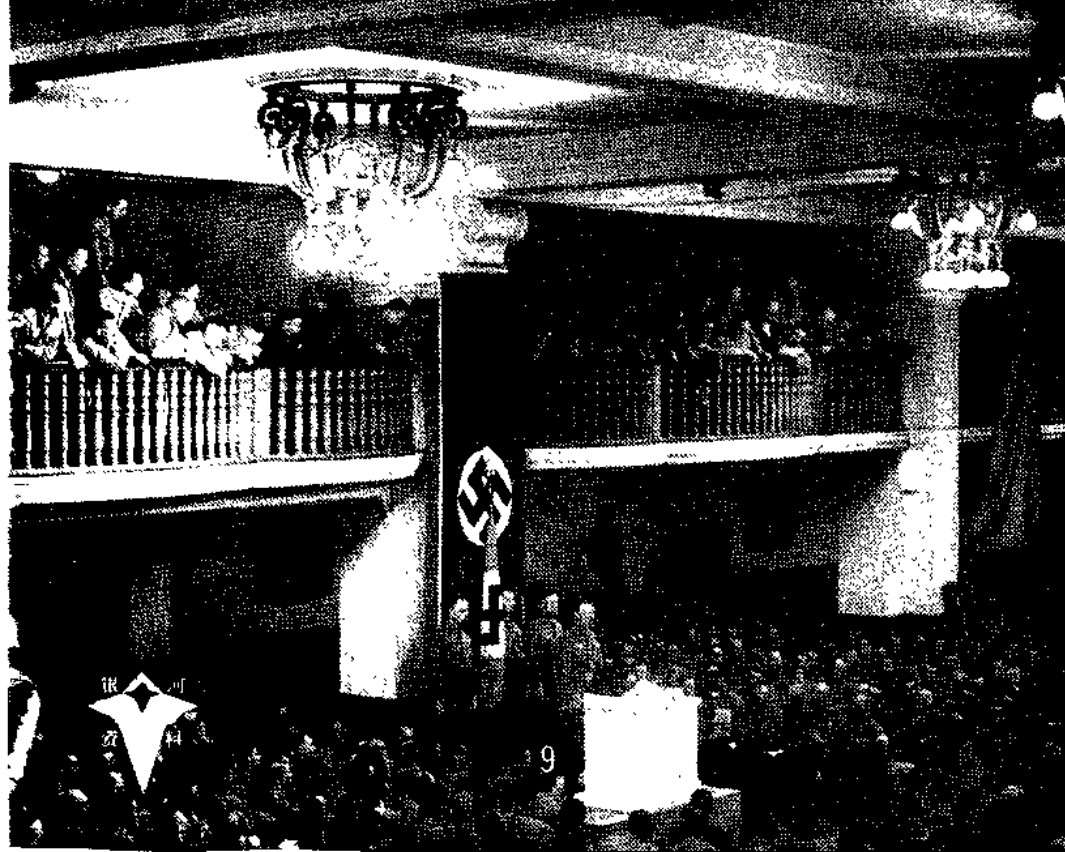
德国海军潜艇部队总司令邓尼茨后升任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希特勒自杀后，他继任第三帝国元首。



资料

1938年9月，墨索里尼乘火车到达慕尼黑，这是他在下火车与前来迎接他的希特勒握手。

希特勒在慕尼黑那间著名的啤酒馆中发表演说，1923年啤酒馆暴动标志着纳粹战胜魏玛共和国的开始。



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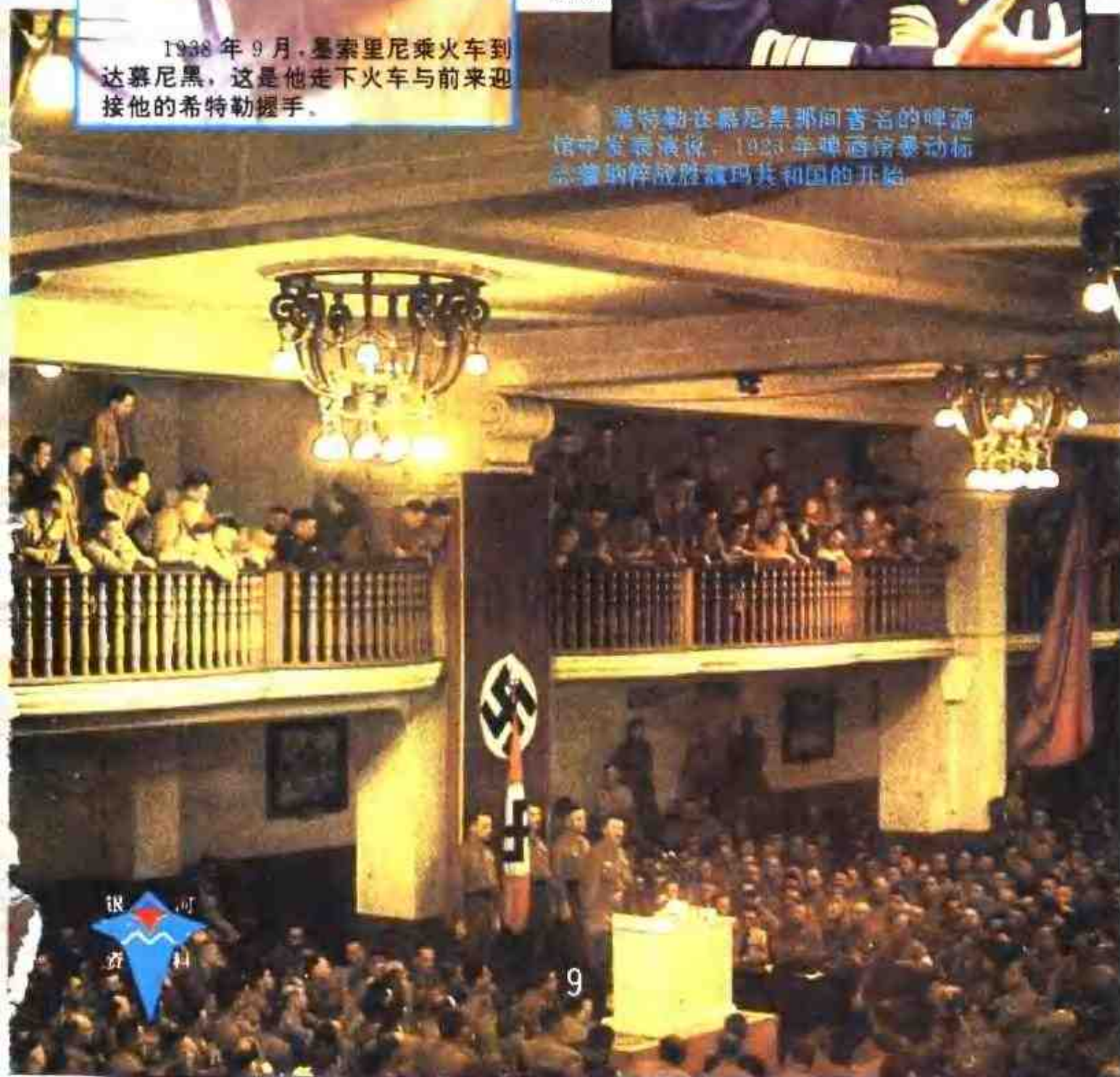


1938年9月，墨索里尼乘火车到达慕尼黑，这是他走下火车与前来迎接他的希特勒握手。

德国海军潜艇部队总司令邓尼茨后升任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希特勒自杀后，他继任第三帝国元首。



希特勒在慕尼黑那间著名的啤酒馆中发表演说，1923年啤酒馆暴动标志着纳粹党胜利魏玛共和国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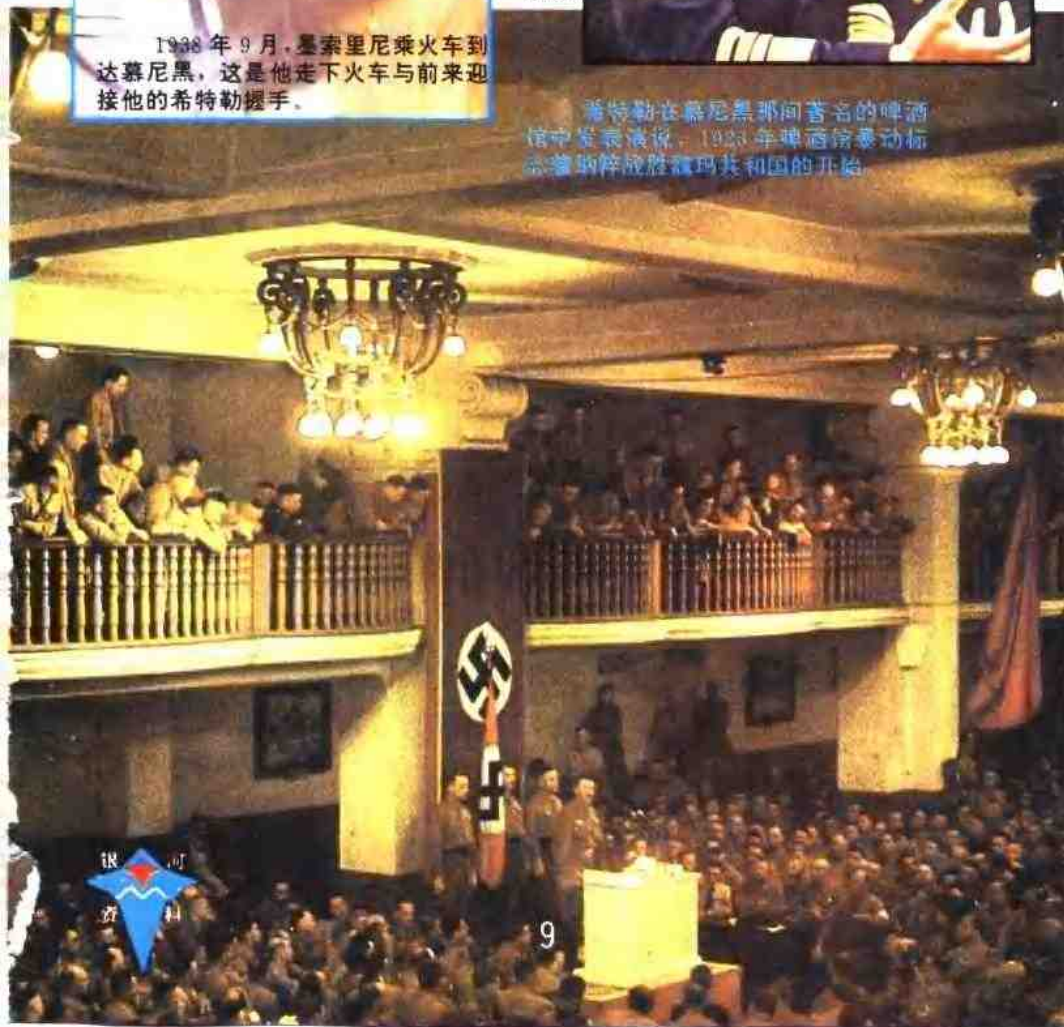


德国海军潜艇部队总司令邓尼茨后升任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希特勒自杀后，他继任第三帝国元首。



1938年9月，墨索里尼乘火车到达慕尼黑，这是他走下火车与前来迎接他的希特勒握手。

希特勒在慕尼黑那间著名的啤酒馆中发表演说，1923年啤酒馆暴动标志着纳粹党胜利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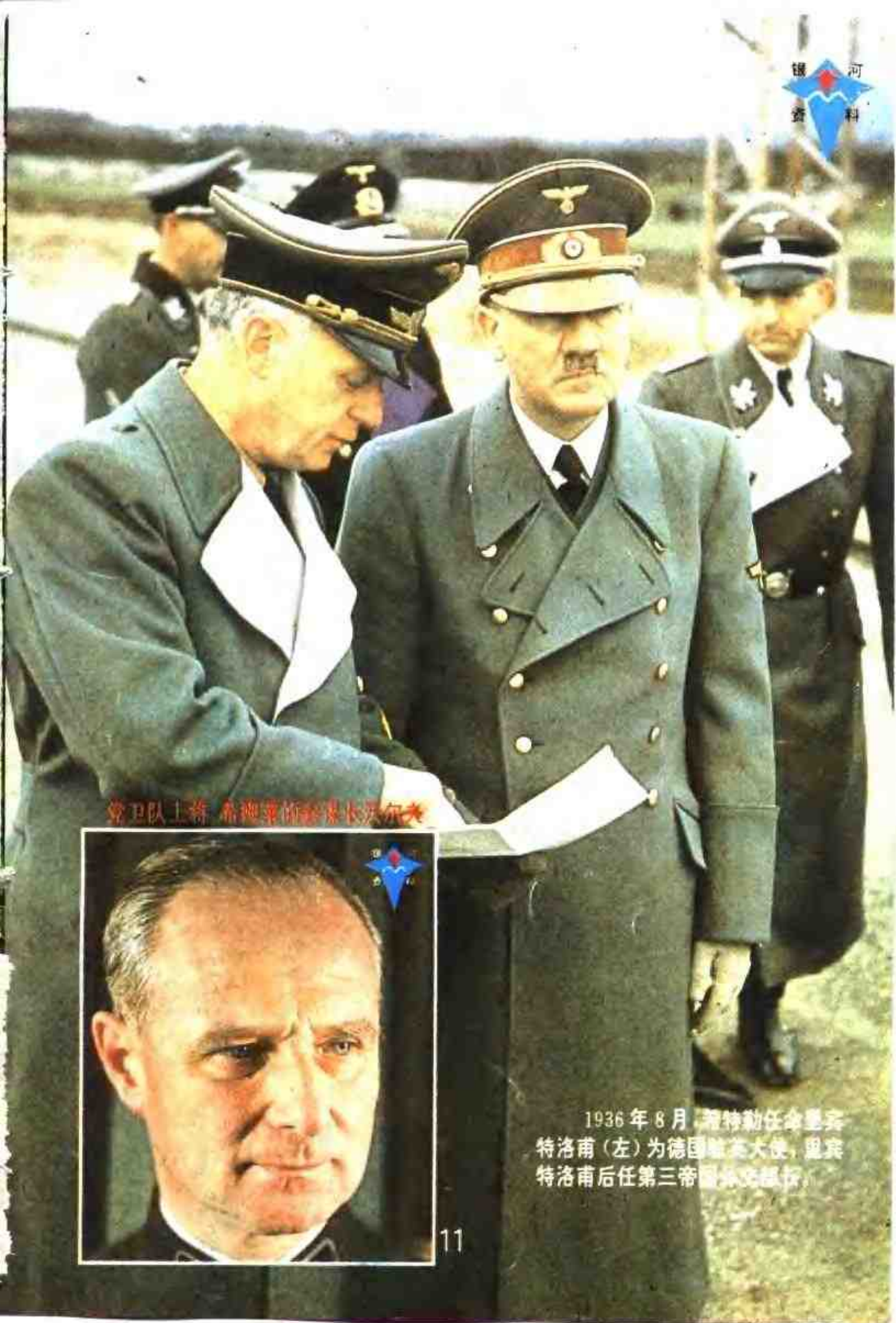
能把谎言说成真理的戈培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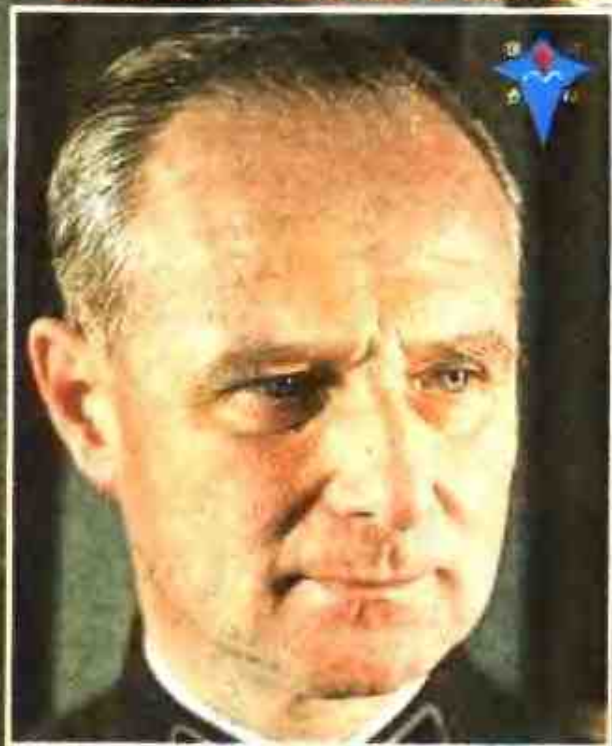


1936年8月，德军第三舰队司令  
特洛甫（左）为德国海军上将  
特洛甫后任第三舰队司令





党卫队上将 希特勒的副官卡尔·邓尼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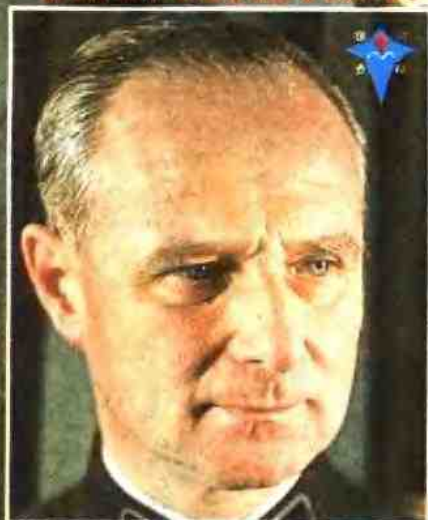


1936年8月，希特勒任命里宾特洛甫（左）为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后任第三帝国外交部长。





党卫队上尉 希特勒的副官长沃尔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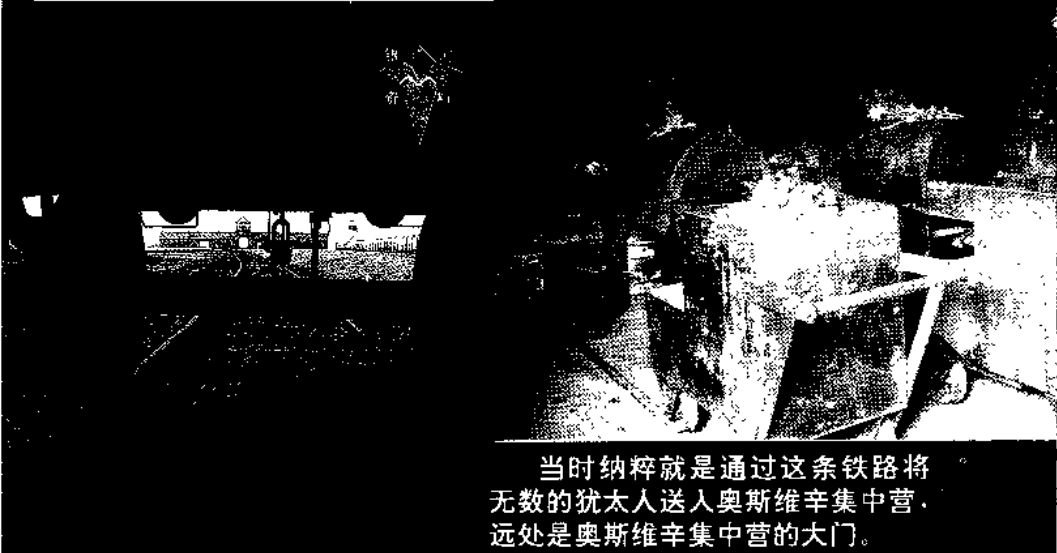
1936年8月，希特勒任命里宾  
特洛甫（左）为德国驻英大使，里宾  
特洛甫后任第三帝国外交部长。





1945年，盟军占领纳粹集中营后，发现了许多触目惊心  
的事情，这是美军发  
现的一车尸体。

战前波兰的  
奥斯维辛集中  
营内景。



当时纳粹就是通过这条铁路将  
无数的犹太人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  
远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

奥斯维辛集中营一隅





1945年，盟军占领纳粹集中营后，发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这是美军发现的一车尸体。

战后发现  
的奥斯维辛集中  
营的焚尸炉。



当时纳粹就是通过这条铁路将无数的犹太人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远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



奥斯维辛集中营一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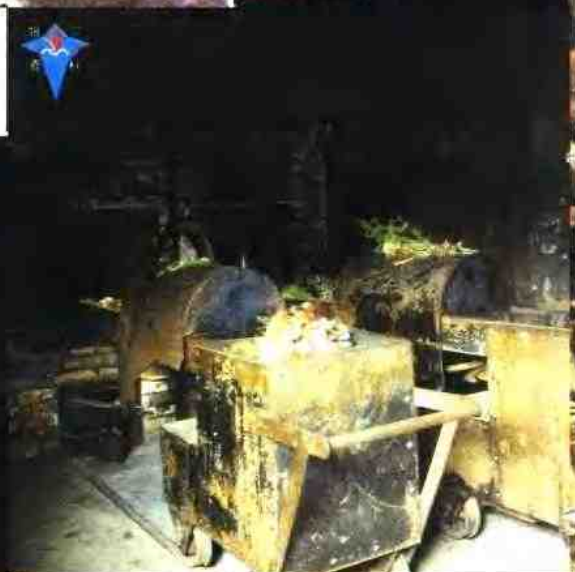






1945年，盟军占领纳粹集中营后，发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这是美军发现的一车尸体。

战后发现的  
奥斯维辛集中  
营的焚尸炉。



当时纳粹就是通过这条铁路将无数的犹太人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远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

奥斯维辛集中营一隅





1941年德国的一幅招贴画，  
上面的德文是“武装党卫队”。

德国国防军外国与谍报  
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



纳粹德国中央保安  
局局长、盖世太保头目  
卡尔滕布鲁纳博士。

1942年美国的一幅  
海报，上面的英文是：  
“这就是我们的敌人！”



13

This is the Enemy





在苏联前线的武装党卫队的骑兵巡逻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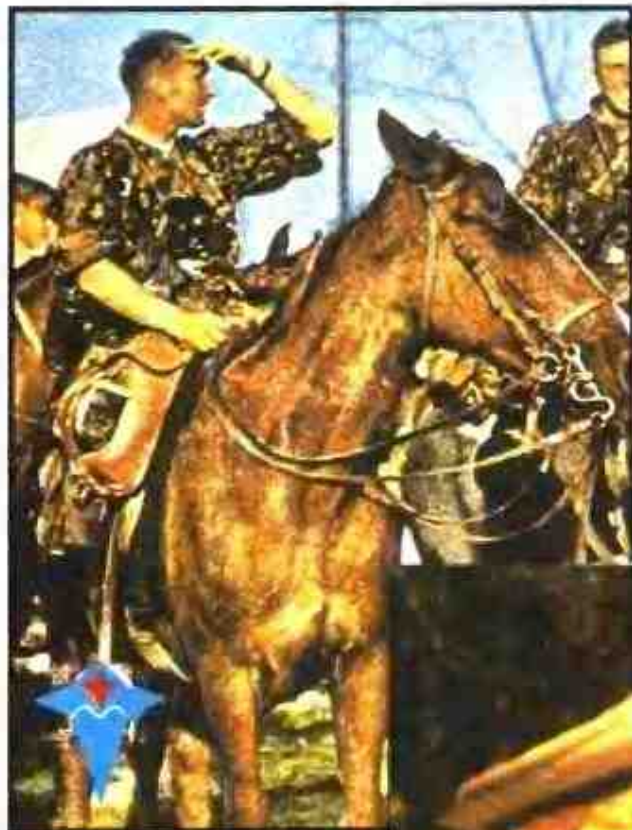
第 14、15 页照片：  
1944 年 3 月的阵亡  
将士纪念日，纳粹高  
级将领在柏林检阅军  
队。左起：空军总司令  
戈林帝国元帅、最高  
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  
元帅、海军总司令邓  
尼茨元帅、党卫队领  
袖希姆莱和希特勒。



希特勒与凯特

尔在一起讨论战局。





党卫队队员骑着摩托在被占领国领土上横冲直闯  
在苏联前线的武装党卫队的骑兵巡逻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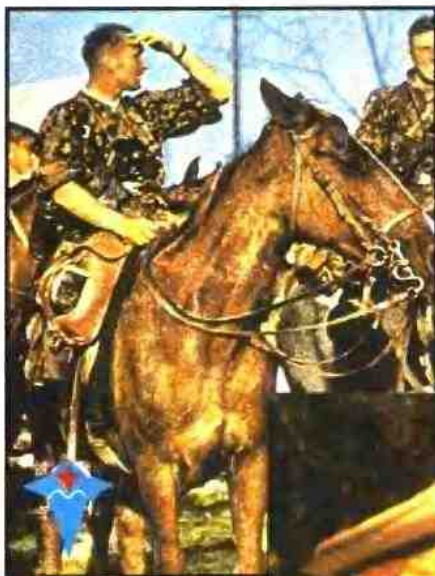
第 14、15 页照片：  
1944 年 3 月的阵亡  
将士纪念日，纳粹高  
级将领在柏林检阅军  
队，左起：空军总司令  
戈林帝国元帅、最高  
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  
元帅、海军总司令邓  
尼茨元帅、党卫队领  
袖希姆莱和希特勒。



希特勒与凯特尔、约德尔在一起讨论战局。







党卫队队员骑着摩托在被占领国土上横冲直闯  
在苏联前线的武装党卫队的骑兵巡逻队。

第 14、15 页照片：  
1944 年 3 月的阵亡  
将士纪念日，纳粹高  
级将领在柏林检阅军  
队，左起：空军总司令  
戈林帝国元帅、最高  
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  
元帅，海军总司令邓  
尼茨元帅，党卫队领  
袖希姆莱和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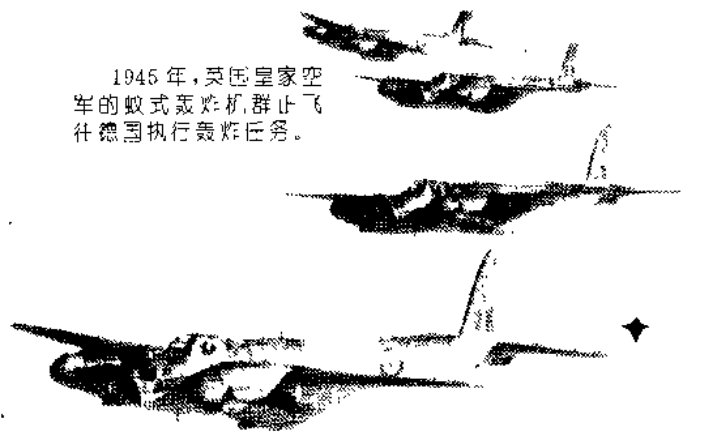


希特勒与凯特尔、约德尔在一起讨论战局。

14



1945 年，英国皇家空军的蚊式轰炸机群飞往德国执行轰炸任务。



希特勒与他的最忠实的朋友、爱犬布隆迪。





1945年，英国皇家空军的蚊式轰炸机群正飞往德国执行轰炸任务。



纳粹德国战时军火与武器装备部部长弗尔博士掌握着纳粹德国的所有军火生产。



希特勒与他的最忠实的朋友、爱犬布隆迪。



1945年,英国皇家空军的蚊式轰炸机群正飞往德国执行轰炸任务。



纳粹德国战时军火与武器装备部部长施佩尔博士掌握着纳粹德国的所有军火生产。



希特勒与他的最忠实的朋友、爱犬布隆迪。





1945年5月7日，约德尔上将代表德军在投降书上签字，右为新任海军总司令的弗里德堡海军上将。



1945年5月，戈林被美军俘获，这是他沮丧地坐在战俘营里，他旁边是一名美军军官。



文化信息  
世界大

1945年5月7日，约德尔上将代表德军在投降书上签字。右为新任海军总司令的弗里德堡海军上将。



1945年5月，戈林被美军俘获。这是他沮丧地坐在战俘营里，他旁边是一名美军军官。



纳粹战犯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前排上起：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后排上起：雷德尔、希拉克、绍克尔、约德尔。



北京银河文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世界大地图  
片档资源提供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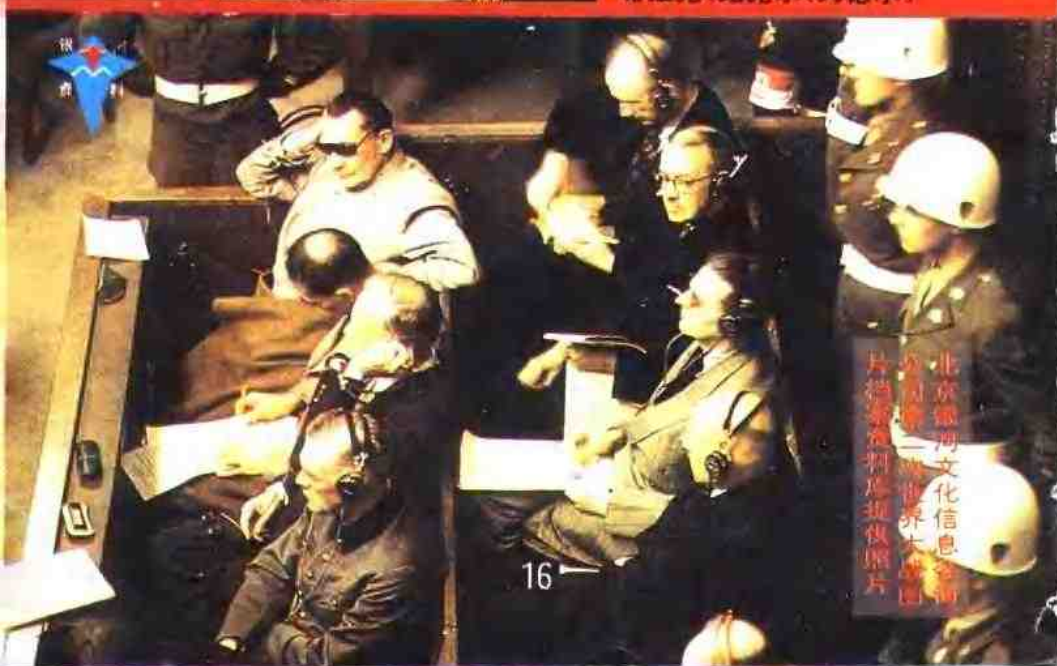
1945年5月7日，约德尔上将代表德军在投降书上签字，右为新任海军总司令的弗里德堡海军上将。



1945年5月，戈林被美军俘获，这是他沮丧地坐在战俘营里，他旁边是一名美军军官。



纳粹战犯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前排上起：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后排上起：雷德尔、希拉克、绍克尔、约德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秘密警察/苏真,刘平安编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5

ISBN7-80105-261-7

I. 盖… I. ①苏…②刘… 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史料 IV.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636 号

书名\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秘密警察

编著者\苏真 刘平安

出版发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市安定门内大街 10 号 邮编:100009 电话:4010840)

经销\新华书店

图文照排\北京银河文化信息咨询公司数据处理中心

(北京市裕民体育场东 3 号 邮编:100080 电话:2576323)

印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202 工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插页\16

字数:150 千字

版次\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

印数\1—25000

书号\ISBN7-80105-261-7/K·22

定价\16.80 元

奥威尔在集中营中关押  
时曾写下“小囚徒”。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违者必究





前言【1】

A

盖世太保的崛起【3】

B

希姆莱和党卫队【31】

# 目 录

C

海德里希和党卫队保安处【53】

D

屠杀褐衫队【64】

E

无所不在的盖世太保【83】

F

走向战争的盖世太保【106】

G

盖世太保在东欧的暴行【125】

# 目 录

H

暗杀海德里希【150】

I

西线的“夜和雾”【170】

J

盖世太保和堡垒内部的对手【200】

K

清算与代价【228】

L

历史的见证【259】





# 前言

盖世太保是世界历史上最残暴也是最有效的警察组织。1933年以来它一直是纳粹控制德国人民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1939年后，它又进一步把魔掌伸向了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各国。

盖世太保是纳粹政治的缩影，它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恐怖。在它的魔影的笼罩下，没有人很完全幸免。从暗算希特勒的德国高级将领到懒散工厂工人都不能逃脱“罪责”。不久德国民众就认识到他们必须在举手投足之间做到万分谨慎才能不听到深夜的“鬼”敲门声。维持政治安定是盖世太保的另一项主要工作。纳粹开始实施种族主义政策时，盖世太保就充当屠杀犹太人的急先锋，对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来说，盖世太保就意味着魔鬼和地狱。盖世太保跟在德国国防军的后面负责清理被占领土上的“劣等民族”，连年逾古稀的老人和嗷嗷待哺的幼儿都不能幸免于难。吊打、抽筋、活埋……一切惨无人道的刑罚都被盖世太保用尽，其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盖世太保为什么能如此嚣张？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本书讲述了它从300人逐步发展



到 2 万余人的整个过程，从中读者可以窥视世界历史的风云变化。

盖世太保的发展是和希姆莱与海德里希这两个杀人狂魔分不开的，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惜拿千百万人的生命做交易，但他们终未能逃脱正义的惩罚，落得一个被杀、一个自杀的可耻下场。本书还讲述了一大批与盖世太保的兴衰息息相关的纳粹“风云人物”：希特勒、罗姆、戈林、里宾特洛甫等，这将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第三帝国的枭雄们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内幕。

掩卷长思，像盖世太保这样的历史“畸形儿”本不应该出生，更不应该再度脱胎。

本书配有“北京银河文化信息咨询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图片资料档案库”提供的珍贵彩色、黑白历史照片 300 余帧，版式按图文混排的方式处理，有别于已经出版的各类关于盖世太保的图书，使全书阅读起来更加直观、生动。

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了北京大学李晓松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白光炜同志等人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成书仓促，囿于编者水平，难免有错漏之处，敬希读者不吝赐教。





# A

## 盖世太保的崛起

1933年5月1日，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在3月份的大选之后，纳粹党接管了权力。这个国家的新统治者准备以一种新的形式来庆祝他们的第一个国际劳动节。各商会的领袖作为贵宾被邀请到柏林，他们游行穿过饰有卐字旗帜的大街。冯·兴登堡总统和帝国公共教育及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在首都的拉斯特花园向参加集会的儿童发表了演说。随后是正式的活动：10万多工人聚集在坦普霍夫广场。戈培尔致辞，他对在为元首争取权力的激烈过程中牺牲的7名工人和冲锋



约瑟夫·戈培尔



1933年5月1日，10万纳粹党徒齐集柏林坦普霍夫广场，庆祝纳粹德国的第一个劳动节。

队队员给予了高度赞扬。

接着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讲话。元首宣布这一天将以“尊重劳动，尊重工人”而永载史册。纳粹德国的第一个劳动节给盼望美好生活，盼望出现使他们美梦成真的元首的德国工人带来了希望。

但是，明天会怎么样？至少没有人会怀疑。戈培尔博士在他当晚的日记里对白天的事情作了热情的描述。任何看过他日记的人都没有理由担心，除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明天，”戈培尔写道，“我们将占领商会大楼。我们将不会遇到太大的抵抗。”

第二天，德国报纸头版头条报道：“国家社会党（纳粹党）人接管商会大楼 商会领袖被捕 整个帝国在行动”。上午10点，成群的冲锋队分队席卷了商会领袖们的总部。在长着一对猪眼，有一张可怖的脸的同性恋司令罗姆的指挥下，身着褐衫的年青冲锋队员横冲直撞，这在柏林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





一战时兴登堡元帅(左)与德皇威廉二世(中)、鲁登道夫将军。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更为凶恶的组织。逮捕 48 个商会领袖的任务是由普鲁士警察执行的，他们得到了其头子戈林的正式命令，第一次使用了新名称“盖世太保”(GESTAPO)，它是德文秘密警察的缩写。

5 个月之前，即 1933 年 1 月 30 日夜晩，整个柏林陷入了狂欢。从傍晚直至深夜，数万名冲锋队员举行盛大的火把游行，以庆祝柏林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刻。43 岁的阿道夫·希特勒，一个维也纳的流浪汉，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里的无名二等兵，现在变成了德国的总理。这似乎是一个新的黎明。但是那一天并非每一个人都看好第三帝国的诞生。当然，年迈又极端保守的陆军元帅兴登堡总统就更不这么认为了。兴登堡是普法战争时期的老兵，1914 年德军东线的总司令。

就在 1933 年 1 月 26 日，兴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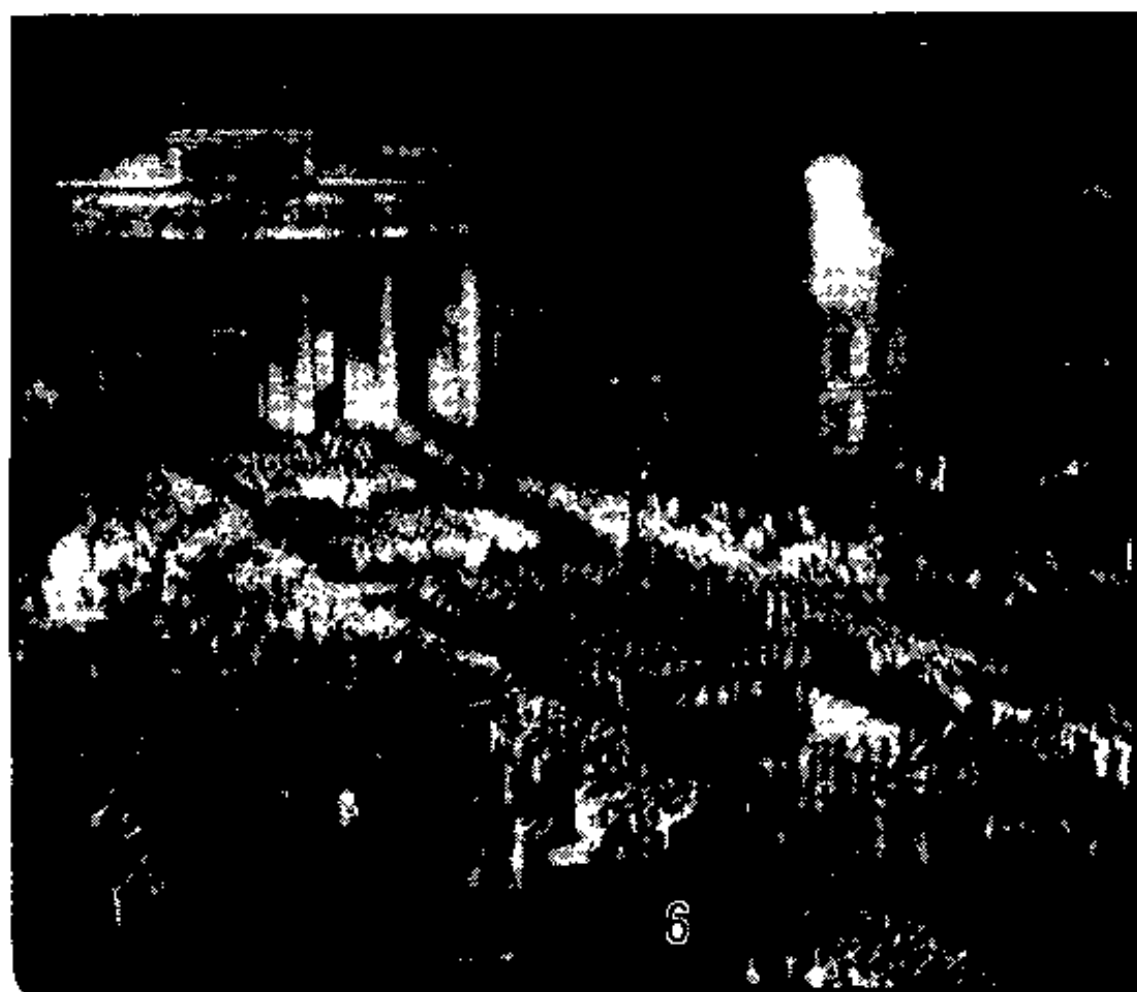


埃利奇·冯·鲁登道夫将军，德国一战英雄。

堡就对他的参谋长说过他还没有确定任命那个“波西米亚上士”当国防部长还是当总理。战争期间曾作过兴登堡总参谋长的鲁登道夫将军写信警告他的老上司：“我必需郑重警告你，这个凶险的家伙会把我们整个国家推向地狱，他会使我们的国家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

德国在 1918 年的惨败使得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国会中的民主党不得不开来收拾德意志帝国崩溃后的残局。当共产党要革命的时候，右翼分子则为德意志共和国于 1919 年签署的凡尔赛和平条约感到痛心和愤怒，他们称这一行为无异于卖国。骚乱和秘密行动最后很快演变成在德国几乎每一座城市街道上出现的公开暴动。德国的民主最终变成了一种病态的形式，即使在魏玛共和国建立初期也是这样，它当时旨在创立一种完善的民主宪法。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 21 年里，一场场运动此起彼伏，这些运动都要求进行一场剧烈的政治变革。有许多人加入了钢盔团，这个党是一个右翼武装，它是退伍的国家主义者的组织。魏玛共和国时期更为臭名昭著的一次右翼冒险是 1920 年的卡普



1933 年一月 30 日，第三帝国正式成立。冲锋队在柏林举行规模浩大的火炬游行以庆祝纳粹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1930年，冯·路德  
维希任艾哈德旅长时  
的照片。



沃夫尔冈·卡普，早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

1923年1月28日，慕尼黑纳粹第一次集会。







在慕尼黑的德国自由军团士兵。

暴动，它妄图用武力推翻柏林的帝国政府。由各种各样的准军事组织构成的自由军团分队则充当这次行动的急先锋。在自由军团

中有一支旅，它首次使用了古代的卐字符号。该旅士兵脚登长统靴，戴着刚刚涂上卐字符号的灰绿色的“煤斗形”钢盔，潮水般涌进首都。他们的首领路德维希将军用下面的话来预言将要家喻户晓的暴行：“我们需要两样东西：秩序和工作……只有强制才能使人们工作。不劳动者不得食。其次，完全禁止罢工……骚乱者将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工人立即作出了一致的反应，他们举行了一次总罢工，使得路德维希和沃尔夫冈·卡普博士的所有企图遭到破产。一场政变就这样很滑稽地失败了。

像这种挑衅性的国家主义的行动并不仅局限于柏林。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古斯塔夫·冯·卡尔的右翼州政府，强烈反对柏林的中央政府所奉行的政策。在慕尼黑，一战时的二等兵阿道夫·希特勒，他依然掌握着他的旧部——第十六巴伐利亚步兵团。他的上司对他那富有煽动性的演讲天才印象非常深刻。他的演讲在煽动各个阶层国家主义者的情绪，在控制不满的激进分子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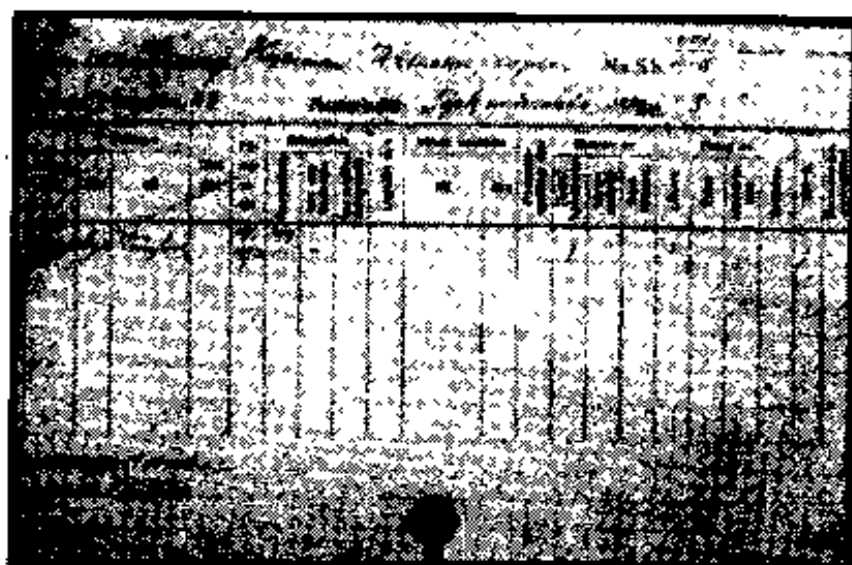
希特勒于1920年2月控制了德国工人党，他的上司曾派他打入该党以刺探情报。这个党的成员都是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他们不承认令人痛恨的《凡尔赛条约》，摒弃共和制，蔑视资本主义。总之，该党的党纲宣称它是站在那些遭到破产、失败、被剥夺了财产的“小人物”一边。

在这一时期，希特勒结识了一个对他十分有用的朋友，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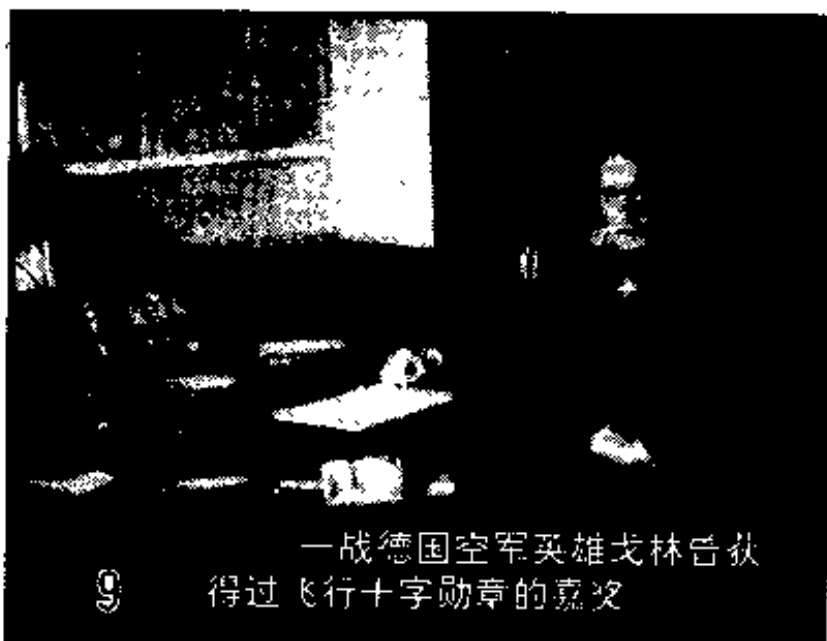


就是令人生畏的罗姆。罗姆当时的任务是在巴伐利亚组织一支称为“黑色帝国国防军”的高度秘密的部队，来非法加强《凡尔赛条约》所限制的 10 万人的官方正规军。罗姆还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即在正规军的全力支持下，将军队的资金转到准军事组织和右翼团体名下，以便有紧急情况时，可作为军队的后备力量。在会见希特勒后，罗姆很快就认识到“希特勒是德国需要的人”。然而，对于希特勒更重要的不是得到认可而是通过罗姆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这期间，希特勒还和戈林有过一次极其重要的会面。戈林是德国家喻户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英雄，是富有传奇色彩的里奇特霍芬歼击机联队的最后一任队长，是德国最高荣誉“优异服



1925 年，戈林在瑞士一家医院看病的病历，上面标明他曾患有精神病。



一战德国空军英雄戈林曾获得过飞行十字勋章的嘉奖

务勋章”的获得者。一战后戈林来到慕尼黑，在大学里学经济，那时他对前途感到渺茫，收入微薄。1922年下半年，一场集会游行在慕尼黑的克尼希广场进行，以抗议同盟国对战败国德国的最新要求。

戈林当时站在人群的边上，入迷地看着人们向一个叫希特勒的人欢呼。听旁边的人讲，他才知道希特勒现在领导着一个小党，名字叫“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或简称“纳粹党”。这是一次不祥的相遇：戈林看到一个30出头、没有经验、穿得破

罗姆的褐衫党徒正在柏林大街上游行示威。





破烂烂的人在这种场合下不愿作演讲。然而，几天以后，戈林的确听到了希特勒关于“凡尔赛条约和引渡德军将领”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当他听到希特勒尖叫“我们用刺刀来对付威胁”和“打倒凡尔赛”时，戈林完全折服了。

希特勒自己则醉心于寻找一种使他的幼稚的举动获得尊重的途径。为了获得开山鼻祖的形象，他推出了对旧秩序的一种有力的崇拜：这里有一位名望不在鲁登道夫将军之下的一战时期的战斗英雄，他就住在慕尼黑附近，而且这个自称是国家主义者的人并不反对使用武力来实现正确的构想。

这一时期柏林政府和巴伐利亚政府互相敌视。普鲁士的选民倾向于左派或持中立态度，而巴伐利亚的情形则是强烈的右倾。巴伐利亚的三位掌权者体现了这种情绪：古斯塔夫·冯·卡尔，一个年迈的专员；奥托·冯·洛索将军，巴伐利亚驻军司令；奥勃斯特·汉斯·冯·塞瑟，州警察首脑。希特勒会见了他们三人，以此作为他大胆赌博的基础。他计划召集鲁登道夫的支持者，由他们出面，通过武力扫平旧秩序。

1923年10月8日，当卡尔正在公民啤酒馆的一次集会上

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中发表一年一度的演讲，庆祝1918年的政治暴动





手校：站在他的战友里奇（右）旁

作演讲时，希特勒出击了。在戈林的帮助下，希特勒动用了罗姆的自由军团式的“帝国战旗组织”和 600 名钢盔团成员。他们包围了地下室，冲入会场并朝天花板放了一枪。在一阵冠冕堂皇的演讲之后，希特勒宣布全国革命，并且废除巴伐利亚和柏林现政府。

希特勒将卡尔及其他人带入后

室，逼迫他们宣布合作。希特勒将在新的政体下直接指挥政治活动，而鲁登道夫（他只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告知这一企图）将统帅整个军队。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卡尔为了拖延时间，只好答应，但当他一脱离冲锋队的威胁后，就立刻取消了他的承诺。这时，暴动本该失败了。但恰恰相反，第二天中午，纳粹党的首脑们带着两千多人朝位于慕尼黑市中心的奥德广场进发，在那里，州警察接到命令在街道上设置了路障。游行者拒绝解散，于是警察就向游行人群开枪。16 个纳粹党党员和 3 名警察死亡。希特勒和戈林也都负了伤，前者只是轻伤。在混乱中，停在旁边的一部汽车将希特勒迅速拉到一位同事家。一颗子弹击穿了戈林腹股沟，差点打断他的动脉。附近的一位犹太银行家帮了他大忙，随后将他偷运至奥地利。

表面上看，暴动失败了，而且声名狼藉，但是在巴伐利亚，希特勒依然拥有大量的支持者。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暴动使得希特勒和他的运动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这个未来的元首和鲁登道夫、罗姆一同被捕并被送上同情他们的法庭，希特勒受到了最低的处罚：5年的“堡垒监禁”，罗姆则被投入斯塔特海姆监狱，而鲁登道夫被无罪开释，在一片热情的“鲁登道夫万岁”的欢呼声中走出法庭。

1924年12月，希特勒从“兰斯堡监狱堡”被提前释放后，他发誓他将放弃暴动的企图。他日后获得权力的方式将仅限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然而，卡普和贝克勒尔是依靠暴力来达到他们的最终目标的。每一个冒险的行为都预示了德国将如何沿着专制的道路走下去直至独裁。在反抗巴伐利亚的暴动中，希特勒已有了两个合适的人选，他们注定会在纳粹党以及盖世太保里得到高位。除了致力于建立盖世太保的戈林外，在暴乱的人群边上还有一个来自“帝国战旗”组织的头目罗姆的追随者。从仅存的一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长着猫头鹰似的脸、戴着眼镜的人，举着帝国军旗，两眼盯着不堪一击的障碍物和铁丝网。这个扛军旗的希特勒在1923年11月9日的慕尼黑暴动中，希特勒（举旗者）夹杂在人群中，毫不起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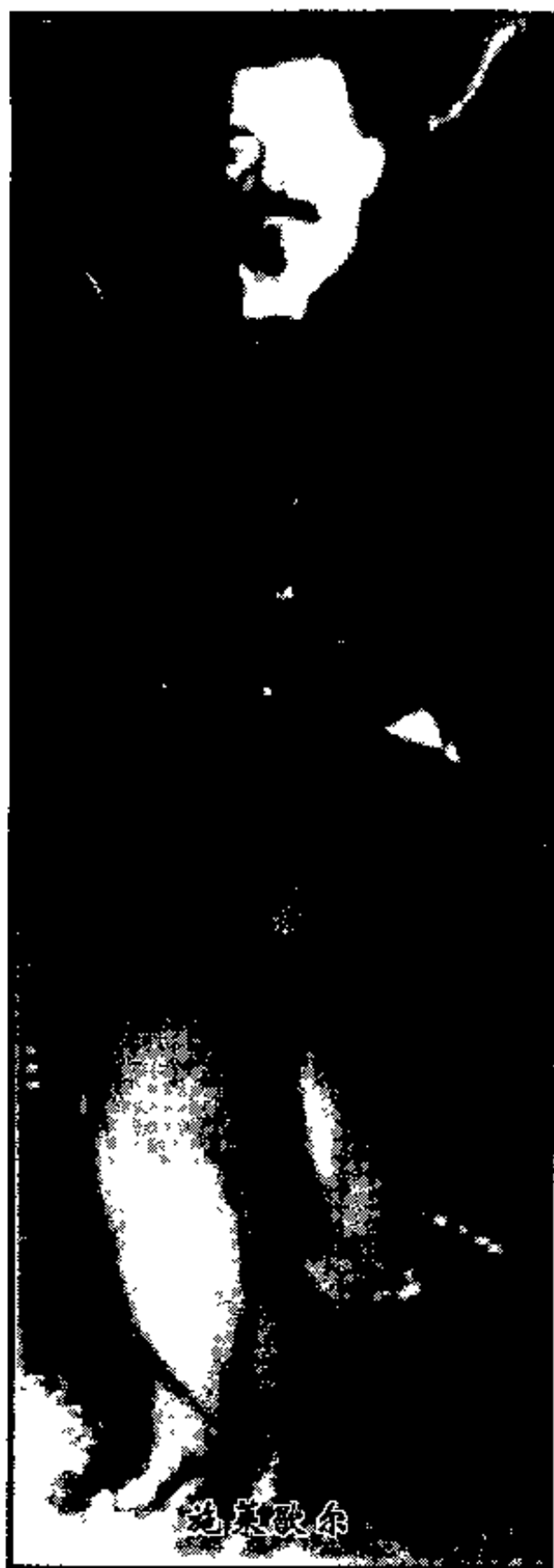
旗的人就是希姆莱。

1929 年是纳粹党低谷。但是，尽管左派党吉星高照，希特勒的追随者们仍获得比以前更多的选票。这些年里，希特勒一直在磨练自己做政治交易的本领，以寻求和右派及中间派达成幕后合作的途径。

1932 年 5 月 30 日，纳粹党夺权斗争的最后阶段来到了。兴登堡突然解除了中央党海因里希·布鲁宁的总理职务，而任命弗朗茨·冯·巴本为继任者。巴本当时受到军队及工业界巨头们的支持。巴本上任不到两个星期，就提出一项法案禁止冲锋队的出现并禁止以前由布鲁宁提出的穿纳粹制服活动。一个月后，各州政府都被解散，代之以不太可能产生抵触情绪的新政府。当奥托·布劳恩的社会民主政府在普鲁士提出抗议时，巴本就立即解散了它。

这些举措深得纳粹党及其追随者的赏识。在 1932 年 6 月的大

选中，纳粹党获得了 230 个席位，一跃而成为德国的第一大党。同年 8 月 30 日，戈林当选为国会议长。库特·冯·施莱歇尔，这个一战时期兴登堡参谋部的将军、自由军团的创建者之一，接替巴本成为德国总理。然而，巴本和施莱歇尔为争夺权力的内斗还在继续。施莱歇尔声称如果希特勒允许他进入内阁并让他





1931年10月11日,戈林(前排右二)、罗姆(前排右四)和希姆莱(前排左二)在纳粹党的一次游行中。后来在谋杀罗姆的过程中,戈林和希姆莱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国会议长戈林(左三)在官邸迎接未来的德国副总理冯·巴本(左二)。





掌握军队，他将支持纳粹政府。而巴本为了不被击败则答应用莱茵河地区工业家的财力来支持希特勒。巴本对希特勒更有利。1933年1月30日中午，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任命巴本为副总理。

希特勒一旦大权在握，他就有必要加快步伐。巴伐利亚人格里格·施特拉塞尔曾是希特勒纳粹党内的竞争对手。他一直是“绝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忠实信徒。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应采取一切手段来加

速资本主义的灭亡。为了这一目标，甚至可以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联合。两个人进行了激烈的争吵，最后施特拉塞尔退出了领导层，但希特勒清楚，为了生存他必须克服党内任何残余的左、右倾分裂。

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当天下午，戈林就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在希特勒的授意下，戈林不费吹灰之力就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定于当晚进行的共产党示威游行。现存的国会备忘录还记录着希特勒从戈林那里得到了全力支持。戈林提出应举行新一轮的全国大选，以便使纳粹党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支持，从而拥有立法权来通过所谓的“权力授予法”。这是一项被称之为“使人民和帝国摆脱困境的法案”。这项法案在短短5





1934 年，希特勒在柏林出席纳粹集会的情景。

1933 年 2 月，冲锋队员在德国共产党总部前聚众闹事。



段话里就赋予了新政府可以不经国会批准而制订法律的权力。

2月1日，希特勒从兴登堡总统那里获得了保证。总统将签署一道命令解散国会。大选定于3月5日举行，但是希特勒和戈林都很清楚获得大选胜利是一回事，保证政府的独裁统治完全又是另一回事。戈林现在实际上就是普鲁士的无冕之王，他可以任意使用他的权力。而实现这一点的工具则是他所掌握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警察。

戈林有无可挑剔的资格官居要职。他是国会议长、普鲁士议会议员，并且还负责过航空。然而，使希特勒看中从而让他掌管警察的却是戈林和普鲁士的联系。因为普鲁士是德国最大的州，它的面积远远超过其他各州。另外，在它的境内还有首都柏林和许许多多的工业中心。

戈林认为，无论警察力量的形式如何演变，它最终都应对普鲁士内务部长负责，即对戈林负责。我们现在常常将盖世太保的诞生归因于希姆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最终获得了对州秘密警察以及党卫队的绝对控制。但是，最初的组织却是戈林冷酷无情和努力创建的结果。

就1933年4月26日盖世太保的诞生，戈林在他的《德国的新生》一书中写道：“开始时，对我来说最最重要的是将警察这一武器牢牢地控制在手里。我进行了第一次大清洗。32个警察总监中有22个人被罢免。随后就是数以百计的监察员和几千名警察……我补充了许多新的人，这些人都毫无例外地来自冲锋队和卫兵。”

3月5日，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次大选开始了。整个选举吵吵闹闹。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纳粹的卐字旗，到处都可听见冲锋队踏正步的声音。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使许多人胆战心惊而投了纳粹党的票，但是，他们的人数还是不够。纳粹党获得了17227180张选票，这比以前的550万张要多得多，但这些也只

占到总投票数的 44%。希特勒并没有赢得多数。中央党干得不错，选票从 4230600 增至 4424900，它的同盟，基督教巴伐利亚人民党则维持着 550 万张选票。甚至社会民主党依然保持着第二大党的地位，它的选票是 7181629 张，只少了 70000 张。共产党则失去了 100 万支持者，但仍然获得了 848058 张票。胡根伯格和巴本领导的国家主义党的选票则跌至 3136760 张，仅占总数的 8%。

即使把国家主义党的 52 个席位加到纳粹党的 288 个席位中，希特勒政府在国会中仅超过半数 16 席。然而，希特勒需要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来通过《权力授予法》。现在还保存的一份资料记录了 1933 年 3 月 15 日的内阁会议的内容。从这份资料上可以看出上述问题由于国会中 81 个共产党员的缺席而得到部分解决。实际上，这些共产党员是担心生命受到威胁而躲藏起来了。从 2 月初起，共产党的集会和共产党的报纸都被禁止了。在该次会议上，戈林提出了一个赤裸裸的毫不讲理的建议：

1934 年希特勒在柏林的一次典礼中装模作样地俯身迎接 86 岁的兴登堡，他身后是戈林。





禁止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进入议会。这些人实际上已被禁止进入议会。当开始投票表决时，基督教中央党领导人妥协了，他起身表示拥护提案。会场外，冲锋队则高叫“权力归一入”。《权力授予法》授予希特勒内阁4年的绝对立法权。就这样，纳粹党在名义上至少得到了立法权，但是，冲锋队又出了问题。褐衫党徒在柏林大街上横冲直撞，随意抢掠东西，威胁群众。他们日益嚣张的行为得到了警察的默认。当这些暴徒乘坐汽车而不付车钱，恐吓店铺老板并抢走他们东西的时候，警察却不闻不问。

戈林传奇般的精力，部分是来自他的吗啡瘾（吗啡最初是用来解除他在那次流产了的政变中负伤的伤痛）。他的这种精力在大选前的几星期里明显地达到高峰。在2月底，他组建了一支有5万人组成的强大的警察队伍，这些入大部分是来自冲锋队和希姆莱领导的党卫队。在大选中，他们说服并引导选民去“正确”的投票站。那些想投对手票的人则会被关进戈林在奥兰林堡和巴本堡所设的两个集中营中的一个。对于追问的入，这些集中营就被简单地说是政治上有不满情绪的人的再教育中心。

另外还有其他野蛮的教育中心也渐渐为持不同政见的人所熟知。那些在纳粹党出现之前对位于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部十分熟悉的人会惊奇地发现，一夜之间情况完全变了。熟悉的卫兵不见了，代之出现的是身着褐衫、臂缠白臂章的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看上去似乎应该在亚历山大监狱栏杆的另一边。审讯室、地牢、走廊简直像在恶梦里一样，每天都有许多男男女女被冲锋队卫兵押到这里，他们从车上下来，被连踢带打地拽入大楼里。偶尔，也有被过分热心的警察以莫须有的罪名捉来的人。这些入大声地喊着一个能证明他们无辜的人的名字。如果他侥幸成功的话，他就会被带去和一个人见面，这个人能保证他离开亚历山大广场。此人就是鲁道夫·迪尔斯。作为未来盖世太保的第一任首脑，迪尔斯在历史上有许多不清楚的

地方，以前，他一直在普鲁士内务部任高级官员。由于他公开声称反共而得戈林的赏识并得到提升。作为盖世太保的创始人，多疑的戈林并不怎么太关心他的下属是不是党员。他喜欢挑选那些他认为能够一起工作并在非常严格的范围内能够信赖的人。

迪尔斯，这个戈林在这一时期所信任的人，生于1900年，他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在吉森大学和马尔伯格大学他主修医学和法律。然而，他却不专心于学业。除了喜欢和别人决斗外，据说他还是一个挥霍无度的贪杯者。现在有大量关于政治人物的普鲁士州警察的秘密



鲁道夫·迪尔斯（1900～1957），盖世太保第一任首领。

档案经他手处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里面的重要价值。自然，这些档案里也包括他这个部门感兴趣的纳粹党首脑们的卷宗，其中也有戈林的。戈林非但没有感到受到侮辱，相反他大大地赞扬了迪尔斯的热情。当然，这里面也有戈林自己的考虑：因为这样他自己可以获得纳粹党里所有丑闻的第一手资料。谈到迪尔斯，用他党卫队的同事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颇善言辞，效率很高的策划者”。迪尔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向戈林谄媚从而获得戈林欢心的。

戈林完全有理由感到满意。毕竟，他已经清洗了柏林的警察。有5万名武装了的后备军带着卐字旗整天在街上昂首阔步，他们每天的工资是3马克。另外，戈林已签署命令征募冲锋队成员和钢盔团成员作为警察力量的补充。

戈林于1933年4月26日进一步签署命令，组建国家秘密

警察办公室，随后更名为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开始给这个新机构命名为GPA或GPS，它和苏联警察GPU的缩写非常相似。而发明出历史上最恐怖的缩写的功劳，一般认为当属一个不怎么耐心的普鲁士邮政官员，当时他想找到一个方便的速记以使这些字能很好地刻到通用的橡皮图章上。戈林所继承下来的警察体系结构具有许多特性，当盖世太保作为官僚机构最终确定下来后，在这方面就不再改变了。在普鲁士，便衣警察局由刑事警察、一群侦探和政治警察构成。迪尔斯将要接管的正是这样的组织，然后把它们转变成盖世太保。穿制服的警察由秩序警察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在较大的城市设置路障或作为机动小分队来平息国内的骚乱。

戈林主要关心的是刑事警察。从中他划分出一个专管政治的部门，连同处理重要的叛国案件的政治警察以及反间谍警察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盖世太保。对于这个新成立的盖世太保来说有许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共产党的力量 and 影响依然是它最担心和最迫切要处理的。在盖世太保披着合法外衣干着这些勾当之前，需要确切地知道共产党的威胁有多大。

2月27日夜，戈林的机会终于来了。是夜，德国国会大厦突然起火。一位过路者看到二楼的窗口有一个人在挥舞着火炬。戈林迅速赶到现场，当众逮捕了那个纵火的共产党员。此人叫马里纽斯·冯·德鲁比，一个脑子迟钝的丹麦共产党

“国会纵火案”的嫌疑犯、砖瓦匠冯·德鲁比。







身穿囚衣的德鲁比正在德国最高法院接受审判。



1933年2月27日晚10点左  
右，燃烧起火的柏林国会大厦。

10月30日清晨，消防队员扑灭  
国会大厦的大火时，这栋曾经辉煌  
一时的建筑已经成为一堆瓦砾。



的理想主义者。他是在逃出大厦时被捕的。戈林指控他是共产党的间谍，随后就交给迪尔斯审讯。另外3个领头的共产党员也遭逮捕。普鲁士警方还抓了4000多人。德鲁比随后被判处死刑。

关于究竟是谁放火焚烧了国会大厦的调查一直进行了半个世纪。共产党是否放了火，抑或是纳粹党假借对手的名义自己将大厦付之一炬，这个问题可能永无定论。在当时，还有许多人相信此事是来自慕尼黑的党卫队干的。而现在的许多历史学家则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大火是德鲁比放的，因为他以前曾三次企图放火烧掉其他建筑物，其中包括柏林市政大楼，以表达他个人对政府的不满，但他一次也没成功过。非常巧的是，这一观点和迪尔斯在审讯德鲁比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

戈林与他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在一起的合影。

对戈林来说，不管是谁放的火都一样。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从此就开始了。第二天他就颁布了我们平常所称的“二月二十八日紧急法”，“以保卫人民和国家”。这无异于完全剥夺了公民的个人自由。警察被授予全权可以不经批准而搜查或逮捕任何人。他们可以随意将人投入监狱而无需提出指控或经法官审判。此外，该法令授权帝国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全权接管联邦各州，





1936年10月29日，戈林在柏林一家体育馆向15000名听众发表演讲。

可以对一些罪行，如持枪者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罪”，处以死刑。年迈体弱、老眼昏花的兴登堡总统一言未发地签署了这项法令。

共产党——至少在此刻——显得很“顺从”，但是在德国城市的大街小巷，冲锋队还在继续抢劫，这种势头有增无减难以控制。戈林一直筹划搞掉罗姆的支持者

并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作为这一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他将迪尔斯的柏林警察局反共部门移至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街8号，这里由于盖世太保而日后闻名于世。

至此，我们尚未提及另外两个对第三帝国忠心耿耿、具有狂热野心的奴仆。他们一个是希姆莱，那个罗姆手下戴眼镜的无名小卒，那个10年前慕尼黑那场未遂政变中扛着帝国军旗、眼睛盯着路障的人。另一个叫海德里希，一个残酷无情、野心勃勃的前海军军官。这两人都想独揽新生的盖世太保的大权，因此，视戈林为他们达到最终目标的绊脚石。

1929年，希姆莱年仅28岁，就完全控制了党卫队。他被授予党卫队领袖的军衔，这一称号几乎伴随着他走完他的一生。尽管如此，1929年的党卫队势力还很弱小，充其量不过两百来



人。这意味着希姆莱所向往的真正的权力离他还很遥远。即使到了1932年，当党卫队的力量增加到3万人时，它依然从属于拥有230万人之众的罗姆的冲锋队。希特勒掌权后，希姆莱也只得到巴伐利亚警察总监的位置。尽管如此，希姆莱，一个面色苍白的小官僚，“一个小走卒”（戈林这么称希姆莱），虽然对巴伐利亚以外的事情知之甚少，但仍决定以此为跳板来壮大自己的势力。

席卷全德国的纳粹运动给希姆莱创造了契机。除了普鲁士外，德国其他州的议会都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希特勒任命的地区长官。暂时，希姆莱对普鲁士还无所作为，但他却能安心等待。在此期间，他派出下属四处打探。他们被告知去寻找可能空缺的警察的职位。当他们找到一个这样的空缺时，就表明或许巴伐利亚警察总监就是这一职位的最好人选。

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数月之内，希姆莱便控制了帝国第二大城市汉堡的警察。接下来是梅赫伦堡、吕贝克、图林根、大德意志黑森、巴登、符腾堡和安哈尔特。1934年初，希姆莱又控制了巴登、奥登堡、萨克森。到了春天，希姆莱除了普鲁士

1838年1月，摄于纳粹德国的一次高级会议间隙，左起为戈培尔、希姆莱、赫斯、希特勒、布伦堡、弗立契和雷德尔。



戈林此时在思想上有了新的认识。他承认，警察工作自有其魅力。很清楚，必须要有一个机构来监视罗姆那帮蠢才。但是，戈林不像希姆莱那样有耐心，一旦盖世太保成立后，他便失去了兴趣。

这位德国前飞行英雄一直怀有重振德国空军雄风的梦想。当兴登堡总统 1933 年提升他为步兵将军时，这一热望重又在他胸中燃起。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比当一名荣耀的警察更有吸引力。然而，戈林又不情愿放弃对盖世太保的控制，因为那是他的盖世太保。他也知道狡猾而又会拍马的希姆莱对他这一位置的威胁。这个党卫队的首脑对普鲁士的盖世太保垂涎已久，他一直在恳求希特勒，说“在整个帝国内对敌人的追踪将是公正、及时和必须的”。迪尔斯对希姆莱所施加的压力感到不安。迪尔斯清楚他在下属中已树敌太多，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在觊觎他的

国会纵火案后，克洛尔国家剧院成为纳粹政府举行例会的地方。前排左起为：戈培尔、赫斯、戈林，前排右起为：雷德尔、约德尔、布伦堡、希特勒，二排左三为德国国防军创始人之一的锡克特将军。





1934年6月，豪华的戈林为他的前妻举行隆重的移葬仪式，出席这次仪式的有希特勒及所有的内阁成员。

职位。要搜集迪尔斯的不体面的言行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实际上，他的对手已经这么做了并且把它呈报给了兴登堡总统。迪尔斯作了牺牲品。作为补偿，他得到了柏林警察代理督导的职位。然而，迪尔斯很清醒，柏林这地方充满了火药味，他觉得避开一段时间是明智的。他穿过前线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并在那里住了下来，坐山观虎斗。

戈林任命一个叫辛克尔的老卫兵来接替迪尔斯。尽管辛克尔忠心耿耿，但他有个毛病就是太贪杯了。上任后天天在办公室里烂醉如泥，10月底，任期未过一月他就被解职了。戈林用电报召回迪尔斯，后者同意继续在原岗位上任职。迪尔斯的任期一直到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到达柏林。4月1日，他的卸任最后确定。作为分别的表示，他被授予科隆地区政府首脑的职务。

直到那时，戈林才定下决心：他将放弃对盖世太保的直接控制而由希姆莱担任领导。后者，永远隐藏在那一副金属眼镜架后面，顺从而又冷静。他于1934年4月20日上任。这绝对是



使他的爱玩弄阴谋的同伙海德里希也感到非常满意的。第二天党报《人民观察家》刊载的大字标题：“帝国统帅希姆莱接替戈林成为普鲁士秘密警察领导人”。戈林，作为普鲁士总理和内务部长，签署了一项命令将希姆莱的权力扩大为国家秘密警察署督导。命令的开头引用了希姆莱的一段话，这些话的内容引起了各部门的注意。



1934年4月20日，戈林将盖世太保的指挥权交给希姆莱。

命令说：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希姆莱，他将在没有普鲁士州部长参予的情况下处理普鲁士秘密警察的所有事宜。希姆莱将被授予全权并仅对我直接负责。所有来往的信件将冠以“普鲁士秘密警察署 代理长官和检查官”，并且从此以后将专门送至柏林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街8号秘密警察署。

签名：戈林

在接受任命的演说中，希姆莱尽可能地作出和善的姿态，他向戈林保证说：“我永远信任你。你永远不会担心会有什么威胁。”

戈林作为第三帝国警察的太上皇的时代已经结束。下面开始的是希姆莱时代。

1937年9月，迈向权力顶峰的希特勒  
参加在汉诺威举行的盛大纳粹集会。



# B

## 希姆莱与党卫队

瓦尔特·多恩伯格，德国军队的老兵，纳粹德国 V-2 火箭研制的总负责人，以一种迷惑的眼光看着高级会议室里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头子，“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学识渊博的小学教师，而不会是一个崇尚暴力的人。我恐怕一辈子也看不出这个身着灰色党卫队制服，中等身材，年轻而又略现瘦弱的人到底有什么出色或与众不同之处。不太高的眉毛下，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直视着我。闪闪发光的夹鼻眼



希姆莱在慕尼黑大学技术中专读书时的登记照。



镜后面的那两只眼睛总是透露出安详又带点怀疑的神情。笔直漂亮的鼻子下面修剪得很好的小胡子，在他那苍白而不太健康的脸上划出一道黑线。他的双唇没有血色而且很单薄。只有他那不太显眼，向里凹的下巴倒使我感到惊讶……他的手纤长、苍白，像女孩子的一样柔软，上面青筋暴露。”

希姆莱出身高贵。他的父亲戈培哈德·希姆莱受到了他的巴伐利亚邻居的普遍尊敬。1900年戈培哈德·希姆莱教授很满足于现状了，因为他在35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份稳定的职业：慕尼黑一所学校的校长。

他一直受着威特尔斯巴赫王室的赞助，威特尔斯巴赫在慕尼黑大学学习语言学的时候曾听过他的课。他曾被任命为巴伐利亚海因里希王子的指导教师。老希姆莱总是提醒大家，只是在此之后，他才成为教师。从幸存的“教授先生”的照片可以看到他勤勉、一本正经、迂腐的个性。这些性格将传到他妻子安娜于1900年10月7日在慕尼黑海德加特舒适的公寓里生的第二个孩子身上。

第一个孩子取了他父亲的名子戈培哈德。第二个孩子海因里希，送给了巴伐利亚王子。第三个孩子恩斯特，生于1905年，出生时仅有6磅重，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而且视力也不好。正是从戈培哈德那儿，我们才敢说年轻时期的海因里希“对老年妇女非常好，他可以为她们跑腿，帮他们搬东西”。

据说，海因里希喜欢服从命令守纪律。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向往军队的生活。他一直等到1918年才在巴伐利亚第十一兵团找到一个职位，但这并不能满足他的野心。对他来说，一战结束得太早，以致于他没有得到提升，他的服役纪录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上官生。由于美梦变成泡影，他只能不得已求其次，想在并不令人满意的志愿军中任职。他想由此而在和平时期的军队里谋得一官半职。但这时他的父亲出面干预了：整个德国被政客出买，在战争中遭到惨败，现在国内经济濒于破产，物价飞涨，在这样的国家军队里任职有什么用呢？海因里希必须找一份更稳定的工

作。这个男孩天生顺从，可能永远不会违背他父亲的旨意。除了当兵，最能吸引海德里希的就是务农。还在儿童时，他就喜欢收集花园中的各种植物，尤其是一些草本植物。在日后他管辖的集中营，他下了一条命令种植各种各样他认为有用的草本植物。

然而，希姆莱注定不会平平静静地干他的农活。他去军营附近的农场学习经商，但他的好梦还没开始就又破碎了。甲状腺热使他体质变得极其虚弱，不能胜任军队的生活。尽管他可以参加学习，但他被告知必须避免体力劳动。1919年10月18日，他成为慕尼黑大学技术中专的一名农技专业的学生。

他是一个非常正经的学生，整日在埋头读他的植物学、土壤施肥和化学方面的书。然而，他内心又具有强烈的普鲁士人的特征，他对待金钱一丝不苟，是一个很好的管理家。这个日后党卫队的首脑、经常被人提及的纳粹德国炙手可热的人，将要有意识地从他的薪水扣除用于个人的汽油费的人，现在则是理财的行家，他用从他父亲那儿得到的零花钱紧巴巴地过日子，他保存着所有的收据和票根。

在他所读的书中，他从理查得·瓦尔特·戴尔所归纳总结的法令原则里获益匪浅。戴尔是纳粹党最早的拥护者之一，他关于农业、选择繁殖的观点和希特勒完全一致。在他的《鲜血与土壤》一书里，戴尔提出应作为“雅利安人种的生命源泉”来保护农民，拉丁人种，戴尔说，是劣等种族，其中最主要的是黑人和亚洲人。

希姆莱像个小孩子一样，全盘吸收了这些种族主义者杂七杂八的偏见，他最仇视犹太人。他开始不太关心学习，而是醉心于健



1922年在罗姆的周旋下加入帝国战旗组织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哥哥戈培哈德·希姆莱。

康和体格锻炼。令人可笑的是，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他甚至连大学体育馆中的双杠都够不着。在他滑稽地追求强壮和体格健美的过程中，他有意识地参加慕尼黑学生决斗和射击团体。在经过数月的请求之后，他最终为他自己找到了一次决斗的机会。他对他随后的行为非常满意，后来他写道：“我当然一点也不急躁。我笔挺地站着，打得很有技巧，而且动作也很漂亮。我的对手被心服口服地击了好几下。”

库特·达吕格(左二)、希姆莱(左三)与罗姆(右一)在一起。







恩斯特·罗姆的上半截鼻子在 1914 年被子弹打掉了。

希姆莱在预定的 50 场比赛的第 13 场被打伤。当两个决斗者被助手带下去缝合伤口时，严峻的考验来到了。希姆莱被击中 5 下。他们给他缝了 5 针，并打上一条绷带。希姆莱写道：“我一点也没有退缩。”他认为他已经证明了他自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希姆莱于 1922 年 1 月见到了罗姆。罗姆当时正在为纳粹党搜寻人才（因为他正将他遇到的人提供给冲锋队）。罗姆在寻找同性恋伙伴方面也很卖力。不过，如果他在这方面对希姆莱感兴趣的话，那么，他是注定要失望的。希姆莱的性倾向无论多么有限，毫无疑问是异性恋（“陪冯·布克夫人回家，她没有挽着我的手臂，我比较欣赏这一点。”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的确，希姆莱对同性恋十分恐惧。很可能罗姆最终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很精明地改变了策略。希姆莱最主要的价值在于他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合作伙伴。在这一方面，罗姆倒很有吸引力，希姆莱和他的胞兄很快就加入进来，成为帝国战旗组织的一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参加了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那次以失败告终的暴动。

希姆莱于 1922 年毕业。他的研究包括化学以及如何培育植物和庄稼新品种。他还在一家农业公司当实验室助理。这份工作有两个好处：一则，使希姆莱有了一份收入，二则，这家公司离慕尼黑只有 15 英里。因此， he 可以和德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保持

施特拉塞尔（1892～1934 年）1932 年时照片，他是早期希特勒攀爬纳粹党领袖的主要竞争对手。



联系，可以不单单研究罗姆的活动，更可以研究希特勒的活动。这时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正在导致纳粹党的形成。

直到 1923 年 8 月，即慕尼黑暴动前 4 个月，希姆莱申请加入纳粹党。作为行动的一部分，罗姆已经同意向设在施恩菲尔德大街的国防部的军事总部进发。在那里他可以将他的人躲藏在铁丝网之后，并布置机枪防御阵地。然而，第二天的事件迫使罗姆缴械投降，他被囚禁于斯塔得海姆监狱。希姆莱在日记里记载着他骑着奖给他的二手摩托车去拜访罗姆，罗姆正在作政治演讲，对送来的桔子和报纸他非常感激。

当罗姆从监狱释放出来后，希姆莱发誓他将为这个“上帝优秀的作家”贡献全部的精力。当希特勒还囚禁在兰斯堡监狱时，罗姆就一直着手他的计划即组建一个“革命”的组织，其中包括国家主义者和反犹团体。这个计划日后被称为“种族主义运动”。在主要的支持者中有两个人在以后纳粹运动中非常出名。他们一个是失败者，另一个则是幸运者，至少直到战后他站在纽伦堡被告席上之前，他是个幸运者。施特拉塞尔在巴伐利亚的兰茨胡特拥有一家化学试剂商店。这个冷酷、生活富裕、金发的巴伐利亚人相信，纳粹主义应强调它的社会主义特征。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是个崇尚暴力、积极反犹的爱沙尼亚人。1920 年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见过他。在希特勒被监禁期间，他扮演着纳粹党代理领导人的角色。罗森堡认为“自由主义”已经使雅利安人种的优势荡然无存，低等入种夺取了权力。德国人面临的神圣职责就是去征服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种族主义者在巴伐利亚政府中已经成了举足轻重的力量。1924 年的大选中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来获得支持，最终在国会中赢得 32 个议席，其中施特拉塞尔、罗姆、鲁登道夫都成为国会议员。

到了希特勒从兰斯堡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只有施特拉塞尔一人还保留他在国会的席位，其他人在一次选举中皆落选了。对此，希特勒一定是感到相当满意的，他不喜欢潜在的竞争对手。然而，他却对重建纳粹党很感兴趣，纳粹党在他被监禁期间已经支离破



纳粹哲学家罗森堡后来担任了纳粹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这是他在苏联德占区接受乌克兰儿童的献花，他身后是一群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军官。



碎了。

希特勒对作为对手的罗森堡并不担心，罗森堡笃信纳粹的种族信条并成为最富有演讲鼓动力的信徒之一。两个真正使希特勒感到担心的是施特拉塞尔和罗姆，前者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他是一个著名的演讲家，一个富有热情、精力充沛的组织者。对希特勒而言，施特拉塞尔可能过于聪明了点儿。施特拉塞尔很清楚地向希特勒表明他是根本不会全力支持希特勒的力量。身有枪伤、爱吵吵闹闹的罗姆则毫不隐瞒他将最终成为德国武装力量的统治者。那时，罗姆得到了一次机会，他被授予上校军衔并被派到南美去训练巴西的军队。

罗姆对自己说这一职位只是垫脚石，等到他返回时，胜利女神便会向他招手，同时这对提高他的声望极为有利。1925年，罗姆从党内退出。现在希特勒只剩下施特拉塞尔一个对手了。

希姆莱，这个热心的皈依者怎么样了？这位纳粹党徒现在是时来运转。施特拉塞尔和他的兄弟奥托可以给希姆莱提供一个工资比较高的秘书性工作。希姆莱表面上对给施特拉塞尔当个卑谦的打杂工很满意，他起草信件，拿拿文件，尽职尽责，施特拉塞尔任命希姆莱为下巴伐利亚地区行政长官，很自然，他要在慕尼黑希特勒的阴影下工作了，更糟糕的是他的工资每月只有120马克。然而，希姆莱对金钱没有太多的兴趣。他想得到的只有权力。至少，施特拉塞尔给了他一个名义上的职务——一个非常响亮的地区民选部门主任的头衔。希姆莱也是一个二百来人小组织的第二号人物。该组织称为禁卫军或党卫队，它的最初形式是希特勒总部的卫队。希姆莱本人于1925年加入党卫队，他的党卫队编号是168。

1925年还发生了另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一次是希姆莱和戈培尔相遇。戈培尔，这个莱茵地区的瘸子，是一个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还是施特拉塞尔种族主义理论的热烈崇拜者。在“革命”运动中，他和希姆莱各自展现了他们非凡的才干。戈培尔是一个



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精于说谎，且是歪曲事实的能手，由希特勒亲自选拔出来作他的主要助手之一。本图摄于1933年11月。

天才的演说家和政论家，而希姆莱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兴趣，他的热情已淹没在数不清的文件和卷宗中，根本没有时间对他的种族

希姆莱在技术中专读书时，正是德国社会动荡不安之际，这是学生们在焚烧书籍。



主义信条进行自我陶醉式的思索。希特勒很快就发现了戈培尔这颗耀眼的明星，他感到他在柏林已越来越需要戈培尔了。1926年，他对戈培尔的几句奉承话使戈培尔接受了那个地区的行政首长的职位。

希姆莱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巩固他在下巴伐利亚的地位。尽管，他在本质上仍然是个跑堂的。上司希望他能多发展党员，募集捐款，为党报《人民观察家》作宣传。1926年他出任帝国代理宣传部长。希姆莱开始大量召募

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市民与学生不断上街游行，这些游行学生所乘的卡车上写着：“我们学生抵制国外知识的冲击！”





下属，他的薪水也随之提高了很多。同年，在去柏林的途中，希姆莱结识了玛格丽特·康采佐娃，一个波兰血统的金发女护士，她身上具有一种主宰人的气质，她长他8岁。玛佳（人们常常这么称呼她）在柏林拥有一家小护理所。她对希姆莱关于医学方面的异乎寻常的观点表示赞同。特别在顺势疗法上，她非常赞赏希姆莱的看法。另外，她对某些专门的学科，如催眠术、占星术、治疗性

希姆莱与其妻子玛佳，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



希姆莱的女儿古德伦6岁时的照片。



催眠术等也表现出很大兴趣。这似乎是理想的婚姻，双方都是高效、节俭、严格生活方式的热情崇拜者。正是在追求这种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中，玛佳卖掉了她的护理所，将钱投入距慕尼黑有几十英里的瓦尔德图得林的一处小地产中，靠卖农产品和农具来挣钱。他们于1928年7月结婚，次年玛佳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古德伦。这个女儿被认为是结婚前所生的。这一情形和希姆莱婚前行为不检点吻合。希姆莱曾向施特拉塞尔郑重地提起过这件他引以为疚的过失，而后者用巧妙的回答避开了这一问题。

1929年对希姆莱来说在其他方面也是重要的一年。党卫队第一任领导是约瑟夫·贝拉托尔德。他的继任者是前警察密探埃哈德·霍登，希姆莱则是他的副手。霍登继承了冲锋队的吵吵闹闹的令人讨厌的坏风气。党卫队的成员自视为纳粹党中的贵族。对于霍登及希姆莱来说，他们感到必须和人数庞大但组织松散的冲锋队竞争。一方面霍登认为党卫队“非常有效但同时又很妄自尊大”。另一方面，希姆莱则声称：“冲锋队是队列中的步兵，而党卫队则相当于禁卫军。自古以来就有禁卫军：波斯帝国有过，希腊人、凯撒、拿破仑、腓特烈大帝，直至一战都有过禁卫军。党卫队将是新德国的帝国禁卫军。”

这样的热情，更不用说希姆莱所具有的严格自律的品质和组织才能，很快得到了希特勒的赏识。1929年1月6日对纳粹党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希姆莱继承了党卫队领袖的职位。这个夸张的头衔可能使希姆莱欣喜若狂，但此时并没有对外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实际上，成为党卫队领袖仅仅意味着可以指挥慕尼黑谢林大街50号的一支不足300人的队伍。使希姆莱最为忧虑的是由于戈培尔出色的宣传和公关技巧，种族主义的中心已经移到了柏林。那里的党卫队在另一个志愿军老兵库特·达吕格的领导下，不听他的调遣，自行其事，这使他很担心。当然，他也没有忘记他的心腹大患冲锋队。

另外，希姆莱的个人生活十分单调。他这时已经28岁，前途并

不十分明朗，收入也很菲薄。他还有一个比他年纪大的怀孕的妻子，有一点点用薪水购置的财产，他几乎入不敷出。更糟的是，玛佳渐渐对他感到厌烦了，因为他不顾家庭而热衷于政治。如果说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真正的感情的话，那么这种感情也像钞票一样很快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易激动而又神经过敏的希姆莱似乎容忍了玛佳的唠叨。他们的关系一直不好，在古德伦出生后不久，他们就分居了。希特勒已任命他组建一支绝对可靠的部队，部队的成员都要经过严格的挑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希姆莱分心。



希姆莱从别的地方几乎得不到鼓励。冲锋队最高指挥官弗朗

1933年，第三帝国的所有警察（包括民事警察、政治警察、秘密警察）都划归希姆莱和党卫队管辖。



茨·冯·所罗门，毫不掩饰他的敌意。希姆莱则用他最有效的武器予以回击：办公室备忘录。在元首的应允下，他写了一份，作为命令发给所罗门。实际上，这份备忘录就构成了党卫队条例：党卫队成员必须是我们种族的精英，只有那些能达到雅利安英雄标准的人才资格入选党卫队。

1931年6月，希姆莱发表了一次演讲：“我们的敌人正妄图使德国布尔什维克化，他们的人数正在增加。我们情报部们的任务就是去发现他们，镇压他们，这是党卫队目前最重要的任务。”由于希姆莱对冲锋队所采取的“偷猎”政策，党卫队的人数不断增加，因此，希姆莱又在党卫队下增设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里的秘密情报部门负责收集所有敌对党派的情报。

此时，党卫队中又多了一个新的可怕的幽灵：盖世太保。本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使许多知识分子流离失所，他们中的许多人从纳粹运动中寻找避风港。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一个金发、高傲、冷酷无情的人，就是从这群人中脱颖而出的。他懂一些情报学知识，而且天生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很快就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来为希姆莱服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海德里希在时机的选择上无可挑剔。

纳粹党对使用间谍非常入迷。搞得敌人随处可见。比如，我们知道关于纳粹党和施特拉塞尔及他的兄弟奥托（他也是左翼党的代表）的关系就很牵强附会。施特拉塞尔曾公开宣布他的观点，说希特勒向“德国国家保守”集团讨好，他向右倾得太厉害了。冲锋队继续在捣乱，即使那些信誓旦旦的纳粹信徒也持观望态度。希姆莱委托海德里希成立保安处，并招募密探。这最后就演变成党卫队保安处，它可以及时地和盖世太保合作。

海德里希承担了将党卫队保安处转变成纳粹党的主要秘密部门。这个新门徒工作非常卖力，他得到了希特勒的全力支持。1932年1月25日，希姆莱被任命为位于慕尼黑布里纳大街45号的纳粹党总部的安全司令。一道由当时仍是党卫队上级的冲锋队



发布的命令说“所有党总部的安全工作交由党卫队负责”。关于希姆莱个人的权力故意写得很含糊，“希姆莱的责任是采取措施防止马克思主义者及共产党分子的袭击，并阻止警察的干预。”希姆莱的目的正是利用一切机会来为他认为值得的事服务。但确切地说，这些事到底有多少价值呢？

从最重要的 1933 年 1 月 30 日的情况来看，答案似乎是：没多少。对希姆莱而言，他们已设计好了的第三帝国及“国家革命”在失望中开始了。柏林的每一个人都在拼命获得最诱人的工作，但没有人邀请这个瓦尔德图得林的收入微薄的农民来分享外快。希特勒打算只将希姆莱提升一级，即担任慕尼黑警察总长，然后，一步步地提升他为全巴伐利亚警察首脑。

俯首贴耳的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则被指派了一项搜集整理帝国政治敌人的档案的工作。纳粹党的情报网应运而生，它的成员对有关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以及党员的私生活等等任何情报都感兴趣。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关押着的一批政治犯。





1934年，希姆莱在柏林向希特勒介绍新式德国警服的情景。

趣。在1933年4月的一份党卫队命令中，希姆莱详细阐述了情报网的基本目的：“我们可以从可疑分子那里得到许多将来可能有用的情报。尽管对他们的卖国行为的怀疑最后可能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我们还可以劝他们为党卫队保安处提供情报，这些情报将会使我们发现另一个可疑分子。我们可以采取监禁、威胁或答应释放来获得这些情报。”

希姆莱继续着手进行他的工作。他意识到在柏林和迪尔斯领导的盖世太保打交道会发生什么，他决定模仿戈林建立自己的集中营。第一座集中营的地址，希姆莱选择了在慕尼黑西北约12英里的达豪，那里有一座废弃不用的面粉厂，里面有几间石屋。这座集中营是作为那些被投入再教育中心的人的收容地而建立的。犯人将被告知：“根据帝国总理于1933年2月28日颁布的人民和国家保护法第一款，以保障公共安全及秩序的名义，将你送入监狱。原因：被怀疑参与威胁国家安全的行动。”这些冷冰冰的官腔十足的术语代表了希姆莱建立警察国家的全部过程。

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被认为是警察中的精英，在不算大

的党卫队里它一直是一个小不点，而党卫队又从属于冲锋队。更糟的是，冲锋队现在又在刚刚从巴西回来并被希特勒任命为冲锋队总参谋长的罗姆管辖下。另外，柏林部门的领导权握在艾德蒙德·海恩斯的手中，他是罗姆的同性恋伙伴，是冲锋队中最有权势的一个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非常希望能够建立以柏林为基地的遍及全国的盖世太保网络，他们在等待时机。

上天保佑，机会终于来了。海德里希的一个密探声称他听到消息说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正策划谋杀戈林。尽管党卫队在慕尼黑逮捕了一些人，但这一阴谋是否存在依然无法确定。不管这消息是真是假，希姆莱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对希特勒的报告自然是毕恭毕敬的。希姆莱条理清晰地向希特勒提出：他想知道，一个活生生的警察组织连谋杀它首脑的阴谋都不知晓，到底是怎么搞的。

补救的方法就是将帝国的所有警察力量（包括内务警察、政治警察、秘密警察）都置于党卫队的控制之下。希特勒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终于同意了。在戈林的允许下，普鲁士内务部、政治警察包括盖世太保都交由希姆莱领导。最后，希姆莱终于进入了柏林，他带来了三个营的纪律严明的党卫队，他们的身后还有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的支持。海德里希将总部设在威廉大街 103 号新成立的党卫队保安处处长办公室。

从此，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成了希姆莱整个生命的中心。他每天的活动非常有规律，早晨 8 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工作 16 个小时。他旅行时总是带着秘书，以便和他的办公室保持无线电联系。在火车上或飞机里他不停地起草和口述记录。他随身带着大量的文件，当他读完并同意时，就用绿铅笔（这种颜色是绝对不允许别人使用的）在边上小心地签上名字。由于希姆莱实际上没有自己的私生活，他和玛佳的关系更加恶化。然而，希姆莱固有的普鲁士主义思想并没有阻碍他找一个情妇：一个叫路德维希的女孩，她是他的私人秘书。但是希姆莱考虑到他自己的面子，他没有和玛佳离婚。

总而言之，希姆莱对文件的思考处理使他摆脱了家庭的不愉



快。瓦尔特·舒伦堡曾经在波恩大学学习过医学和法律，后来成为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手下最优秀的年轻军官之一，由于职务的方便，他可以非常仔细地观察希姆莱。他认为：

希姆莱像一个非常苛刻地批改学生作业的校长。他的整个为人充分体现了他严谨、勤奋、忠诚的工作作风……他天生不爱表达意见，对其他人来讲，收敛锋芒会更安全些。如果日后证明某个批评是错误的，那么他就要找出这个犯错误的下属。这种制度使希姆莱给人以一

德意志帝国的创建者腓特烈一世的塑像。

在帕德博恩附近，希姆莱重修了威尔威斯伯格堡，其中每间房屋都以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命名，希姆莱的房间就叫「腓特烈一世」。





种超然的感觉，他总是能站在较高的层次来对待一件普通的冲突。这使他成为最后的仲裁者。

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面目。希姆莱的脑海里仍然充满着日尔曼民族的理想，充满着为所有党卫队士兵进行种族净化的梦想。

希姆莱一点儿也不受他双亲传统的天主教教义的约束，但他对天主教仍然心怀崇拜。他甚至急于组建一个中心来表达他的这种感激。因此，许多党卫队的规定都是仿效天主教的原则而制定的。天主教的创建者圣依纳·罗耀纳提出的一套服务规则和宗教运动成为希姆莱让他手下的党卫队真心诚意效仿的范本。然而，天主教理想本身却不怎么有效。

希姆莱还被 12 世纪末期具有狂热宗教信仰的骑士形象所吸引。正是这些骑士形象启发他创建了一种相类似的党卫队骑士规则。希姆莱的头脑里还幻想着建立一个新的日尔曼民族秩序，他要致力于从日尔曼民族中清除掉那些已退化了的斯拉夫和犹太人种。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希姆莱在帕德博恩附近的森林里建立起一幢新的日尔曼威尔威斯伯格城堡，帕德博恩是个古老的城镇，与查理·玛格林时代有着历史上的联系。这幢装饰豪华、造价高达 1100 万马克的城堡是用来显示日尔曼民族之伟大的。城堡每间房子都冠以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如腓特烈大帝，屋里陈列的都是一些珍藏的宗教遗物。希姆莱本人的房间则被命名为海因里希一世。

据一些党卫队的人说，希姆莱实际上把自己当成了撒克森王的化身，甚至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也这样开场：“在这个问题上海因里希一世会采取如下的行动。”善于明哲保身的党卫队成员为了赢得他的欢心而执行这些愚不可及的命令，而他们的头子，随着权力的加大，越来越沉缅于他的种族梦想中。

然而，他的确能做到这一点。他确信自己已经通过组织警卫队的各项措施而获得了希特勒的认同，并且已得到了他的好感和钦

佩。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也有他自己了不起的一面，当他在巴伐利亚的贝德-德沃尔兹学校任领导的时候，海德里希就确信运动、体操和一些类似的给学生以纪律约束的体育项目也是党卫队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这可比希姆莱所欣赏的乱七八糟的活动来说要好得多了。但是那时海德里希已被委派了更为实际的任务。随着希姆莱控制盖世太保，海德里希出任党卫队保安处的代表和首脑，警察政权的基础已经牢固地建立了。

希姆莱在一次阅兵式上向希特勒敬礼。





希特勒的忠实走狗希姆莱站在希特勒身旁自豪地检阅党卫队部队。



身著制服的  
的尼世太保特  
海徒里希，其右臂  
上的标志牌是德  
卫队的双闪电标  
志(SS)。





# C

## 海德里希和党卫队保安处

1942年5月27日，一位捷克间谍在布拉格向一辆经过的奔驰扔了一枚炸弹，使莱因哈特·特雷斯坦·欧根·海德里希受了致命伤。

海德里希 1904 年 3 月 7 日生于萨勒河畔的哈勒，毗近莱比锡。他生长在一个有着深厚音乐传统的家庭。他的父亲理查德·布鲁诺·海德里希是一所音乐学校的创始人和管理者。这所教授音乐和戏剧艺术的学校于 1899 年在哈勒创立。然而，学校资产很少，布鲁诺通过努力的工作和一门“好亲事”才得以被哈勒上层社会所接纳。布鲁诺曾梦想成为一位古典派歌手，但他却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他转而集中于作曲，但受到的批评比赞美多得多。除了艺术之外，布鲁诺还有社交方面的抱负，后者通过婚姻得以实现，他娶了伊丽莎白·安娜·阿梅丽亚·克兰斯，一位相当富有的中产阶级上层小姐，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克兰斯 1871 年出生

于德累斯顿，是一位拥有一家具有皇家荣誉的音乐学校的音乐教师的女儿。因此，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成长于一个具有很浓厚文化氛围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影响了这一生，并且在他父母给他取的名字里也有所体现。莱因哈特意为“明智的决断”，这是他父亲的一部歌剧中的英雄人物。“特雷斯坦”，这当然是取自瓦格纳笔下的人物。至于“欧根”（“高贵的出生”）是献给他外祖父的，莱因哈特的外祖父是一位教授、皇家议员、德累斯顿音乐学校的创始人。

布鲁诺·海德里希似乎获得了他曾渴望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但是，仍然有点缺憾，因为哈勒地区一些头脑保守、思想偏狭的人从来没有真正地把布鲁诺当作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们把布鲁诺当作一个追求社会地位的人：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天才，但又是一个通过有利的婚姻才获得承认的投机者。当地贵族对他们所看到的这个人所表现出的有意的风趣以及经常极力献媚的态度表示不信任。

那么，布鲁诺后来究竟怎么样了？有人认为他定期给某个叫伏萝·埃丽丝汀·爵丝的女人寄钱。这女人被证实是他妈妈。“爵丝”是个值得怀疑的犹太人姓名，很快，就有人无端宣称“海德里希”是一个假名而已。

伊丽莎白·海德里希坚定地为她丈夫抵制着这些诽谤，难道布鲁诺对德意志民族，对凯撒的忠诚亚于任何人了吗？在这样的质问下，造谣者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闭嘴了。小海德里希被送到哈勒的一所新型的文科中学。

1922年复活节，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参加了海军，这是在所有军种最有远大前途的一类，这种选择看来是明智的。这位年青人似乎前途远大，他有望几年后当上海军中士。在1929年，他被提拔为海军少尉，随后是海军中尉。18岁就加入海军的海德里希看上去有点不适应其职位。

莱因哈特·海德里希身高1.9米多，行动笨拙，身材又瘦又难看，发色是极浅的金色，深凹的双眼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淡蓝色，长

长的马脸上长着显眼的鹰钩鼻。海德里希说话音调很高，笑声像羊叫，于是他有个昵称“齐格”(母山羊)。那时，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虽然他后来对这两样都嗜之如命。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最有价值的财产是一把小提琴，这是他父亲送给他的礼物。虽然海德里希努力工作、能干、非常守纪律，但他却和战友不太亲密。这些人发现他自高自大。除音乐外，他生活中的其他爱好就是政治。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余波给海德里希一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布鲁诺和伊丽莎白全力创造的一个优雅的富有文化气氛的家风在政治变化的潮流冲击，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的影响下逐渐萎缩。1918年，当哈勒人民听说威廉二世退位，帝国首相、贝登的马洛斯王子辞职并把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时，小海

海德里希坐在他的奔驰车上，左一为希姆莱，左二为卡尔·沃尔夫。



德里希一遍又一遍的骂道：“叛徒。”

无政府的混乱以及幽灵蔓延在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共和党的公告。斯巴达斯克左翼激进分子与志愿军公开冲突。与家庭关系更密切的是通货膨胀，它使海德里希一家的财产有被倾荡一空的危险。所有这些对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影响都是很微妙的。他收集了被扔掉的制服，还有一个钢盔，加入了志愿军，准备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作战。他对哈勒的德意志青年协会表示忠诚。在1920年时，他就加入了德意志民族保护和忠诚组织，一步步的接近被他后来骄傲地称之为和志愿军“卢克斯”师联络的“志愿军联络处”。然而，街头政治使这个毛头小子不敢涉足。

海德里希不知疲倦地鞭策自己，目标瞄准了成绩，尤其是在击剑、游泳和航海方面。在1928年他被提拔之后，他在波罗的海一个海军基地任无线电军官。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有远大的前途，但海德里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没法离开女人。同时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差点葬送了他的前程。如谣言所说的那样，海德里希与汉堡海军基地一位军官的女儿有瓜葛，甚至被人认为他们这一对要订婚了，但海德里希却写了一封信告诉那位姑娘他已答应和一个18岁的姑娘莉娜·冯·奥斯特恩结婚，她是波罗的海费马恩岛上一位乡村学校校长的女儿。

投机主义在海军圈里蔓延，据说海德里希无情地抛弃了这位军官的女儿。接着，又据说他被海军开除。因为不检点的行为而上了法庭，而且海军进行官方审讯会遇到麻烦，因为一个很有前途的军官会有感情纠葛是大不可能的事。但在几年内人们一直认为这是海德里希离开军队的原因，但没有真正的证据提出来证实它。

我们所知道的是在海德里希于1931离开了军队。究竟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呢？一种解释是这所有的事件是海军中亲纳粹党的同情者所策划。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和一些志趣相投的追随者被认为是纳粹党的狂热信徒，海德里希可能被纳粹党看中，他们策划把他释放了。



不管事实如何，失业的海德里希在汉堡、吕贝克和基尔熄灭了他的热情，恰恰这些地方是冲锋队和纳粹党的狂热信徒利用街道举行他们暴力狂欢的地方。是纳粹党，或更确切些是莉娜·海德里希，拯救了这位前海员。1929年当莉娜还是基尔一个学生的时候，她就对纳粹党发生了兴趣，并成为第1201380位党员，后来她又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妇女组织。她劝说她的未婚夫也加入了纳粹党，向她保证这样会前途远大。

在瓦尔德鲁丁一块小耕地上，与希姆莱的会面使海德里希的命运定了下来，希姆莱，这位党卫队头子说话精确，又带有点学校校长的口气：“我想为党卫队建立一个谍报工作组织，我正在找一人来负责。如果你有信心接受这项任务，用20分钟写下你如何组织训练。”海德里希照办了，并增加了一些他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党卫队保安处的前身。

希姆莱表明自己对此印象很深。慕尼黑的党总部按时收到一条消息：党员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汉堡人，党员证号544916，将从今年10月起，作为帝国领导的成员之一执行党的任务”。海德里希被贯以冲锋队指挥的头衔开始执行任务。

1931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海德里希以未来领导人的身份出席了慕尼黑褐色大厦里召开的党卫队领导人会议。会上希姆莱给他两个文件夹，他用一种很恶毒的方式在文件夹上画了一幅纳粹党的画，上面全是间谍和叛国者。在追踪灾难的详细描述中，海德里希对所有的党卫队组织下达命令：“每个地区以尽快的速度建立起一张情报统计表来解决地区内所有的情报活动。接下来每张情报统计表要能为每一个党卫队部门提供预测。”海德里希很快意识到不可能在褐色大厦里培养他的新生儿，那里的人太好奇。他带着三个办公人员搬出去在一所私人住宅建立起了自己的检索目录和档案柜，那所住宅的安全不是一个大问题。

早期的党卫队保安处是一个不完善的组织，总部位于慕尼黑土耳其街23号的一所公寓里，是从一位名叫维克多丽亚·埃德里克的寡妇那里租来的，当需要打字机时，就去借，用完即还，许多档

案柜是由雪茄箱做成的。党卫队保安处的办事效率是随着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事业上的飞黄腾达而提高的。海德里希 1931 年 12 月 24 日娶了莉娜·范奥斯特。提拔随之而来：1931 年 4 月 10 日，冲锋队首领；1931 年 12 月 31 日霍郝普斯冲锋队首领；1932 年 7 月 19 日，正式任命为党卫队保安处头子；1932 年 7 月 29 日摩托化部队统帅；1933 年 3 月 21 日，充当盖世太保头头。

然而，像希姆莱一样，当希特勒成为帝国元首时，他也感到沮丧，当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势力在戈林控制下的普鲁士越来越壮大时，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觉得自己受到像不受欢迎的邻居那样的待遇，当你正要打招呼时，门却冲你关上了。

虽然在柏林不受欢迎，党卫队保安处在巴伐利亚却取得很大成绩，在早期它仅仅是查出告密者（一种委婉的称呼是情报人员），这些人隐藏在党卫队各级军官里，同时，党卫队保安处又被要求向希姆莱已经正在激增的文件柜提供专门情报。这些情报用颜色码来区分，并且冠以不同主题。很快党卫队保安处就成为国内一家搞

1931 年 12 月 24 日，海德里希与一名女纳粹党员莉娜结为夫妇，这是他与妻子和儿子在慕尼黑的家里的一张生活照。



间谍活动和调查活动的组织，这个组织不管以任何方式达到它的目的都不受阻碍。这位组织者领导者总是主张“一个人必须对人们了解得尽量地多。”这些人逐渐染指党内成员和他们对手的各种细小的事——他们的长处、短处、爱好、习惯和丑闻，所有这些都在党卫队保安处以后几年内，被大约 10 万名固定聘请的间谍、侦探和告密者耐心而全面地记录了下来。

海德里希在全面承担起他的新责任时，却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1932 年 6 月 8 日，拖特拉塞尔，当时纳粹党的组织部长，收到一封来自鲁道夫·约尔丹的信，后者是哈勒-麦斯堡州党部领导，信中说“一个叫海德里希的党员”是某个帝国领导的父亲，此时他正住在哈勒，在约尔旦管辖的范围内。“有理由相信，”约尔丹的报告继续说，“布鲁诺·海德里希，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父亲是犹太人。”

这谣言来自于海德里希祖母的第二次婚姻，欧妮斯汀·威廉明妮·海德里希，后来嫁给了一个名叫

1934 年，海德里希（右）在慕尼黑他的办公室里工作。



希姆莱曾称赞海德里希是一个「真正的党卫队员」，这是海德里希身着党卫队服的照片。





海德里希(右二)和库特·达吕格(右一)在一起

古斯塔夫·罗伯德·爵丝的熟练的锁匠，作为她第一任丈夫大家庭的母亲，莱茵伍德·海德里希，经常叫自己爵丝—海德里希，这个名字通常被认为是犹太姓，但是爵丝同海德里希却没有直接联系，帝国人种问题调查小组才宣称他们很满意地发现海德里希一家“无论怎么看……都没有犹太血统。”

尽管如此，海德里希却没有轻松下来，直到 1942 年被刺杀以前，他一直担心被认为是犹太人或部分犹太人，许多评论家认为他对于犹太难民丧心病狂的行为是出自一种故意的寻找人种问题上的心理平衡。这也反映在一种不正常的自我憎恶，一个描述当时的海德里希的故事说，一天晚上他喝醉了回到家中，他突然看见一面墙上的大镜子里映出的自己的像，他顿时怒火中烧，掏出手枪开了两枪。希姆莱，这个天生的操纵别人的人，没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这种欲望，尽管如此，希姆莱却强烈感受到这位精力充沛的下属的成就，在任何事件上，这两人都尽力朝向他们的最初目标，即成为德国警察头子迈进。

随着希特勒出任元首，警察和安全事务都得以加速发展，在希





1939年11月，党卫队高级官员坐在一起开会，从左到右依次是：谢伯（维也纳盖世太保头头）、勒比（刑事警察头头）、希姆莱、海德里希和穆勒。

姆莱被任命为慕尼黑警察头子的同时，海德里希这位保安警察的头子，也被任命为慕尼黑刑事警察政治处的头子，海德里希很好地指挥着他从党卫队保安处带来的全体人员，他还抱着将政治处从巴伐利亚行政处独立出来的最终目标。

这位有着忙碌过去的人像什么呢？一个光辉煌前景是什么样呢，他的一位主要同事是海因里希·穆勒，此人后来直接在海德里希领导下任盖世太保头子，他认为海德里希是一个强盗似的知识分子，另外一些人认为他是被鞭策着，并不是为了个人理想，而是出自对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海德里希本人抱着他自己的信仰，如果这些信仰是明智的，那么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也是，然而，瓦尔特·舒伦堡这位干练的副官，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些生动的描述：海德里希是一个身材高大，并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的前额很宽而且特别地高。不停转动的小眼睛透出动物一样的狡诈，使人难以捉摸，他长着一只长长的贪婪的鼻子，一双厚厚的嘴唇和一双纤长的手。他那较大的臀部使他漂亮的形象受到影响，而令人讨厌的阴阳怪气就更让人感到可怕。他的嗓门和他的身材比起来又高了不少，讲话时他神情紧张，言语常常不连贯。另外一些人则提到海德里希的手，瑞士前国际联盟日内瓦高级代表卡尔·

博克哈德曾在一次宴会上坐在海德里希旁边，他把这双手描写为“拉斐尔式、水仙一样白晰的手，生来是用来慢慢把人卡死的。”然而，这又是一双专门用来弹奏钢琴的手。那些了解海德里希的人说，你绝不会忘掉他那女里女气的声音，因为它来自于一个运动员，一个第三帝国最好的击剑手之一。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已经得到了帝国内务部部长威廉·弗朗克的支持，而戈林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屈从意味着党卫队希姆莱

1941年9月27日，刚提升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代理保护长官的海德里希（前右一）在卡尔·弗兰克（前右二）的陪同下来到布拉格哈德卡尼堡（海德里希将他的司令部设在此处），这是他接受党卫队士兵敬礼时的情景。





据传说捷克斯洛伐克的王冠如果非真正继承人的人戴上它，他就会死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给海德里希看了王冠并给他讲了传说。据说海德里希一边放声大笑，一边把皇冠戴上试了试。

可以担任国家秘密警察的职务。但是，到了1934年4月22日，真正担任盖世太保头目的却是海德里希。

这时，整个第三帝国的政治警察部队都掌握在海德里希手里。他刚刚在柏林站住脚，便展开了大规模重新组织的计划。在这个工作中，他得到了希特勒的全面支持。希特勒宣称：

与盖世太保有关的一切调查审讯，一概由盖世太保全面负责，党部一切机构及有关部门均不得干涉。按照惯例，一切政治性事件，即使通过党部途径而来，也必须交由盖世太保有关部门处置  
.....

我在此强调指出：一切背叛国家、谋反叛乱的企图，一旦由党部所知，必须报告国家秘密警察局。不论事件性质如何，党部均无权自行调查审理。

尽管重任在肩，但是对于恩斯特·罗姆的冲锋队的重重敲击的脚步声，海德里希也绝未充耳不闻。盖世太保马上将被派出执行一个大屠杀的任务。

# D

## 屠杀褐衫队

恩斯特·罗姆如此长久而又如此傲慢地骑在炸药桶上，而这个炸药桶却注定要在 1934 年 6 月 30 至 31 日的流血周末爆炸。

那时，冲锋队一直是一支危险可怕的力量，它以 15 : 1 的比例在数量上远胜常备军队。尤其令希特勒担心的是，罗姆公开对当时的军事机构表示轻蔑，而希特勒却正依靠这些人掌握政权。罗姆认定，传统的军事机构已经不适应社会的要求，必须由具有打破旧秩序的热忱的真正革命者来取代。况且，国家社会主义总得是社会主义吧。

希特勒这位老战友在公开场合的声明甚至走得更远。他公开指责希特勒背叛了革命。当罗姆和他的老伙计们在他喜爱的首都查略顿堡区一家饭店吃饭时，他会不由自主地高声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如此，希特勒对于这位曾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却一直有一种感情。他不忍除掉他。他们在职务上笼络他，让他做“没有公事包的





部长。”这没有能够满足他。罗姆激愤地指出，这同样的职位曾在早期给过一个叫做鲁道夫·赫斯的追随者。于是希特勒又采取小小的威胁手段，甚至在纳粹报纸上以新故事作伪装发出警告信息。在《国家时报》上曾有这么一则信息：“从现在起，镇压将更加严厉。‘国家的敌人’这个词已不再仅仅限于布尔什维克特务。它也同样包括那些在语言上或行动上危及第三帝国安

1933年9月，希特勒和罗姆在纽伦堡最后一次共同散步。

前进中的罗姆褐衫队。冲锋队许多成员不过是街头流氓而已。他们的横行霸道使急于赢得人们尊重的纳粹党感到很棘手

全的人，不论其怀有怎样的意图。”

对于任何愿意听从的人来说，这警告已明确无误，但对于傲慢的罗姆却仿佛对牛弹琴。他的冲锋队继续横行街头。希特勒意识到，在每一天的耽搁中都潜伏着危险。兴登堡总统确已年过花甲，对于罗姆的狂妄行为已无能为力。但是一旦有适当的人在总统耳边吹一吹风，便会引出这





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员们在一起，这位希特勒的老战友忘乎所以地公开指责希特勒背叛革命。

冲锋队和常规部队将会合并，巴本、戈林和外交部长纽赖特将被免除政府中的职务。施莱歇尔继续构思他的“影子内阁”：海德里希·勃朗宁，前任中央基督教派总理，将担任外交部长的职务，而施特拉塞尔将接管国家经济部。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威勒-勃耐特当时住在柏林，他后来回忆说：“新内阁名单被打字机打出，在人们手里传来传去，其缺乏保密性已到了令人可怕的程度。”威勒-勃耐特继续说道，有一天在

样一个明显的疑问：希特勒是否无力控制他的支持者？他适合统领整个国家吗？事实上，已经有人在散布说，希特勒，或者至少他的部分党羽，应该下台。希特勒的最起劲的抨击者并非冲锋队的人，却是库特·冯·施莱歇尔将军，元首的前任总理。他本已下野，却东山再起，展开对政府的猛烈抨击，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施莱歇尔，作为一个有心计的政治家，公开表白对罗姆的同情。事实上，他已经与之同流合污。而且施莱歇尔毫不掩饰他想再次品尝手握大权的滋味。总理的职位已无希望，那也无妨，他可以在希特勒手下作副总理，与当国防部长的罗姆合作。他在想象中飘飘然，忘乎所以：

某个著名的酒吧里，在谈话当中有人向他出示一份影子内阁的名单。而那时，人人都知道，酒吧的侍者全是盖世太保手下的人。

如我们所知，就连那精力极充沛的戈林也不由得频频回首，对罗姆感到紧张。戈林当机立断找到施特拉塞尔。后者当然满心希望部队服从党卫队的领导，但是，一如既往，他宁可持观望态度。罗姆的问题为当务之急。当戈林放权于希姆莱时，他老谋深算地保留了自己的秘密警察机构并一直使其井井有条。这是他的所谓研究部门。它的主要任务是将有可能影响帝国安全的电话谈话和信号进行拦截。他们矫揉造作地称之为“研究结果”。

戈林，在希特勒的扶持下，自一开始便独揽在帝国监听的大权。为了显示这种权力戈林在监听器上刻了一个大大的“G”。考虑到不久将实行的清除罗姆的行动，戈林把他的权力使用到了极限。

海德里希的特务们和戈林手下的盖世太保马不停蹄，不分昼夜地工作。任何不利于罗姆的东西，包括一个词、一句话、可疑的接触、半真半假的话，都被录音存档。海德里希的任务便是为希姆莱提供尽可能多的罗姆的罪证，然后把它灌输给希特勒。海德里希很快意识到，除非宣告一场大规模的谋反、一场严重的政变，否则无法使希特勒从犹豫不决和对罗姆的忠诚中解脱出来。一个预谋叛乱和叛乱被彻底镇压的消息必须有一种轰动效应，这样，不论一个普通的街头公民还是年迈的兴登堡本人，都会相信希特勒是被情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

1934年6月的柏林，天气阴霾，危机的情绪在漫延。罗姆事件的导火索是6月17日副总理巴本在古老的大学城马尔堡对一群学生的演讲。演讲包括对罗姆有代表性的抨击和对冲锋队鲁莽行动的批评。这演讲对纳粹党来说无可指责。然而话外有音：它对希特勒明确作出了警告，要他慎勿疏远助他掌权的保守力量。巴本还暗示，冲锋队令人发指的行为和纳粹主义同出一辙，那就是对受尊敬的公民和爱国者的迫害，对知识和精神的无视和践踏。



被冲锋队抓捕的反法西斯者背墙而立，这种街头大捕获通常称为野外集中营，被抓的人一般都有所谓暴力“犯罪”的嫌疑。

冲锋队的早期一次游行，冲锋队始建于1920年8月，刚开始时称为“体操与运动”分遣队，在纳粹刚开始夺权时，它曾是纳粹的主要武装力量。





希特勒对这样的背叛当然不会听之任之，但此时他无力打击兴登堡总统的心腹。希姆莱指出，退而取其次的最好方法是攻击演讲的作者。海德里希的特务们很快便查出，演讲稿出自一个年轻有为的作家和律师之手，他就是埃得加·荣格博士。他信仰“保守革命”，从而为嗜血的纳粹所憎恨。

6月21号，即马尔堡演讲4天后，荣格博士独自一人在家。他的妻子回来后，发现他不见了。在浴室的墙壁上他发现草草写着“盖世太保”几个字。埃得加·荣格备受残酷折磨的尸体，后来在通向奥兰林堡的路上的一条沟里找到了。然而，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很早就曾专门关注过巴本副总理的行动。海德里希曾从巴本的支持者那里寻求合作。事实上，他曾试图把一个特务伪装成巴本的朋友悄悄送进敌营。海德里希选择了奥托·贝茨，他曾经为冲锋队当过间谍。贝茨得到的指示是，时刻监督巴本和荣格，同时也汇报赫伯特·鲍斯的行动，他是巴本的私人秘书长。1934年5月4日，忠实的贝茨去了柏林执行任务。他的两个住处都靠近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街，这方便了他的任务。

贝茨认识到他的任务很艰巨。盖世太保手下的人显然在副总理那里不受欢迎。贝茨受到鲍斯的怀疑，但他坚持不懈，利用和荣格的熟人关系争取巴本手下人的信任。他甚至警告说，他们的电话已被窃听。

同时，毋庸置疑，贝茨一直在向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汇报。这一切达到了预期效果。希特勒最担心的事得到了证实。反叛的预谋确有其事。该采取行动了。兴登堡总统显然在生病。一旦他死去，保守主义者极有可能要求回复君主政体，宝座的重要候选人是凯泽的儿子奥格斯特·威海姆，而他是冲锋队一员。众所周知，兴登堡的宠臣巴本，对老头子是有极大说服力的。巴本的马尔堡演讲已经谴责了纳粹党的手段，抨击了他们对人权的侵犯，和他们的反基督教举动。这种言论必须制止。同样，必须找到替罪羊，答案便是对冲锋队的清洗。罗姆和他的党徒必须为过去的一切坏行为负责。

这时，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计划受到严重挫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仍做不到将罗姆一次清除。他本人后来谈到：“6月初，我对罗姆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我把他请到我的办公室，我们一起谈了将近5个小时。”无人知道帝国总理门前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但结果是冲锋队被给予1个月的时间，限期把事情处理完毕。

党卫队头头们对此大惑不解。如果任由冲锋队自行活动，如何削减罗姆的势力呢？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使对冲锋队图谋叛乱的指控达到令人信服的结果，盖世太保须马上采取行动。

希特勒紧张到了极点。不但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喋喋不休地纠缠他，部队上下也在表示不满，要求他和罗姆彻底了结。6月25日，总指挥官瓦尔纳·弗立契将军命令全军严阵以待，全部驻守兵营。3天后，罗姆被驱逐出德国军官联合会。国防军无意让自己的手沾上罗姆及其追随者们的鲜血。这个任务留给了希特勒。反过来讲，如果希特勒失败了，那么后果对他将极为可怕。

元首实际上决定把屠杀的任务交给已全副武装的亚

希特勒早期前往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之行的一张照片。他身边是施特拉塞尔（左二）、罗姆（左三）和戈林（右一）。



布拉切斯托斯王子街 8 号(即盖世太保)。6 月 28 日,希特勒离开柏林前往埃森,名义上是去参加约瑟夫·特伯文的婚礼。无人明白希特勒为什么不辞辛苦去参加一个下级官员的婚礼,尤其此时他自己的地位正受到威胁。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想远离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从另一方面讲,由于戈林、戈培尔和迪尔斯也参加了婚礼,这使人怀疑盖世太保有意让元首远离首府,这样他的老同伴们可以监视他,使他不至于一时冲动,在最后关头又改变除掉罗姆的决定。

希姆莱给海德里希的职位接近于希特勒的副官卡尔·沃尔夫。迪尔斯任命的官员们受到慢怠,不经任何程序便被党卫队的人马所替换,其中甚至还有辫子紧束脑后、身着黑衣的女人。在婚礼的当天晚上,希特勒打电话给罗姆,他此时正与一些年轻的冲锋队队员在慕尼黑南部的巴德威塞取乐。希特勒指示他召集所有的冲锋队头目在 6 月 30 日开会。29 日,希特勒视察了西菲里亚的一个劳工集中营,从那儿又到了莱茵河上的巴德古德斯堡,在那儿的德瑞森旅馆过了周末,他认识旅馆的主人。对褐衫军的大屠杀开始于 1934 年 6 月 30 日,结束于该年 7 月 2 日,从德国各地抓到的所谓敌人,至少有 82 人,可能接近 200 人,他们被成批枪毙。受害者或者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去希特勒命令罗姆召开的会议的路上被



柏林—布兰登堡冲锋队指挥官卡尔·恩斯特的婚礼。照片上站在新郎新娘后边的是罗姆和戈林。在罗姆大清洗中,恩斯特于 1934 年 6 月 30 日被枪杀。

盖世太保特务们抓去。

耸人听闻的消息比比皆是。有消息说，希特勒手握鞭子、持着手枪，身边是冲锋队的叛变者戈培尔，身后跟着全副武装的来自慕尼黑基地的特遣部队，先从罗姆开刀，挨家挨户把冲锋队员们从睡梦中逮捕。不到1小时，被捕者全部被塞到2辆车里，拉到慕尼黑郊外的斯塔特海姆监狱，执行枪决。

同一天，在德国其它地方逮捕的冲锋队军官们，被送到柏林党卫队兵营枪决。巴本后来宣称，列出死亡名单的人是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军官，名叫海曼·布莱恩，在那些狂乱的日子里，盖世太保指挥部本身一派繁忙，像一窝蜂。

党卫队最高统帅的任务是使全帝国上上下下处于紧急状态。党卫队开始依赖常备军的支持，为了保密起见，盖世太保死亡名单的人一律用数码表示。不论在电话中，电报里还是在信件中，使用

希特勒在纳粹党早期的一次会议上，他的左边是施特拉塞尔和希姆莱。







坐在豪华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罗姆不知死期将近。

的语言简单模糊：“8号已到；17、35、37、68和84号已被抓获；32、43、17和59号均已枪决；5号尚不知去向。”

吉斯韦斯·汉斯是这些事件的一个重要见证人。在希特勒执政早期，他曾为盖世太保服务。但是，像一个生来便注定要幸存下来的人一样，他后来调到了内务部的警察局：当时他一直在DD（那是一个和盖世太保紧密相连的侦探机构）头目亚瑟·勒比身边，他在他的回忆录《悲惨结局》中写道：

我们听到了隔壁屋子的大喊大叫。那是戈林的书房。执行委员会便在那里集会。盖世太保的信差们不时地进进出出，手里拿着白色纸条，从门口我们可以看见戈林、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小个子的菲利·康纳尔（戈林的国务秘书），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交头接耳，自然，我们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但偶尔我们能听到一声含糊的声音：“快走”、“啊哈”或者“干掉他”。大部分时间，我们只听到粗哑的大笑，他们整个仿佛处于亢奋的情绪中。

戈林满面春风，放射着自负傲慢的光彩，显然他得意非凡。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的长发飘洒，他身上穿的是白色紧身军服和

蓝灰羊皮裤，黑色的高筒皮靴直到膝盖……

我们突然听到大喊大叫。一个满面油光的警官冲出了屋子，紧随他传来戈林粗哑、沉闷的声音：“干掉他们……立刻干掉他们！”这诉诸文字的语言是无法表达当时场景所显示的那种毫不掩饰的嗜血狂、恶毒的复仇心以及与之交织的恐惧的。

在里希特菲尔德军营，大约 150 名冲锋队军官面墙而立，死刑由希姆莱的党卫队行刑队和戈林手下的警察执行。

控制着一支由 8 万人组成的柏林—布莱登堡冲锋队的高级将领卡尔·恩斯特，在大清除之前，已出发去度蜜月，当他的车快到不来梅时，他被抓住了，他的新娘和司机都受了伤。恩斯特本人被飞机送回柏林交给了行刑队，他的主要罪行是说话太多，尤其是关于“国会纵火案”。他还说过有损希姆莱形象的话，他曾给希姆莱起了个绰号，叫做“虚伪的黑心家伙”。

罗姆大清除也毫无例外地成为一个清算旧帐的时机，6 月 30 日上午，戈林派他的陆军警察去处理被他认为是叛徒的冯·施莱歇尔将军，具体是谁执行了任务却无从知晓，戈林日后曾称，是陆军警察的一个分队未经他的命令便抢在“官方”杀手之前动了手。人们所知道的是，杀手们在一片猛烈的弹雨中将施莱歇尔将军和他的妻子屠杀了。

罗姆却稍稍多活了几天。直到最后，希特勒还是难下决心除掉他，甚至在他被捕后，希特勒还命人在他牢房桌子上放了一把手枪。罗姆拒绝拿起它。据传，他当时说道：“如果要杀我，就让阿道夫亲自来杀吧。”根据 1957 年 5 月在慕尼黑举行的战后审判上一个警察上尉的证词，最终是两名党卫队军官进了牢房，把手中的左轮手枪中的子弹一气打光。证人证明说，罗姆本想说点什么，但党卫队军官挥手示意他保持沉默，然后罗姆被剥光了上衣，立正站好，他脸上露出轻蔑的表情。执行的命令先传达到希姆莱，他又转而传达给卫兵队指挥官西奥多·埃克。埃克在其副官麦克利波特的帮助下，一丝不苟地执行了命令。

埃克于1913年2月在俄国战死，而利波特却活了下来，参加了1957年的慕尼黑审判。另一个牺牲品是71岁高龄的古斯塔夫·冯·卡尔，他曾使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受到挫折，而他的死，大家公认，只是用来满足戈林复仇的欲望。他早已退出政坛，但这没有使他幸免于难，他被用斧头砍得支离破碎，他的尸体被扔在达豪附近的一个沼泽地里。

如果巴本不是和兴登堡总统关系密切，仅凭他的不合时宜的马尔堡演说，他也难逃劫难，他的两位关系最亲密的同事都命归黄泉。他们是他的私人秘书赫伯

格莱格·施特拉塞尔是纳粹党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以至于成为希特勒的威胁。在“长刀之夜”行动中，希特勒和戈林特别下令干掉了他，他的弟弟奥托也是纳粹党成员，并在战争中活了下来。



奥托·施特拉塞尔

特·鲍斯和前面已经提到的演说词的作者爱得加·荣格。

罗姆的同盟者施特拉塞尔专门受到行刑队的惠顾，这并不奇怪，库特·达吕克是一个老纳粹队员。早期在慕尼黑时他曾成为希特勒狂热的追随者，他虽是罗姆的心腹，却幸免于难。他回忆道：“6月30日下午1点半，3个盖世太保军官闯入施特拉塞尔的家。当时施特拉塞尔正与家人



进餐，他们命令他跟着走，当他询问原因时，他被告知涉嫌叛变活动，他们说他的办公室也要被搜查，但当他们到达办公楼时，他却被交给等在那里的一支党卫队分遣队。”

汉斯接下去说：

达吕格和我遇到了勒比，他告诉我施特拉塞尔已经死了。他是自杀。我们非常愤怒。如果我们知道他们以怎样畏缩卑鄙的方式杀害了他，我们会更加愤怒，一个目击者几天后告诉了我这件事。施特拉塞尔是在大约中午的时候被带到盖世太保监狱的，几小时过去了，一直有人在进进出出，后来一个党卫队的人来到门口喊道：“施特拉塞尔。”这个一度在纳粹党的地位仅次于希特勒的人，要被转移到一间单人牢房，当施特拉塞尔缓步走出屋子时，人们都没把他当回事，但还不到1分钟，他们便听到了手枪的射击声。

党卫队的人从背后向毫无防备的施特拉塞尔开了枪，打中了他的主动脉，一股鲜血喷涌而出，溅在狭小的牢房的墙壁上，施特拉塞尔没有马上死去，隔壁的牢房里一个囚犯听到他在草垫子上辗转反侧，折腾了近一小时，没有人理会他，最后这囚犯听到走廊里传来很响的脚步声，有人在喊叫着下达命令，卫兵们立正站好，这囚犯听出了海德里希的声音，他在问：“他死了吗？让这头猪流尽最后一滴血。”

牢房墙壁上的血迹保留了好几个星期，它是党卫队的骄傲，像一件纪念品，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把血迹给所有吓坏了的囚犯们看，他们炫耀说：这是一个名人的血，是施特拉塞尔的血，只是到了后来海德里希才命令把血迹清洗掉。

汉斯在纽伦堡审判中证实说：盖世太保所有关于罗姆大清洗的文件都被销毁了，因此很难分清哪些谋杀是由戈林和他的私人警察机构干的，哪些又是由海德里希和他的盖世太保干的，但是，有一桩罪行可以肯定地说是海德里希干的，那就是对伊里奇·克劳森纳博士的谋杀，他是基督教行动组织的领导人，一直单枪匹马同纳粹作斗争。





希姆莱和他的参谋长卡尔·沃尔夫(中)以及海德里希在一起。

在1931年5月1日的宗教布道中，克劳森纳呼吁人们对教堂的社会教育应给予特殊关注，纳粹党认为5月1日是他们的节日，他们对这一传统的劳动者节日非常重视，克劳森纳的演讲被看作是有预谋的反叛。6月底，克劳森纳在基督教两年一次的会议上发表了热烈的演讲，纳粹党认为演讲内容有悖于所谓的“国家利益”。

当罗姆大清洗的清算名单雪片般飘满海德里希的桌子时，盖世太保头头在名单上又加上了克劳森纳的名字，海德里希没有亲自执行暗杀，手下一个能干的上尉替他摆平了克劳森纳。

海德里希回忆说，早在1932年2月，一个称为党卫队突击队的组织已经成立，它是党卫队特遣队的前身，后者在第二年成了元首唯一的贴身保镖，仅限于保卫和安全工作，其中一名队员深得海德里希的赞赏，因为他对命令从不提出问题，他叫吉尔庇斯。

大清洗那天，海德里希给他下达命令，“你负责克劳森纳的案子。你亲手干掉他，而后直接去帝国交通部报到。”

1953年，当吉尔庇斯因谋杀罪受审判时，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充满热情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讲述自己怎样拒绝海德里希塞给他的武器而动身去执行任务。大约下午1点钟，当克劳森纳离开办公室去洗手间时，他和杀手相遇，吉尔庇斯不慌不忙，陪着克劳森纳回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告诉他被捕了。克劳森纳转身背对吉尔庇斯，在衣柜里找他的上衣。这个党卫队刽子手拿出武器开了火，直到这时他仍不急不忙，当他肯定克劳森纳已经死了时，便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总部号码。电话里一个尖嗓门命令他把死者弄成自杀的样子，吉尔庇斯非常听话地把手枪放到死者右手边，并把门挂上了双保险。

吉尔庇斯为此被判15年监禁。他声明，只有回到海德里希那里后，他才知道他杀了一个“危险的基督教领袖”。吉尔庇斯无暇思考，他马上被派去执行下一个任务：飞往不来梅，抓住卡

尔·恩斯特,把他交给行刑队。

那天,海德里希和吉尔庇斯均受到表彰,以国家的名义,盖世太保头目海德里希被提升为党卫队领袖,库特·吉尔庇斯也受到希姆莱的提拔,二战期间他在“武装党卫队”中服役。

当他的同胞们在1953年的谋杀审判中间他:“当你干这种谋杀勾当时,你在想什么?”他耸耸肩回答:“什么也没想。”

子弹嗖嗖射进冲锋队员们身体的同时,阿道夫·希特勒正企图用交杯碰盏的声音压过枪声。约瑟夫·戈培尔为内阁成员及其妻子儿女们在帝国总部举行晚会,那天晚上在场的人后来回忆说,元首精神焕发,侃侃而谈,对孩子们格外和蔼亲切。到7月2日,罗姆大清洗的屠杀活动结束了。元首表示满意。叛变者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再也不会有人胆敢企图东山再起、卷

1934年8月9日,希特勒在坦嫩堡为兴登堡总统举行规模盛大的悼念活动。



土重来了。确切的受害人数永远都无从知道，在7月13日卡洛尔国立剧院的演讲中，希特勒宣布，61人死于枪杀，包括19名“冲锋队高级军官”，另有13人拒捕被杀，还有3人自杀，总计77人。由巴黎移民所出版的《清洗白皮书》上记载，这次共有401人被杀，但辨明身份的只有116人，在1957年的慕尼黑审判中，这个数目又升到1000多人。

在他的演讲中，希特勒说道：“现在，革命必须流血，这已不是秘密；当我们谈起它，我们称之为‘长刀之夜’。人人都必须明白，如果他把矛头对准国家，那么他必死无疑。”

希姆莱、海德里希、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信息，外加戈林的研究办公室，以其复杂的技术拦截的信息，把谣言、反谣言和对话添油加醋地凑合在一起，大大地挑起了希特勒的怀疑，直到他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不论他多么不情愿。

在戈林和希姆莱看来，罗姆罪有应得，罗姆这个一直令戈林感到恐惧不安的人总算被除掉了。党卫队兵营墙壁上的鲜血不仅仅吓坏了冲锋队——这时冲锋队已名存实亡，像一个幽灵一般，成为历史的脚注，冲锋队被交到维克多·鲁茨手里，任其自生自灭，鲁茨本人也无实权。1935年，当帝国征兵制度重新恢



1934年圣诞晚会上，“快乐的戈林叔叔”拿一把玩具枪逗孩子玩。



复时，冲锋队的力量被重新分配；其成员们渐渐被军队吸收，陆军部在清洗中采取了消极旁观的态度。1934年8月2日早上，兴登堡总统去世。中午，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同时，宣告了另一个消息：帝国内阁已经产生一个文件，即日起生效，帝国总理和总统职务合而为一。总统这个称号，在希特勒看来，太民主化了。他放弃了它，而选择了德国元首这一称号。

全国谋杀周超出了既定的目标。但是掌握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希姆莱和其部属们怎么办呢？尽管秘密警察机构为自己洗刷干净，但希姆莱非常清楚，虽然他掌握警察的权力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没有堂而皇之的法律地位。

两个文件弥补了这一缺憾。第一个文件于1936年2月10号由戈林签发。这个文件成为盖世太保的“基本法”，文件规定，盖世太保的任务是调查整个国家中一切敌对的势力，1936年6月17号的文件，任命希姆莱为全国警察力量的最高负责人，不论正式的还是便衣警察，警察部队不再服从国家管理，而是由党卫队指挥。

戈林在他钟爱的凯琳庄园设宴招待罗姆大清洗中大显身手的海德里希和他的下属。二战后期经过盟军的轰炸，这座花去了德国纳粹人1500万马克的豪华别墅变成一座废墟。



最后是关于警官们的工资和基本开销等细节问题。文件明确规定：“警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它的职责是：第一，执行唯一的领导者的意愿；第二，保卫德国人民，防止来自国内外敌人的一切破坏企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把警察武装起来，使其力量强大。”

紧接着罗姆大清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马上动手巩固他们的地位，至于戈林，他声称自己心情愉快。除掉了罗姆这块绊脚石后，他以新的热情投身于建造

凯琳庄园的计划。庄园以他去世的第一夫人命名。他计划把它建成一座豪华的乡村居所。它座落在普鲁士美丽的湖光山色之间，戈林对这笔巨大的花费极为骄傲，虽然它将花去德国纳税人1500万帝国马克，戈林认为海德里希及其手下在罗姆大清洗中功劳卓著，作为奖励，他把他们用车接到新别墅里，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晚会一旦结束，帝国长官们便回到已经计划好的且难以避免的话题上，即关于希特勒第三帝国向一个完全的警察化国家转变的问题。

在战争后期，纳粹党办公厅主任马丁·鲍曼的权力日益扩大，远甚戈林与希姆莱。这是鲍曼（前右）与戈林（前左）在一起。



# E

## 无所不在的盖世太保

从一开始，盖世太保的特务们便认定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严密监视国家工作人员，哪怕有稍许对政权的批评，也必须严惩不贷，公民们被教导互相监视，如果不情愿，便是犯罪，但是这种大规模的互相监视决不仅仅限于官僚机构。

德国被分成 32 个辖区。区下分圈，圈内分地区社区，社区下是小社区，最后是街区，每一个分支都有相应的领导，区领导由希特勒直接任命，盖世太保最看重的是臭名昭著的街区长，他可以汇报一座楼里 40 户或 60 户人家的活动。

街区长们被看作盖世太保的最低级的官僚而受到轻视，他们的报酬也少得可怜，但他们却格外热心收集议论、谣言和偶然听到的对话，任何有嫌疑的事情都从他们那里层层上报，在著名的洛温布洛啤酒厂事件中，一个名叫约瑟夫·舍尔的街区长起了很大作用。1933 年 7 月 18 日，舍尔向上级报告了一个名叫麦克·兴特洛



柏林盖世太保司令部为了折磨囚犯，他们把热气吹进没有通风口的牢房里，图为吹气的管子。

尔的木匠、一个叫做马塞亚·莫利斯的酿酒师以及一名叫埃道勃特·范斯的雇工，关于兴特洛尔，舍尔写道：“他是一个公认的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妹妹为犹太人和著名的商人海曼·斯古伦博士做工。”莫利斯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同情者”；而范斯的嫂子也“为斯古伦博士工作”。他接着汇报说，这3个人一起在法国度过假，他想知道的是，他们是如何为这次旅行弄到钱的，尤其那个范斯天天都在抱怨没钱花。舍尔接着建议对3人的信件和行动实行监视，他还着重指出：“他们同斯古伦博士上的来往显然值得深思。”

盖世太保的触须决不止尽于此，希特勒未来的助手和心腹马丁·鲍曼于1935年签发一项命令：“将来，盖世太保的头领们将被邀请参加纳粹党及其组织的一切重要的官方活动。”

盖世太保极力要创造这样一种气氛，让每一个人，从邻居，学校老师到最年轻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都不再得到信任，当父母批评元首或纳粹党时，哪怕是在自己家里，孩子们也被鼓励去揭发他们，整个帝国时代，被抓的可能，戴手套的手敲门的可能，使千家万户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在德国西南部工业中心斯图加特，纳粹党给希洛特班克一家带

通过图中这个简陋的类似蜜蜂状的东西，盖世太保可以窃听囚犯说话。





来了悲剧。这家的主人、53岁的高堤夫·希洛特班克是一个没有职业的共产党员，他被捕后被送到休伯格集中营。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奇是唯一的幸存者。他的父母、姐妹和未婚妻都死了，1945年他写道：

盖世太保也带走了我的弟弟海曼，因为他散发共产党的传单，党卫队以各种方式折磨他，他们把他打得皮开肉绽，把他扔在地上，踩断他的骨头。几周后，他们放了他，他的内伤太重，已成了一个残废，他才14岁。盖世太保打定主意永远不让他恢复健康，他们不时地骚扰他。每次他去他们的总部，被迫去接受所谓的“社会福利教育”时，他们都要毒打他一顿。

但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为盖世太保所设想的角色，却远比鼓励公民去做告密者复杂得多，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下



希特勒在柏林大人民宫的第一次演讲，是纳粹党历史上最重要的内部会议之一。演讲中，希特勒称“我的德国人民”为“未来德国的种子”。



刑事警察头目海因里希·穆勒对于妨碍他的人从不手软。

纳粹党第二号人物赫斯，1941年5月10日他驾机逃往英国。



令，正式将纳粹党党卫队头领职务与新建立的德国警察总监的职务合并，这样希姆莱就得到了党卫队头领和警察总监的双重职务，海德里希作为盖世太保头目决不仅仅是一个警察的提升，他逐渐成为实际上的纳粹党驾驭国家政权的体现者。

海德里希一踏上柏林的土地，便采取了改造盖世太保的行动，他把从前的巴伐利亚的同事们派到关键的位置上。其中有一个叫做海因里希·穆勒的人引起了人们的注目，这个肥肥胖胖、脖子粗大的刑警曾当过西线飞行员，并从1919年底起便成为慕尼黑警察总部的一员，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穆勒在警署总部政治部负责反共任务。那时，他凭着充分的自我保护意识，没有让自己正式加入纳粹党。作为一个天生的投机者，穆勒很清楚，希特勒欠了他某种东西：1931年9月，元首的侄女格丽·萝宝，可能也是希特勒的情妇，不明不白地死去了。掩盖丑闻，杀人灭口的任务据说就委托给了穆勒。

纳粹党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对穆勒的性格作了概括：

在穆勒掌握大权之前，他在警署总部政治部工作，他一向兢兢业业……他的工作是监视左派分子，必须承认，他对于左派分子的制裁极为严厉，甚至到了违背法律的地步。他野心勃勃，孜孜不倦，哪怕让他去同右翼作斗争，他的精神同样会使他得到上级的奖赏，不论谁作他的上级，在政治上，他似乎不属于任一派……他似乎在德国民主主义人民党和巴伐伦党之间摇摆，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他的个性比他的政治态度还糟糕，他对于任何可能妨碍他的人都毫不留情地清除掉。

海德里希对于支持技术管理者更感兴趣，他并不在乎他们以前的政治信仰，只要他们不威胁到他的地位和国家的安全，但他们必须具备好斗的性格，像穆勒一样冷酷无情。

一旦到了柏林，海德里希便分秒必争地对盖世太保开始了大规模的激进的改造。1934年10月，他起草了一个分派盖世太保任务的计划。所有现存各分部重新分成部，室变成分部，以前的私人顾问现在称作副官，接着，海德里希创建了管理、组织、立法3个部。管理部门（第一部）由卡尔·鲁道夫·瓦格纳·拜斯特接管，他是一个有资历的律师，前一个州警署的头目。他以善长组织而出名，对不必要的官僚作风从不容忍。

海德里希尤其关注的却是组织这一分支，他认为它是盖世太保的核心所在，他极想把操纵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海德里希本是一个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工作狂。但就连他这样意志坚定的人也不



“骷髅”第3装甲师



第4警察装甲兵师

的  
徽  
章。  
正  
队  
部  
分  
师  
武  
装  
党

斯坎德贝格  
第21山地师



玛丽亚·特蕾西亚  
第22骑兵团



得不把权力托付给穆勒，“盖世太保穆勒”掌握了第二部的大权。

在慕尼黑，还有地方警察这个问题，柏林却从不忍耐这种碍手碍脚的东西，穆勒可以自行挑出左翼激进主义者，当然，还有他的宿敌——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和他们的有关组织、保守派和“反动派”，连同奥地利事务，共同属于另一部门管辖之下，另有一个部门负责处理由现存纳粹党成员所带来的威胁，还有一个部负责各种宗教团体，包括共济会。

至于第三部，海德里希则握有不容置疑的大权，其任务是反间谍，他首先把自己看作是党卫队保安处的人，是纳粹党的左右臂。这一党派的主要力量就是盖世太保。

至少从文件上看，各部任务分工明确，党卫队保安处独揽警署情报大权，而执行裁决权却属于盖世太保，只有前者有权逮捕、搜查和审讯，盖世太保则负责把人们“处于保护之下”并把他们送到集中营。从理论上讲，这样做分工明确，但实际上，盖世太保独立进行自己的情报工作，但它也必须依靠党卫队保

1933年6月16日当斯图加特市民闻知州长欧根·伯尔兹被捕的消息后，汇集在斯图加特市盖世太保总部所在地赛博尔宾馆外。





安处提供的情报。

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办事效率必然受挫，海德里希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反过来说，这一庞大复杂的机构又令许多人无所适从，这又是一个用警察来管理国家的有利方面。

然而，海德里希有他的担忧，希特勒要把党卫队和警察统一起来的声明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并且，海德里希厌倦了海因里希·穆勒这个职业警察对党卫队保安处和那些独具一格的“知识分子”的不屑一顾和轻蔑，盖世太保的军官们，在穆勒的鼓励下，一点一点地向党卫队保安处渗透，党卫队保安处发现自己被盖世太保军官们包围，而这些人大多还不是纳粹党成员，更不用说是党卫队队员。在1936年中期，607名盖世太保军官中仅有244名属于党卫队；而战争爆发时，盖世太保虽已发展壮大到2万人，却仅有3000人是党卫队队员。轮到分配资金时，盖世太保总占据绝对的优势，而贪心的海德里希却总在东求西告地要钱，申诉说他的人得不到他们做民事服务的同事们一样的资助权利。不论个人感情如何，海德里希是个现实主义者：必须把党卫队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署正式合并，这样党卫队保安处便可成为一个国家机关，由帝国直接负责它的开支，但这要等到战争的爆发了。

盖世太保权力无限，最好的说明便是它进行大规模逮捕的权力。海德里希为自己披上法律的外衣，在他的授意下，瓦尔纳·拜斯特博士宣称“为了镇压和防止一切扰乱第三帝国政府安全和秩序的行为”，警署应该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不论对法律和秩序的侵害是否真正发生。”海德里希天天瞅着他的目录卡，翻阅着嫌疑犯们的档案。

盖世太保在间谍领域也侵入了党卫队保安处的领地，进行间谍活动的盖世太保号称“前线警察”，他们可以对任何涉嫌叛国行为的人进行追查，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室里，他们天天趴在桌子上。



盖世太保的一所训犬学校。

在法律系统内，确有人反对把德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早在1933年6月2日，慕尼黑的国家第二法庭检查官已经注意到达豪集中营里无数原因不明的死亡。一份呈给法律部长巴法伦的报告指出：“达豪集中营里的事件调查需要认真严厉地进行。”1933年5月的第二周，4名达豪犯人之死得到了调查，结果发现他们是被集中营卫兵折磨至死的。

在战后无数的审判中，为盖世太保辩护的人声称，自从希姆莱建立起一个“死人团”专门提供集中营卫兵以来，集中营一直由他一手负责，1936年以前的几年是无法证实的，因为管理集中营的费用并非出自帝国总开支，

库特·达吕格是希姆莱任命的德国民事警察头目，后被提升为武装党卫队上将。



1936年以后，却有足够的文件证明盖世太保直接卷入其中，无国籍的难民被在耳朵上作了记号以便驱逐，但也有的暂时被送到集中营。拜斯特博士负责这一工作，他宣布说：“对无国籍难民的接收通过军事警察来进行，检查卡上每人有一张照片。”

只有当其它国家愿意接受被驱逐者时，他才被允许离开集中营，即使那时，盖世太保的威胁依然存在。拜斯特规定：“在移交之前，前线警察将从被驱逐者手中拿到一份复印声明，即一旦他回来，他将面临被送回集中营的危险。”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手中的警察权力的逐渐扩大，导致官场上职位肥缺的明争暗斗，其中一个库特·达吕格，他曾任柏林党卫队的首领，但迪尔斯下台后，他胃口更大了。希姆莱认识到，安慰一下达吕格有益无害，当盖世太保力量一分为二时，机会来了。海德里希掌握了党卫队中央保安局（党卫队保安处）、海因里希·穆勒的盖世太保，亚瑟·勒比手下的刑警、前线警察和反间谍警察，其余的权力便给了达吕格，相当于社会秩序警察。

海德里希尽管权力不断增加，但在一个部门受到希姆莱之牵制。海德里希对集中营的干涉使后者大为震惊，但他显然缺乏与之对抗的决心，相反地，1934年10月20日，希姆莱传达了一个新文件：一个新的职位产生了。根据在此前10天的一条命令，集中营监查部门指挥机关设在柏林盖世太保大楼，关于集中营的经济事务的管理、组织、执行等权力均移交给新部门，在此之前，权力属于盖世太保第二分部。

希姆莱接着说，集中营检查员的职务将由党卫队西奥多·埃克担任，他在罗姆大清洗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希姆莱个人权力分毫不损，因为同一个文件又规定，一切有关文件，必须经由集中营检查官交到普鲁士国家秘密警署。

虽然海德里希因为这个文件失去了对集中营的控制权，但对于因为怀疑有反抗之心而被盖世太保移交来的人——所谓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强迫劳动的政治犯和犹太囚犯



盖世太保命令犹太妇女脱光衣服，然后送入毒气室毒死。





“国家的敌人”，他仍有生杀大权。受害者不受任何法律保护，一旦被捕，他们便成为不复存在的人，除非国家秘密警察作出另外的判决。

海德里希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些他认为是最可怕的潜在的敌人身上，他们是纳粹党内和警察里的人，尽管他坚持要有合法程序。他却毫不犹豫地歪曲规定为自己服务，并不断地招惹仇恨和恐惧，除了内部监视外，海德里希整整建立了一套国外的和反间谍特务网络。

海德里希这时和他的老朋友——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成为并肩战斗的伙伴。卡纳里斯是个神秘的影子人物，海德里希第一次认识他是在海军服役时。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是国防军的一部分。对海德里希来说，这就意味着它有“反革命”掺杂其中，即：如果纳粹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对这些持有陈旧思想观念的人加以监视。况且，党卫队保安处和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有着共同的事业。必须认识到，后者是情报部门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建立起友好的工作关系是有必要的。

尽管卡纳里斯自命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人们都知道他讨厌纳粹的野蛮过激。当然他的思想与海德里希的种种新举措缺乏共同之处。瓦尔纳·拜斯特博士却是另一副德性，拜斯特和海德里希二人举行了一次会谈，海德里希对他理智妥协的风度颇有好感，在时机成熟时，拜斯特拿出了“十诫”，在间谍事务上，把党卫队保安处和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的职责进行了明显分工。

这一文件实质上在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这个相互竞争的情报机构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又使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免受党卫队的干涉，而且，对卡纳里斯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它似乎确立了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在间谍与反间谍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但“十诫”中有些有意模糊的条文，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

里变得非常明显。例如，条文规定，盖世太保主要负责处理背叛行为，而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则主要负责国外军事间谍活动。海德里希和他的人监视外国来使、报社代表、商人和有嫌疑的外国人。但是，逐渐地，反对国家的管辖“一切”敌人的斗争，不论国内国外，有意无意地进入了海德里希的范围之内。很快，海德里希便实行起对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的监督，他夺取它的情报，理由是他必须了解一切军事和政治上的动向。

与此同时，还有其它事情亟须海德里希处理，国家社会主义者们、犹太人、共济会基督派以及布尔什维克，都更难以对付。年

卡纳里斯海军上将（188~1945），从1935年到1944年任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局长，这是他与海德里希在一起开会的情景。



轻的阿道夫·艾希曼对这些事情格外感兴趣，他是从党卫队保安处调到盖世太保去的，艾希曼对犹太人的仇恨被他在学校期间的经历火上烧油，因为他有一张黑面孔，他的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犹太人”。

当艾希曼的母亲去世后，他一家移居到了奥地利，1932年4月初，他加入了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党，并宣誓成为党卫队成员，然而，奥地利警察却对他不放心。作为权宜之计，他去了德国，在那里，他很快便引起了海德里希的注意，艾希曼的第一个工作



艾希曼政治生涯开始于党卫队保安处，后调到盖世太保负责“犹太事务”。

是纯粹的苦工，他被要求打印那些处于纳粹党监督之下的嫌疑分子的资料。他开始阅读所有关于共济会的文件，并且很快使自己相信共济会正和犹太人策划一个巨大的控制世界的阴谋。

作为一个迂腐小心、毫无色彩的人，一个热忱的种族主义学生，他颇受希姆莱的欣赏，这并不令人奇怪，他同有权实行实质性监督的盖世太保ⅡB部共同工作，逐渐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当希姆莱创建了犹太事务科学博物馆时，他任命干劲十足的艾希曼负责筹备工作，艾希曼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参加犹太人的集会，走访许多市镇的犹太人居住区，作了大量的笔记，并建立起系统的档案。随着自信心的增强，他不再把自己仅仅当作一个档案保管人，而是一个情报特务。艾希曼的得意之作



一切德国公民必须带证件，民警和军警都可以随时拦住他们检查。照片上一个便衣警察在检查一过路者的身份证件。

便是揭示了希特勒的厨师是 2/30 的犹太人。像海德里希一样，艾希曼坚信犹太人是纯种雅利安女人的践踏者。法律已经禁止德国人和犹太人发生任何性关系。盖世太保有权决定是否将违犯者送交保护监管处。

一个例子是来自诺伊施塔特盖世太保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报告说犹太康养院、旅馆，客人和德国雇员之间的关系中，都有严重的违法行为，海德里希下令对案件逐个审查，由法庭判决后再决定是否送交特殊的“保护监管处”，他的助理宣布：“我要求，每个案件结束后，如果一个德国人被判刑，那么相关的犹太人必须送到保护监管处并立即报知柏林警署。”

对于共产党员、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动派”和教堂，党卫队保安处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实际上，党卫队保安处情报机器如此活跃，其特务们可谓亦步升趋地跟随着那些干同样工作的盖世太保军官们。当然后者还多了执行逮捕和监禁的任务，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党卫队保安处，逐渐成为

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情报机构。它给帝国头脑们、纳粹党领袖们提供一切关于“帝国政治局势和大众情绪”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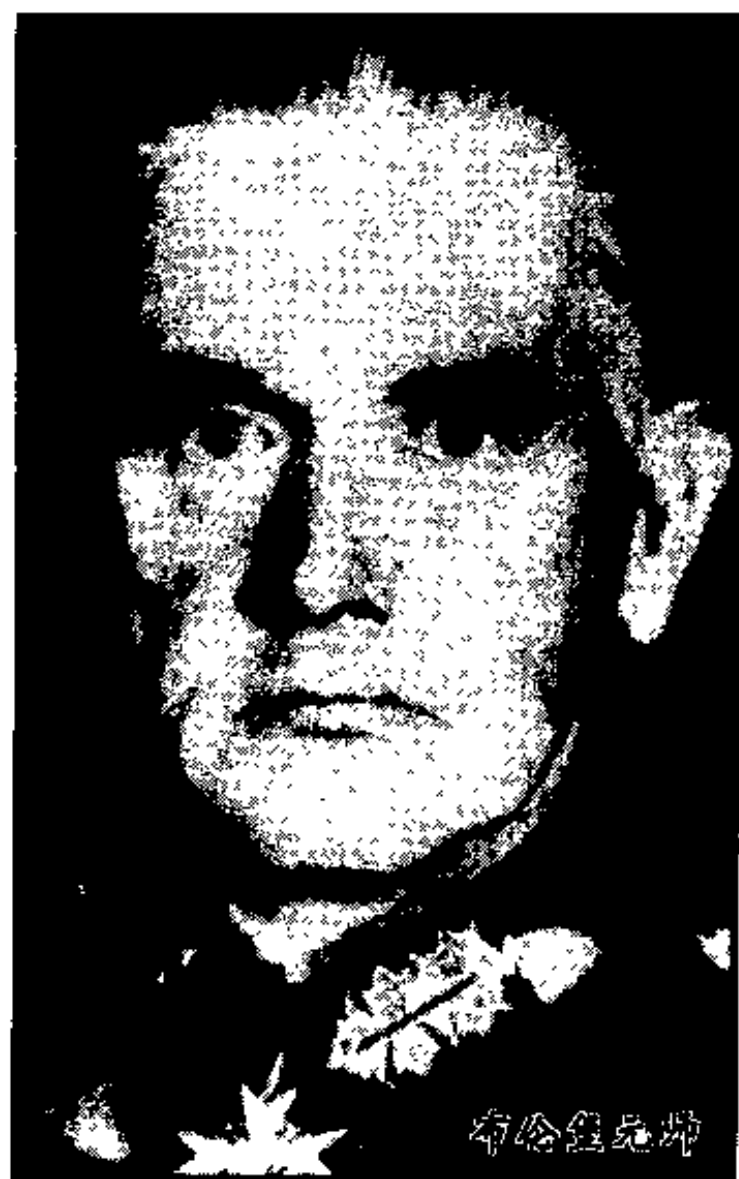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元首正用搜索的目光审视着他的由 17 个军和 36 个师组成的新部队。依照他的品味，这支军队远远称不上是“新”的，这个曾经是送信员和一战战壕里的二等兵，对于他所称之为“上层一小撮该死的人”从未停止过深深的蔑视，他们是反动派，他知道他们崇尚君主政体而仇视他，他将在给这些旧秩序的残留代表者们的最后一击中，发挥神秘莫测的作用。

从 1933 年起，这“一小撮该死的上等人”由 3 个指挥德国国防军的人作代表：国防军统帅冯·布伦堡、国防军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弗立契和国防军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前两个人

战争部长布伦堡元帅（中）、陆军总司令弗立契上将（左）、  
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右）在 1937 年 11 月 5 日的会议上。







布倫堡元帅

是清除的目标，由戈林和希姆莱实行暗杀。戈林尤其痛恨布伦堡。这个人，从军事理论的角度上看，是高他一畴的，而布伦堡总乐于不失时机地让他认识到这一事实，戈林急于让国防军和纳粹党形成更紧密的关系，然而这对于国防军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在1937年期间，戈林对布伦堡的不信任与讨厌具体化为一个愿望：那就是取代他成为战争部长。

那一年，戈林和盖世太保的机会来了。装备部队的

速度之慢一直不合希特勒的口味，为了寻求补救之策，他召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会议记录以希特勒的副官豪斯巴斯命名。作了会议记录，幸运的他活了下来，并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了证。这次会议在1937年11月5日举行，出席会议者有外交部长冯·纽赖特、戈林、布伦堡、弗立契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

希特勒阐述了他的侵略思想及如何成功的观点。除了戈林表现出高涨的热情，别人都认为德国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发动一场战争。布伦堡相信，一旦德国有扩军的迹象，法国和英国就会发动攻势。弗立契附和了他的观点，还抱怨说，纳粹政治过多牵制了国防军的精力。如果希特勒打算发动战争，他不太可能指望他的两个年老的指挥官迭建奇功。用行话来说，从那天起，布伦堡和弗立契的好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不论作为一个士兵有多少美德，一旦轮到纳粹政治，他总是极端愚蠢的。显而易见，

他不是无耻残忍的戈林的对手，却径直落入了他的手中。1937年10月，布伦堡缺乏判断能力这一致命的弱点使他去找戈林，寻求戈林对他“在一件微妙的私人事件上的承诺”。布伦堡曾跟一位低层的不属于军队的女人搭上了关系。他急于从戈林那儿得到保证，使之不致影响他个人的地位。戈林立即作出了反应，同时他却利用盖世太保和警察的力量去揭示这位情妇的过去，并要求越多越好，还有一些别的复杂的事情。这女人以前有个情人，戈林“劝”他移居到阿根廷。布伦堡认为在戈林那里找到了理解与承诺，却不知戈林的调查已成果硕累。

这场戏剧的下一场于1938年1月12日拉开帷幕。这一天报纸上登出了一则声明：布伦堡元帅在柏林和弗洛琳·格鲁恩结婚，婚礼私下里举行，证人是希特勒和戈林。人人知道，布伦堡是个漂亮的鳏夫，已成年的孩子的父亲，所以他的婚礼报道既无评论也无照片也许不值得惊奇。沙龙里谣传，新郎是个爱虚荣的人，他为自己情场老手的名声感到沾沾自喜。至于新娘，除了她出身卑微之一事实，人们对她一无所知，然而，婚礼后还不到一周，柏林关于布伦堡元帅的谣言却沸沸扬扬。人们纷纷嘀嘀咕咕，指手划脚。为什么婚礼快得让人觉得“有失体面”，又如此保密？新娘真的拿不出那无数的法律所要求的官方文件吗？尤其是关于其祖父母的警方记录或文件？

不到两个星期，戈林自称已掌握了关于布伦堡的严重证据。证据来自于亚瑟·勒比的档案，他是刑警头子，海德

德国国防军陆军参谋长贝克上将。



里希的下属,里面包括一张黄色照片,照片上的女人除了一串珍珠外浑身一丝不挂,照片后面写的是布伦堡的名字和地址。戈林把它带给希特勒看,示意说这照片来得很突然。对性问题一向严谨的希特勒勃然大怒。极合时宜的是,戈林令人怀疑地恰恰弄到一份完整的档案,说其它同样淫秽的照片还有很多,而且被拉皮条的四处兜售。

戈林不失时机地请求,让他去亲自告诉布伦堡,这个婚姻应该宣布无效。当然,戈林去找布伦堡另有动机,他想要求后者为了名誉而辞职。如我们所知,戈林认为他是战争部长这一职位最合适的人选。但作为一个很现实的人,他知道这职位也极可能落到弗立契手中。戈林和他在早期的会议上曾大动干戈。弗立契像个令人讨厌的梦。怎样对付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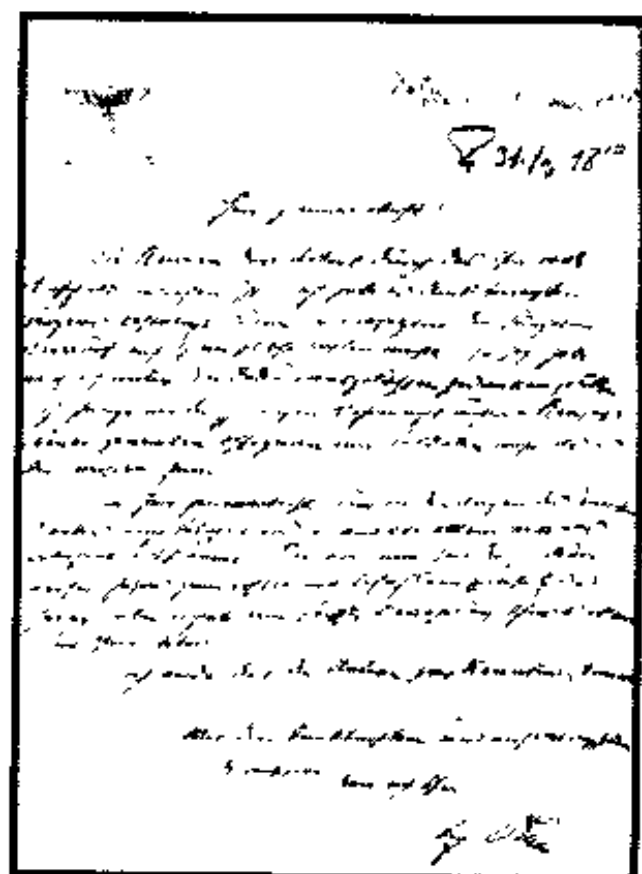
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巧合发生了:一起新的丑闻在国防军最高层传开了。其主要人物就是弗立契,他被指责是同性恋者,虽然消息的来源很可疑,一个叫汉斯·斯密德的同性恋拉皮条客被盖世太保抓住。据吉斯韦斯说,审判官们诱惑斯密德为自己开罪,而供出了一个叫做“弗里希”或者“弗立契”的人物。除了那个臭



名昭著的大人物、国防军的最高指挥官,还有谁呢?何况党卫队正拼命地要找他的碴呢?盖世太保军官们记下了这个皮条客所供出的一切,斯密德还说 he 从这个主顾手里赚了几千帝国马克。

他们拿出一张高级指挥官的照片给他看,问他这是否就是那个在柏林外宛西火车站搞同性恋的人,斯密德说弗立契付了钱要他保持沉默。据占斯韦斯说,供词被整理成档,由海德里希交给了希特勒。可是,元首仅仅匆匆瞥了一眼,似乎对这种脏污的东西感到不寒而栗,他命令希姆莱烧掉它,但布伦堡危机使之未能付诸行动,弗立契的档案被交给了海德里希。希姆莱确实听从希特勒销毁了它,但仅是在进行了复制之后,不管如何,戈林希望这一丑闻闹得越凶越好。戈林告诉了希特勒有关布伦堡夫人伤风败俗的事情后,希特勒马上召来弗立契,当着戈林的面,把吓得六神无主的斯密德带到了他面前。弗立契凭自己的名誉发誓, he 以前从未见到斯密德,但元首却不相信。

第二天,布伦堡辞去了国防军总司令的职务,但是,令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恼火的是,弗立契却不愿善罢甘休。他要求一个正式的审判,对此希特勒无法拒绝。3月18日,怒气冲冲的戈林主持了听证会,而弗立契被判无罪。事情很简单,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去了一趟斯密德所供出的地点。那里确有一个叫弗里希的退役骑兵。他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和付给别人敲诈他的钱。而且,弗里希声明盖世太保对他的事情了如指掌,他们大约2个月前便审讯了他。



这是希特勒写给陆军总司令弗立契将军的亲笔道歉信。

弗立契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尤其尴尬的是，希特勒不得不给这个无罪开释的人寄一封道歉信。关于希特勒是否知道有人企图中伤布伦堡和弗立契，至今没有任何确凿证据。戈林和希姆莱显然是出谋划策者。问题是无罪开释并没有帮上弗立契的忙，后来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职位，希特勒毫不顾忌地开除了他。冯·布劳希奇将军取代弗立契做了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是一战时的炮兵军官，以对帝国忠心耿耿而出名。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是创立一个组织，使其凌驾于军队各机关之上，该组



人变成了负重的奴隶，照片显示集中营犯人被党卫队驱赶背负石头去修建一英里之外的一条新路。





后升为元帅的布劳希奇

织(即第三帝国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是无能的马屁精凯特尔上将。



里宾特洛甫

另有 30 位将军被解除指挥大权, 44 人调动或退休, 许多老年军官落到同样的下场。政治家们也受到了免职和被人取代的遭遇。外交部长纽赖特被革职, 由一个死心塌地的名叫里宾特洛甫的纳粹份子代替。战争部长因悔过自新而幸免于难, 逃脱了戈林的魔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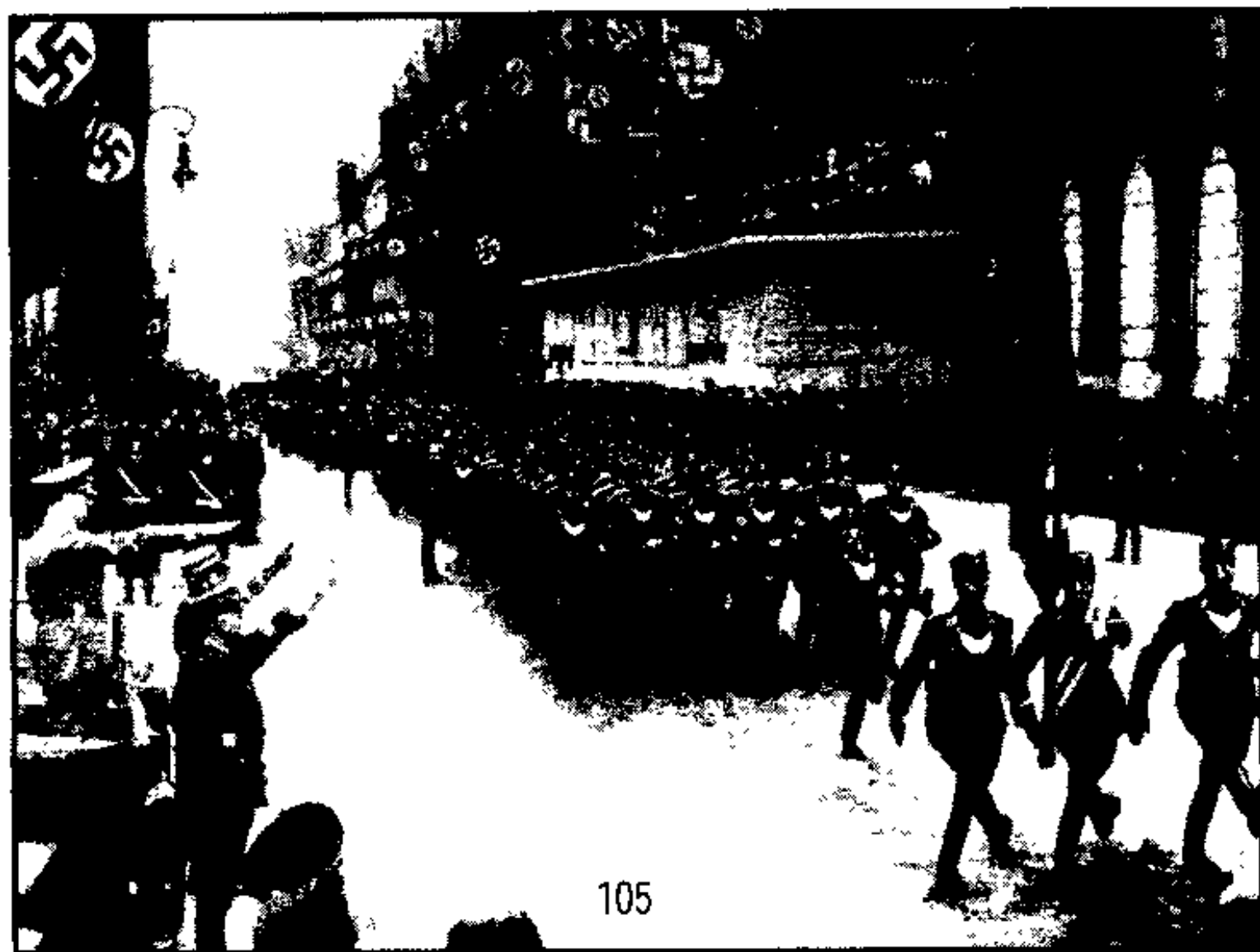
弗立契最终被允许回归国防军。1939 年他去了波兰, 一门心思但求速死, 不久即如愿以偿。希特勒为他安排了国家级军人葬礼, 授予他种种荣誉, 在大雨滂沱的柏林鲁斯卡顿广场, 戈林代表元首, 举杖作最后的致意。布伦堡满怀庆幸, 隐姓埋名, 终于在 1946 年作为美国的战犯死去, 这也是他无法逃脱的下场。1971 年, 一位叫加利克的老记者为了写海德里希的传记而采访了布伦堡的遗孀, 她说海德里希在他们的婚礼前便伪造了那些下流的照片, 而她丈夫也知道伪造照片的人是谁, 她丈夫向她说明那是一个业余画家, 他擅长伪造模仿, 在海德里希的工厂里工作。

加利克只知道他名字开头两个字母是“KM”。布伦堡的遗孀解释说她丈夫认为，那人把她的头像加到做下流动作的女人照片的身体上。

在这场戏中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真正的同性恋弗里希在盖世太保监狱中自生自灭，在历史上销声匿迹。拉皮条的敲诈者斯密德承认自己撒了荒，他并没有在宛西车站见过弗立契，但他说，他这么做是有人以死来威胁。戈林曾向他保证：“如果你说真话，我保证不会伤害你。”戈林很守信，一经审判完毕，他便把斯密德交给了希姆莱，把他永远地关进了集中营。

1938年2月，国防军将领们蒙受的耻辱令他们永世难忘。但他们的意见就像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的树叶一样摇曳无力。希特勒决心已定，不可更改，纳粹德国正踏上战争之路，而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机器将与之同行。

1938年4月29日，希特勒在检阅部队，这天是他的49岁生日。正从他面前经过的是刚刚于1938年3月13日参加了吞并奥地利的党卫队特遣队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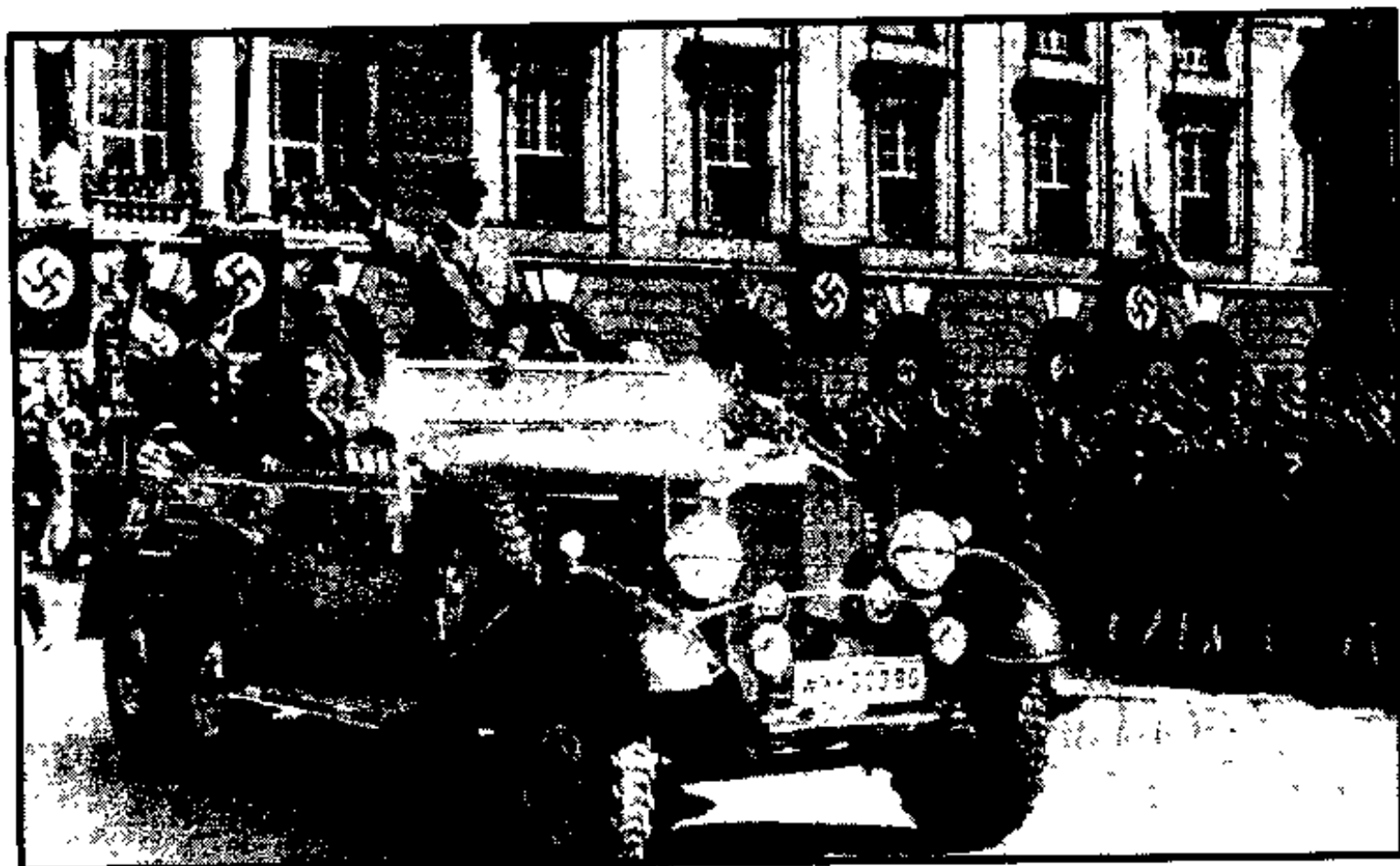
# F

## 走向战争的盖世太保

1938年5月一个欢快的日子，英国驻柏林军方代表梅森—麦克法伦上校在林芝—麦尔克路停下来加油。这条路拐过几道弯后就通向维也纳，突然一队威风凛凛的车队飞驰而过。后来他回忆说：“先有2辆载着持枪荷弹的党卫队的卡车过去，后面紧跟6辆高级车，车上是希特勒和他的贴身随从和保镖。”

元首正在去维也纳的路上，他要去处理德国和奥地利统一的具体事宜。3月13日他到达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下榻在皇家宾馆，他在那里受到了歇斯底里的群众的狂热欢迎。之后他和他的老家伙们转入正题。他们是希姆莱、海德里希和达吕格，另外舒伦堡也一大早就从柏林赶来。他带来了全副武装的党卫队队员和各种非正规军组织的卫队。

希特勒对奥地利人素有刻骨的仇恨，他认为在他年轻时漂泊的日子里，他们抛弃了他。复仇的任务交给了专制的工具。比



1938年3月14日，德国并吞奥地利的第二天，希特勒在维也纳受到热烈欢迎。

1938年3月17日，希特勒成为奥地利的征服者。几天前，纳粹军队涌入奥地利并带来了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等特务机构。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希特勒、希姆莱（右五）、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右四）、空军上将米尔希（右三）、奥地利总督赛斯-英夸特（右一）。



如：舒伦堡为希姆莱工作，更直接地为海德里希工作，他的手下早已开始在德国少数民族地区，和奥地利及捷克的法西斯和纳粹团体中建立了秘密的地下情报网。

3月12日，德国军队开进了奥地利，这决非自发之举，党卫队和海德里希早在两年前便订出了计划。海德里希设想了一个谋杀和叛乱的手段，后者将在维也纳实行。党卫队保安处的头目动了一个以慕尼黑为基地的奥地利党卫队军官的援助。他将利用党卫队保安处的情报和力量来进行他特殊的叛乱和谋杀。

1934年7月25日，身着奥地利军服的党卫队占领了维也纳政府，并谋杀了奥地利总理阿尔斐斯，这仅仅是随之而来的恐怖行动的一个序曲。德奥合并之后，奥地利纳粹分子在维也纳横行无忌。他们许多人还正当少年，他们的主要活动便是骚扰犹太人，他们强迫犹太人在腰上扎刻有“十诫”的皮带，并强迫他们擦洗地板。

这种种行为都得到了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的准许，这个新任的奥地利党卫队和警部头目，早已以残忍而出名。据谣传，

1934年7月25日，刚被党卫军谋杀的奥地利总理  
阿尔斐斯的遗体躺在他的办公室的沙发上。





他每4天都要看到一次流血，绝无偏差。海德里希对他的过分为很不满。他宁可让盖世太保举止更有传统味儿，即抓住持反对政见者，并分清哪些该送去集中营。盖世太保热情十足，已经干得超出了希特勒的规定范围，1938年11月1份《每日报告》中说：“根据1938年11月16日下午6点作出的估计，维也纳已有6547名犹太人被捕。其中有3700人被送到达豪集中营，1865人暂时候审，982人被释放。送到达豪的犹太人，经检查留下来2000人，医生说他们病得太重，已没有用处了。”

海德里希素来对教堂怀有刻骨仇恨。他尤其注重对敢于出言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神父们进行镇压。36岁的基督教神父约翰·伦兹神父曾公开谴责“元首及其国家的行为”。神父的言论被盖世太保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这些言论包括：“当战争来临时，德国将被孤立。没有人会帮助它，哪怕是意大利也不会，希特勒是被放出来的撒旦，一切邪恶由他而起……耶稣受难像被扔出学校和医院……我们所能传播的只有炎热的空气。奥地利被掠夺、被污辱，而这一切几乎没有遭受抵制，这是奇耻大辱。”这一部分的《每日报告》中写着：“针对伦兹的调查正在进行。我们怀疑他在国外宣讲这些恐惧故事。”

受害者之一有库特·舒施尼格，他是被杀害的阿尔斐斯的继任者。他被带到维也纳市的盖世太保总部。他们想好了各种方式羞辱他，首先，他们给他一把扫帚，让他打扫自己的牢房和他的卫兵的房间和厕所。他的饭盘被放在卫兵刚刚使用过的便盆旁边。他们还把他当作一个必须为自己的食宿付钱的寄宿者对待。由于他没有钱，他们便常常不给他饭吃。

但他在纳粹监狱里活到了战争结束。生于英国的奥洛夫·韦特也活了下来。他是法国情报人员。他要经历的是盖世太保惨无人道的虐待。当德奥合并时，他不幸正在奥地利，他被抓到盖世太保总部审讯，盖世太保怀疑他同反纳粹者有联系。审讯他的盖世太保弗德曼急于得到结果，他“会向我椅子后面的打



1942年夏，希姆莱和卡尔滕布鲁纳参观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他们中间的党卫队军官弗朗斯·兹瑞斯是该集中营指挥官，后来他因拒捕被美军士兵枪杀。

手微微一点头，然后啪一声，一个小橡皮槌便顶在我的脖颈上，不偏不倚正好在头盖骨之下，于是我的耳朵便开始嗡嗡响，我的膝盖后面开始发抖，头盖骨内剧烈的疼痛便开始蔓延、收缩。”韦特不无后怕地回忆道。

弗德曼是个大烟鬼，他的下一步便是大叫“拿烟灰缸来！”然后他“使劲地吹烟头，直到剩下烧得红红的地方，把它放到我的手上方停一会儿，然后咬紧嘴唇，把烟头使劲地往我皮肤里按……当他把燃尽的烟头扔掉时，他把烟灰抹掉，我手背上就只剩下圆圆白白的小肿块。半小时后，就会肿得像一个又小又亮的半球。弗德曼一口气烧上这么3个时，它们看起来就像3个粉粉黄黄的碗豆。然后他用一把尺子抽它们，直到肿块破裂，我的手背上沾满流出来的脓血。”

在统一之后，奥地利变成了“日耳曼帝国的一个省”。维也纳仅仅是一个省行政中心。那些没有领受情洗街道、清扫水沟

任务的犹太人，在战争爆发之前，倾其所有，才从纳粹手里买到移居国外的自由。

对奥地利的占领，使希特勒给帝国增加了 700 万臣民，同时他获得了极为宝贵的、意义重大的战略位置。他准备继续冒险了。在维也纳，他拥有了通向东南欧的大门。因为轻而易举占有了奥地利，所以他受到了鼓励，决定继续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是在前奥地利领土上建立于 1918 年至 1919 之间的一个国家。它自从建国，一直受到少数民族问题的困扰，最甚者为苏德台日耳曼人。他们分布于同德国毗连的波希米亚地区。

希特勒早在 1934 年就作出了计划，那时候，一个名叫康拉德·海恩伦的德籍捷克体育教练建立了“德国阵线”。这个崇尚纳粹党的家伙要求让苏德台日耳曼人在捷克国内独立自主，希特勒决定利用苏德台人的感情来消灭捷克，他在 1938 年 2 月宣称，苏德台人必须依靠第三帝国来保护他们不受捷克人的凌辱。

法国和英国两大西方民主国家开始关注捷克的命运。英国

1939 年 3 月 15 日，纳粹德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照片中的党卫队突击队员正在通过布拉格查尔斯大桥，远处是哈德卡尼堡。



首相张伯伦三访德国，请求希特勒不要动用武力。在第三次出访时，在慕尼黑古老的巴洛克城，他甚至在乞求和平，请求停止一切关于战争的谈论。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希特勒的专制伙伴墨索里尼，一起在慕尼黑会晤了希特勒。在后来的会议上和签署事关重大的慕尼黑协定时，捷克和苏联代表却被拒之门外。协议规定捷克必须交出苏德台地区。

德国向西方民主国家显示：他们将无能为力制止德国人的“事业”。张伯伦和达拉第都知道，论军事力量，他们是无法与希特勒相抗衡的。他们以为，除了接受希特勒的条件外别无选择。张伯伦很快作为一个绥靖主义者被历史淘汰，但他却一直以为他为世界和平作出了真正具有政治家风范的贡献。事实上，英国当时不少绥靖主义者认为他签了个有道理的协议。

对于捷克人来说，任何公平待遇的暗示都是短暂的。慕尼黑协议上的签字墨迹未干，希姆莱已掌握了“德国阵线”的大权。它被重新命名为“苏德台日耳曼党”，希姆莱还在苏德台地区任命警察，他们像其余的警察一样，接受党卫队首脑希姆莱的领导。

战役转到了波希米亚和摩



“贫民区”的孩子们。



1938年慕尼黑会议期间，张伯伦(左)与希特勒亲切握手。

1938年慕尼黑会议期间，张伯伦(左)与墨索里尼在一起交谈。



1938年10月，张伯伦回到英国，手里举着有希特勒签字的、一钱不值的《慕尼黑协定》，声称和平就在他的手中。





拉维亚。在这里，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操纵下的苏德台日耳曼的纳粹学生组织大显身手。他们负责镇压任何抵制活动，到1939年3月15日，德国国防军开进已经残缺不全的捷克，出场安排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在其贴身随从和保镖的陪同下，超过他的正在前进的部队，连夜行过冰封的道路，以便头一个以征服者的身份到达哈德卡尼堡——波希米亚国王们的古老城堡。

对布拉格人来说，生活从表面上来看还算是正常的，商店早上8点照开，咖啡店照常营业。连报摊也在继续卖外国报纸。然而，穿黑军服的党卫队，满载军官的小车和旗子到处可见。希特勒在哈德卡尼堡宣布将已归属德国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作为保护领地。被纳粹党看作比较“中性”的康斯坦丁·纽赖特被任命为保护人，康纳德·亨莱恩被任命为主管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内务的头头。

真正的权力却落到了卡尔·赫尔曼·弗兰克的身上，在几年之内他便使纳粹党卷入了二战的罪恶暴行。海德里希也在忙碌。在党卫队后面产生了新的特别行动组。这是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杰作，其成员来自于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其中一个特别行动组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杀人分遣队，专门搜寻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者。关于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所扮演的角色，在入侵捷克时曾有一份文件规定：“党卫队保安处跟随进攻的大部队之后，完成和他们在第三帝国内所做的同样的工作，即维持政治生活的安定，保证一切对国家经济以及战争经济所必要的企业的安全。”

文件接着简述被占领土如何划分，“从而使一切意欲在捷克找到工作的党卫队保安处成员都能马上找到工作。特别行动组得到与他们在帝国职位相称的职业……由党卫队保安处老年军官指挥和领导对被占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盖世太保军官将被分配一定的工作。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对于准备、培



在“水晶之夜”事件前，已经有布告号召市民联合抵制犹太商品。犹太人商店被刷上了标语，窗户被打碎。

训和资料的使用必须与在国内一样有同样的权力。”

对捷克的支解瓜分并不是唯一的任务。在德国国内，犹太人的问题还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个例子是一起枪杀事件。扣动扳机的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德国犹太避难少年格林斯潘。

到1937年10月底，海德里希已经下令逮捕了1700名波兰籍犹太人，帝国要除掉他们。大约6万犹太人原本是在一战结束时从波兰移居德国的，他们在德国繁荣兴旺起来。当纳粹党宣告要把他们遣返波兰时，波兰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并禁止他们入境。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困于两国边界，没有住处和食物。

海德里希采取的行动是把他们赶进货车运过边境。这是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第一次遣返。受害者很快便面对着波兰军队的机枪目瞪口呆。残存下来在德国和波兰之间的无人区徘徊的人中有一个波兰籍裁缝，他来自汉诺威，他的财产已全数被没收。他和其他逃难者一样，身无分文，饥寒交迫，常被大雨浇透。

这个裁缝的名字叫曾德尔·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十几岁的儿子在巴黎听到了父亲不幸遭遇的消息。1938年11月7号，年少的小格林斯潘手持左轮手枪，来到德国使馆，显然想对德国大使实施报复。当他问冯·韦尔扎克大使现在何处时，大使的第三秘书拉斯回答了他。格林斯潘对他开了5枪。然而，不幸而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斯仅仅是个

好奇的德国人窥视着被捣毁的一家犹太人商店，这是为报复一个犹太人小格林斯潘（照片中小图）所犯的一起政治谋杀而进行的成百上千起捣毁事件之一。这些破坏加快了把犹太人从德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的进程。



小官员，而且是盖世太保监视下的反法西斯主义者。

那些从收音机上听到这一消息的人，一开始并未意识到格林斯潘犯罪的全部含义。像乔治·罗斯就没有意识到其含义。他是个商业画家，家住在苏登堡，此时他正忙于准备自己即将到来的婚礼。

他后来回忆说：

当我一个拥有一家男装商店的朋友诺塞克要求我把他的名字画在商店的前门上时，我一点也没有把它和拉斯之死联系起来。事情看起来好像当地盖世太保急于把犹太人的财产都作上记号，于是想到了这个办法。盖世太保的命令很明确详细：所有的犹太店主必须把名字写在与视线齐平的门上的地方，每个字母要12厘米高、1厘米宽。

人们都知道在整个犹太人居住区，我是唯一能做这种独特工作的画家。我只是名义上拿了诺塞克一点钱，因为我想盖世太保应间接负责这笔费用。事实上，这件事非常有利可图。其它听到当地盖世太保命令的店主也都来找我，使我一下子应接不暇。

罗斯和其它犹太人都没有想到这一指令意味着特别的恶运。他们认为，这不过使纳粹党更容易辨认犹太人的财产，然而



戈培尔利用拉斯之死，煽动德国人民起来对犹太人进行“报仇雪恨”。

真正的动机远为可怕。纳粹德国已经制订好了他们最阴险狠毒的反犹太人计划。

11月8日那天，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到慕尼黑参加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暴动15周年纪念。纳粹党老兵们正在吃晚饭时，来了一份电报，宣布拉斯已于当天下午死于枪伤。戈培尔这个天生的演讲家抓住时机，发表了一通反犹太人的言词激烈的演讲，声称拉斯之死显然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他正言厉色地说：德国人民一定要报仇雪恨。

暴行开始了，但主要仍由纳粹军队来执行。德国燃烧起残暴行动的熊熊大火，并作为“水晶之夜”而永驻史册。帝国上上下下，持枪的党卫队保安处士兵冲进犹太人家庭，砸碎他们的家俱，把他们的东西扔到街上，抢走钱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当着他们家人的面强奸妇女及至年仅13岁的少女。稍有抵抗便被残酷地杀害。犹太人被扔进冰冷刺骨的河水里，当他们试图爬出来时，冰雹般的砖头石头便落到他们身上。在商店遭受抢劫的同时，犹太教堂被点上了火。乔·罗斯突然明白在店门上写名字是什么意思了。到这时，大约7500家犹太人开设的小商店和百货店已被砸毁拆掉。

战后，活下来的盖世太保声称，直到事情一发而不可收，他

1938年11月10日，“水晶之夜”行动开始实施，在整个德国，全副武装的党卫队队员袭击了犹太人商店和住宅。图中的犹太教堂被捣毁和放火燃烧。





们才知道“水晶之夜”的活动已经太过火了。例如，海德里希就曾在其居所附近一座犹太教堂燃起大火时向他的夫人声明说，这出乎他的意外。他和夫人正为教堂起火原因迷惑不解时，他们得到消息说，戈培尔的宣传机构已经通知盖世太保说党卫队“已开始对犹太人进行集体迫害，盖世太保不得干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盖世太保确实参加了“水晶之夜”的行动，而且整个行动决非一时兴起的自发行动。那天晚上关键情报之一由柏林的海因里希·穆勒签发的，11月9日半夜被送出，上面标有“特快保密”字样。情报上包括下列信息：

一、反对犹太人，尤其是反对他们的教堂的行动马上就要在帝国展开。任何人不得干涉；但维持秩序的警察有权制止抢劫和其它过激行为。

二、只要教堂里有历史性档案资料，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把

希特勒在布拉格接见德国学生，陪同他的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



资料弄得手。

三、做好准备逮捕大约2万到3万犹太人。此外，要选出富有的犹太人。晚上的行动将得到详细的指令。

所谓“详细的指令”迅速达到各地方。乔·罗斯回忆说：“正好在我结婚后的第二天，早上6点钟，两个我认识的盖世太保找到了我。他们礼貌极了，对我的妻子视若无睹，连问一声‘这女人是谁’都没有。显然他们受命只逮捕男人。”

这是纳粹从犹太人手中夺去一切财产的合法盗窃。犹太企业被卖给雅利安人，犹太人的金银手饰被抢走。为了充实德国的金库，犹太人被集体处以10万马克的罚金，而这是在他们已经倾家荡产的基础之上。到期的保险金被没收。靠这样残暴手段夺取的财物对于国力溃乏的第三帝国犹如雪中送炭。犹太人此时唯一免受的恐惧是驱逐出境和丧身集中营，那还是将来的事情。但犹太人已经受到了近乎最后通牒的警告：从现在起，他们再无安全保障。

希特勒严词谴责了那些对“水晶之夜”的疯狂行为的批判之辞，声称这证实了“犹太人大阴谋”的实力和范围。此外，他所考虑的远远超过给犹太人一个严厉警告。他一门心思要继续他的征服计划。如果可能就用外交手段，否则便动用武力。捷克被占领，使英国首相张伯伦认识到，当初希特勒说苏德台是他对欧洲领土的最后要求以及他无意占有捷克等等都是弥天大谎。在伦敦，张伯伦提出了下面的问题：“这仅仅是对一个小国的最后侵犯，还是更多侵略活动的一个开端？”只要看一眼地图上斯洛伐克德军的新位置，或者衡量一下德国对奥地利和捷克不费一兵一卒的占领，谁都不会怀疑德国人的下一个目标在哪里。

对波兰的占领和以前非常相似。德国国内早已有人在呼唤民族主义情感，有人在强调“东方流血前线”，影射令人憎恨的凡尔赛条约。这项条约对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来讲，条件近来苛刻。争论的焦点是维斯杜拉河口的港口但泽。从历史上看，它本

是一个日耳曼港口，凡尔赛条约却试图通过解除其军事力量使其成为一个自由港的方式来解决它的进退两难的处境。连着海岸线的一条通道使波兰可以使用这个港口，他们称之为“波兰走廊”。毋庸置疑，希特勒很快便要求归还但泽。纳粹党的挑衅行为被伴之以斯洛伐克是下等民族的污辱性宣传。希姆莱在此时是不甘落后的。

希特勒选择了军事侵略，但他必须为自己找个借口。他们为自己强暴波兰开脱的办法是制造边境冲突。他们弄得漏洞百出，像一出闹剧。幕后策划者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以及盖世太保的穆勒。这是盖世太保第一次进入国际领域的大行动。

“希姆莱行动”由海德里希发起。他首先招来了他最信任的





希特勒在将军们陪同之下，观看对波兰作战的地图。

一个街道巡逻老兵阿尔弗雷德·诺朱克。诺朱克 1934 年加入了党卫队保安处，5 年后，他升职为奥斯拉党卫队保安处 III 部部长，负责为国外间谍们编辑文件。

诺朱克在战后纽伦堡法庭上概括了海德里希挑起的对波兰的侵略事件。海德里希告诉他，他的任务是袭击波兰边境附近的德国广播站。他必须把事情做得好像是一群波兰人挑起的侵犯行为。波兰方面的所谓侵犯将有文件证实，还有穿着波兰军服的德国犯人。后者必须夺取播音器，直到一个讲波兰语的德国人广播一篇由海德里希写好的广播稿。

党卫队保安处的人和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人提供了一切东西：军服、武器、身份证，甚至波兰香烟。当诺朱克被派往上西里西亚格莱维兹北方 40 英里外一个叫奥珀伦的小镇时，盖世太保又显身手。在那里，穆勒向该地党卫队头子赫尔伯特·麦海霍恩解释说，盖世太保被命令提供一种叫做罐头商品的东西。这些商品原来是 12 个在集中营判了死刑又被穆勒挑

出的人。在纽伦堡，诺朱克作证说：“穆勒宣称他有12~13个已被判除死刑的罪犯。他们将被穿上波兰军服死在出事地点，假装是在袭击中被打死的波兰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海德里希手下的医生给他们作了致命的注射。然后他们又被枪打上真正的伤口。事发后，外国报社记者和其它人员将被带到现场。然后再做一个警方报告。穆勒告诉诺朱克说，他得到海德里希的命令把罪犯之一交由诺朱克处理使用。

他提到的罪犯叫波尔，他被注射了麻药带到广播站枪杀。尸体被当场拍照以便为报纸使用。然后进行了对广播站的袭击。诺朱克手下一个会说波兰话的人带着德国口音广播说：“这里是波兰起义部队。格莱维茨广播站已落入我们手里。自由的钟声已经敲响了。”

穆勒曾欺骗那些穿波兰军服的囚犯们说，他们是在协助拍电影，由于他们参加了爱国活动，他们将被赦免，得到自由。广播站一旦到手，诺朱克及其手下立即撤退。“演员们”的尸体被留在现场。被杀掉的证人不仅是他们，党卫队保安处所有涉及此事的人都被

1939年9月1日，德军开始入侵波兰，这是德军士兵拆除德波边境线上的栏杆，德军入侵波兰的借口是一周以前的“格雷维茨电台”事件。







美丽的波兰首都华沙在战争中被破坏得满目疮痍。

除掉，只有诺朱克例外，所以事件的详细情况没有泄漏出去。

格莱维茨行动的第二天，即1939年9月1日，当德军从黎明时分开始大举进军波兰领土时，希特勒在克洛尔国家剧院的讲话中提到了这次波兰军队的“侵犯行为”。国防军随声附和，说他们被迫对波兰侵略行为进行还击。整个事件给希姆莱、海德里希和穆勒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此事首先显示了党卫队是一个多么高超的组织。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以及卡纳里斯的人之间的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希姆莱行动”远未满足盖世太保的欲望。相反，它使他们更加厚颜无耻、飞扬跋扈。

# G

## 盖世太保在东欧的暴行

战争爆发3天后，德国军队分批入侵波兰，到9月8日，德国坦克已轰隆隆地开到华沙市区。希特勒也把他的司令部移到了前线附近，3列专用火车穿过波兰前线到达格莱维兹地区的卡托维兹，3列专列上分别乘坐着希特勒和戈林的随从人员。而希姆莱乘坐的则是自己的专列。

被占领的波兰被分为4个行政管辖区，每个辖区都被由纳粹党所任命的专员来控制。整个波兰东南部分统称为占领区统一政府，该政府由汉斯·弗兰克将军负责。

警备大权，正如早已清楚规定的一样，由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忠实党徒把持。

这些人到处胡作非为，他们大批逮捕犹太人、波兰贵族、传教士，并随便在任何场合逮捕各个劳动阶层的人。各种暴行已是屡见不鲜。10月27日，70岁高龄的西波兰沃斯高区考克兹修道院院长

波罗斯基，被盖世太保以非法拥有枪支的罪名逮捕，实际上，他拥有的枪支仅仅是一支打松鸡的猎枪。盖世太保把他的脸打得几乎无法让别人认出来，然后，把他带到了附近的卡力兹广场上，在那里，刑场早已布置好。盖世太保强迫当地犹太人把波罗斯基神父绑在行刑柱子上，杀害之后又解开绑缚，继而又让犹太人在神父下葬的墓地前，吻他的脚。

希姆莱和希特勒亲临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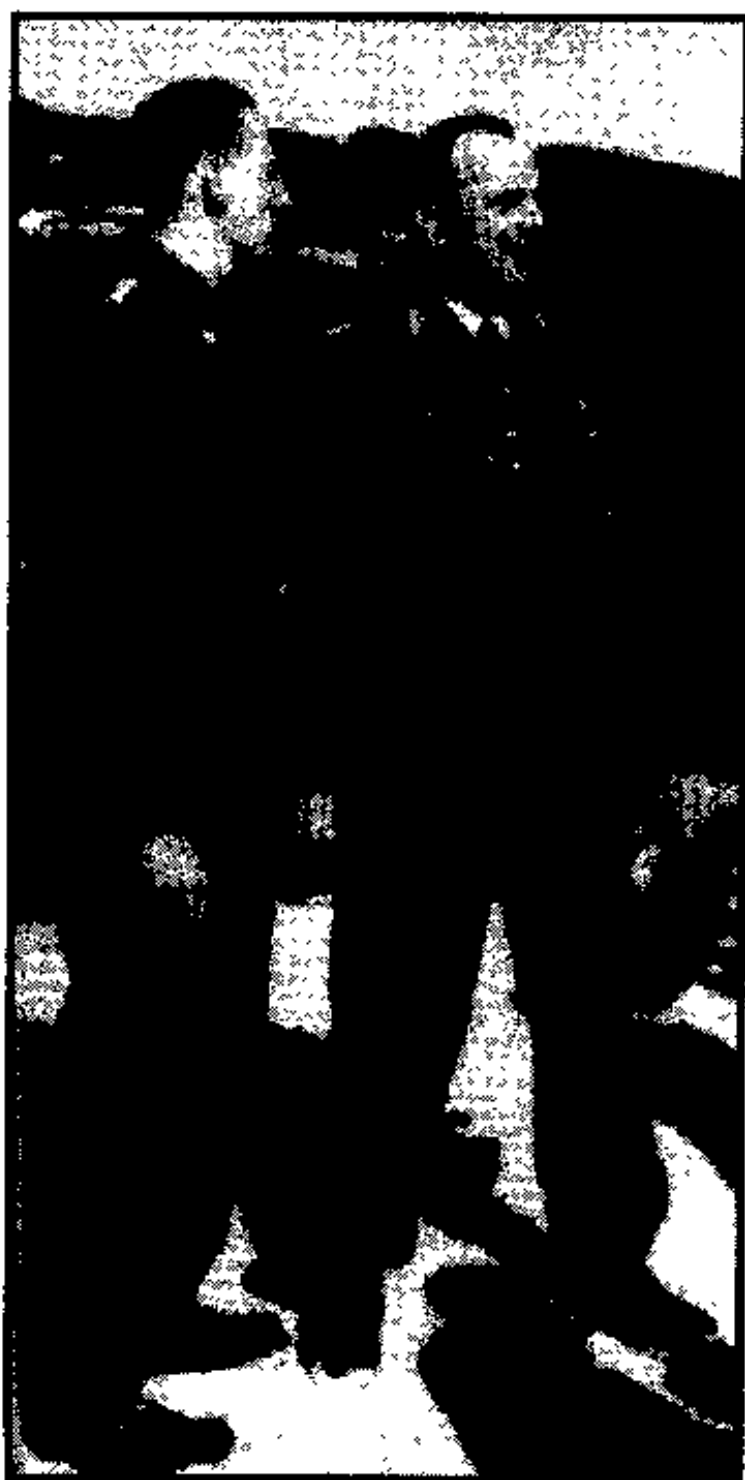


德国武装党卫队在波兰屠杀群众

党卫队干了许多残酷的暴行，但并不是全部的暴力事件，另一些通常是波兰极端种族主义者们干的，以前他们在波兰是少数民族，他们形成了“自我保护”的组织。后来他们被说服长期生活在波兰。海德里希做了一点尝试来隐瞒他的计划，9月21日，海德里希告诉党卫队保安处和特遣队司令说波兰这个国家将从地图上消失，包括从语言到领导人及受过教育的人统统消失。

在一份以《战争中秘密警察的任务》为题的文献中，海德里希声称，这些是和平时期功能的延伸——“调查和镇压所有可能会威胁到整个国家安全的一切活动。”这一条，特别适合于“国家警察特遣队”，它由德国军队的精英组成，有责任恢复和保障后方的安全和秩序。在占领区的特遣队的任务与在国内的特遣队的任务完全相同。

海德里希(左)与达吕格(右)的合影。



对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特遣队中安插盖世太保成员特别适合于这个武装力量功能的延伸，但这种做法也产生了它自己的问题。纳粹党的影响范围远远在第三帝国边界线之外。这样，在特遣队这把保护伞下，全新组建完整的党和国家机器是必须的。

这个重组过程分成两个阶段。1938年6月23日，下令所有的保安警察(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必须全部在党卫队注册。



盖世太保作为一个国家组织，完全在党卫队保安处的领导之下，除了所有现实的目的，两者是合并的。1939年9月29日，即华沙失陷之后，又一个命令，表明重组的第二阶段开始。所有现存的警察力量，包括盖世太保、刑事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将置于单一的组织，即帝国中央保安局统帅之下，第三帝国中央保安局是由海德里希领导的。第三帝国中央保安局作为一个中央局，既为第三帝国的党卫队领导人员服务，又为第三帝国内部的内阁成员服务。希姆莱批准第三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命令在官僚机构引起了巨大的恐慌，第三帝国中央保安局设在盖世太保总部所在的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街8号，由6个（后来7个）主要处或局、社组成。他们手中的权力像是一种日用品，可以简单地去玩弄和陶醉于其中，而且是在所有可能的场合里去表现。1940年5月18日，海德里希提出了一个规定，是关于加入第三帝国中央保安局的严格的条件。加入人员，必须是党卫队学校的或有大学法律学位的人，要求与刑事警察一起用4个月时间去学习警察工作技术。然后，花两三个月时间在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总部学习。最后，根据其潜力和成绩，决定是否吸收为第三帝国中央保安局的成员。

把党卫队保安处和保安警察局合并好像是海德里希一直梦寐以求的。但是，希姆莱永远把他自己的野心隐藏在眼镜后面那双冷酷的眼睛中，所以，希姆莱憎恨完全撤除他的控制大权的作法。他通常被认为是永远冷血的独裁官僚，从未轻易显示出害怕，即使仅仅几个小时也没有。希姆莱克服了自己的胆怯，去阻止海德里希控制民事警察，此时，民事警察正由海德里希厌恶的库特·达吕格控制，实际上，帝国中央保安局的人用一个嘲讽的“杜米—杜米”绰号来嘲弄达吕格。而且海德里希从未能控制德国种族主义组织和刑事警察增援队。这两者在后来奴役波兰人民中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在第三帝国扩张过程中，与之相竞争的阴谋网也应运而生，并越来越复杂。盖世太保作为庞大的镇压组织，在这个巨大的官僚机

构中横冲直撞，使他们成为萧条和恐怖的代表，而希特勒正是元凶，欧洲成了德国的附庸国，只有英国还未陷落。到1940年9月底，盖世太保在第三帝国中央保安局的犹太事务处最终由在柏林的艾希曼所控制。但那时希特勒的视线已转向东方，对准了苏联。

1940年12月18日，遵照元首的指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成为进攻苏联的主要负责人，约德尔命令他的助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瓦尔特·瓦利蒙特少将准备一个在1941年5月15日向苏联发起闪电战的详细计划，这个行动的目标是，首先用包抄战术打垮苏联红军在俄罗斯的军队，然后建立一条从阿契盖尔到伏尔加河的防线。

实际上，进攻苏联的信号是在6月22日凌晨4点11分发出的，德国19个坦克师和14个摩托化部队把矛头指向西俄罗斯的苏联军队，此前希特勒大夸海口，说“整个世界将为之而震动”，但实际上，德国的军事力量是用不足3550辆坦克，对苏联的24000辆坦克（如果苏联的数字是可靠的话），其中，半数部署在西俄罗斯。但是，正像德军早已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几个小时中，德军控制了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脉的所有国界河上的桥梁。德军在向东进攻中，德国空军摧毁了许多停在地面上的俄罗斯军用飞机。

但是，“巴巴罗萨计划”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冒险，还需要有逻辑、战略、策略上的思维。希姆莱在他对武装党卫队党徒的讲演中，预先说明了这个进攻的真实本质。“这场战争中，国家社会主义秩序将建立起来；这个思想是建立在我们德国日耳曼血统的价值观上的。”后来的演讲中，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被希姆莱的残暴的叫嚣所取代，“我们一定要做到，在乌克兰消灭一切，杀光一切，直至没有人，没有牲畜，没有一寸农田，没有一段铁路，没有一座房子留下来，没有采矿设置，在所有的井中投毒，使之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废墟。”

在这个惨无人道的暴行中，党卫队特遣队成了希姆莱的忠实走狗。在苏联的这场暴行中，希姆莱将特遣队分成4个部。他们的



站在德军虎式坦克中的希姆莱在党卫队将军的陪同下，巡视苏联前线。



希姆莱在苏联视察战俘营。



活动范围是：A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B组，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C组，基辅地区；D组，南乌克兰地区。正像在波兰时那样，每一个分部又根据其职能分成几个突击支队，每队1000多人，可以由以下人员组成：350名武装党卫队队员、150名司机和机械工程师、100名盖世太保、80名辅助警察、130民警、40或50名刑事警、30到35名党卫队保安处队员。但这并非全部力量，每个突击支队有自己的行动组，这个行动组由一个军官带领，配备翻译、无线电通讯员、电报员、办公室职员、女秘书，每一类可能有几个人。指挥人员则是从盖世太保总部、刑事警察处和党卫队保安处抽调来的。这个行动组随时听候调遣。



刑事警察头子亚瑟·勒比因涉嫌1944年7月的炸弹而被捕枪决。

在1941年7月2日，海德里希从柏林发给党卫队保安处的主要负责人的命令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任务。这份文件中，说明了“当前最紧急的任务是在新占领区里建立保安警察机构”和“所有的搜捕和行刑均由占领区的政府机构负责。”

为确保海德里希的命令有效地执行，又成立了一个由前特遣队成员组成的机构。其成员安德里斯·冯·爱姆伯格战后吐露说，“1941年7月18日，我被任命为秘密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特遣队参谋。因为我会说俄语，所以被派往俄罗斯，当时，我却一点也不清楚突击队的作用。在明斯克，我向特遣队的头子、党卫队准将亚瑟·勒比报到……这里一再强调，消灭犹太人是元首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拒绝参加。党卫队头领威胁说，任何想要逃避执行此项任务

的人,都将被带到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军事法庭接受处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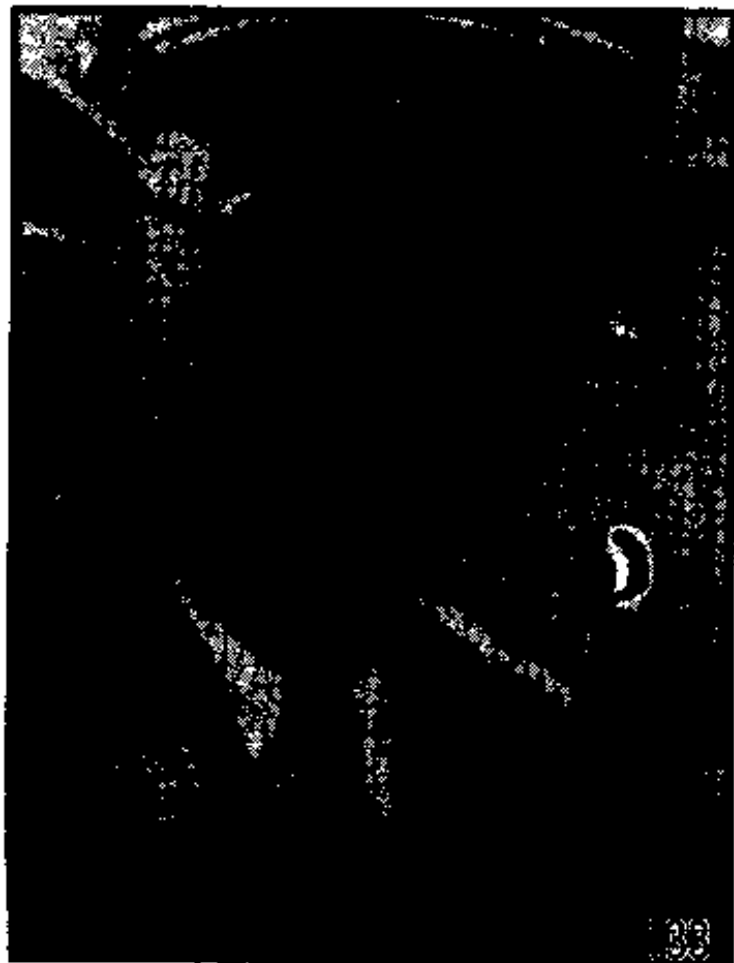
爱姆伯格又说,因为参与屠杀的士兵受到的心理压力太大,所以勒比发明了一种可以使他的手下心理压力小一些的杀人办法。“他开始试验用他的8个汽缸的霍斯车的尾气来杀人(有一次,杀死了80位精神病院的病人)。勒比狂热地进行这项试验,以致于他忙得简直无法开交。”他同时还是一个高明的业余电影摄影者。战后,在柏林他的家里的影片中,发现了用汽车尾气杀人的镜头。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成了一个巨大的人间地狱和杀害德国犹太人的中心。据说,明斯克至少有5000犹太人,这正好适合于希姆莱的个人兴趣。在一次视察中,希姆莱对勒比说,他想看一次大屠杀情景。后来,勒比从监狱中调来100个被关押的游击队队员,其中只有两个是妇女。

当时,希姆莱命令勒比放过了两名妇女,以便在屠杀过程中了解这些游击队员活动的信息。第八突击队和B特遣队警备队第九营,把这些无辜的人带到早已挖好的大沟前,强迫他们跳下去,低

下头。紧接着是让士兵从上面开炮,每一轮的屠杀之后,尸体上都埋上了一层土,让下一组的人再下去,依次进行。这并没有使希姆莱感到不自在。党卫队行刑队的队长爱利奇·维恩·戴姆·巴扎勒斯科,他曾被命令去镇压游击队,要求希姆莱保留一点怜悯心,当然不是对无辜平民,而是对执行这些屠杀的刽子手们。

希姆莱在仅有几个保镖的情况下,在布拉格郊区兜风时的照片。



前线德军每天的无线电汇总称之为“事件报告”。而





盖世太保特遣队队长奥托·奥兰采夫在1947年的纽伦堡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书面的汇报则由信使迅速送到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司令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杀人命令也是由信使送达执行机构的。特遣队在苏联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活动都是惨无绝伦的大屠杀，所有这些记录都充满了无辜者的鲜血。

最早的暴行之一，是发生在德军开始入侵苏联的前线上。在沃拜第斯村庄，盖世太保特遣队强迫犹太人沿着5公里长的反坦克壕沟躺下，然后用机枪向他们开火。暴行重复了7次，“只有孩子没有被射杀，但是，他们也未能幸免。盖世太保抓住他们的双腿，把他们的脑袋往石头上撞，有些就是这样被弄死的。”

B特遣队在1941年12月19日的一份报告说，“在检查奥格里夫的撤退道路时，我们在国防军的支持下，逮捕了135人，大部分是犹太人，其中127人被枪毙。”另一份汇报，来自立陶宛，汇报说“抓住了大约500犹太人，其中混有破坏分子，现在每天都在执行枪决。”给予特遣队的这种屠杀大权，好像根本没有限制。党卫队在基辅的指挥官奥托·莱斯博士说，有51000起杀人暴行。这些暴行均是针对下列人员的：苏联政治活动家、抢劫者、破坏分子、共产党和政治阴谋家、以说谎方式逃脱监狱的犹太人、苏联游击队员及

其通风报信者、不受欢迎的人、反社会的人、搞煽动的危险分子、俄罗斯游击队员、后备军、给俄罗斯游击队提供物品和药品的人、不满分子、堕落的年轻人等。

奥托·奥兰朵夫博士，苏联内陆地区党卫队保安处和特遣队的负责人，是另一个杀人狂，他的第 12 特遣队在 10 万人的尼古拉耶夫市搜出了 8000 犹太人。据一项记载说，希特勒对这个成绩十分满意，为此，希特勒立刻把奥兰朵夫提升为该地盖世太保头头。

在纽伦堡的审判庭上，奥兰朵夫十分坦白地承认，他收到了他的属下的屠杀报告。但是，他以种族背景为由，并引用历史上曾有过在长达 30 年的战争中杀害吉普赛人的事件的方式，请求国际法庭予以公正判决。奥兰朵夫完全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的。他说：

我从未允许单个人去杀人，而是命令几个士兵同时开枪，以避免直接的个人责任。其他集团的领导人则是命令那些无辜平民平躺在地面上，然后让士兵从颈后开枪杀死这些无辜者。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无论是对这些无辜者还是对执行屠杀的士兵来说，在心理上都是难以忍受的巨大负担。

后来，受害者被分批送进毒气室杀害。但奥兰多夫也抱怨说，在焚尸炉投入使用之前，每次只能杀死 15 到 20 人。他同时还指出，有些杀人的数字被人精心地夸大了，以便得到帝国中央保安局领导的赏识。即使认为这些是真的，仅在德国侵略俄国的第一年中，他们就杀害了至少 30 万犹太人。但据最近对俄国的档案研究表明，以前对这个数字的估计还是太低了。在 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在斯大林时期被封存了厚达 20 英里、存放着苏维埃特别委员会有关德国法西斯罪行的文件，被公之于众。以色列亚德·瓦斯姆纪念馆的史密尔·克瓦明斯科，在伦敦举行的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大屠杀的国际会议上说，“有证据表明以前有关被害人的数字可能不得不再增加 25 万，仅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被害犹太人就达到 25000 人。希特勒并未留下明确的有关种族灭绝政策的记录，某些历史学家为此曾做了大量工作。因此，希特勒不会对此负责，实际



焚尸炉中未烧完的尸体



纳粹集中营的焚尸炉

上，艾希曼在对他的审判时说，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一道书面命令。艾希曼对此没有隐瞒，而且也没有理由去隐瞒，他对法庭说，毫无疑问，他是按着希特勒本人的指示行事的：“我所知道的，都是海德里希告诉我的：‘元首命令对犹太人进行肉体上的消灭。’”

无论有或没有得到希特勒的指示，党卫队保安处仍旧认为还存在可怕的敌对力量。甚至还怀疑负责监管监狱中的苏军战俘的德国国防军。在俄罗斯战役开始不久之后，德国最高统帅部与党卫队保安处之间达成了一项关于监管俄罗斯犯人的协议。为此，还专门起草了一个文件来指导如何从事监管工作，这个文件称为在占领区辨别市民和嫌疑犯的指南。在那时，与对待战俘相关的命令必须要做军事上的考虑。从那时开始，类似的命令必须有政治上的考虑，以便保卫德军利益，防止布尔什维克分子煽动叛乱，确保德国牢牢地控制住占领区。

这份文件，是海德里希在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街8号举行的一个会议的结果。这次会议，是向盖世太保突击队的指挥官解释他们任务的本质：即从根本上消灭所有的犹太人。当时，阿道夫·艾希曼也在场。艾希曼主要是对这些文件有浓厚的兴趣。战后他的证词也十分吸引人。在二战期间，他完全是按自己的思想行事。在他驱逐和迫害犹太人时，他居然表现出有那么大的精力，自己直接参与在纳粹党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十分简单地杀害犹太人的行动中。到1940年1月，矮小的艾希曼已经跻身于新组建的帝国中央保安局在柏林的司令部，负责领导盖世太保犹太事务处。当时，他是由帝国中央保安局的下属机构IVB4委任的。他负责把纳粹党对犹太人的政策在德国及全部德军占领区内执行。

实际上，艾希曼所负责的机构是实施消灭犹太人的罪恶计划的司令部。纳粹当局又一次玩弄虚伪的文字游戏。对外公开场合，艾希曼被说成负责“犹太人问题”，他的办公楼是一座4层楼，手下有116名党卫队队员。就是在这里，艾希曼控制着这个中心，把魔爪伸向16个国家的犹太人，对犹太人进行了长达4年的杀戮。犹

在德国军队进入波兰的几周内，盖世太保特遣队逮捕了一大批犹太人，他们所到之处，剥光所有人的衣服，随意毒打，无数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或者就被杀。





太人居住区人口大批被杀害。艾希曼还提出了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提出用毒气或者就地杀戮的办法来迅速消灭犹太人。

要完成这些事情，艾希曼只需在他的帝国中央保安局里按一下开关，启动杀人机器即可，他本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后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强迫南斯拉夫签署《三边协议》，希特勒让南斯拉夫签署《三边协议》实际上是一个阴谋。即在南斯拉夫加入《三边协议》后，德国军队就可以随意取道南斯拉夫进攻希腊。但是，在3月26日夜里及27日凌晨，南斯拉夫政府和摄政王保罗王太子的政府被南空军和陆军的反叛部队推翻。年轻的彼得王子被封为国王。尽管新政府与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协议，但是，很明显，对南斯拉夫人民来说，《三边协议》是无效的，因此，希特勒取道南斯拉夫

阿道夫·艾希曼和他小儿子在一起休息，他厌恶犹太人是从他是一个小学生时被起了个“小犹太人”的绰号开始的。1932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纳粹党组织，1934年前往柏林，负责“犹太人事务”，1938年，他负责“犹太事务处”，主持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





这是艾希曼“最终解决”方案的牺牲品，这张照片曾在 1961 年被用作起诉艾希曼的证据。

向南进攻希腊的计划就落空了。

当然，这个协议在贝尔格莱德带来了很大的悲哀。在德国总理穿过狂热的庆祝人群拥挤的街道时，有许多人向他的车上吐唾液。当德军部队经过时，又故剧重演。希特勒的狂怒带来了很恐怖的结果，他的军队毫无疑问执行了他的决定，即把南斯拉夫的军队和国家击成碎片，必须毫不留情的击垮。与此同时，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因煽动而升级。政治观察家们认为克罗地亚人会胜利。南斯拉夫空军地面设施和贝尔格莱德会被德军日夜不停的空中打击击溃。

落到贝尔格莱德的第一批炸弹是在 1941 年 4 月 6 日早上 5 点钟。目的是恐吓心理上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的市民，事实证明了希特勒的成功：17000 平民被炸死。创下了 20 个月的战争中一天内炸死平民人数最多的记录。不久，南斯拉夫被攻陷。4 月 13 日，德军和第三帝国的附庸国匈牙利的军队击溃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抵抗。4 天后，南斯拉夫军队的 28 个师在萨拉热窝被围。南斯拉夫政府签署了投降书。此前，克罗地亚独立国领袖安特·帕韦利奇早已宣布克罗地亚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希特勒也早已攻进了希腊。4 月 23 日，希腊军队向德军和意大利军队投降。

在塞尔维亚，屠杀行动已准备就绪。此前先做了一个汇报。其中第108号汇报在1941年10月9日送给在柏林的党卫队保安处的负责人。此“汇报”副题为塞尔维亚，这个“汇报”说：“德国陆军在塞尔维亚附近地区已抓到22000男犯人，作为对几天前21名德军士兵在托普拉被打死的报复，有2100名犹太人将被处以死刑……805名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将被从萨巴克集中营中带出来，其余的犹太人将被转到贝尔格莱德的集中营。在蒙托维亚地区塞沃部郡的一个集中营，可关押5000人，后来被扩张成5万人。”该报告结尾说：“这个集中营将按着德国集中营的模式建造，它的监管权由党卫队保安处来掌管。”

9个月之后，海德里希在柏林开了一个会议。会址位于柏林西南市郊、靠近湖边的一座风景优美、环境舒适的乡间别墅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万塞会议，这次会议的目是总结过去的战事，并对将来做出打算。从外表上看，参加人员有党卫队人员，像以前在内务部举行的有关国内事宜的会议一样。但是，这次会议对海德里希本人特别有价值。它给海德里希提供了一个可以使其扩张权力的大好机会。

参加会议的人中，有来自东部占领区部的军官，他们都是完全按照纳粹种族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理论行事的人。还有来自内务部、军事法庭、海外事务部、经济部的军官。或许，这些人中，鲁道夫·兰治军医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虽说在军衔上他是最低的之一。他领导的突击队，在纳粹党占领拉托维亚的6个月里，杀害了多达35000犹太人和无以数计的其他无辜者。另外，还有臭名远扬的纳粹党成员、高等法院的成员、希姆莱的种族及安置办公室职员以及作为帝国中央保安局代表的海德里希和艾希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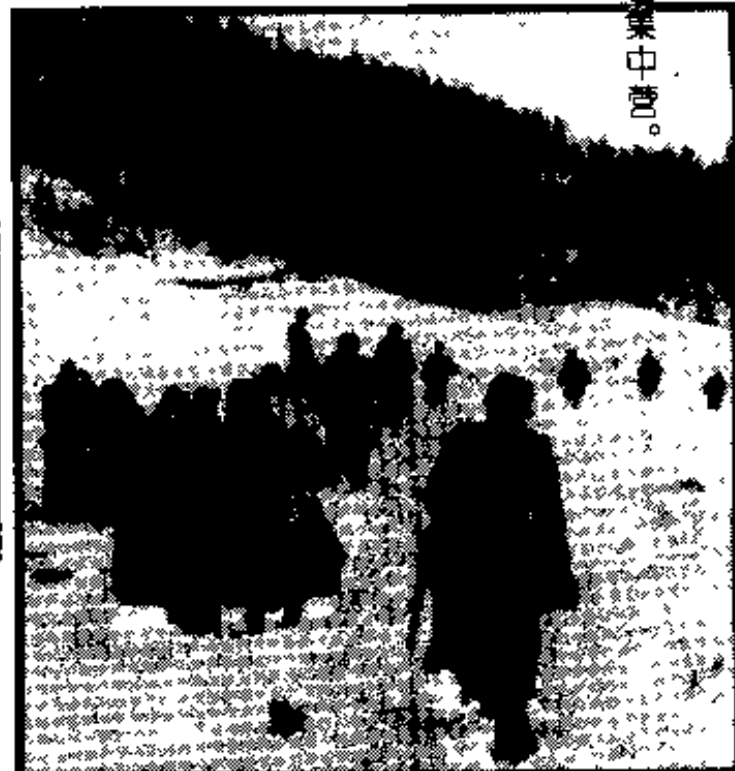
这次会议的材料被大量传阅。海德里希是根据他在1941年7月31日从戈林那儿得到的命令而发言的。其中，他说：“这里，我要求你们做好一切必须的准备，以便从组织、财政上保证德国在欧洲势力范围内，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再者，我要求你们尽快向我提

1941年4月，一名武装警卫队员押着两名南斯拉夫战俘前往德军战俘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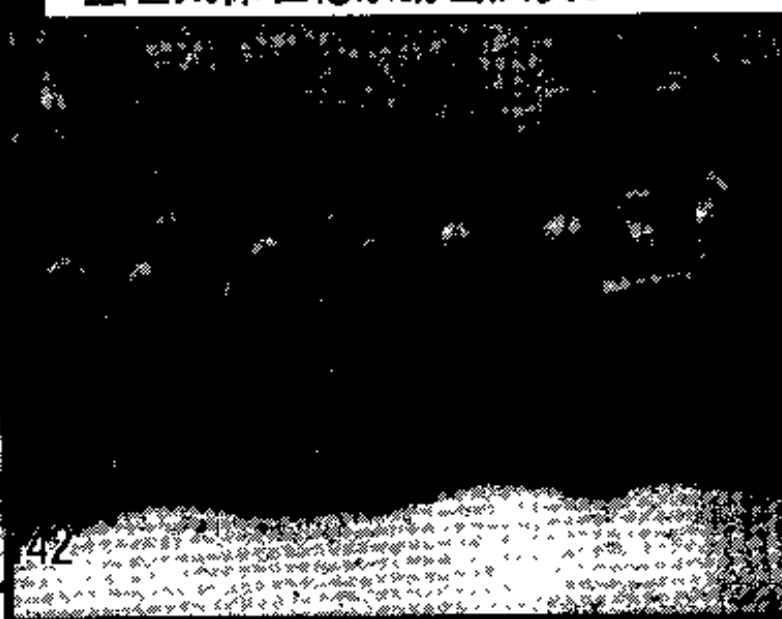


德军部队隆隆开进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与两年前德军进驻维也纳不同的是，围观的人们没有行纳粹礼。

德军士兵将一群南斯拉夫妇女和儿童押往集中营。



盖世太保在枪杀游击队员。



盖世太保枪杀了一名南斯拉夫妇女。她是一名游击队员的遗孀。

供有关‘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有关数据。”根据当时在场的国外局德国区主任、犹太人政策专家马丁·路德称，海德里希还说，他已得到希特勒对此任务的授权。

然后，海德里希回顾了反犹太人的情况和目前的形势。首先，从肉体上把犹太人从德国领土上消灭，继而，把犹太人在德国人生活中各方面的影响消除掉。帝国中央移民办公室已经加快了移民进程。海德里希说从1933年到1941年10月，通过移民的办法，已经移走了537000名犹太人。另外，根据战时条件，帝国将对移民政策予以支持。海德里希又说：“在东欧还有其他可能的解决办法。”

再者，是批准把犹太人从东欧“撤走”，“撤走”的含义，如后来所揭露的那样，是驱逐、犹太人居住区域化以及由特遣队参与的大屠杀的伪饰代名词。万塞会议的记录也表明，海德里希也希望犹太人成为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库。他们中的大部分当然会死去，或逐渐因自然死亡而“消失”。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必须“适当”地处

由海德里希召开的万塞会议就是在这个房间举行的，这个房间在柏林市郊的爱姆格罗森。会议议题是根除贫困、大批屠杀犹太人。





理。犹太人将从欧洲全部被淘汰掉。

盖世太保对万塞会议的高层文件感到十分高兴。30 份的记录复印件中,只有一份得以保留下来(已经由海德里希亲自将其中诸如“死”或“消灭”之类的不适当措词加以润色)。1961 年在以色列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中,艾希曼试图降低他在这个会议中的作用。他对法庭暗示,他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官僚,“我是从我的上级穆勒那儿得到命令,为确保整个会议完整的记录。我花了大部分时间用来削绘图铅笔了。”

南斯拉夫游击队领导人铁托



在德国陆军进攻南斯拉夫的同时,一份要攻占的领土的计划直接送到了希特勒手中,为了准备这个称为“根据元首的指示来解决的国家问题”,在艾希曼的领导下,制定了一个计划,要在斯洛文尼亚根绝犹太人,并把他们赶到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

塞尔维亚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正好可以形象地说明这种杀人暴行。国外事务局驻塞尔维亚代表吉山德特·历克斯·本泽勒正为塞尔维亚犹太人问题而烦恼。那里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不断地受到纳粹党徒的攻击。“而要释放他们又是不可能的,他们会加入到反抗行列中去……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存在会引起极大的不安和骚乱。”因此,本泽勒建议,把犹太人赶到波兰或俄罗斯,并为此而向外交部的弗兰兹·兰德曼彻写了信,但兰德曼彻与艾希曼联系后了解到,无法找到火车来遣运犹太人,他在信的边缘写到:“据从帝国中央保安局 IVB4 部的信息,把犹太人赶往波兰或俄罗斯是不可能的。艾希曼建议就地实行枪决(艾希曼口头指示)。”

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审判厅上，当兰德曼切被问及此事时，他补充说，他从上司得到确切指示，“我给帝国中央保安局打电话，是与艾希曼讲的……艾希曼说，警察要对塞尔维亚的治安负责，应该枪毙反抗的犹太人。当我再问他时，他仅仅重复说‘枪毙’，并挂了电话。”据他在后来的审判中说，结果有 10000 塞尔维亚犹太人被杀害。在战争开始时，南斯拉夫有 75000 犹太人，后来估计，只有 15000 人免于死。

艾希曼在南斯拉夫的活动，得到了海德里希挑选的很具有合作精神的贝尔格莱德警察头子的极大支持。埃默纽尔·沙夫尔于 1942 年 2 月被任命为贝尔格莱德盖世太保头头，他出身于德国边境的上西里西亚地区的中上层社会。他一直表现出他的忠心。例如，他在波兰任特遣队队长时，曾指挥士兵杀害了一大批人。

像波兰一样，在被德军党占领后，南斯拉夫的特遣队也被解

贝尔格莱德失陷后，南斯拉夫游击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反抗德国入侵者。



散。根据柏林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形式重新组建留下来的人。沙夫尔所领导的机构包括由布鲁诺·塞特勒指挥的盖世太保，塞特勒曾是魏玛共和国（1919～1933）时期的一名残暴的预备队员。参加过波茨坦自由军团。

对于沙夫尔和塞特勒两人来说，贝尔格莱德的盖世太保的最重要的任务是组建和管理犹太人集中营。位于萨瓦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塞姆林集中营是犹太人集中营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塞姆林集中营中关押的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是在前些时候特遣队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的。1942年春天，海德里希和艾希曼针对塞尔维亚的屠杀计划，使这里变成了可怕的屠杀场。这里发生的事情，后来在1953年的夏天，在克罗地亚对二战战犯沙夫尔的审判中，才得以公之于世。

作为盖世太保头子的海因里希·穆勒，曾发给沙夫尔一封电报（题目：在塞尔维亚针对犹太人采取的措施），其中谈到了即将到达的“特殊分遣队”。用党卫队队员的话来说，这意味以下两件事情之一。“特殊分遣队”可能由在东欧德占区执行“警察和政治任务”的特殊党卫队员组成，或者由从集中营中挑选出来干特殊事件的男犹太人组成，无论这些行动是由党卫队或者是犹太人来做，对于无辜者的最终命运来说都是没有区别的，就南斯拉夫的76000犹太人来说，他们代表了塞尔维亚犹太人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实在是太可怕了。

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凶残无道的大屠杀更专制的了。为了写作方便起见，这里仅讲一个在贝尔格莱德市郊的塞姆林集中营发生的故事，来说明纳粹党是多么的凶残。这个关押营的条件十分恶劣，据在这个集中营中被关押过后来又活着出来的人回顾说，房子里没有供暖，睡觉的地方是用木板搭起来的。毒打哭喊着要点儿吃的儿童更是屡见不鲜。那时，这座死亡集中营是为了大批枪杀那些被关押的人而建造的。后来，纳粹党认为这样做太慢了。

穆勒给沙夫尔的电报决定了贝尔格莱德附近的犹太人的命

1941年4月，在南斯拉夫作战的德国炮兵。



盖世太保在枪杀游击队员

运。沙夫尔通知盖世太保中负责犹太人事务的头子，也是塞姆林集中营的主管塞特勒，说一种为可以运载 50 人的萨勒卡车是用于执行“特别任务”的。实际上，军官们的这种迷惑人的字眼到处使用。这座集中营的指挥官海伯特·安道夫被告知，他所关押的人将得以“长眠”（即被杀死），为杀害塞姆林集中营的犹太人所做的准备，就已经够使人背透凉风了，即使对血腥十足的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也是如此。他们使用了十分阴险的欺诈手法。被关押的人被告知，他们将先被押往南斯拉的一个中转集中营，然后送往罗马尼亚。为了制造假象，掩人耳目，他们还调来一批医生和护士。使人感到真要进行一个比较艰苦的转移，还调来医生、护士护理病人。向孩子发放糖果，是为减少怀疑的另一个诡计。但是，当时还是有那种敞蓬的卡车（说是“用来运行李”的），尽管这卡车可能引起的人们的怀疑。

两个党卫队保安处的司机乍兹和迈耶，拉着犯人经过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开往贝尔格莱德东南大约 10 公里的爱维拉射击场，在开往射击场的途中某个地方，汽车的尾气开始排到密封车厢里，里面的人因窒息而死。在爱维拉射击场待命的是沙夫尔的分遣队，这个分遣队有两个任务：把在车厢内没有窒息面死的人（实际上几乎不大可能出现）杀死，另外就是守在那里等待被驱使的塞尔维亚“囚徒”，他们还将执行一项十分恐怖的工作，即掩埋被屠杀者的尸体。

不是一次，而是干了两个多月，直到 1942 年 5 月停止，仅在周末时才停下来。刽子手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一个叫爱德加·恩济的可怜的塞尔维亚屠夫，最终也被枪决，并与犹太人一起被掩埋了。

战争结束后，据估计，大约有 47000 人在塞姆林被害。在塞尔维亚成功地完成了“最终解决”的任务，使得负责盖世太保下属机构 IVB4 的艾希曼获得了更高的职位，负责在柏林和巴尔干的盖世太保事务。

外交部的犹太人问题专家弗兰兹·兰德曼彻在他 1942 年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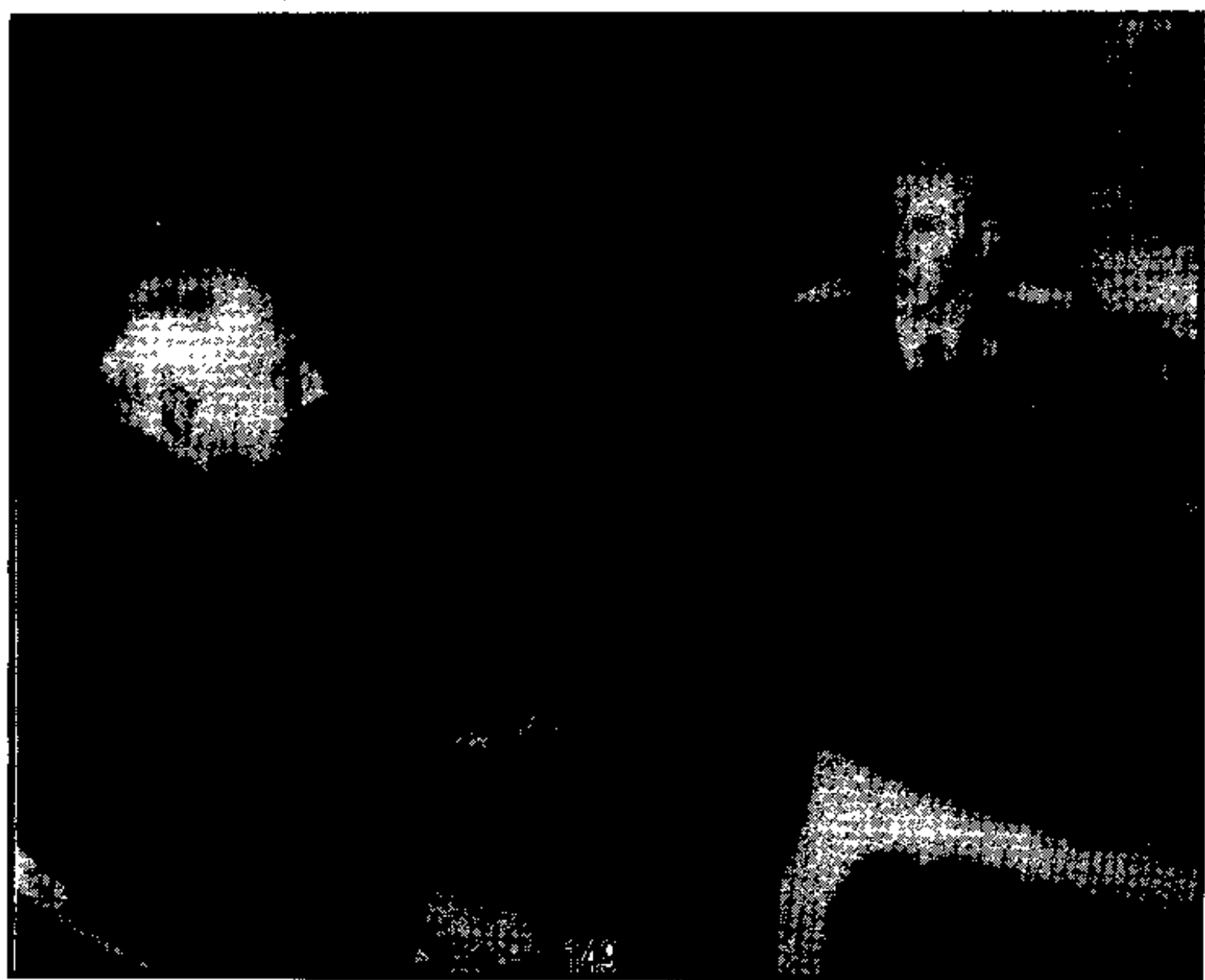


月 29 日的讲话中，毫不掩饰他对整个犹太人问题的处理感到满意：“在塞尔维亚，犹太人问题已不再是那么敏感了。现在所剩的问题仅仅是解决有关财产的问题了。”埃默纽尔·沙夫尔也是对此十分满意的人之一。令他担忧的问题在塞尔维亚已经不存在了。

当德国侵占东欧的行动正紧张运行的时候，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不仅仅是苏联和巴尔干半岛各国，屠夫们也开始遭到厄运，1942 年发生了一件十分引人注意的事件，正当德军对苏联游击队员进行攻击并准备加强他们在哈尔科夫地区的战线时，在英格兰正准备一项称为“猿人行动”的计划。

这项计划的目标就是暗杀莱因哈特·海德里希。

1941 年 9 月 28 日，海德里希到达布拉格。因为海德里希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总统哈查在一起。



# H

## 暗杀海德里希

1941年夏天，正当国防军扑向莫斯科的时候，希特勒正在考虑令他十分担心的地区的问题，其中最让他担心的莫过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地区。对希特勒来说，牢牢地把持住这两个地区是十分重要的，波希米亚是德国弹药生产基地，只要苏联存在，抵抗运动（主要来自于共产党）就会得到支持。

当时，当希特勒进攻华沙时，暗中的抵制反倒加强了，甚至抵制由德国控制捷克报纸。在局部地区，共产党已经军事化了，他们得到了爱德华·贝奈斯的支持。贝奈斯是由伦敦支持的捷克流亡政府的总统。在德占区破坏、罢工等活动不断出现。

海德里希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首先，他密切监视着德国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代理保护长官”冯·纽赖特，人们普遍认为，希特勒对纽赖特很温和，海德里希在他长期形成的野心驱使下，想伺机夺取纽赖特的地盘。要想设计一个陷害纽赖特的计划并不难，

莉娜与他丈夫海德里希一起出席在布拉格的一个招待会，此时海德里希刚刚被提升为中央保安局局长



因为他对盖世太保的做法的指责已经记录在案，他所表现出的顾虑也帮不了多少忙。比如，对于盖世太保的大批逮捕和不加分辨的乱杀，纽赖特采取的态度是相当保守的，在未证实之前，他不会轻举妄动。在他任职期间，他一直是这种态度。在战争前的一年，因为他说希特勒的坏话而被踢出内阁办公室，希特勒认为他缺少责任心。许多破坏事件表明真正的抵制可能已经开始，或者正像不少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是盖世太保驻捷克的秘书卡尔·霍夫曼·弗兰克的指示而捏造的。这当然是不能成立的，不容置疑的是，弗兰克是一个残酷的冷血动物。弗兰克说，这些破坏行动反而给我们进行严厉的镇压提供了借口。有一个理由说，弗兰克的残暴是因为他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早已窥伺着纽赖特的位子。同时，海德里希也在注意着事态发展，但却未采取行动，因为这根本不必要，党卫队保安处的档案中，已经有了关于弗兰克贪污受贿的有力证据。

后来，在元首的司令部里举行了一个会议，当时希特勒的司令部是在东普鲁士树林深处的拉斯滕堡。一个十分能干的下级军官卡尔·鲍尼，他是布拉格的党卫队保安处的头子，撰写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报告，揭发了纽赖特管辖地区抵抗运动正肆意扩展的事实，事实是无法辩驳的，希特勒生硬地告诉纽赖特，让他放弃他的职位。令纽赖特十分悲伤的是，他的继任者海德里希早已放出消息说，纽赖特已经病了，并已去休假。弗兰克甚至连安慰性的奖赏也没有得到。弗兰克本来以为，以他本人在盖世太保中的位置和比任何其他人都懂捷克的语言这一条件，他会接任纽赖特的职务的。但是，最后证明，他什么也没捞到。那个位置无可争议是海德里希的。

开始，海德里希为他的新地位感到沾沾自喜，而实际上，他只不过身处其位罢了。但是，海德里希是一个十分现实的人，不会不对他新职位上的危险毫无查觉。他把办公室布置成一个十分复杂的迷宫，而他则坐阵中心控制这个迷宫。

1941年9月27日，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这个瘦削的撒克逊人（指海德里希）穿着一身精干的党卫队的制服来到布拉格。他这样打扮是深有考虑的，当他们来到哈德卡尼城堡时，德国新闻摄影师紧跟在全副武装的海德里希卫队之后。当时，哈德卡尼城堡已经变成了海德里希的司令部。

捷克人不久后了解到，海德里希的到来，不仅仅是一个人事变化，他一到达就精心安排了他在哈德卡尼城堡的第一次会议。他的讲话被记录下来，并被封锁在安全的地方，只是在20年后才被捷克政府泄露出来。海德里希十分庄重地开始他的讲话：“党员们、先生们！3天前，奉元首的命令，由我来担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代理长官，前长官纽赖特因病告退。”这种庄严并未持续多久，他不久就离开了，毫无疑问，他得去处理公务了。从那时开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保护权就牢牢地掌握在海德里希手中。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一样，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反击犹太人。在平缓的大草原上，波希米亚的低山的怀抱，有一个美丽的小镇特里金，海德里希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贫民区。为了防止人们怀疑是监禁，他特意将贫民区设计成一个用于养老的贫民区模式。开始，犹太人认为是像所见到的那样，是用于养老的。实际上，这正达到了海德里希的目的：这里是转往死亡营的中转站。

然后，海德里希又把注意力对准了捷克人民。他对他们的政策是要他们放弃抵抗，变成驯服的奴隶。海德里希开始拉拢工人，甚至在哈德卡尼城堡接见工人代表。工人们被告知，只要他们忠于第三帝国，他们就会得到奖赏，工厂工人如果生产出所要求数量的武器即可提高食物配额。为了说明这是真的，海德里希宣布，将生产武器的工人的肉食配给提高到每人每天400克。所有这些当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德国这架战争机器需要占领区的人民为他们生产武器和弹药。

为了镇压抵制活动，处罚也就更严厉了。以前为纽赖特工作的人又开始为海德里希搜捕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叛徒和盖世太保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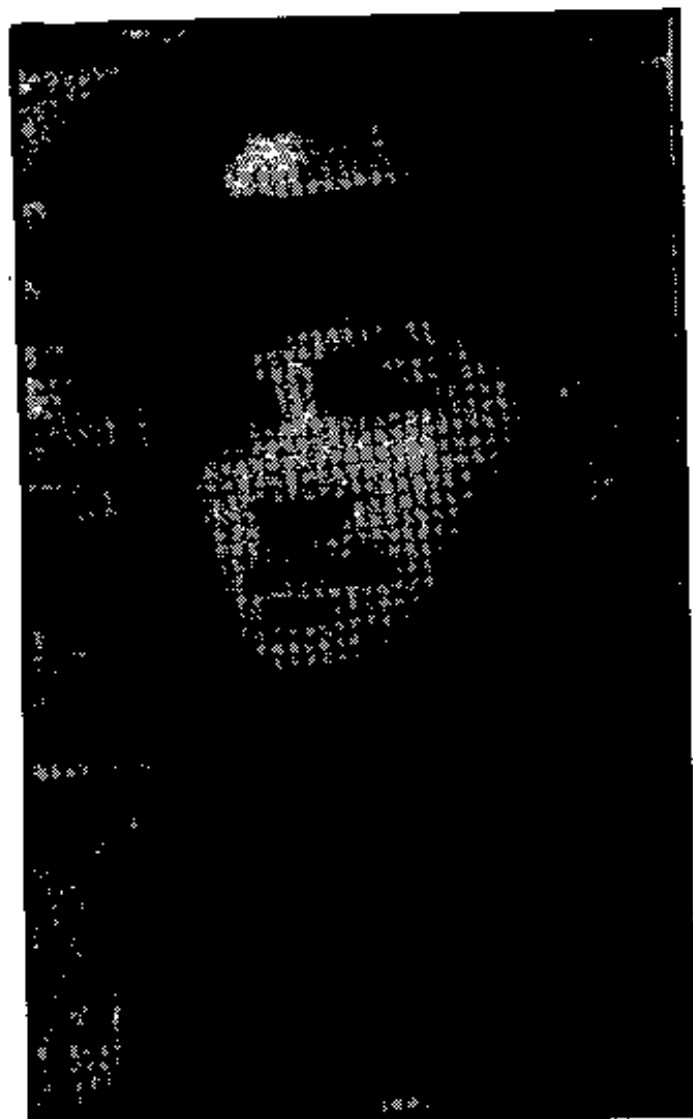
常出入布拉格的“安全居住区”。盖世太保还被给予拘留权，他们可以绝对自由地拘留任何人，同时，残酷的屠杀照样继续进行，更不用说“棍棒”方式了。黑市上的贩子被逮捕并与反抗的人一起被枪决。报纸的头条新闻曾以醒目的方式印刷出：“14名黑市贩子被判处绞刑，他们中有德国人和捷克人。”海德里希也鼓励盖世太保去调查那些涉嫌在公务中偷占收缴财物的人。

但是，海德里希的权力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布拉格。其他的任务和晋升机会正等着他呢！1942年5月27日，他被调往柏林亲自向希特勒汇报“最终解决方案”的进展、武器生产和兵工厂的状况等情况。

与此同时，远在英格兰的一伙敢死队员正在制订一项计划，在伦敦的捷克流亡政府在评审了它在布拉格的情报人员的汇报后，得出结论，认为海德里希对捷克工人的“和善”态度会导致捷克人民认为德国的“保护”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在英国的捷克流亡政府制定了计划，由英国“暗杀活动特别行动组”训练的杀手被派往布拉格，准备暗杀莱因哈特·海德里希。贝奈斯当然十分清楚

海德里希(中)在布拉格市中心被杀前不久，他的司机科雷恩(右)正扶着海德里希的绿色敞篷奔驰车的车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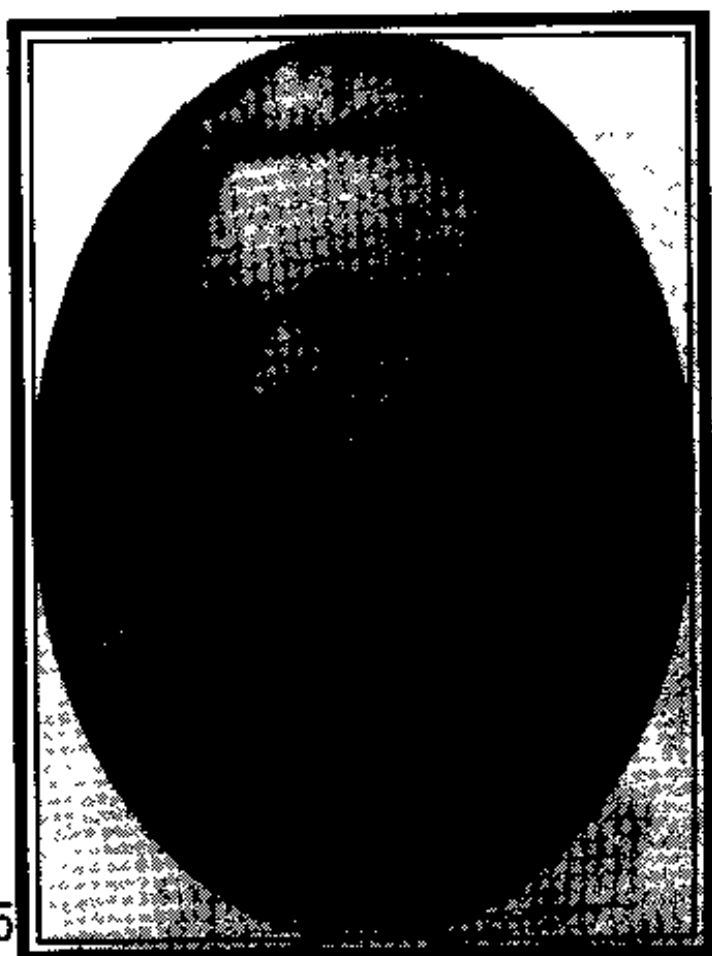


刺杀组成员盖伯克

刺杀组成员库伯斯

如果暗杀失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尽管如此,他仍认为冒险是值得的。这个想法使布拉格的地下组织感到不安,他们请求英国政府劝说贝奈斯放弃暗杀计划。英国政府没被说动。1941年12月28~29日,暗杀组分两组出发。第一组,称为“猿人”,由盖伯克和库伯斯领导,实施暗杀计划,称为“银A组”,配有大功率发报机;第二组由约瑟夫·瓦西克领导,负责善后处理和安排潜逃。有些成员最后成功地与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住进了布拉格“安全居住区”。另外一些人,因为不慎或者因为选择的跳伞地点不好而被捕杀害。

刺杀组成员瓦西克



海德里希的私人住宅是在离布拉格有一定距离的番尼斯克布拉泽尼,住宅得到了严密的保护。保安人员保持足够的警惕严加保护着番尼斯克布拉泽尼,但当海德里希在布拉格兜风时,海德里希常常是十分轻率的,他出去时经常不带保镖,坐没有上防弹装置的奔驰车,他完全信任他的粗笨的司机科雷恩,两人仅带着手枪。据希特勒的军工和装备部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的回忆说,这种鲁莽的轻率引起柏林的一些担心,因为来自反抗组织的暗杀随时可能发生。海德里希的傲慢致使他对忠告不屑一顾,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他后来的丧命。

有关海德里希预定去柏林的信息表明,这次柏林之行,不是简单地讨论帝国党卫队事务,他可能会调往别处,消息传到了捷克政府暗杀组的耳中。很明显,他们需要快速行动。

1942年5月27日上午10:30,海德里希坐着他的3升半汽缸的敞篷奔驰轿车,高速行驶在布拉格的街道上。车的挡泥板上每侧都插着一面小旗:一面是党卫队队旗,另一面是德国国旗。汽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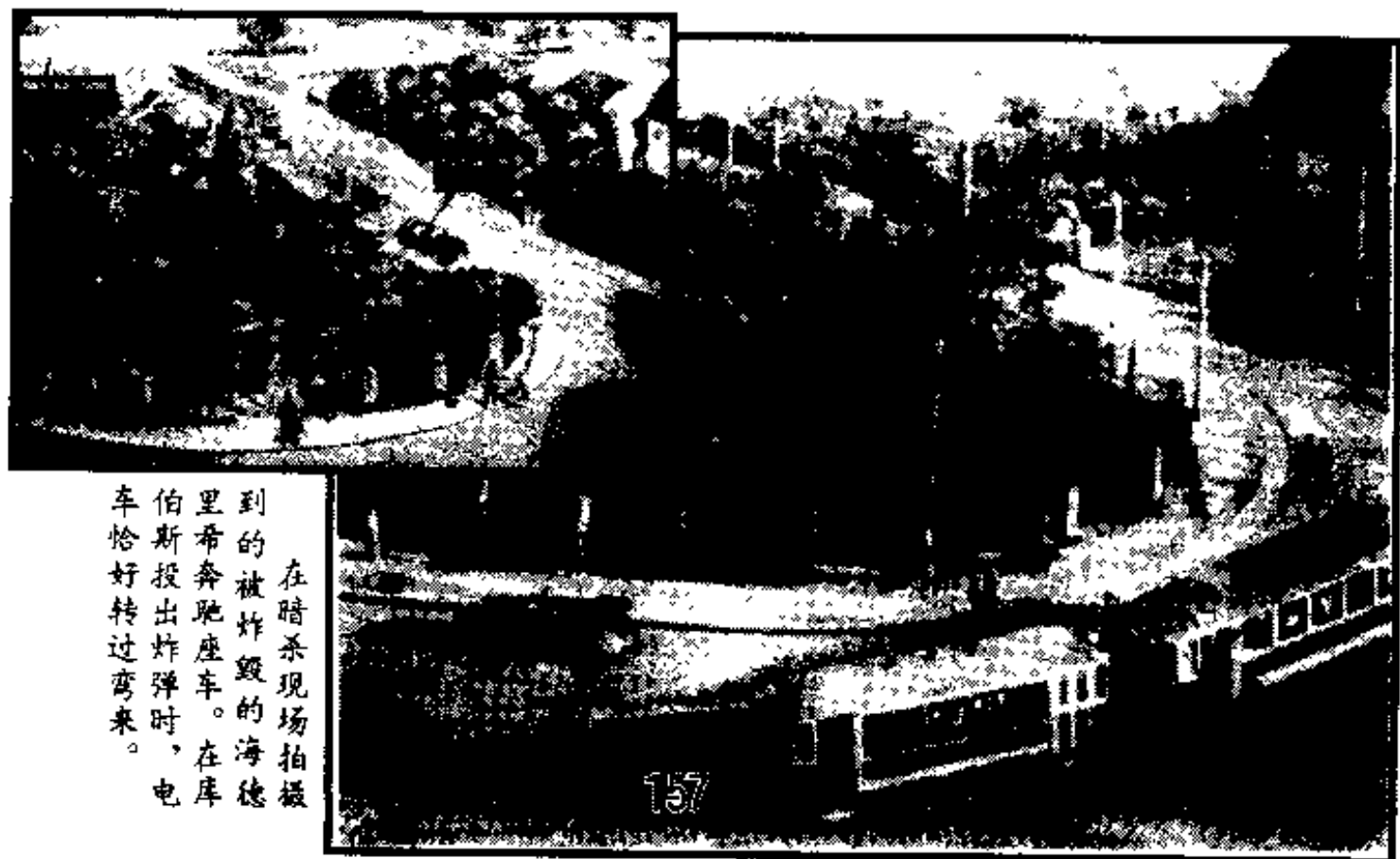
驶到布拉格里本区的霍力索维斯街5号的一个转弯处时,就必须减速,这条街通向特拉加桥。在这里,刺杀海德里希的敢死队员正耐心等待着。他们选择了这个地方是十分精心的。在这个路的拐角,也

是海德里希最易被暗杀的地方。

盖伯克使用的是自动武器，库伯斯则带了一枚特制炸弹，他们在路边焦躁不安地等待着海德里希的到来。10：32，他们收到了准备行动的信号，奔驰车正向他们开过来。但库伯斯却被没有料到的电车的声音所惊扰，这辆电车好像正好和海德里希的车同时到达这个拐角。撤退是不可能的了，盖伯克早已掏出了他的自动手枪，当海德里希的车开到他正对面时，他瞄准了海德里希。库伯斯大喊了一声：“开枪！”，盖伯克扣动了板机。令他们十分恐惧的是，盖伯克的自动手枪出了故障，没有响。海德里希这时才看到了要暗杀他的杀手。如果他那时命令他的司机科雷恩将车开走的话，他无疑会逃脱。但海德里希恰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命令科雷恩停下，科雷恩猛地踏了一下刹车板，车吱吱嘎嘎地开到库伯斯旁边停了下来。这时，库伯斯投出了炸弹，炸弹落在了汽车的挡风玻璃附近。炸弹刚落下就爆炸了。爆炸把刚开来的电车玻璃震碎了，并发出耀眼的光。硝烟过后，奔驰车不能动了。

若换了个人，或许不会这么做。尽管海德里希伤势严重，他还是从车里爬出来，掏出手枪，扑向刺杀他的人，并向还没有反应过

1942年6月4日，刺杀组成员等待海德里希到来的位置示意图。



在暗杀现场拍摄的  
到的被炸毁的海德  
里希奔驰座车。在库  
伯斯投出炸弹时，电  
车恰好转过弯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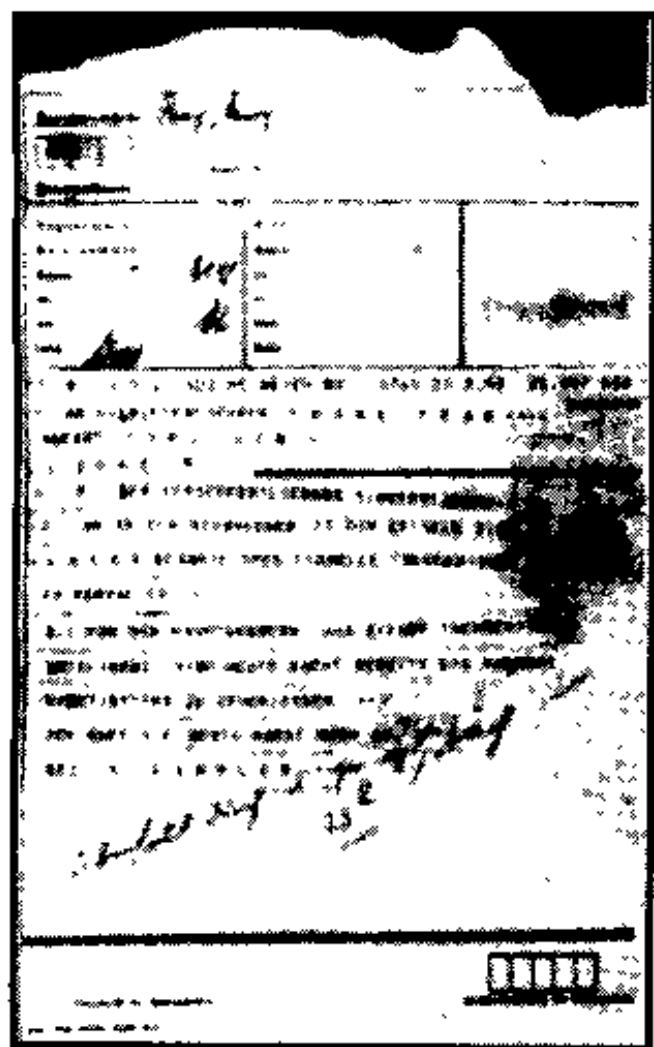


来逃跑的刺客开枪。科雷恩逃跑得并不快,盖伯克想追上他。而海德里希孤立无援地站在那儿。突然,他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用他的右腿,一瘸一拐地跑,很明显,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跑向了布尔科瓦医院,想要取出他已伤痕累累的身体中的弹片。

海德里希昏迷了一周,他的伤势十分严重:断了一条肋骨,胸膜破裂,身体中还有一块车体碎片。弹片和他的制服碎片都穿进了他的脾及血管,感染是无法避免的。他的体温十分高,病情不断恶化。最后,在1942年6月4日与希姆莱见了最后一面后就魂归西天。据一些记载说,达吕格和弗兰克都在门外焦虑地来回走动,都十分关心海德里希的继任者是不是自己。一个未署名的医务人员在海德里希的医疗报告上,嘲弄式地写到:“死亡原因:伤口感染。”

海德里希的尸体在哈德卡尼城堡停了两天,然后拉往斯沃斯





1942年3月27日希姆莱发出的电报，命令立即枪毙1万名捷克斯洛伐克人。

堤卡斯，在重重保护下运往柏林，先是送到了帝国中央保安局总部，然后送到总理府，最后到了最终目的地——柏林荣誉公墓。

隆重的葬礼之后，希特勒叫嚣着要报复。他狂暴地说，刺杀海德里希的人，要用鲜血来偿还。3000犹太人从海德里希组建的“有名的贫民区”被送进死亡营，还有另外许多人也无辜受到杀害。布拉格的党卫队变得更加疯狂，因为，如果搜索刺杀海德里希的人没有结果，以希特勒的残酷血性，是很容易迁怒于那些为此而负责的人。亚瑟·勒比以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名义命令紧急起草

一个大搜捕令。这个命令以电报的形式发给各区的警察局和区领导，文件规定：“封锁火车站及其他一切口岸。所有到过现场的人必须接受盘查，凡涉嫌者均不准离境。”防止逃跑的搜捕网向敢死队收缩。

勒比说他们发现了“一把英国制造的手枪、一件雨衣、两个装炸弹的盒子（也为英国制造）、一辆自行车和一张地图。”大批人，尤其是犹太人被捕。在这种白色恐怖中，随意杀人更是随处可见。

海德里希被刺杀，致使希特勒下令大量捕杀犹太人。报复行动中最有名的也是捷克人民永远无法忘记的是由于暗杀而卷入这场报复的一个村庄。莱蒂斯村位于一个小山谷中，风景十分迷人，房屋都建筑在教堂周围，房屋顶都是用彩色的瓦拼成，十分吸引人。村外是一大片农田和牧场。妇女干农活，而男人则去工厂干活，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对政治毫无兴趣。

第一次搜捕莱蒂斯村庄是在6月4日，即海德里希死的那一天。经历过这场搜捕的人回忆说，一大批从布拉格来的党卫队沿着大道直扑而来，他们让居民排成队，检查他们的身份证，并由党卫队和盖世太保进行盘问，但对于莱蒂斯的居民，并未进行迫害。或许是因为没有发现武器或其他可疑的东西而十分恼火，秘密警察冲进整洁的小屋，不是砸碎家具，就是把它们扔到外面的街道上。很明显，盖世太保需要捏造“证据”。最后，他们又开着卡车一窝蜂地回到了布拉格。

实际上，盖世太保并没有发现莱蒂斯村与暗杀海德里希之间有什么关系。之所以选这个村子做为替罪羊的借口之一，是因为有两户人家住在这儿——赫莱克斯家和斯普尼斯家——他们的儿子参加了捷克在英国的军事组织。而且，德国人还声称村子里藏着机枪，从英国来的敢死队员曾在这里跳伞。实际上，躲过大屠杀的幸存者绝对否认此事的。赫莱克斯家和斯普尼斯家全部被捕。但并未发现什么降落伞。

第二次残酷杀戮发生在6月9日的夜里。最初，卡尔·博姆在海德里希葬礼那天向希特勒汇报了对该村不利的证据，并建议采

这是在发生悲剧的一周前，莱蒂斯村的小学生与他们老师在一起的合影。他们中只有3个人活到了战后。



取报复,博姆的汇报内容是这样的:

题目:克拉德罗地区的莱蒂斯村,1942年6月9日,下午7时45分,卡尔·弗兰克从柏林打电话指示我说,那天,根据元首的指示,建议对莱蒂斯村采取以下行动:

1. 枪毙所有的成年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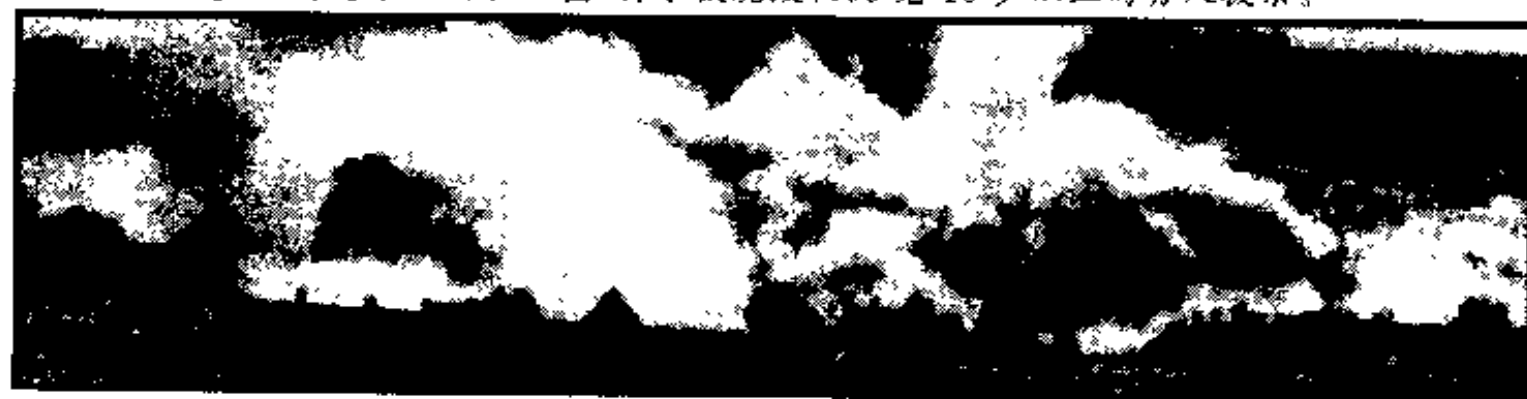
2. 把所有的妇女送入集中营;

3. 把儿童集合起来,如果能德国化,就把他们送到帝国的党卫队队员家庭收养。对其余的进行适当形式的教育;

4. 把这个村庄炸掉并夷为平地。需要火焰喷射器处理。



莱蒂斯是布拉格郊外的一个宁静的小村。1942年6月10日,盖世太保突击队开进来,掳走了妇女和儿童,村子被烧毁,199名15岁以上的男人被杀。



博姆和布拉格的盖世太保头子奥托·盖斯切克博士,以及克拉德罗地区的盖世太保的头子威斯曼一起到克拉德罗地区亲自指挥这次行动。克拉德罗的正规警察包围了整个村子。只允许居民进入。然后,在马克思·罗斯托克的领导下,一队突击队员开进了村庄。盖世太保后来汇报说,这个行动中,枪杀了199名男人,逮捕195名妇女,从布拉格调来的突击队,事先在谷仓的墙上围上一些床垫,以防止子弹反弹。然后他们把男人和男孩带过来,每次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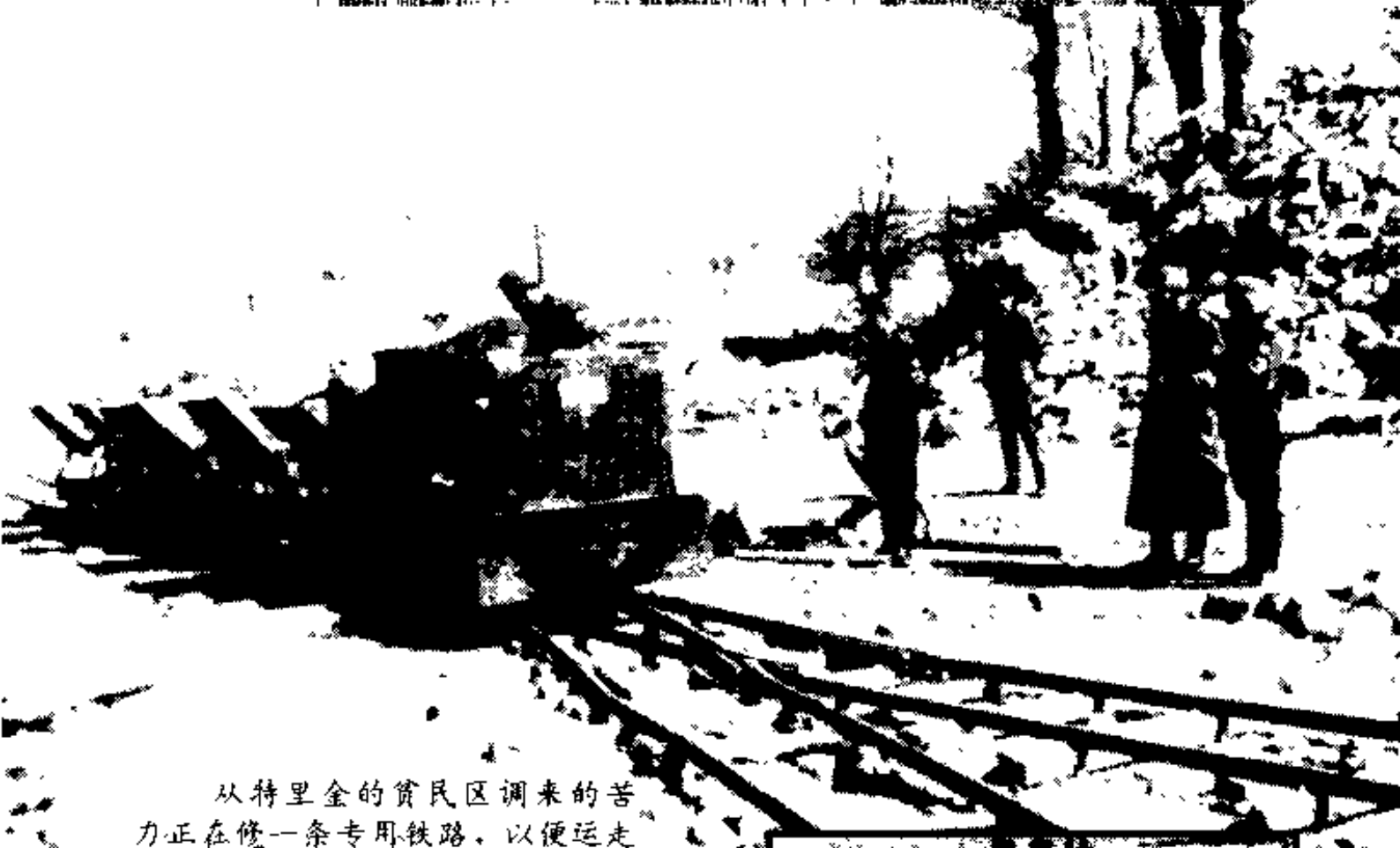


被杀害的莱蒂斯村民

人，全部枪毙。妇女和十分年幼的男孩和儿童被送往集中营。妇女们将被运往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95个孩子中，最后只有9个被认为值得驯化。大部分孩子都失踪了。战后，只有16人还活着。

然后，这个村子被烧毁、炸掉，并夷为平地。砖瓦被运走，人们的宠物被弄死，墓地被挖开，除了光秃秃的平地之后，其余的都没留下。后来长满了草，一点村子的遗迹都没有。另外，纳粹分子还为第二天的广播准备了一份稿子：“在寻找刺杀海德里希的人过程中发现，这个村子的人支持并协助刺客，除了给他们帮助之外，这些人还犯有其他的敌对行为。如私藏炸药和枪支，非法使用发报机，并存贮了一大批的专控物资……这里的建筑已被夷为平地，这个村子的名子也将被抹掉。”

许多有关这场屠杀的情节被一个德国的电影厂拍到，这个屠杀莱蒂斯村的电影脚本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被用做屠杀证据。这全是纳粹分子一手造成的。从电影上可以看到仅存的有关莱蒂斯村的最后一刻的信息：莱蒂斯的房子冒着火，党卫队员、秘密警察在街道上巡逻，当然，还有一堆尸体，一条死狗躺在它的窝旁。整个屠杀过程都被一个军官从望远镜中监视着。最令人气愤的是，教堂的高塔在刚刚完成第三次装修之后就被炸了，牧师已经被枪杀。这个电影脚本还摄入了刽子手们，他们大笑，互相开玩笑，像是在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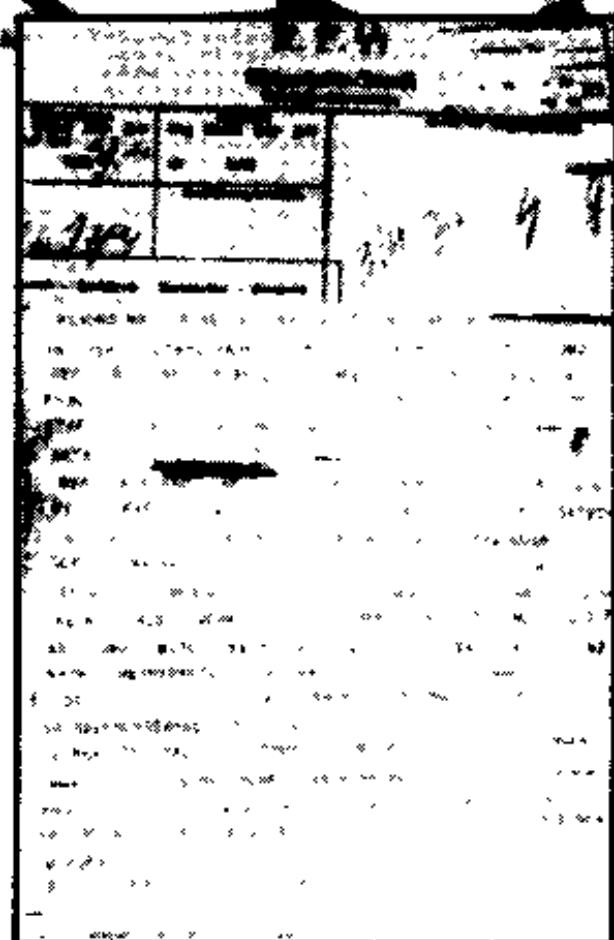


从特里金的贫民区调来的苦力正在修一条专用铁路，以便运走废弃物，使莱蒂斯村荡然无存。

家庭电影一样。

令盖世太保十分沮丧的是，他们在莱蒂斯和其他地方的恐怖屠杀并没有杀掉暗杀组人员，记录和检查的材料并没有多大价值。负责反破坏活动的布拉格盖世太保头子冯·潘尼维茨向弗兰克建议，在指定时间内，向政府自首的人可被特赦。弗兰克被说服了，接受了5天的期限。特赦布告在6月13日贴出。

参加暗杀活动的敢死队的成员，冒着时刻被出卖的危险，从一个房屋转到另一个房屋，他们没办法逃跑。他们最后在卡雷尔·波罗米杰斯科的希腊东正教教堂接受庇护。这座教堂地处离市中心不远的雷赛尔大街。这个教堂的教士伍莱迪摩·帕特莱克是一个十分热心的人。他们是在5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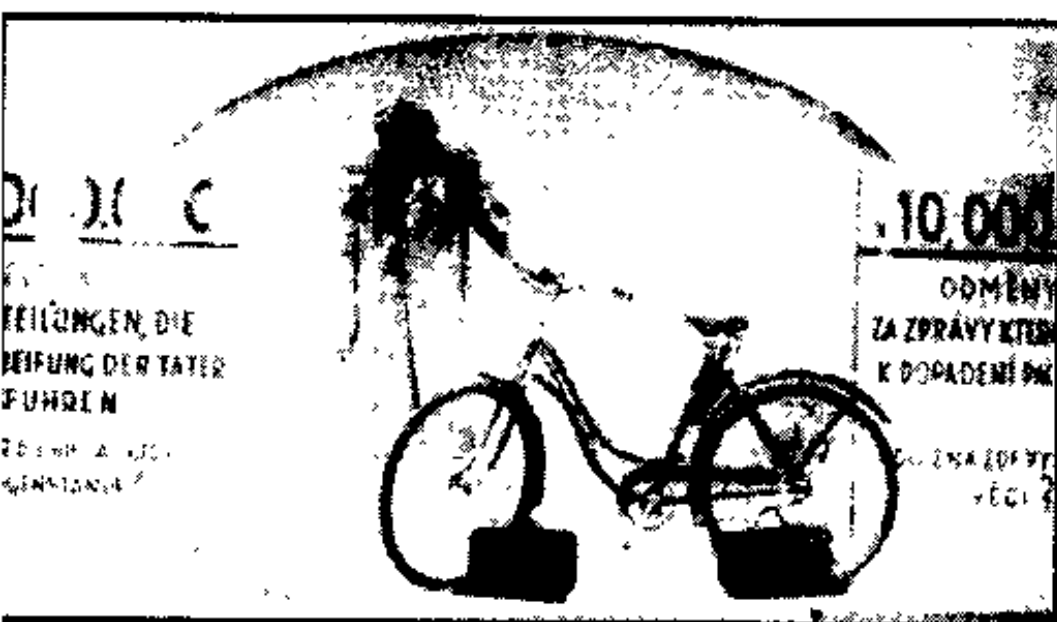
1942年7月1日，克拉德罗地区盖世太保头子威斯曼拍给希姆莱的电报，说摧毁莱蒂斯村庄的任务已完成。



来到教堂的。

正如以后所证明的那样，“猿人行动”有一个最脆弱的环节，跳伞进入布拉格的暗杀组队员中，有一个叫卡雷尔·柯达的是“远方”抵抗组织成员，他脸上有一个大疤，由于他害怕疯狂的报复，另外还担心盖世太保对他的家人进行迫害，他决定做一个叛徒。他向盖世太保交代了许多情况，在“安全居住区”中有一个名叫摩拉维克的中年铁路工人，还有家庭主妇和他们 21 岁的儿子阿塔，阿塔曾帮敢死队送过情报。这三个人都与布拉格抵抗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盖世太保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线索。

在布拉格市郊兹朝乌的主教路，平静的早晨被盖世太保的突



布拉格市中心张贴的悬赏暗杀海德里希凶手的布告，赏金高达 1000 万克郎。

然搜捕打破了。审讯是直接了当的，并且十分残忍。盖世太保不想浪费时间。玛丽·摩拉维克很快认识到这一点，她有心脏病，在这种审讯下，她不知道她还能坚持多久。她找个借口去厕所，她

走出了正关着她的亲人的房间，然后，她迅速吞下了她一直带在身边的棕色氰化钾剧毒药片，在几秒钟后死去。警卫把摩拉维克和他的儿子带到了另一个地方，在那儿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审讯，阿塔十分勇敢地坚持着，甚至忍受着包括强行往他的喉咙里灌酒精的痛苦。最后，这种酷行终非血肉之躯所能忍受，他屈服了。阿塔·摩拉维克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根据这些，盖世太保推断出他们的追捕目标是在卡雷尔·波罗米杰斯科教堂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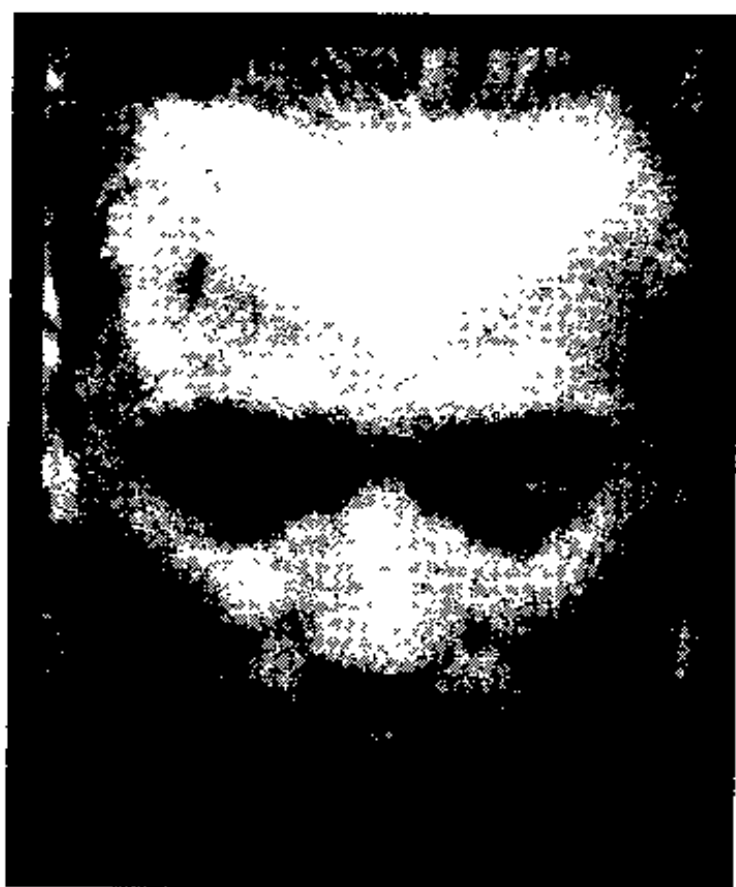
6 月 18 日早上，这个教堂的周围响起一阵警哨声。1992 年是



盖世太保围攻卡雷尔·波罗米亚斯科教堂的情景。这张照片是附近一居民偷拍的。

库伯斯的头颅，这是盖世太保拍照后送给库伯斯的亲人看的照片。

这个教堂的神父的伍莱蒂德·盖雷迈维（后来改名为圣·斯雷尔·迈瑟迪斯，当暗杀组藏在那儿时，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神司），他回忆说：“我没有被成年人告知谁躲在教堂里，但我记得有装着食物的篮子经常送来，我还以为那是送给穷人的呢。6月18日那天早上，我试图去教堂，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党卫队已经封锁了那个地方。从那时起，我就躲了起来。”



潘尼维兹布置了一条由19名党卫队员、740名盖世太保的警戒线。他们被调来围攻刺客及其他5名坚守在教堂的地下组织成员。整个战斗持续了2个小时，直到早上7：00才结束。教堂里，藏

在神殿上层和在屋檐上的抵抗组织成员仍拒绝投降，尽管他们已经暴露。为了迫使他们出来，德军把催泪弹扔上了屋檐，后来从屋檐上流下了血来。但是，没有一个地下组织成员被活捉。他们一直坚持到最后一粒子弹，或者拿着武器对着自己开了枪，2名暗杀组成员服毒自杀。他们的尸体被暴尸，摊在教堂的旗帜上（其中有盖伯克和库伯斯），后来由卡雷尔·柯达确认出来。柯达是戴着手铐被带到现场的。在下面的这张照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把他以前的同志指给戴着黑礼帽的盖世太保们看。

在卡雷尔·波罗米杰斯科教堂的外面，柯达（中）被带来确认他以前同志的尸体，俯身查看的是弗兰克，头戴礼帽的那帮家伙是盖世太保。





希特勒命令不准在莱蒂斯村留下一丝痕迹。战后重建工作开始时，工人们发现了这个旧的村名标牌。在莱蒂斯，人们现在仍可以看到它。

盖世太保在卡雷尔·波罗米亚斯科教堂举行的审判会上，从左到右依次是（除盖世太保们外）：桑纳文德、帕特莱克（教士）、锡卡尔和戈雷兹，他们都被判处死刑。



盖伯克和库伯斯的头被盖世太保割下来，拍了照，后来送给他们的亲人看。

卡雷尔·波罗米斯杰科教堂的所有神职人员，包括主教，都被送上法庭，然后，和阿塔·摩拉维科一起被枪杀。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报复，如在另一个叫拉扎科的村子里搞了一场大屠杀。居民们把这座教堂保持原貌，正如半个世纪前盖世太保离开时一样。教堂的正面墙上满是弹坑，厅堂成了博物馆和纪念馆。而当年停棺材的架子（那天是党卫队用来侮辱已死去的敢死队员的）依然空着。

海德里希死后，他所看不起的库特·达吕格当上了德国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代理保护长官。弗兰克的野心再一次受挫，他仍然是一个秘书。

纳粹党为了纪念海德里希的死，党卫队在那条街上建了一个纪念碑，一直由党卫队警卫看守（战后，这个纪念碑被捷克人

海德里希死后的脸部石膏像





砸毁)。德国报纸上发表了一些赞美海德里希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达吕格的文章写道：“他的死，更激励我们沿着他所表现的勇敢的政治和军事精神继续前进……只有他的朋友和部下才能真正明白他每日反对犹太人所需要的勇气。”

最后，希姆莱让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接替海德里希担任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滕布鲁纳体格粗壮，脸上有一个大疤，是奥地利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博士，他在奥地利时期和海德里希矛盾很深。

对于海德里希和卡尔滕布鲁纳，很难令人想象出他们俩人之间有多大差别。按照党卫队的说法，海德里希总是给人一个死面孔。一个叫沃纳的警察队长，曾被派往布拉格调查刺杀的现场，他说，这张面孔具有“精明的诡诈特点和完全变态的美，如中世纪文艺复兴的作品一般”。对卡尔滕布鲁纳的评价，与此评价也差别不大。一个党卫队队员说：“他有着十分宽阔的肩膀，爪子一样的手。当我和他握手时，我总是感到战栗不安。”这个党卫队队员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另外一个党卫队高级官员也说：“卡尔滕布鲁纳来后，事情越来越糟，我们认识到，有盖世太保这样大的权力掌握在他手中，这个冷酷的具有法律思维的律师（即指卡尔滕布鲁纳）比海德里希更凶残、可怕。”

盖世太保所做的最罪恶的事情，不是在西欧，而是在东欧的占领国。

在1946年的大举侵略中，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令人憎恨而又可怕的魔鬼面孔。

# 西线的“夜和雾”

在纳粹的征服浪潮中，盖世太保在西欧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事实上，在德国国防军野战部队作好 1940 年的进攻准备前，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已经在竭尽全力制造一个侵略的借口。

因为天气原因和对部队的战备情况的担忧，希特勒已经数次推迟了在西线发起进攻的计划。1939 年 11 月 8 日，希特勒从柏林赶往慕尼黑，去庆祝慕尼黑啤酒馆暴动 16 周年，那次失败的政变在纳粹传说中早已被神化了。就在元首臭骂了英国人 8 分钟，离开会场去参加柏林的军事会议后，一颗藏在大厅柱子上的威力不小的炸弹马上爆炸了。轰塌了的天花板砸死了 7 人，砸伤 63 人，包括一些老牌纳粹党员。

纳粹党报《人民观察报》，攻击了这种企图暗杀的行为，并把它归罪于英国特工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希姆莱趁机逮捕了 40 名巴伐利亚保皇党和一些有嫌疑的不满分子，把他们弄到了盖

盖世太保总部。官方悬赏 60 万帝国马克给提供案犯信息的人，而希姆莱本人又加了 30 万，而且可用外汇支付。

暗杀者没能躲藏多久，36 岁的乔治·埃尔塞在企图穿过德国边境进入瑞士时被盖世太保抓住。他是个木匠，刚从达豪集中营被驱逐出来，因为他是个公开的共产党三个小组的成员。盖世太保从他兜里搜出了一张啤酒馆的地图，其中一根关键的柱子上标了个十字符号。作为希特勒的特殊犯人，他随即给送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去了。

就在第二天，希特勒又有可喜之事了。盖世太保设计了一个出名的圈套，把两个在荷兰的英国情报人员引诱过了荷德边界，然后绑架了他们。为了这一特殊使命，海德里希给舒伦堡从党卫队保安处中调来了海尔姆斯·克罗齐，一个有 3 年历史的党卫队保安处追随者。克罗齐的任务是在国外建立一个有效的间谍网。

1939 年 11 月 8 日，一枚炸弹轰塌了慕尼黑啤酒馆，当时这儿正举行啤酒馆政变 16 周年纪念，而希特勒凑巧于爆炸前离开大厅。





1938年11月9日纳粹举行游行，纪念纳粹建党节。

舒伦堡化装作豪普特曼·舍默尔(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只是早已被抓走了)，取得了两个英国间谍贝斯特和史蒂文森中校的信任。他曾在几次会议上见过他们，他假装成抵抗运动的代表和发言人，向他们反复强调抵抗运动的力量和作用，又强调抵抗运动的成员只是要求伦敦注意他们并公平地对待他们。

这两个英国人确实曾接待过一些真的反纳粹的和平主义者，但是他们这一次上当了。贝斯特和史蒂文森收到了一个小型无线电收发装置，随后又在荷兰小镇里与“舍默尔”进行了几次商谈。最后，两个英国佬要求舍默尔讲具体一点：反纳粹运动的具体方案是什么？于是另一个善于欺骗的专家阿尔弗雷德·诺朱克出现了，他曾为海德里希上演过臭名昭著的“波兰人进攻格莱维茨的无线电台”的闹剧。这次，他召集了一群党卫队员，准备进攻“舍默尔”和英国人约会的咖啡馆。两名英国人是乘坐柯平斯中尉驾驶的一辆大

别克车去赴约的。

他们在咖啡馆刚下车就遭到了一群盖世太保的袭击。随后贝斯特、史蒂文森和受伤的柯平斯，按舒伦堡的说法，“像干草一样地”被扔上了车。

贝斯特和史蒂文森被带到了德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做了囚犯，直至1945年被释放为止。这个被称为“文洛事件”的最不幸的受害者要算柯平斯中尉，他实际上是荷兰参谋总部的一名军官，真名为柯纳普。他中了盖世太保们的子弹，最终死于杜塞朵夫医院。



瓦尔特·舒伦堡（1910～1952），后被提升为党卫队外国情报局局长，主持拟定了“大不列颠特别搜捕名单”。

至于啤酒馆事件，希姆莱把它说成是英国人的阴谋，这一说法，即使德国公众能相信，对外人来说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美国驻柏林的著名广播主持人和记者威廉·谢尔在日记里写道：“此事在我看来非常可疑……希姆莱那一帮人很明显是想告诉容易上当的德国公众，英国政府想通过暗杀希特勒及其主要助手来赢得战争。”

在啤酒馆炸弹事件的观察者中，谢尔绝不是唯一的联想到国会纵火案的人。他们似乎觉得，那把火5年后还在冒烟。埃尔塞是又一个贫穷、疯狂、有纵火癖的人吗？至少，文洛事件发生的时间实在太凑巧以至不得不让人怀疑。劳约克在荷兰的人马11月7号起就布置好了，这和舒伦堡的回忆录中的说法相悖，他说抓这两个英国人的决定是在慕尼黑炸弹事件之后做出的，顺理成章的结论是这两件事有共同的原因。盖世太保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英国人“陷入”了一个针对希特勒的阴谋中。11月21日，希莱姆宣布了逮捕乔治·埃尔塞的消息，并声称他是受两个英国秘密情报人



员的唆使，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援助，那两个英国人在德荷边境已被逮捕。希姆莱还进一步说明贝斯特和史蒂文森搞到了一部无线电收发机，德国的反叛分子至今为止就是通过它与英国政府联系的。

以亚瑟·勒比为首的炸弹事件高层调查团只是提出了更多的疑点。希特勒到达之前，啤酒馆搜查过了吗？如搜过了，为什么没有发现并拆除炸弹？如果没有搜查过，为什么没有处罚那些应当负责的人？而这些松懈得令人难以相信的人正是海德里希的部下。而埃尔塞，在他的监狱生涯中，据说，总是告诉任何一个愿意听的人：一些假装做反希特勒的人，为他提供了钱，帮他做了炸弹并把它安置在靠近发言者讲台的一根柱子里。这是否属实，或是一个可怜的孤身作战的共产党员和希特勒仇恨者的虚构，不得而知。有消息说埃尔塞将被审判，但又因各种原因推迟了几次。

直到战争末期，埃尔塞的命运才见分晓。一道由海因里希·穆勒下达的指令决定了他的命运：这个“特别犯人”，在一次盟军空袭中，将被提出来，并“在可怕的空袭中受致命伤”。这个指令很可能来自希姆莱，他在他的帝国行将崩溃时，除掉了很多原来的反对者。1945年4月16日，果然宣布了乔治·埃尔塞在空袭中身亡的消息。在文洛事件和炸弹事件中，最无可争议的是，希特勒找到了进攻西线，特别是低地国家的借口。“难道荷兰人不是纵容了反对帝国的间谍行为吗？”

其实当时的德国已经是骑虎难下了。那些真正想除掉希特勒的人，至少在当时，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持不同政见者或“失败论”者都意识到了海德里希和盖世太保一旦得到啤酒馆事件这样的借口，肯定会马上出击。

而当时，德国将军们先前的疑虑正在消失，他们的部队取得在丹麦和挪威的胜利后，又攻入了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在荷兰前线发起攻势后的第35天，1940年6月14日，冯·屈希勒将军的第十八集团军开进了巴黎，屈希勒的部队兵分两路，分别开向了埃菲尔



已被提升为元帅的希特勒

铁塔和凯旋门。紧接着开来的是博根斯拉夫·冯·施图德尼茨将军的队伍，施图德尼茨将军是“大巴黎”的首任长官，以克里翁大饭店为其总部。

在不间断地进入或通过巴黎的部队中，有一支按照它本来的目的，不声不息地进来了。他们身着秘密前线警察制服，表面上处于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的控制之下，充当一种类似宪兵的角色。

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秘密前线警察。海德里希手下那些化装了的守卫人员就这样穿着羊皮进城了，他们之所以这样掩盖是因为国防军不允许秘密警察公开出现，尤其是特别突击队员。

11月14日夜，在卢浮饭店区驻扎下来后，特别突击队把地盘让给了卡尔·博姆堡的盖世太保们。博姆堡像他的上司穆勒一样，是一个很有手腕的职业警察，

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 1940 年 11 月至 1942 年 1 月间任驻法德军总司令，因为对法国人不够“强硬”而被迫辞职并于 1942 年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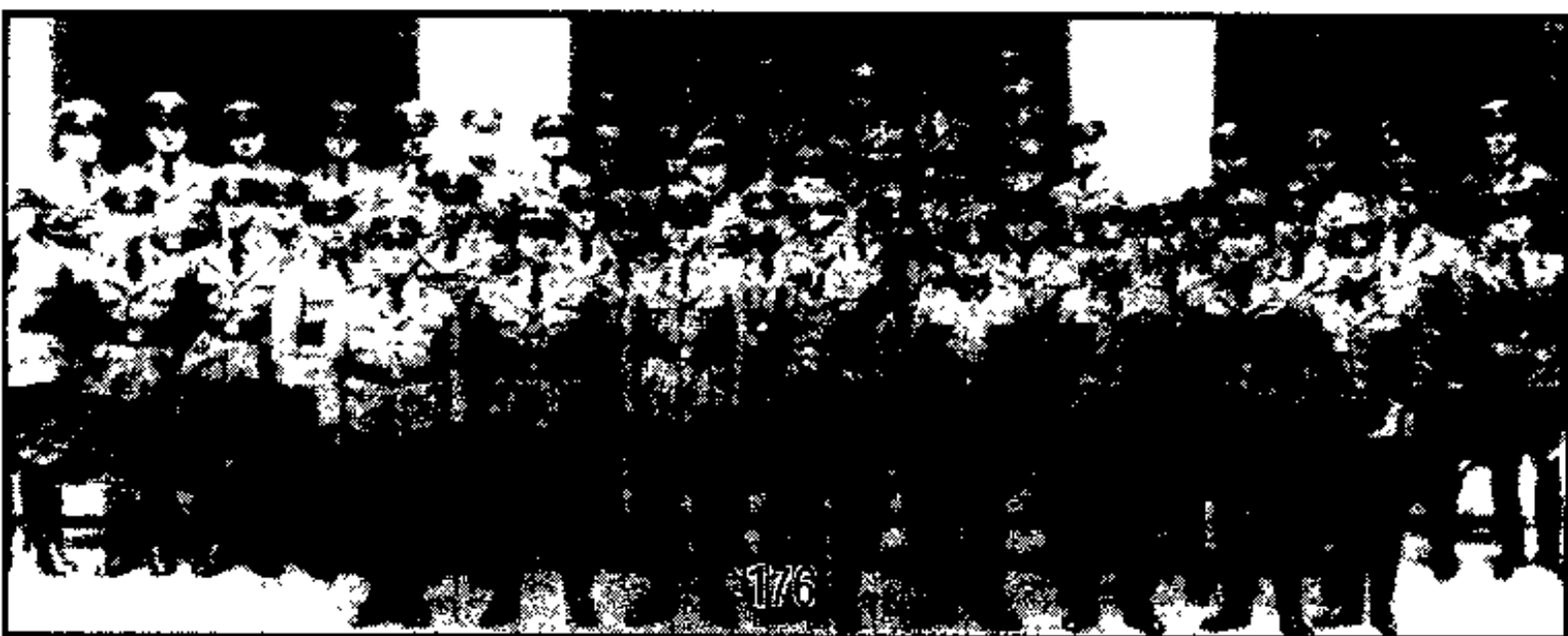
他以前曾在法国住过，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这支小部队的头目是文洛事件的关键人物海尔姆斯·克罗齐，另外的都是些年轻聪明的党卫队员。

不久，军方的头子奥托·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就开始抱怨特别突击队正在渗透入占领当局，而且致力于动摇占领当局。特别是他很讨厌党卫队旅长马克斯·托马斯博上，一个体壮如牛的家伙。托马斯是海德里希的个人代表，负责传达各种对特别突击队的指示。施蒂尔普纳格尔完全有理由担心，因为秘密警察洗去伪装花的时间并不长，实际上，在他们抵达后的第二天早晨，克罗齐的一个助手就赶到了巴黎警署，索要德国犹太移民和反纳粹政治犯的档案，这对盖世太保来说，是资料的补充，因为他们已经花了4年时间来研究巴黎的警察系统，特别是它的档案了。

作为“第五区”，巴黎令柏林的盖世太保产生了特殊的兴趣，现在，盖世太保们可以封掉所有那些反对者的办公室，并夺走他们的文件。真正的秘密前线警察，虽然只有2500多人，但他们逮捕了许多互助会会员，国防军的警察很不喜欢克罗齐的小“代用”军队，但却被迫忍受它。一旦条件许可，克罗齐就开始扩充人马，他的权势，只有博姆堡才可与之相比，而后者当时是盖世太保在法国的代表，他的总部就设在索萨尔大街第11号。

在波尔多，很快设立了盖世太保分部。从西班牙到卢瓦尔省的整个大西洋沿岸，在整个法国德占区，都有盖世太保在盯着。克罗

巴黎盖世太保官员合影。



齐对法国的盖世太保和警察行动的绝对控制一直持续到1941年，他的职责在于送走各种各样的反对派，甚至包括托马斯博士。因为博士很快就表现出对比加勒宫的美食有更大兴趣，超过了对情报工作的琐碎事务的关心，结果很快被调到苏联基辅前线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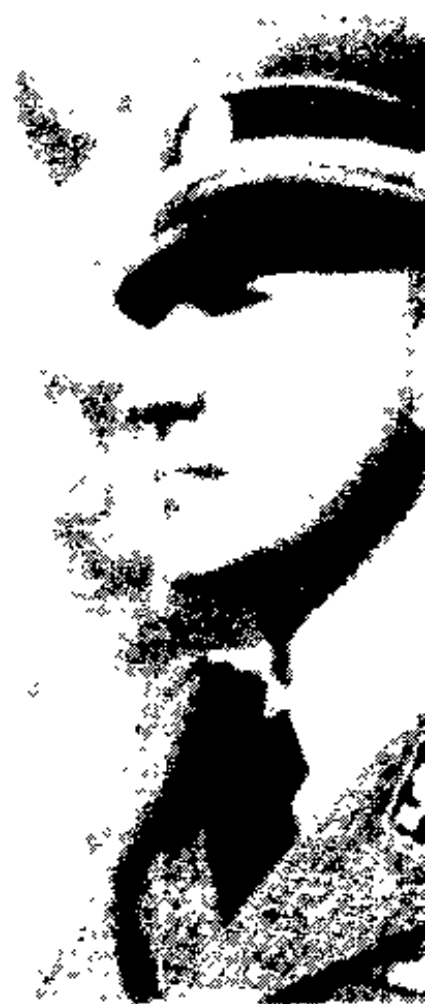
从一开始，克罗齐就想按柏林的方式来组织他的机构：他的人像总部一样，分成了不同的分局。他预料的是，不管国防军情愿与否，总有一天，他们得求助于他。果然不出其所料，秘密前线警察很快觉得自己力不从心了，他们被迫和盖世太保合作并划分了职责：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负责陆军后方部队的安全工作，而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的人专门控制军事情报工作。

党卫队保安处很大程度上是海德里希一手搞起来的，带着他的个性和风格，即使这个在巴黎的分部也不例外，党卫队保安处因为组织方式上的原因，是无法完成所有的任务的。

正如所预料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势力也没有减弱，他从慕尼黑派来了27岁的特奥乌尔·丹来克，此人衣着讲究，是个反闪米特族的官僚，虽然名义上他对克罗齐负责，但是事实上却受控于艾希曼。丹来克成了盖世太保法国犹太事务部的头子，专门负责把法国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和毒气室。

同样，在比利时，海德里希也发现陆军并不喜欢他的党卫队保安处和特遣队员，国防军占领比利时后，就通知党卫队，党卫队的活动是受到猜疑的。海德里希对此并不吃惊，他早就表示过他担心“由一些政治上并不可靠的反间谍部门的退休或留用的军官领导的”陆军，可能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



会建立一个独立的警察组织。

作为防护措施，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派党卫队军官和秘密警察头子去管理各地方的警察部门，而且他们只向希姆莱负责。陆军的反应是当然的：拒绝！臭名昭著的特别队不能进入比利时！只是在戈林干预以后，陆军总部才极不乐意地同意一个10人代表小分队进入比利时，条件是他们必须穿国防军军服。



法国的行刑柱，这种东西遍布欧洲被占各国，用来捆绑枪毙的犯人。盖世太保虽有权处死犯人，但死刑往往还是由军队来执行。

直到1940年7月27日，海德里希才带着他各分部的头子和党卫队旅长托马斯正式进驻布鲁塞尔（托马斯当时是党卫队在比利时和法国占领区的代表），并以布鲁塞尔为总部建立了一个安全机构，分为6个局，其中盖世太保为第四局。第四局又分为许多分局，它的功能就是要找出帝国的政治敌人。该安全机构的蜘蛛网一直延伸到了—些省区小镇，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军事长官亚历山大·冯·弗肯豪森将军的同意下，党卫队保安处在安特卫普、里尔等地都建立了分站。

希姆莱一向认为应该掌握第一手资料，于是他和他的副官卡尔·沃尔夫加上其它4个党卫队军官，开着车到处巡视，通常还是微服。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急于在军事占领区中安插一些高级党卫队军官担任行政顾问，作为他们的第五纵队，在整个欧洲德占区他们都想这么干，不只是在比利时。在比利时，充当这一角色的是党卫队旅长艾格尔特·里德，前亚琛州政府高级官员，现在代表比利时和北法部队总司令，担任军管当局头子。



按希姆莱的标准，里德温和得简直不像个纳粹党员。希姆莱的心腹之一、党卫队分队长哥特罗伯·贝尔格，攻击里德好像没认识

到“他的政策是比利时人的政策，他应该把它改为帝国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里德表现出了对希姆莱的灭绝犹太人计划的不满。事实上，1942年3月，里德就拒绝了克罗齐要把“最终解决方案”政策用到比利时的建议。

希姆莱对于阻碍他的人通常是反应很快的，这一次，他选中了党卫队军官库特·亚希。此人在战后幸存的犹太人的回忆中，像个外省银行里动作温柔的职员。但事实证明，此人不愧是艾希

曼。盖世太保使用这些残忍的折磨方式时，丝毫没有良心不安。事实上，要得到有用的供辞，往往要靠“有技巧”的审讯，刑讯折磨往往作用相反。



曼的得力信徒，亚希和艾希曼一样，研究过犹太文化，并懂得耶地语（犹太口语）。亚希受 IVB4 头子的派遣，他努力从事于抓捕犹太人。事实上，他常吹嘘他战前是如何精于烧毁犹太教堂。

德国占领比利时 6 个月后，反犹太政策颁布了按德国人的种族标准对犹太人所做的定义，并命令犹太人进行登记。两年后，押送开始。比利时的伊丽莎白女王通过外交渠道，要求赦免比利时的犹太人，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正关在玛里南中转营里，1942 年 8 月，从这儿，第一批犹太人被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

弗肯豪森答应放掉一些比籍犹太人，但亚希不尽余力地阻碍他。亚希直截了当地告诉比利时犹太组织的代表，“不要幻想放掉比籍犹太人，现在正考虑作出对比籍犹太人的新规定。”1943 年 6 月 29 日，他宣布：“根据帝国党卫队首脑的命令，转移行动中不能遗漏犹太人。”他接受了弗肯豪森放掉一部分犹太人的命令，但做了许多手脚，使得大量犹太人未能获释。

希特勒有在比利时和法国建立军管机构的明显意图，好使这些地区成为进攻不列颠的基地。但希姆莱看到了军管机构对他的种族政策是一种阻碍，只要可能，他都决心挽回损失。他宣称对秘密警察的弹压能力极为不满，但至少在一个方面，盖世太保在德占区的恐怖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加强，因为 1941 年 11 月 7 日，臭名昭著的“夜与雾”法令颁布了。

这一法令的颁布是因为希特勒对用共产党员作人质政策的不满。这种关押人质的办法，本是想遏止地下活动，但效果适得其反，抵抗运动风头越来越大。夜与雾法令，由希特勒亲自起草，凯特尔元帅签署，并由党卫队保安处、刑事警察和盖世太保执行，有着一种更激烈的目的。

希姆莱给党卫队保安处发布了这一法令：

1941 年 12 月 12 日，武装党卫队总司令颁布下述规定，以便执行。

经仔细考虑，元首决定改变对付那些与帝国和帝国占领军作

对的人的方法，元首认为，刑事关押甚至终生苦役对这些人显得过分软弱，只有死刑或一种令家人不知其下落的办法才能造成真正的威慑效果，而押解到德国正能达此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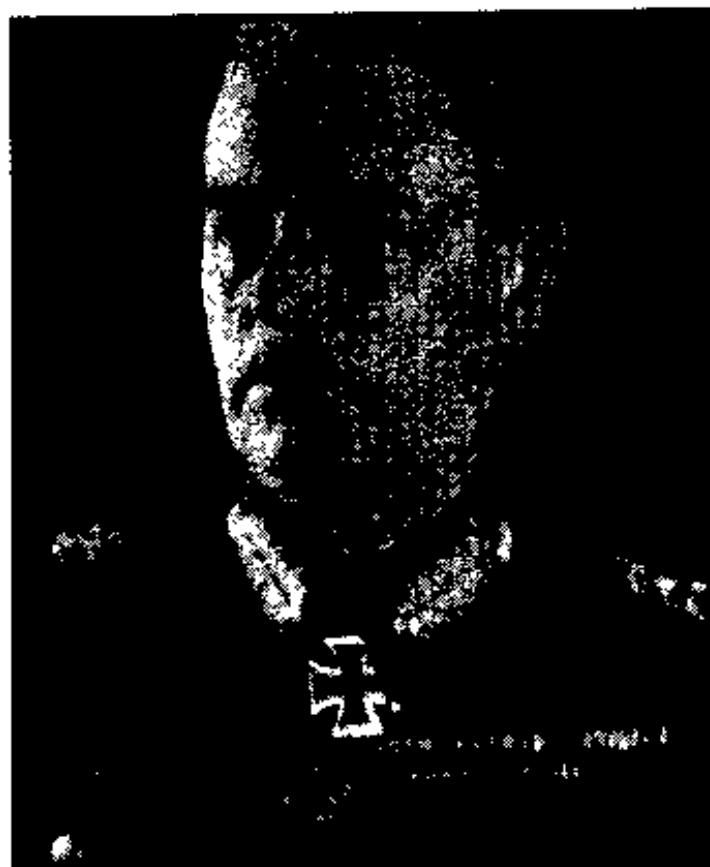
按元首之意，关于犯人的起诉有以下规定，这些都是元首仔细斟酌后同意的。

凯特尔在一个 1941 年 12 月 12 日的文件中指出：

“只有死刑和令家人不知犯人下落才能达到有效和长效的恐吓，这一目的可以通过把囚犯押往德国而达到。以后，囚犯将被秘密押往德国，在那儿对囚犯采取进一步措施，这种措施因以下理由将产生威慑：首先罪犯将不留痕迹地失踪；其次，有关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的命运的所有信息都将被封锁。”

1942 年 6 月 12 日海因里希·穆勒下令，如有必要，可以在讯问中使用第三度刑具。战后缴获的档案中有许多标为“姓名不明”，特别是那些有关埋葬受难者的地点的文件。

夜与雾法令在法国恶毒地实施了，首先是在北部德占区，在维希法国被德国人控制之后，范围扩展到了整个法国。那一年是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个低潮，特别是对战斗法国组织来说，它一直是法国最大的抵抗组织。叛徒亨利·戴维尔斯为盖世太保提供了一份战斗法国主要人员名单，后来才知道他是为德国陆军反间谍局工作的双重间谍，于是 47 人被捕并送往萨尔布吕肯集中营，在那儿他们被标为“姓名不明者”，17 个男人和 7 个女人被处死，其它被指控的人被判长期监禁。处决的办法是用斧子斩首。有些犯人，虽然被军事法庭开释，还是一样给送到了集中营。



凯特尔元帅

虽然夜与雾法令如此恐怖，德国人仍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就而担心。这支“秘密军队”的人员一直在增加，当德国人在苏联受到挫折后，法国人的信心又增强了。从前，海德里希对他的突击队的不厌其烦的指挥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印象，现在，受希姆莱激发，海德里希想出了类似的清洗方法。希特勒宣布，党卫队保安处和军方的不默契的合作再不能继续了，将派遣一个被授予广泛权力的党卫队官去和占领区军事首领合作，这个军官的头衔将是党卫队和警察高级统领。

最后的任命是按照海德里希的提名，卡尔·奥伯格被选中了，此人46岁，体壮如牛，前汉诺威一家香蕉搬运公司的经理，在大萧条的年代，和其它千百万人一样，在街上流浪过，他参加党卫队的目的很现实：弄点钱花。他选择了追随海德里希，到慕尼黑后几个

由海德里希提名，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奥伯格于1942年5月5日来到巴黎，他负责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在法国各地方机构的重组。





荷兰漫画家乔丹为1941年的《格陵兰人》杂志所作的漫画  
画中荷兰纳粹领导人穆塞特跟在“卖国”、“恐怖”和“悲惨”后面操  
着正步，其中“卖国”拿着一份盖世太保文件。

月，纳粹党就上台了。在以后的9年中，他飞黄腾达：1933年7月1日不过是个小分队长，1941年9月被任命为波兰拉德市警察总长，在那儿，他一直不懈地抓捕犹太人。

1942年5月7日，奥伯格从拉德前往巴黎，声势颇为显赫，海德里希亲往陪同。里茨大酒店辉煌的灯火令许多在场的人回想起战前的首都。整个仪式令人宽心，但并不只因为奥伯格本人的外表不那么可怕：金发、脸颊粉红的中年人，刚到中年。

但对巴黎人的软化并没持续多久。海德里希出发去布拉格，任命奥伯格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人”，此后，奥伯格就觉得可以放手建造他的帝国了。控制法国警方的军事部门给转到了党卫队保安处。按照柏林的模式，在巴黎和法国各地的德国警察机构建立了起来。但真正的盖世太保并不由奥伯格控制，他们是在丹来克的指挥下进行反犹太活动的。

很快，丹来克就向艾希曼汇报，简直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上给法国人灌输对犹太人的仇恨。集中和押送10万犹太人的行动，很难诱惑法国人来参与，贿赂也没用。但犹太人还是被集中起来被押走



了，部分没被押走的关在了法国境内的集中营里，其中出名的有德朗西、贡比涅和匹斯威斯。从这些地方，他们又被运往东部的死亡集中营，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数奥斯威辛了。

但所有这些事件中，艾希曼一直握有全权。只是德国驻巴黎大使偶尔会提出一些建议，因为外交方面的原因，要暂停一下进一步的押送。而艾希曼有时竟鲁莽地越过外交部行使他的权力，只与希姆莱本人打交道。如在1942年3月，他写信给外交部的兰德曼彻：“我们想把1941年12月12日的行动中抓到的1000犹太人送到奥斯威辛去，因为他们企图暗杀德国士兵。他们现在正关押于贡比涅，我们将用特别列车来押运他们，如果阁下不予以反对的话，我将万分感激。艾希曼。”外交部的回答是：“不反对，我们同意这次行动。”

在西线的被占国家，荷兰和她的14万犹太人的命运是特殊的。荷兰当时处于帝国总督阿瑟·赛斯-英夸特的控制下，他是一个奥地利人。事实上，这种无情破坏的机器在荷兰是由几个奥地利人控制着，因为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宣称他崇拜奥地利人，哈贝斯堡的训练使奥地利人具备了对待被征服者的特殊才能。而赛斯-英夸特，这个奥地利人，出任公共安全专员，很会按宣传部长长的要求办事。



安妮·弗兰克

在20年代，罗德这个疯狂的泛日耳曼反闪米特族暴徒就加入了斯德伦卫戍部队。斯德伦组织与纳粹党建立联系后，汉斯·罗德就成了个勇猛粗野的街头战士，他很快对纳粹德国警察系统的潜力产生了兴趣，并成为了其中一员。德国的侵略战争开始后，罗德就被任命为盖世太保驻荷兰的长官。在罗德的领导下，盖世太保们按照刑事警察的方式，难寻找和追

捕政治犯，而且，他还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荷兰暗探组织，以此来渗入地下组织。

同时，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也负责把荷兰犹太人送往东方的死亡集中营。安妮·弗兰克，这位死于贝尔森集中营的 10 多岁的少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犹太人必须带黄星标志；犹太人必须交出自行车；犹太人不能坐电车；也不能自己开车；犹太人只能在 3 至 5 点间去挂有‘犹太商店’牌子的商店购物；8 点以前犹太人必须在家；而 8 点后又连坐在花园里也不许；犹太人不得去基督徒家造访；犹太人必须上犹太学校；还有很多类似的限制。”

德国驻荷兰总督赛斯-英夸特（左）和他的奥地利同胞、党卫队旅长汉斯·罗德是荷兰的主宰。



安妮·弗兰克曾和家人一起躲在一个改装过的阁楼里。从这些照片里可以看到房子背面及阁楼的密门。1944年8月4日，盖世太保找到了安妮一家，然后把他们送往贝尔森集中营，在那儿，安妮死于1945年3月，年仅16岁。



除了这些人身限制之外，犹太企业也遭到了排挤。下一步措施牢牢掌握在帝国总督赛斯·英夸特和罗德手里。他们下面是对盖世太保负责的刑事警察司令，他直接对盖世太保负责。

1943年以前荷兰并没有意识形态形式上的纳粹。威廉·哈斯德博士是一个职业警长，虽然他认为必要时，也使用第三度刑具和折磨。而盖世太保却在无情地追捕犹太人，是艾希曼，而不是哈斯德或他的继任者，对反犹太计划的进度表示不满，特别是对押送的进度不满。

1943年8月底，艾希曼命令他的前方代表回到柏林来参加一个会议，几分钟之后，按照艾希曼的意思，会议决定：1943年7月将是转移犹太人的最后期限。

从此以后，犹太地区的每一个街角都充满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爬到阁楼、地下室或地窖里躺起来。在一条运河旁边的一幢老屋里，安妮·弗兰克和她的家人与另一个家庭在书架后藏着一个秘屋里躲了两年多，她在1943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从一个屋溜到另一个，上楼又下楼，觉得自己就像只翅膀给野蛮地

剪去了的画眉，在无边的黑暗中，一次次地撞在笼上。”

第二年8月，盖世太保在“绿衣警察”（即民事警察）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个密室，弗兰克一家和其它人一起被抓了起来，最后被毒气毒死或饿死于奥斯威辛、贝尔森等地。弗兰克一家人中，只有安妮的父亲奥托幸存了下来。

希特勒在各占领国安插代表时，他显得对昔日夺权时的老同志特别关照。比如，帝国在丹麦的全权特使，就送给了瓦尔纳·拜斯特博士，他是盖世太保的老法律顾问，曾在德国外交部干过。希特勒就是把他从外交部提拔到丹麦去的。约瑟夫·特博文是一战中的老飞行员，在20年代就加入了纳粹党，因为他在魏玛时期“红色”堡垒里的暴力行为和街上斗殴，升得很快，1927年就是纳粹党的重要人物了，1933年任埃森省的党部头子，然后他去挪威担任总督。

在丹麦，盖世太保有3个总部：第一个在哥本哈根的谢勒斯大楼，面对着水库区和圣约根湖，这儿原来是国际石油公司的地盘；第二个在欧登赛附近的农业学院里；第三个则是在奥佛斯大学。

奥佛斯监狱的刑讯是臭名昭著的。里面关押的囚犯中，最出名的人之一是哈伦德·桑德贝克神父。在1940年4月，他曾经去芬兰，为600名为芬兰而战的丹麦志愿兵担任随军牧师，那时他们对付的是俄国佬。丹麦刚一沦陷，他就开始售卖非法出版的抵抗运动小册子，1942年又组织了他的小分队，在日德兰半岛的赫塞姆地区接受盟军空援，并帮助援救盟军飞行员，直到有一天他和6位同志在日德兰一所高中里中了埋伏并被解往奥佛斯监狱。

每天，盖世太保军官都要提审桑德贝克和其他囚犯，虽然这些军官实际上对抵抗运动的情况知道得并不少。一次审问有可能从上午9点开始，经过一天一夜，直至第二天半夜。审问者很可能是一个刚看到名册的军官，在审讯过程中，他会骄傲地斥责犯人，“好！桑德贝克，20个小时前，你可不是这样说的。”

为了加强他的记忆，盖世太保用木棍和拳头痛击神父，当他带

着手铐瘫软在地时，他们继续用脚踢他。最后，他们告诉神父，要处决他了。他没有理由怀疑盖世太保在撒谎，因为他的一个好朋友，牧师和剧作家卡伊克，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就被打死了扔在公路旁。但桑德贝总算活了下来，多亏了盟军1944年冬天对奥佛斯的空袭。

从1943年9月起，谢勒斯楼的统治者换成了希姆莱的另一个信徒，党卫队旅长卡尔·亨茨·霍夫曼。党卫队总部对霍夫曼的评价与笔迹分析的结果并不一致，笔迹分析提供的报告宣称：“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其明晰性、决断力和自控力。他是个高度自我中心主义者，没有健全的责任感，智力平庸，但野心十足。”但是这样一份性格分析报告并未影响到党卫队总部对他的信任。在谢勒斯楼里，霍夫曼与党卫队队长冈德·潘克以及潘克的主要助手奥托·勃文斯潘分担责任，勃文斯潘是受卡尔滕布鲁勒庇护的。

在霍夫曼上任以前，希特勒就派了强硬派军官赫尔曼·汉勒肯中将接管了驻丹麦国防军。至于拜斯特博士，他又接到了新的命令，说对丹麦人，特别是犹太人，得更严酷一点。3年里，丹麦在战时欧洲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对独立，保持着相对的繁荣，食物能够自给，对德国的农业出口还增加了。由8000人组成的犹太社区对帝国并没有什么危险，但希姆莱和艾希曼可不理睬这一点。1943年9月14日，霍夫曼抵达哥本哈根，第二天，在鲁道夫·米德勒博士指挥下的警察部队和安全官员也赶到了。米德勒博士刚从波兰调来，他在那儿担任党卫队奥斯威辛地区指挥官和政治分局头子。

鲁尔夫·甘瑟尔，艾希曼的副手之一，接着也来到了丹麦。盖世太保是反犹政策的主要推动者，这一点可以在米德勒博士战后的供认中得到证明：“希姆莱下令，让艾希曼从柏林赶往哥本哈根，把丹麦的犹太人统统抓走。直接负责此事的是党卫队长、第四局局长穆勒。”

丹麦爆发的罢工和地下抵抗运动不断壮大的声势。被德国人抓住做了借口，他们趁机把犹太人逮捕集中了起来。逮捕行动的日



期定在10月1日晚和2日白天，刚好是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正值犹太人的安息日。星期五，对犹太住宅的大扫荡开始了，但令盖世太保恼火的是，大多数住宅早已人去楼空。3周后，被捕的总数是472人，这些人全部送往集中营。对纳粹，这无疑是一个挫折，因为另外7200个犹太人失踪了，这一切是因为格奥尔格·达克威茨的快速动作。他是拜斯特的亲密助手之一，在丹麦政界有许多朋友，对把犹太人送进盖世太保的虎口可不感兴趣。

同时，丹麦的地下组织收到了确切的消息，虽然它们早已得到警告，说盖世太保强迫哥本哈根犹太教堂的图书管理员把犹太教徒名单交出来。在这一明显的威胁下，地下组织开始收集渔船和其它可弄到手的船只，以便把犹太人送到中立的瑞典去。不能及时逃出的犹太人就先躲在了非犹太人家里，在盖世太保大肆收捕的3周时间里，利用夜色掩护偷偷赶往正在等待他们的船只。

在挪威，在战争继续的5年中，冰冷无情、毫无幽默感的特博文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权力，他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希姆莱的政策机器还要牢固。这个国家的武装部队早已被击溃，国王和政府流亡到了伦敦，被保留下来的挪威本土政党只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亲纳粹



吉姆林(左)与希特勒



1945年，在丹麦盖世太保总部，克伦奇尔爵士（左）被捕。此人是一名律师，在丹麦被占领期间，曾在丹麦电台上为纳粹演讲。

分子吉斯林组建的政党。

盖世太保的注意力转向了挪威的抵抗力量——米罗格组织。该组织经过初期的缓慢发展，于1942年开始与SOE组织合作。而SOE是英国人建立的军事组织，专门在德占区打击德国人。在这一年里，一小队挪威渔船开始在挪威港口和离苏格兰最北部大概100英里的谢德兰群岛之间作有规律的往返航行。这些船只的使命极其危险，它们从英国把联络人员、突击队员和武器运往挪威，也把一些志愿者和难民运回谢特兰，这些危机四伏的航行就是所谓的“谢德兰公共汽车”。

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这一双向交通的消息传到了盖世太保耳里。在阿尔桑德，在这个国家最突入大西洋的部分，亨利·奥利弗·里南，一个挪威告密者，假装成反纳粹者，混入了一个

“出口”小组。1942年2月23日由于里南通风报信，盖世太保截持了一艘正要开出的渔船，上面有23人，然后其它一些人也被捕了。一些经过千辛万苦逃到伦敦的幸存者证实，在纳粹关押人的4层砖的地牢里，活着出来是没有多大希望的。而且大部分人还给押送到了格雷尼集中营。

一个证人，他和一个抵抗战士住过同一间牢房，说道，“我的同伴已经几乎说不出话了……我得喂他吃饭，给他洗身子。警察折断他的四根手指，并剥掉了其中两指的指甲，然后他们用布包着的大棍棒他，直到他倒下，他们接着又把他放平在地上，脸朝上，跳到他肚子上去。他告诉我他曾求折磨他的人一枪把他打死。我看见他口、直肠都在流血，4个指头断了并朝后折了过去，我也亲眼看见他的两片指甲没了。”

盖世太保们对希特勒1942年的命令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时，战争的形势开始对希特勒不利，他下令处决所有的被俘盟军突击队员。元首10月18日的《绝密突击队员令》规定：“从现在起，对所有所谓承担突击使命的敌人，无论是在欧洲或非洲，不管他们是否身着军装，无论他们是否携带了武器，不管他们是在战斗还是逃跑，格杀勿论。”

此后不久，1942年11月19日夜间，苏格兰威克机场上起飞了2架哈里法克斯轰炸机，每一架后面拖着一架满载武装士兵的霍塞滑翔机。这次行动的目标是炸毁位于挪威深山中的挪斯克水电厂，这个水电厂生产的其实就是重水——第三帝国原子弹计划不可缺的基本原料。有一架轰炸机和2架滑翔机因恶劣天气而坠毁，被捕的人审问后就枪毙了。在一个案子中，党卫队分队长威廉·雷蒂斯领导的盖世太保利用希特勒关于突击队员处决前要审问的规定，痛殴英国士兵。1942年底时，盖世太保向其主子保证：挪威的形势绝对令人满意。

在那些在柏林发号施令的人中，在第二年年底，没有比希姆莱更有理由感到满意了。在1943年8月，他取得了内政部长之职，被



授予了所有种族和日耳曼化问题上的决定权，在集中营的势力也比从前大多了，而且，他现在控制着一个多达 6 万人的庞杂的官僚机构，这个数字还没算上党卫队各办公室雇用的 4 万多人。

几乎找不到没有党卫队插足的地盘了。例如，虽然希特勒对扣押人质办法的效果有保留意见，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这一措施还在继续。在动员刽子手和行刑队时，人们听到了官僚作风的呼呼作响声，而希姆莱本人亲自用旧普鲁士的严格态度来负责此事。决定杀

死哪些人质，权限确实不在盖世太保手中，而在陆军司令部，但盖世太保竭力把那些“参于报复和惩罚者”列入供考虑的名单，这些人无一例外都被处死了。

在法国东部，战后一直遗留着关于盖世太保的恐怖的回忆以至于当 42 年后里昂居民被迫面对这些回忆时，大家仍觉得心有余悸。这些恐怖的回忆里开始于 1942 年，当克劳茨·巴尔博（又译巴比）指挥下的盖世太保控制了这座城市时。巴尔博是个德国乡村教师的儿子，来自德国西部边境地区的特里尔城，以“里昂屠夫”而臭名远扬。多年以后，当他被带上被告席时，他被指控有虐待、屠杀和把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等罪名。

巴尔博曾经在荷兰练过身手，1941 年 5 月 2 日，他抵达汉格就任犹太事务部的情报长官，但很快他就到阿姆斯特丹的盖世太保司令部去工作去了。在那个被稠密的运河网分割的城市里，该司令部就位于犹得帕斯大街上（现在的范·得·汶大街）。在那儿，他脱下了军装，穿上了盖世太保行动时所穿的防水衣和软呢帽，他特别

关照的对象主要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金融家、马克思主义者和互助会员，这些人被认为对纳粹党有特殊威胁。但艾希曼对情报收集不够耐心，他要的是各分部各分局马上行动起来以便押送犯人的列车能马上开动，1942年5月，第一辆押送列车开到了荷兰。

同年11月，巴尔博荣获二级铁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对帝国的忠心服务，然后他被调往里昂，就在11月，他在里昂就任。里昂位于法国东部，座落于罗纳河和索恩河的交汇点上，这座城市在盟军成功登陆北非以前，并未被德国人占领。

巴尔博的顶头上司，穆勒对他的到来马上表示出不快，而且从一开始就公开声明尽可能地少与他合作。但巴尔博在里昂的权力仍然不小，他直接对克罗齐在巴黎的总部负责。克罗齐对他的指示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的地步：渗透并摧毁里昂的抵抗组织。里昂市中心佩雷克火车站附近有家四星级的大酒店，这座豪华的酒店被巴尔博占作了他的小帝国的总部，酒店里许多空余的客房被用作审讯室或临时监狱。在昂第尔大街上，巴尔博征用了一所房屋来作他的私人官邸。

大酒店并不是盖世太保在里昂的唯一据点，穿过罗纳河，有一所阴森森的军医学校，过去是法国人培养军医的地方，那儿也是盖世太保的据点之一。蒙特吕克军事监狱，一座高墙铁门的古堡，也被选中了，明显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它离押送犯人去集中营的列车出发的地方很近。

那些在里昂与巴尔博打过交道的人都证实他们遇到的这个人，无疑人格有些分裂：他装作作风随和，甚至在他乘车公开穿过大街时，他嘲笑种种保护官车的做法，而和路人像老朋友一样打招呼；有时梅赫塞默街和索恩河码头四周作那些美味餐馆里的侍者还把他当一个慷慨可亲的顾客。只是他的可亲不是一贯的，有时，毫无先兆地，他大发雷霆，偶而，还像虐待狂一样行事。

在巴尔博的恐怖政策下，里昂的暴行罄竹难书，但最让人无法忘记的是两件事。



让·穆朗，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他在饱经折磨后被送往德国，1943年7月8日死于押运途中。

1943年6月2日，在里昂的一个郊区卡吕尔村，人们的午睡被一队轰鸣的军车弄醒了，车上全是盖世太保。巴尔博和他的手下得知这儿的医生德古龙把他的三层楼的别墅当作了抵抗组织的固定会议点，来参加会议的成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让·马蒂利先生，他是以风湿病人的名义来这儿的。

盖世太保破门而入，冲向里面的人，拳打脚踢，按头撞墙，然后命令他们把手全举起来。让·马蒂利挥舞医生开

给他的诊断书，拼命强调他确实是个风湿病人。德古龙被一脚踢中肚子，倒在地上。所有被捕的人都抓到了车上，但令盖世太保最感兴趣的，还是马蒂利。

他们当然要重视他了，因为他实际上就是让·穆朗，法国抵抗运动最杰出的英雄之一。让·穆朗出生在夏赫特，年过40时就成了法国最年轻的省长，德国占领法国后，他被赶下了台，退职到了普罗旺斯。但退职并不意味着休息，穆朗一直致力于和法国南部的抵抗组织打交道，后来这些组织联合组成的就是出名的“战斗法国”组织。后来他又逃到了英国，在伦敦为戴高乐将军工作。1942年元旦，他潜回法国，肩负的使命是把法国各抵抗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抵抗组织委员会，争取把爱国的政治家、工联主义者、教会人士和自由撰稿人也吸引进来。

虽然这些组织政治上有分歧，但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希特勒和德国人，当然，他们中有些人（不是全部）是想让戴高乐充当自由



法国的领导人的。在让·穆朗的领导组织下，1943年5月27日，在巴黎第四大街48号，法国全国抵抗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为抵抗运动注入了新的信心，但6周后，让·穆朗就遇难了。

他死得漫长而痛苦。最初“照料”他的就是巴尔博，没有几个盖世太保比这个“里昂屠夫”对折磨人的办法更为精通了。工联主义者克里斯丁·佩罗曾被抓进蒙特吕克监狱，他回忆说，穆朗有一次瘫在长凳上，由一个士兵在旁边看着，“他当时已经昏过去了，两眼深陷，仿佛头部在那儿被打穿了；额头上有个可怕的伤痕，他的双唇肿起，发着轻轻的朴朴声。”

穆朗在头颅变形、脑部受损后，被送往巴黎，在那儿，他在党卫队队长博姆堡的别墅里渡过了几天，当然是在昏迷之中，7月初，不死不活的穆朗，全身已被遭踏得不成样子，又被送往德国，然后死于运送途中。穆朗的姐姐后来收到一张巴黎的盖世太保寄发的死亡证书，上面说他在1943年7月8日死于邻近德国边境的美茨城，死因是心脏病。



在巴尔博的命令下从伊汝的“儿童村”抓走的三兄弟，他们后来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

出卖穆朗的叛徒一直没能找出来，虽然幸存的抵抗战士和历史学家一样有着种种猜测。卡吕尔大搜捕和穆朗之死粉碎了戴高乐抵抗运动的初衷，直至1944年，法国抵抗运动才恢复了生气。里昂地区，不断有人被抓而受到酷刑折磨，但最让人痛苦的，是1944年春天，巴尔博对孩子们的大肆追捕。

在4月6日，巴尔博发往柏林的电报遗稿中，可以找到这次追捕的后果的一点痕迹。

今天凌晨，袭击了名叫“儿童地”的犹太儿童之家，所有41个孩子中，



朱利安·法维特 1981 年到里昂法庭，在对巴尔博的审判中担任证人。对法维特来说，重新回忆那些悲惨的孩子们的经历，仍然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3~13 岁的全部被抓了起来，10 个犹太职员中，有 5 名是女性。现金及其它财产未动。44 年 4 月 7 日他们将被送往德朗西。

巴尔博

那个星期四，“儿童村”的孩子们像往常一样来上学了。他们的学校是伊汝村庄里的一幢灰色楼房，从这儿看得见汝拉山脉。这儿的 41 个孩子来自法国各地，在这儿已住了近一年，他们的父母意识到最后解决方案的危险之后，就把他们送到这儿来了。这儿，像法国其它某些地方一样，被认为是盖世太保的狗鼻子之下的一个避风港。

但是，因为有告密者泄露，巴尔博得知了这一地方，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一队卡车和货车，经过弯弯曲曲的山路，开进了学校前面的院子里。在盖世太保和维希傀儡政权的警察的恐吓下，吓呆了的人们给一个个拖到院子里，学校给“梳理”了一遍，所有的孩子都给赶出来了。朱利安·法维特当时是当地的一个农场工人，在



1987年5月，在审判巴尔博之前，老抵抗战士安娜·赖格尔在里昂电台向听众直播战时遭遇。

1984年英国记者约翰·比安特采访他时曾这样报道：

当时我正在附近的农田里劳动，听到喧哗声后，我赶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那场景太恐怖了，德国人把孩子们，不管他还多小，一个个地扔进车的尾部，像扔垃圾袋一样。有一个盖世太保用枪戳我，叫我滚到货车后面去，但他的长官，后来我才意味到那就是

巴尔博，看见了我，他先是跑过来对与我说话的盖世太保大嚷大叫，然后又对我吼叫一气，把我拉开，叫我离开这儿，滚远一点！我能逃脱，自然很庆幸，但我实在是为那些孩子难过，他们在恐惧和疼痛中大声哭叫着。那些卡车上路转了个弯看不见了之后很久，我还能听见他们在呜咽和尖叫。

数十年后，在70年代，当巴尔博被审时，他拼命抵赖说这次抓捕与他毫无关系，而人们又不得不承认法维特当时把他认出来了这一点并不完全确实。当被质问到电报的事时，他宣称他签署那份电报只是“因为当时找不到艾希曼的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逃避责任的说法：盖世太保的犹太事务正是由他管辖。

在巴黎西北边缘，靠近布赫格机场，有个叫特伦西的肮脏不堪的郊区小镇。1941年8月，贝当政府选中了这儿，设了一个中转营，那些将被送往奥斯威辛毒气室的囚犯就先关在这儿，从学校抓来的孩子中的大部分在这儿关了3个月，被弄得骨瘦如柴。在1944年6月30日，一个星期五，盟军的诺曼底登陆行动开始24小时后，孩子们被装进了火车厢送往奥斯威辛，最后惨死在毒气室中。

在法国，1943年是一个灾难之年，4万多抵抗战士及其它人员

被抓了起来，而且数字直在上升。盖世太保掌握着绝对的权力而克罗齐的人也在到处行动。

当然，关于前途叵测的未来，盖世太保们也开始做起恶梦来了。欧洲不再是他们独占的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庞大惊人的部队已经开始在诺曼底登陆，纳粹党的暴政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但盖世太保面对的敌人，不再只是法国和各被占领国的抵抗战士了，另外一些对手活跃了起来，他们来自纳粹堡垒内部。

1940年6月，希特勒以胜利之师统帅的角色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留影。





德军士兵神气地通过巴黎凯旋门。



德国兵正在格莱诺布勒筑起防御工事。



德军在西线部署了重兵，但错误地估计了盟军的登陆地点。

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夕，负责西线防御的德国元帅隆美尔（左）在法国海岸巡视，德军虽在西线部署了重兵，但错误地估计了盟军的登陆地点。



# J

## 盖世太保和堡垒内部的对手

战争的第四年，无论在前方还是后方，第三帝国的战争陷入了一种灾难的气氛之中。1943年1月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对德国国防军来是一个巨大打击，这部可怕的战争机器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元气。1943年1月14至3日，西方盟国卡萨布兰卡会议毫不妥协地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就是最瞎的德国人也看得见那堵神秘的墙上的不祥咒语了。幻灭和不满笼罩着，这种腐蚀性情绪是盖世太保所无法扑灭的，不管盖世太保有多野蛮，它没法控制人的思想。

其实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一年里，盟军已查觉德国人的士气有所下降，这一点可以在英国外交部5月份的绝密文件《每周政治情报概要》中找到证明，第137条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盖世太保为了加强对德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控制，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同时，还努力加强它



在占领区的行动，关于这一点，希姆莱最近到荷兰的巡视和海德里希到荷兰、法国（他现在回到了布拉格）的巡视是最明显的证明。最近，党卫队又采取了一个渗透措施，把所有的邮局卫兵都换成了特殊挑选过的穿军服的党卫队员，这使得党卫队有更多的机会在整个德占欧洲检查和干涉前线士兵和后方亲人的通信。

观察家们已注意到近来德国普通市民的士气有明显下降，而且他们断言连军官的士气也远比不上德国发动对俄国的进攻以前了。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盖世太保密切注视着每一种失败主义的痕迹。他们接到报告说很多纳粹党员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打招呼时说“希特勒万岁！”了；而且有些人在公共场合居然不佩带党徽。

希特勒本人对这种不满现象也很忧心，海德里希死后5个月，他把卡尔滕布鲁纳召到了贝希特斯加登，授予了他更广泛的警政权力。卡尔滕布鲁纳很快发觉各种麻烦堆积如山。就在贝希特斯加

海德里希被暗杀5个月后，希特勒命令卡尔滕布鲁纳执掌盖世太保总部，并授予他对付国家的敌人的更高权力。这是贝希特斯加登的盖世太保总部。





卡尔滕布鲁纳

堡会议当月，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和盖世太保最终破获了一个叫做“红色乐队”的在整个西欧行动的共产党人的间谍网；现在，德国许多城镇，特别是慕尼黑，有人在大规模地散发煽动性传单。其中有一种就号召大家赶在德国的全部城镇变成瓦砾之前，赶在“这个国家最后一个小伙子为一个贱人的傲慢而战死”之前，起来反抗法西斯。而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被说成是用最蹩脚的德语写成的，而德国的知识分

子早已“逃到了地窖里，在那儿，他们就像黑暗中没有光和水的植物，在挣扎中慢慢窒息而死”。

盖世太保对传单运动的策源地一无所知，而传单已经显示出了一定的效果。卡尔滕布鲁纳的一份报告写道：“我们的一些情报人员强调，这是因为市民不再像从前那样遵守规定，把煽动性标语立即擦掉，并马上上交传单，而是阅读传单的内容并互相传看。”无论如何，这些在慕尼黑行动的反抗者的行为对纳粹党徒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因为巴伐利亚州毕竟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诞生地。

事实上，这些传单不是严格的、组织良好的抵抗组织的作品，而是100来个学生积极分子，出于对“纳粹对人类精神的挑战”的义愤而写的。很多情况下，这种不满的动因往往是青春中的理想主义精神，通常效果并不明显，却无法阻止盖世太保带着惊人的残酷，恶狠狠地向他们扑来。

在慕尼黑的传单事件中，汉斯·胡伯教授是一个关键人物。这



汉斯·斯柯尔(左)和索菲·斯柯尔(右),慕尼黑大学生,“白玫瑰”小组成员。

个让人喜欢的中年人出生于瑞士,是慕尼黑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的主任,是他鼓动了学生们。和他的学生们一样,胡伯教授痛恨纳粹党,在1942年春天,在他的公寓里独自发动了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他的武器是一篇800字的传单,这份传单是从明斯特主教,康特·克莱门斯·冯伽南早些时候的布道辞中摘抄出来的。在那些布道辞中,主教痛斥了纳粹党在1939年到1941年间把70000名精神病人、残废人、老弱者关押起来的疯狂行为,主教也谴责了党卫队占领明斯特修道院并把修士和修女驱赶出去的恶行。

命运是莫名其妙的,主教并未因为这些布道辞而被捕,但吕贝克的两名教士却因散发这些布道辞而被捕处死。胡伯教授不愿看着教士们的血白流,他用他的老式手摇油印机把主教的布道辞印了出来,然后冒着莫大的危险,把这些油印件投放到公共邮筒里,寄往德国一些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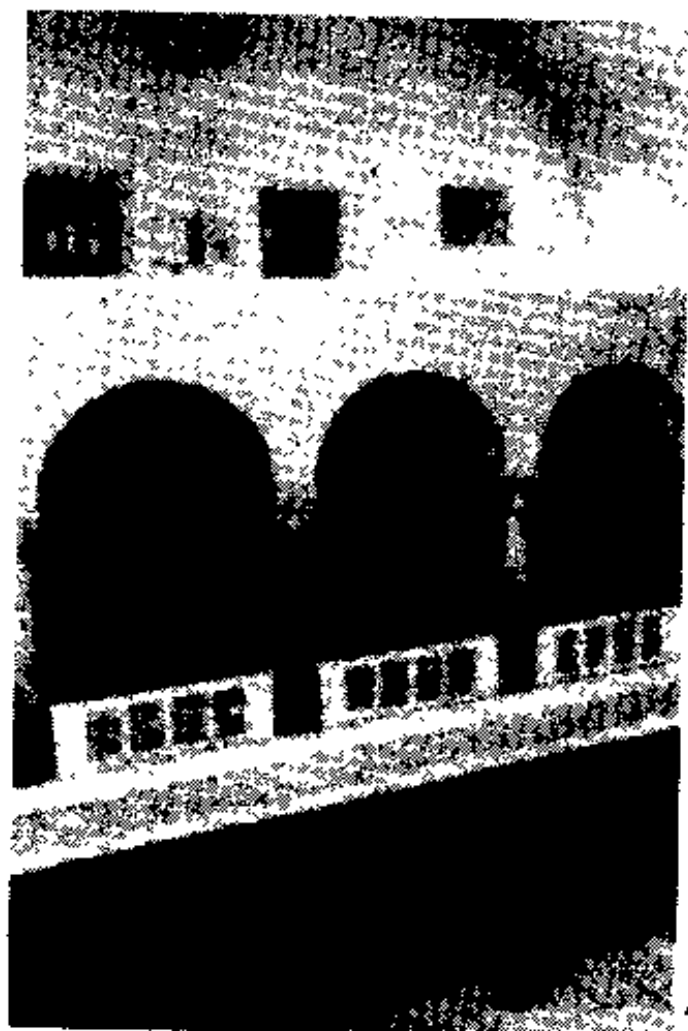
有一份传单寄到了乌尔姆的斯柯尔家里,24岁的汉斯·斯柯尔正巧从学校回到家里,他如饥似渴地仔细阅读了这份传单。斯柯尔曾经在俄国目睹过纳粹的暴行,为了表示抗议,在波兰东部的火车站,他曾与运牛车里的犹太人亲切握手。后来他得到特殊休假,

回国继续他的医学学业，和他妹妹索菲就读于同一所大学。

1936 年以前，和 800 多万 10 岁至 18 岁的孩子一样，汉斯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但汉斯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很快觉得希特勒青年团的反基督教政策让人痛恨。索菲，还有另一个天主教青年运动的老成员威利·格雷夫，以及其它两个学生亚历山大·史克莫尔和克里斯托夫·普罗伯斯特和她哥哥意见一致。

他们开始在他们的老师的公寓里开会，形成了一个后来被称作“白玫瑰”的核心小组，这个名字表示了这个小组的目标和态度。汉斯是从一本美国小说里受到启发而取这个名的，在那部由本·温克写的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庞大机构的不人道之处，但这部叫《白玫瑰》的小说是以充满浪漫传说和神秘故事的墨西哥为背景的，或许正是这一点才对斯柯尔这样的年轻爱国者产生了魅力。

慕尼黑大学的阳台，汉斯·斯柯尔就是从这儿把胡伯教授的传单撒给下面的学生们。



1943 年 2 月，保罗·盖斯勒，慕尼黑和上巴伐利亚的纳粹党党部头子，向慕尼黑的学生们训话，而且斥责他们，说他们士气低落。如果盖斯勒的本意是寻求与学生的合作的话，他的方法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他宣布，每一个身体健康的男学生都应投入一种有用的战时工作中去，而女学生如果每年为第三帝国生一个孩子，任务就完成了。盖斯勒又嘲弄地扫了大家一眼，补充道：“如果有些女孩魅力不够，找不到配种对象，我将给她们每人分一个我的卫兵……我可以保证她会得到一次完全满足的经历。”即使考虑到巴伐利亚人历来

说笑粗鲁，这些话对学生们来说也太过份了。他们冲向了发言者的卫兵，那可全是盖世太保，然后学生们又冲出大厅，窜进各条街道。就在当天，慕尼黑爆发了公众反纳粹的游行示威，这是以前闻所未闻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的第二周，1943年2月16日清晨，路过凯旋门的慕尼黑市民看见了墙上刻着“自由！”和“打倒希特勒！”等标语，在其它好几个地方同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标语，盖世太保不得不强迫乌克兰女囚把它们擦掉。

传单运动的下一阶段其实发生在大学的内部，2月18日凌晨，汉斯和索菲·斯柯尔开始行动了，他们把大量传单散发在教室里，然后又从大厅最高一层把传单撒了下来，弄得遍地都是。

但这两兄妹忽视了雅可·施密特，一个搬运工和手工艺人，他当时看见了正在行动的索菲。而此人实际上是给盖世太保通风报信的告密者之一，他马上跑去叫来了负责处理心怀不满者的便衣密探。斯柯尔兄妹被带到了校长、党卫队成员沃尔特·汉斯特博士的办公室，关在那儿，直至警察赶来把他们抓到盖世太保总部。斯柯尔家遭到了搜查，“白玫瑰”小组的其它人的名单被发现了。

审讯刚开始时，汉斯和索菲一直拒不承认与外面的传单和标语有关，直至刷子、蜡纸和油印机被亮出来。长时间的无情的审讯把他俩弄垮了，作了初步供认以后他们被允许返回牢房。

但时隔不久，仅过几小时后，盖世太保又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讯问又开始了。审问索菲的是一个职业老警察，叫罗伯特·摩尔，此人努力显得通情达理、和蔼可亲，还请她喝咖啡、抽烟。他的语调一点不像个仗势欺人的盖世太保，倒像是伤心的父亲对不听话的女儿的口气。他循循善诱地对索菲讲述纳粹党辉煌的历史，元首的英明伟大以及她这样做对在前线英勇作战的德国战士造成的损害，好像索菲犯错误是因为无知而不是因为怀有恶意。

但如果摩尔预料到了索菲的回答，恐怕他就不会这样做了。索菲不无嘲弄地回答他：“你错了，摩尔先生。如果可能的话，我会重

复我所做过的一切。是你，不是我，抱有错误的世界观。”汉斯想把一切罪名都承担下来，他告诉盖世太保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干的。然后他和妹妹被放回了牢房，牢房里安满了亮煌煌的白炽灯，晃得他们简直连眼都睁不开。

2月22早晨，斯柯尔兄妹和已被捕的克里斯托夫·普罗伯斯特一起被送到了司法部，作为被告被押上了臭名昭著的人民法庭，在那儿审判往往只是滑稽的过场，法官也只是个橡皮图章，判决在审判之前往往就决定了。在1937年1月希特勒颁布的民事服务法案中，有一节就规定了任何不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行事的法官都将被撤职，由更可信任的人来代替。

审理“白玫瑰”小组的首席法官正是臭名远扬的罗南德·弗雷斯勒，此人在一战时做过俄国人的俘虏，后来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再后来又成了一个丧心病狂的纳粹党徒，但他始终是苏联的恐怖政策的热情崇拜者，30年代苏联大清洗中首席公诉员安德雷·文谢斯基的信徒。他特别喜欢的技巧之一就是不断刁难和谩骂犯人，有时也连证人也不放过。

那位年轻的辩护律师（可想而知肯定是纳粹党律师协会的成员之一）对公诉员指出的证据毫无反对意见。索菲·斯柯尔似乎根本就听不见弗雷斯勒的谩骂；而汉斯和普罗伯斯特也根本不想试图否认他们的“罪行”，宣判因此没有拖长，很快，头戴黑帽身着红袍的弗雷斯勒站了起来，他拖声拖气地宣判：

“汉斯·弗雷泽·斯柯尔，死刑。”

“索菲·玛格戴丽娜·斯柯尔，死刑。”

“克里斯托夫·赫尔曼·普罗伯斯特，死刑。”

审讯在上午就结束了，死刑的执行方式是斩首。这些被判死刑的年轻人给装进了汽车，由盖世太保押送到慕尼黑南郊的斯图塔海姆监狱关了起来，他们被分开关了起来，被告知可以写最后几封信。盖世太保允许汉斯和索菲的父母来见他们命运已注定的儿女们几分钟，这几分钟真令他们伤心欲绝。



相比较而言，斩首还是一种比较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盖世太保更喜欢的是用勾子上的钢琴弦把人勒死这类的方法。被判刑的人被四肢展开地绑在一个木架上，然后将其快速推入执行室，犯人进来到断头刀落下的时间是经过精确计算过的，刚好7秒。身着校衣校裙的索菲首先遇难，但她有幸避免了看见用锯木屑撒在地上吸干上一个受难者的鲜血的惨景。卫兵们还记得汉斯·斯柯尔高喊了一声：“自由万岁！”慕尼黑的《新消息》在当天下午就报导了审判和执行死刑的情况，事实上，正在审判时，这些稿件就写好了。

盖世太保并未因此放松对“白玫瑰”其它成员的追捕，胡伯教授、亚历山大·谢莫雷尔和威廉·格雷夫于1943年2月21日被捕；4月19日被判有罪；7月12日被砍了头。

在德国其它地方，盖世太保全神贯注提防着更大的阴谋，这些阴谋者都只有一个目标：干掉希特勒。早在1939年，希特勒的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就宣称应该打死希特勒，但他像其他反对者一样，觉得无法把这种大话付诸行动。但有一些更坚定的人，在此后的几年中，慢慢地克服了犹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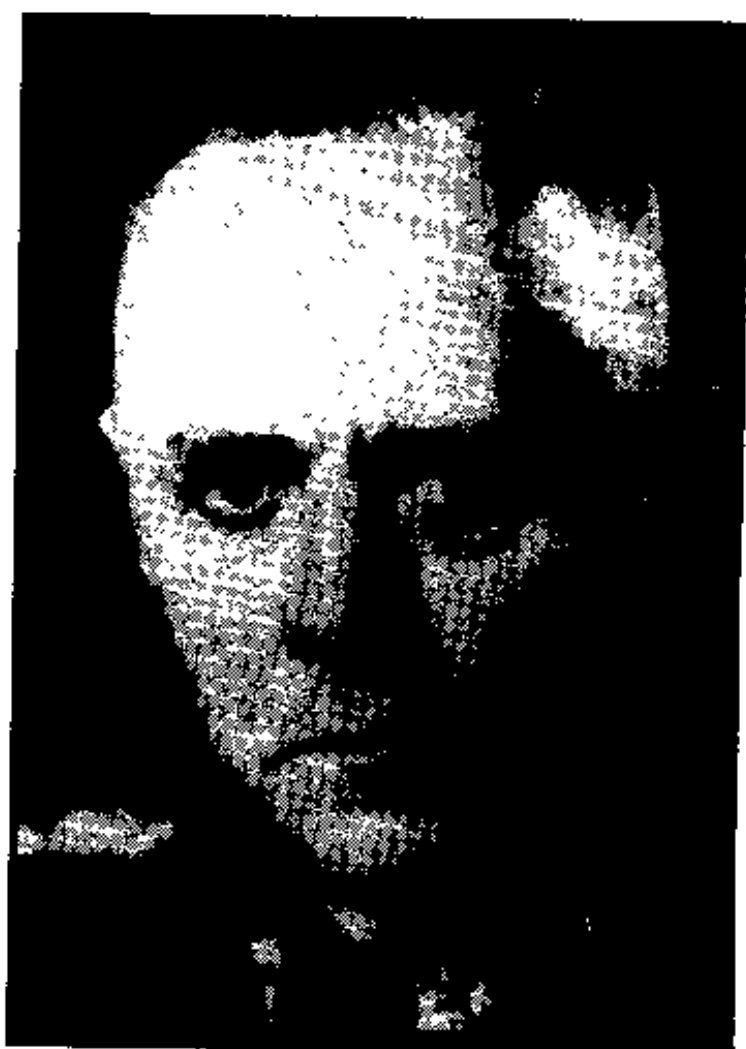
卡尔·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从



安妮多尔·里伯（左）是朱力斯·里伯的遗孀，她的丈夫因卷入1944年炸弹事件而饱受折磨，最终被处死。安妮多尔本人也曾是反希特勒组织的通信员，她现在经营着一家专出有关战时德国反希特勒组织的书籍的出版社。

1942年起就任德国驻法国军队总司令。他和哈尔德一起，说服了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的海尔姆斯·格罗舒特中校以及其它一些人接受了他们攻占柏林，袭击盖世太保和党卫队总部的计划。这个计划以及后来的一些计划不仅卷入了武装部队，而且还卷入了海德里希的老朋友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统帅的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总部的不少人。

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对他的主要助手汉斯·奥斯德中将的活动并没有真正表示过同意，否则那将是奥斯特他们莫大的幸运。奥斯德对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目的有根深蒂固的反感，1940年，就曾故意把希特勒的侵略计划泄露给各个受威胁国家的政府。奥斯德制定了一个计划，藏在措森国防军总部的一个保险柜里，计划要求逮捕包括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内的全部纳粹领导人，然后建立一个由前陆军参谋长贝克将军领导的临时政府。贝克一直反对希特勒的军事冒险。



贝克上将

汉斯·奥斯德中将



当德国在希特勒的带领下一步步走向深渊时，陆军忠诚的传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行动的必要性显得越来越紧迫，而最清楚这种紧迫性的少数人中，贵族克劳茨·冯·施陶芬伯格算得上一个，他虽然供职于国防军总部，却是一个信仰明确的反纳粹者。施陶芬伯格通过一个叫克雷索小组的反对组织接触到了许多合谋反对希特勒的人，克雷索小组始建于1933年，由一群军官和有地位的市民组成，因为



冯·施陶芬伯格上校

为常在克雷索的莫尔提克庄园碰头而取名为克雷索小组。但施陶芬伯格不耐烦地把这个小组称做一个只说不做的茶馆。

施陶芬伯格在北非的第十装甲师服役时，受到了重伤，失去了右手、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还有一只眼睛。有两件可以表明他的勇气的事：一是受伤以后他拒绝以残疾人身份退出国防军；再就是他志愿在希特勒在国防军总部召开一次军事会议时，安装一颗可以炸死希特勒的炸弹。希特勒生性多疑，总怀疑有人在威胁他的生命，他建立了一道最严密的安全网，甚至要求他的贴身仆人也随身携带武器，而他吃的每一种食物都必须先化验一下有没有毒。

施陶芬伯格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突破这道安全网，因为他是反希特勒的小圈子中唯一可以出席希特勒干部会议的成员。他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他在战争中受伤后，听力有所下降，这样他就找到了一个靠近希特勒的最好理由。

以后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从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一个特殊委员会的一系列报告中去寻找线索了。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944年

7月20日，专门调查“7·20”炸弹事件，它由希姆莱下令成立而由卡尔滕布鲁纳和穆勒直接指挥。

施陶芬伯格在公文包中装了一枚定时炸弹，在副官韦尔维·冯·黑尔顿的陪同下，从柏林飞抵拉森堡。在会议正进行时，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下离元首很近的位置，然后借口出去打电话，溜出了会议室。炸弹爆炸了，但爆炸前有人不经意把装着炸弹的公文包踢远离了希特勒，这种凑巧无疑救了希特勒一命。参加会议的人中，有4人被炸死，希特勒本人背部和双手炸伤，耳鼓膜破裂，还有左腿也被碎片扎伤，元首的身体状况在拉森堡爆炸之前就每况愈下，这次“事故”无疑使得他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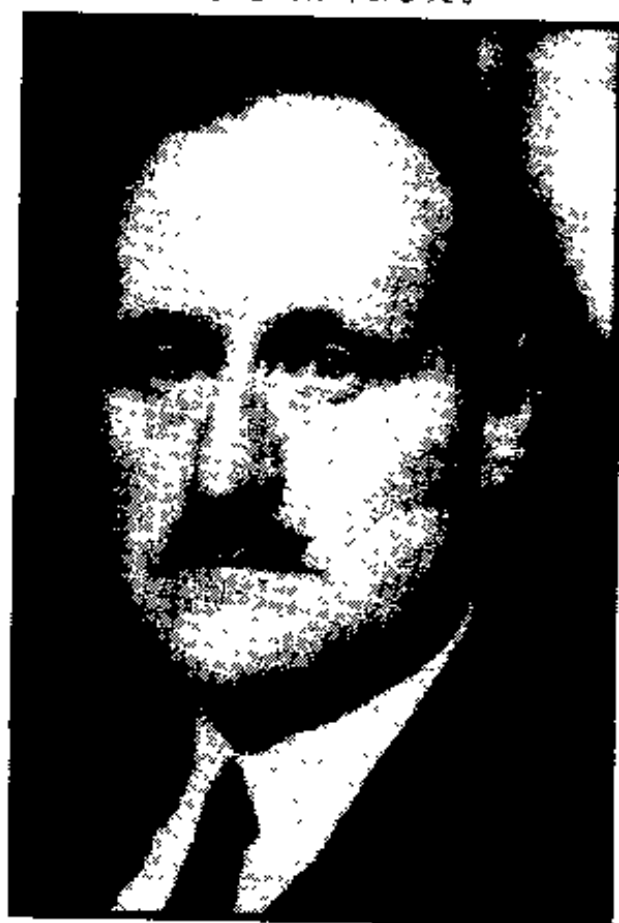
下午1点刚过，施陶芬伯格的专机从拉森堡飞返柏林。由于他的飞机上没有长波电台，而他本人又专注于即将要在首都采取的行动，虽然他除了远远看见会议厅被炸弹轰塌之外，对会议厅的实际伤亡一无所知，他对未来还是有着很高的期望。这次行动的关键在于，由后备军总司令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指挥的陆军部队要能够控制住柏林，弗洛姆也是他们小组的成员（虽然不是一个特

乌利希·冯·哈塞尔（1881～1944），政变失败后被处决。

别坚定的成员）。他的部队已做好了行动准备，命令他们备战的借口是镇压外国苦役劳工的暴乱。

但不幸的是，在柏林本德勒大街等待施陶芬伯格的消息的合谋者们显得有些慌乱，而这一点无疑是致命的。

因为和拉森堡的联系中断，没有人知道希特勒到底是死是活。弗洛姆没有采取行动，而其中最大的失误是没把党卫队的关键人物马上抓起来。拖延无疑是致命的，施陶芬伯格向计划的指挥者弗里德里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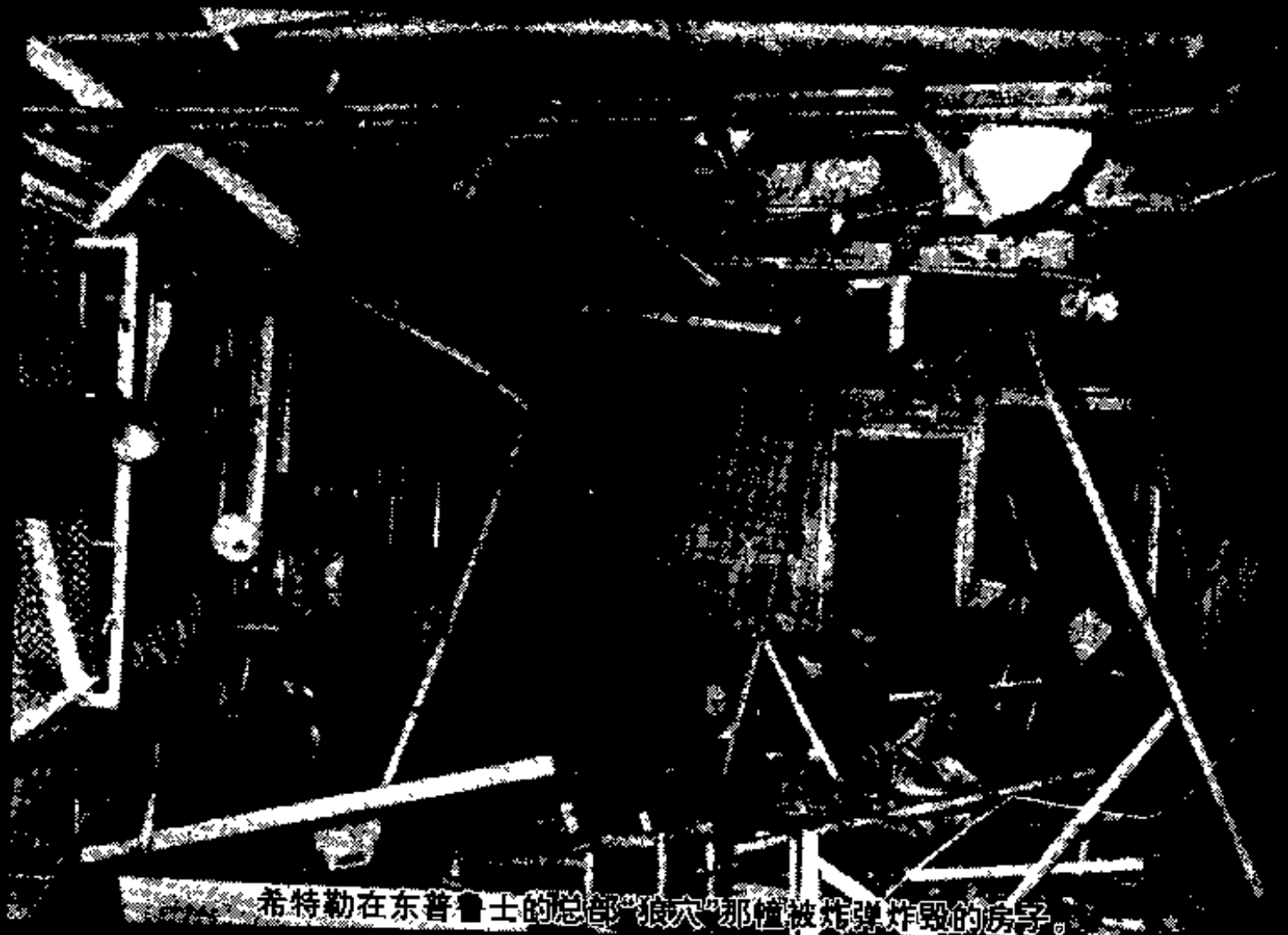


奥尔布雷希特将军(后备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保证希特勒肯定已死,并要求立即开始名为“瓦尔凯雷”的行动,攻占柏林。奥尔布雷希特直接找到了弗洛姆,要他行动,但弗洛姆关心的是保住自己的命,他拒绝下令部队进行任何行动,除非他自己能肯定希特勒确凿无疑地被炸死了。当夜幕降临柏林后,弗里德里希·弗洛姆越来越觉得恐惧,光是装作忠于希特勒是不够的,因为肯定会有许多证人证明他的不忠。虽然时机已晚,弗洛姆还是做了一件其它参与合谋的人没有做的事,他行动了。但他做的是马上建立一个临时军事法庭,审判那些阴谋者,奥尔布雷希特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奥伯斯特·冯·凯尔海姆(施陶芬伯格后来说:“我是不会想到奥伯斯特的名字的。”)以及冯·海尔弗顿中尉被判处死刑。贝克被捕时曾试图自杀,最后却被本德勒斯卫兵连的士兵一枪打在脖子上而一命归西。最后,在凌晨半点左右,被捕的阴谋者们被带到了一个建筑工地的沙堆前,汽车的前灯都明晃晃地照着,奥尔布雷希特最先被处死,然后是施陶芬伯格,接着又轮到了梅茨·冯·凯尔海姆。

如果弗洛姆能做到的话,他本来是想把所有会对他不利的证人全部枪决的,但他来不及这样干了,因为瓦尔特·胡彭科德恩带领盖世太保赶到了本德勒斯大街,他带来了希姆莱的命令:处决马上停止,必须等到审讯出阴谋者们的目的以后再说。而希姆莱现在已奉命行使后备军总司令的职权,负责审问的不仅是希姆莱,还有此间一直呆在柏林的约瑟夫·戈培尔,审判庭就设在戈培尔在赫尔曼·戈林

威廉·路斯齐纳,克雷索小组成员,因参与计划被处决,本来他是预备在推翻希特勒后出任哥尔德勒政府的副总理的。





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总部“狼穴”那幢被炸弹炸毁的房子。

谋杀希特勒事件后，戈林匆匆赶到现场查看当时希特勒等人开会所用的会议桌，双手叉腰的是党卫队将军赫尔曼·菲格伦，卡尔·柯勒等将军正在观看。







希特勒特别吩咐人拍摄自己前往探视在爆炸中受伤军官的照片。他那次大难不死，使他更加深信上天注定要他领导德国走向胜利。

“为德国而死”。本德勒斯大街为纪念纽莱事件的部分死难者而设的纪念碑，这些死难者是：贝克、因尔布雷斯特、施陶芬伯格、凯尔海姆和崔夫顿。这条街现已改名为施陶芬伯格大街。



放炸弹的人的兄弟赫斯特·施陶芬伯格正在美国，他的两旁都是他的兄弟。大多数参加纽莱事件的人，包括许多德国人，被苏军处死。



大街的官邸里。

戈培尔手下的一个新闻官员战后作证说，弗洛姆已被吓坏了，他不断地抗议说他是忠于希特勒的，但戈培尔马上吼叫着打断了他：“你杀对你不利的证人，实在是杀得太快了！”弗洛姆背叛合谋者并未给自己带来多大好处，虽然他多活了一段时间。第二年3月，他还是被处死了。

7月21日凌晨1点刚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开始通过电台向全德意志人民播送，他的声音虽然有些发颤，但还是能很快辨认出来。他不容置疑地判定了阴谋者们的命运：“这一次，我们要按纳粹党人习惯的方式来和他们算帐！”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开始了，其中包括2个国防军元帅和16个将军。

德军西线的司令官冯·克鲁格元帅曾答应“如果计划顺利的话”就发兵援助，现在却倒戈一击，谴责那些阴谋反对希特勒的人。在巴黎，有计划要发动一次行动，开始时似乎还进展得不算太坏，“大巴黎区”的司令官汉斯·勃瓦利堡命令第一警卫团第二连的士兵占领了盖世太保总部，包括党卫队头目奥伯格的私人住宅。

希特勒在爆炸中仅受轻伤，他右臂的伤势拖延了一段短时期。本图是他在爆炸发生之后不久，与墨索里尼（左一）、纳粹党办公厅主任鲍曼（左二）、邓尼茨元帅（左四）、戈林（左六）、希特勒情妇爱娃的姐夫菲基伦（右四）合影。





克鲁格元帅

奥伯格没抵抗就投降了，克罗齐紧随其后也投降了。看来，这次行动无懈可击，令人难以想象地成功了，1200多名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军官被进关了弗伦斯尼的国防军监狱。奥伯格和他的高级官员们被关在大陆酒家，生活似乎还不坏，但前景可不怎么光明，军事学院的大操场上已堆起了行刑队用作枪座的沙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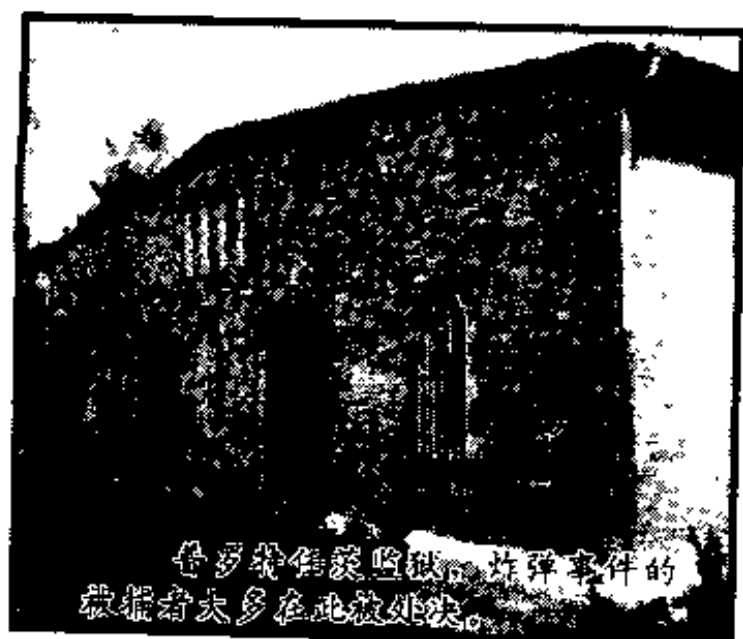
但并不只有奥伯格和克罗齐处在危险之下，起事者们的坏消息也接踵而来。

克鲁格最终还是变脸了，他向柏林告发了卡尔·施普尔普纳格尔将军，但这种懦夫的行为并未能使克鲁格开脱，也更未能得到希特勒的感激。希特勒以未能及时发现阴谋为由解降了克鲁格的职务，据说是因为害怕人民法庭和它那身着红袍的罗南德·弗雷斯勒，克鲁格于8月9日服毒自杀。不过根据1978年出版的波兰抵抗战士莫卡查斯基的回忆录，克鲁格是被党卫队队长吉根·斯杜朴开枪打死的。斯杜朴是一个高级警察统领，他是奉希姆莱之命行事的，莫卡查斯基曾被波兰共产党人把他和斯杜朴关在一起，是斯杜朴本人告诉他杀死了克鲁格的。

那些急于占领各主要建筑的起事者忽视了一个小小的党卫队电报站，一些



普罗特任茨监狱的断头台



萨克森施潘根堡监狱，炸弹事件的  
被俘者大多在此被处决。

党卫队军官从这儿把消息发到了柏林，而且，起事者们的支持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坚定。特奥多尔·克伦克海军上将对起事者们的行动感到狂怒不已，他把他的 1000 人马武装了起来，组成一些分队，并宣称要

去进攻各监狱，把被俘的人放出来；诺曼底前线德军一部分装甲部队也威胁要掉过头来进攻巴黎。

施普尔普纳格尔失败了，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起事者们不无遗憾地把关起来的人又释放了，施普尔普纳格尔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他希望把奥柏格等人释放出来后，双方能喝着香槟解决争端，消除矛盾。他似乎相信起事者和受害者可以一起把这事瞒下来，毕竟巴黎的老百姓并不知道在这些德国统治者之间发生了什么古怪的事。他的错误是悲剧性的，天亮以后，希特勒的报复就开始了。施普尔普纳格尔将军被迫返回德国，在那儿等待他的是逮捕和人民法庭的死刑宣判，他要求走过凡尔登的那条路，1916 年他曾在那儿指挥一个连队。到凡尔登时，他让司机把车停下，说要去看看昔日的战场，然后下车走得远远的，直至身影朦胧。

司机忽然听见一声枪响，跑上去发现施普尔普纳格尔正漂在一条运河里，他企图自杀，却只是把自己的双眼打了出来。无助的施普尔普纳格尔于 8 月 31 日在普罗特仁斯监狱被处死。

那时人民法庭已经开始审理最初的 8 个案子，被起诉的人中包括：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国防军元帅（本来是提名他政变后担任国防军总司令



维茨莱本元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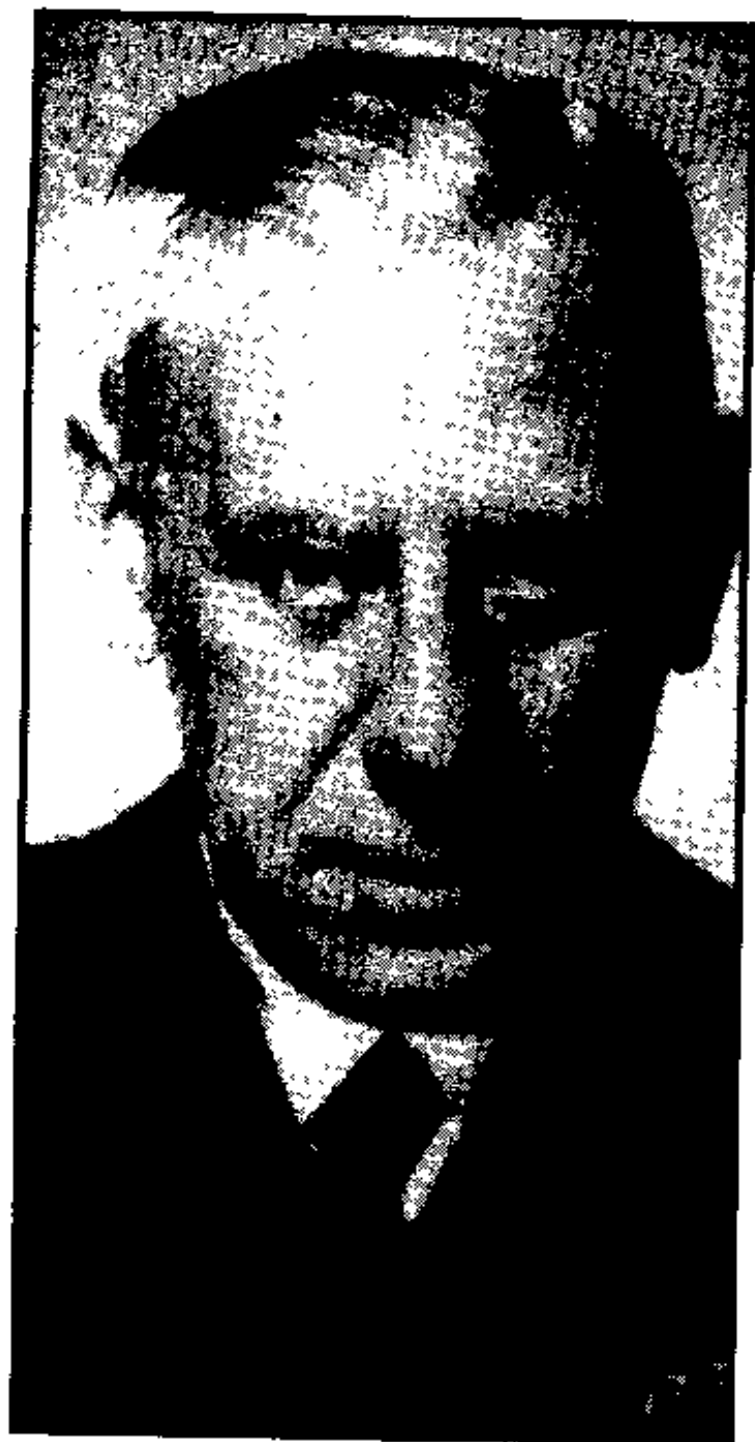


维茨莱本元帅正在接受审讯，他的裤带已被法庭抽去，所以他不得不始终用手提着裤子以防其掉下来。希特勒就是这样羞辱反对他的元帅和将军们。

的)、艾里希·霍普纳中将(在政变的计划中，如果弗洛姆拒绝发兵的话，将由他来担任后备军总司令一职)、总参谋部设在东普鲁士的组织机构的长官海尔姆特·施蒂夫将军、柏林警备司令冯·哈斯、还有克雷索小组的主要成员约克·冯·沃腾伯格。

希特勒命令新闻制片人员把整个审讯过程拍下来，这样，红衣法官弗雷斯勒就获得了在摄像机镜头前面表演一番的机会。囚犯们只要一开口为自己辩护，法官就要喝止他们，他们全被宣布为叛徒和怯懦的暗杀者。最后，弗雷斯勒宣布这8人犯有背叛元首及其追随者、背叛德国人民的最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卡尔滕布鲁纳和他的盖世太保部下刚把起事者们送进监狱，那些职业折磨者就开始收拾这些全身伤残、士气低落的可怜人。审判宣布过后，希特勒下令2小时之内把他们处死，他的原话是“像牛一样地吊死！”这些人确实是这样死去的。行刑者先喝一些白兰地壮胆，因为摄像机要把处决过程全拍下来，希特勒要以此泄愤，



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一直是外国与谍报局局长，虽然他宣称自己是个纳粹死党，但他参与了反希特勒的运动。他在炸弹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始终不是很清楚，但他还是被逮捕并被绞死于弗罗森堡集中营。

好把上面一个绳套挂在天花板下的钩上；然后囚犯飞快地落了下来，他脖子周围的绳子崩得紧紧的。我认为，他马上就死过去了。

第一个人被处决后，马上在他前面挂上了一道窄帘，这样第二个要被处决的人就看不到第一个……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很快被处死了。每一个注定要死的人都挺起胸膛，带着男人气概走过了他

而囚犯都是赤裸着身子被处死的。希特勒总部曾放过这个纪录片，而拍下来的照片在8月18日以前一直陈列在希特勒的地图案上。当时那间行刑室被一道黑帘一分为二，天花板下有根很长的钢绳，上面并排挂着一些挂肉的钩子，那些囚犯就在这些钩子上被细绳吊死的。

行刑开始前，公诉员在前厅里先对被判刑的人重念一遍判决书，然后又念道：“被告，你已被德意志人民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方式为绞刑。行刑队，开始行动！”

有一个纪录片摄像师后来写道：

那个被告人高高地昂着他的头，走到行刑室的另一端，虽然刽子手一直在催他走快一点。到那儿后，他被迫做了一个向后转，然后麻绳套子套到了他头上；刽子手接着将他举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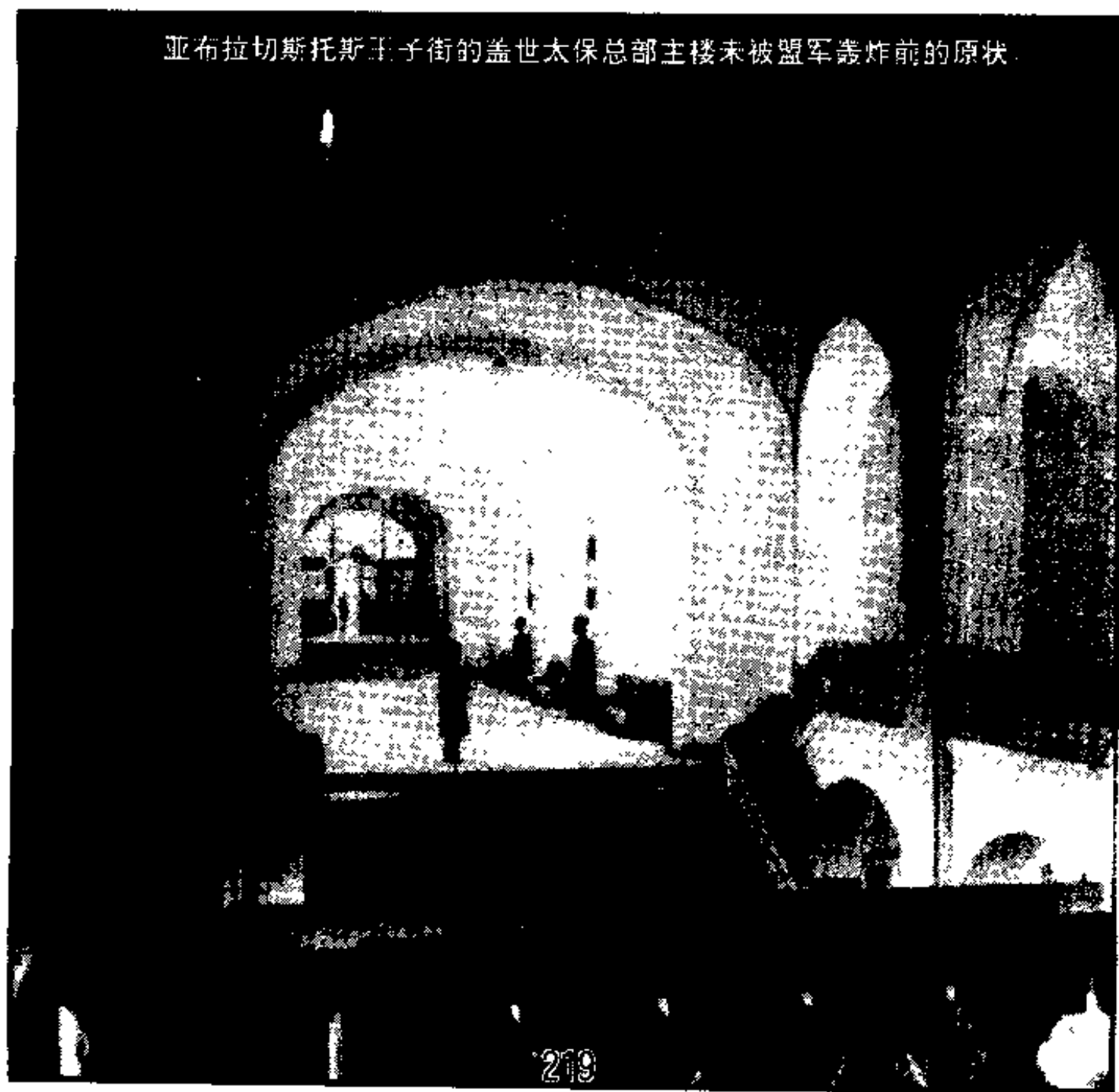


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无一字怨言。

元首的报复欲并未因此得到满足。希姆莱很快在柏林发起了一场报复运动，他派遣 400 人作为穆勒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员，并下令盖世太保挖出每一个与政变有关，甚至只是稍微对政变表示了一点同情的人。盖世太保的行动组在第三帝国境内的每个角落大肆搜捕，甚至抓了一些完全无辜的人。通常，这些人从此都开始了一个相似的恐怖历程：先被关进盖世太保监狱，然后被弗雷斯勒和他的人民法庭送上绞架，或者是送进集中营。

很多无情追捕“叛徒”的人后来自己也变成了“阴谋者”，只要他们与任何一个反希特勒的人或组织有一点联系或仅仅只是事先

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街的盖世太保总部主楼未被盟军轰炸前的原状。



知道一点情况，他们就完了。对有些人来说，这次政变是个绝好的升官的机会；但大多数努力追捕“叛徒”的人这样做并非因为无限忠于元首和祖国，而是为了保住自己。

就瓦尔特·舒伦堡来说，推动他的却是个人的野心。在他的计划里，根本就没有德国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那样的情报机构或卡纳里斯式的独立军事情报机构存在的余地，他想象的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一个以他为首的大日耳曼情报机构。他的这种希望，在海德里希死后大大加强了。

舒伦堡知道卡尔滕布鲁纳是喜欢一个统一的情报网的。他也知道自己过去的表现一直不错：先是在穆勒指挥下，就职于盖世太保的反间谍机构；1941年6月，对俄国的进攻开始时，他已经接管并重组了这一反间谍机构。下一步要做的事非常显而易见。因为自盖世太保情报机构加紧对德国内生活各方面的控制以来，它已经开始和德国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争锋相对了，虽然上峰命令这两大机构应通力合作。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的人素来讨厌盖世太保的做法，他们在有些场合也公开过这一点。

舒伦堡知道自战争爆发以来，海德里希就在整理施渥尔茨·开普勒（黑色乐队）的档案，这些档案表明卡纳里斯曾把和平试探使者派到过梵蒂冈。

但那时候把卡纳里斯揭露出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会影响国防军的信心，海德里希只满足于继续收集卡纳里斯的资料，但他的警惕性从未放松过。1944年7月炸弹事件后，希姆莱和卡尔滕布鲁纳执行了一系列恐怖政策，但卡纳里斯还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这一次仍能涉险过关。但盖世太保很快找到了对他不利的证据，卡尔滕布鲁纳的调查员在外国与反间谍局总部的地下室保险柜里找到了那份致命的文件，他们还搜到了贝克的非常详细的笔记和卡纳里斯本人的一个日记簿，其中除了他与梵蒂冈接触的细节外，还有足以引起轰动的发现：奥斯德和其他一些人曾故意泄露德国最高司令部对法国和低地国家的人侵计划。

1945年2月14日，外国与谍报局被希特勒下令解散，它的残余部分被盖世太保宠大的机构所吞并。希特勒同时授予盖世太保情报机构境外活动权，卡纳里斯失去了他的职务。同时，希姆莱和穆勒下令逮捕卡纳里斯和汉斯·奥斯德中将，后者已遭到了软禁。

卡纳里斯精于各种审问之道，刚开始审问他时，盖世太保们没有能问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曾有一段时间，他的情形也类似于被软禁，那些仍然很尊敬他的卫兵对他很不错。一旦被转到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大街后，给他的食物马上减到了监狱正常标准的1/3，他的睡眠也常被不断的、毫无必要的安全检查打断。这个在海军的显赫生涯可以追溯到一战的老海军上将被迫擦洗监狱的地板，还得忍受卫兵的嘲弄：“嘿，水手，我肯定你没想到又一次擦上了甲板！”

与卡纳里斯有牵连的人在盖世太保的手下，日子过得还要艰难些，汉斯·冯·多纳尼博士就是他们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他曾是奥斯德的手下，担任外国与谍报局总部的法律专家。卡尔滕布鲁纳的手下发现他曾给逃亡的犹太人提供证件和资金，把他们当作谍报人员放走了。这个发现真是盖世太保的意外之喜，因为1938年多纳尼就上了他们的黑名单，那时他曾帮助揭露了布隆伯格·弗里茨事件中盖世太保的阴谋，另外，还发现他和反希特勒的阴谋集团过往甚密，其中包括前陆军总参谋长贝克，还有莱比锡市市长卡尔·哥尔德勒，他参加起事的最突出的非军人之一。

被囚于柏林的泰格尔监狱后，多纳尼对自己的命运已不存幻想，他认为自己能做的最佳选择就是尽量拖长审问过程。最后，他服下了他妻子从监外偷偷带进来的药品，心脏病忽然发作，还引发了腹泻和局部瘫痪。

他采用这种拖延措施确实是低估了瓦尔特·霍本科德虐待狂发作时的残酷本性。霍本科德是老盖世太保，卡纳里斯曾说他“僵硬、单调而且没有人性”，他看到多纳尼的状况后宣布：“让他坐在

自己的粪便上哼吧！”多纳尼和彭霍费尔一起被转到了萨克森豪森的集中营，后者是一个新教牧师，曾与国防军外国与谍报局合作，试图寻求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战后，在1955年10月奥格斯堡法院审判霍本科德和奥托·索贝克时（后者是一名党卫队法官），发现卡尔滕布鲁纳曾向穆勒传达过一道元首的命令，那道命令要求：“1945年4月6日，在萨克森豪森召集一个临时法庭审判多纳尼，由霍本科德担任公诉人。”这个所谓的法庭由3名法官、一名党卫队分队长和集中营司令担任法官，就设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战后审判霍本科德时，他宣称对穆勒的计划提出过反对意见，但这是否属实，已经于事无碍了。

汉斯·多纳尼当时仍处于瘫痪状况，是党卫队士兵用担架把他抬进法庭的，他早已病入膏肓、奄奄一息，而且不允许为自己辩护。霍本科德宣读了几条罪状，开始了这个可笑的审判，把这个让人恶心的丑剧一直演到了夜晚降临，然后他们休庭合议、判决，不用问，是绞死。1945年4月19日（也有可能是前后几天），汉斯·冯·多纳尼被送上绞架，仍然是用担架把他送上去的。

在此之前，美军轰炸机在2月份轰炸了纳粹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总部，使得牢房的水、热、电供应全部中断，穆勒下令把犯人转移到能避开盟军空袭的地方，彭霍费尔就是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的第一批囚犯之一。卡纳里斯、奥斯德以及前奥地利总理冯·舒施尼格和其它一些人被送到戒备森严的弗罗森堡集中营，那儿曾是德捷前线阵地。到这儿后，犯人日夜戴着镣铐，不准收发信件，唯一的好处是食物比原来要好一些，这可不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让他们活下去，能接受以后的审问。

对卡纳里斯和奥斯德的审断甚至违反了第三帝国的法律，因为他俩是武装部队成员，党卫队法庭对他们没有司法权。但这种区别那时是没有人理睬的。卡纳里斯被指控自1938年以来，就清楚政变的计划，而且隐瞒了外国与谍报局中奥斯德小组的活动；此

外，他还怂恿其他军事领导人叛乱，对梵蒂冈的秘密谈判，他也被判为知情不举。他们两人均被判死刑。

审判过后，卡纳里斯拖着沉重的镣铐，又被带回了牢房。党卫队军医赫尔曼·费希尔博士目睹了1945年4月9日的这场审判，他事后回忆道：“卡纳里斯、奥斯德和彭霍费尔（他后来也被转到了弗罗森堡）等被判决了的人一个个被带着穿过空地，来到绞刑架下，然后被迫爬上绞架的梯子，绳圈套在他们脖子上后，盖世太保抽掉了下面的梯子。”尔后他们的尸体被担架抬到了柴堆上，烧为灰烬。

在这以前，埃尔温·隆美尔国防军元帅，德国国防军和德国人



隆美尔与其妻子露茜和儿子曼弗雷德在家中。

刺杀希特勒的爆炸事件使希姆莱(中)大权在握，  
隆美尔元帅(中)丧命、施密特将军(右)被捕。





民的偶像，也已经死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暗杀希特勒，但可以查知他知道起事者们的计划。

希特勒给了这位元帅两种选择：一是服毒，这样他的家人会得到保护；二就是接受逮捕和人民法庭的审判。他选择了前者，他的葬礼是按照国防军元帅应享的规格来举行的，希特勒还给隆美尔的妻子露茜拍了一封哀悼电报。

其他参予起事的人的命运颇有些侥幸。因为人民法庭手头的案子数量实在太太，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拖延。法宾·冯·施纳布伦朵夫是参与起事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国防军军官，国防军起事者们与国防军反间谍局之间的联系正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他直到1945年2月3日，才被送上人民法庭接受弗雷斯勒的审判。柏林令人感觉不样的空袭警报不时打断审判进程，一批美军的B-17轰炸机投弹后，法庭大厅被炸塌了，弗雷斯勒被一根木梁击中，颅骨碎裂，倒下去时手中仍紧紧抓住施纳布伦朵夫的卷宗不放。他被送进医院后不久就死了。

施纳布伦朵夫借机获得了暂时的自由，但不知疲倦的盖世太保又把他抓了起来，而且向他保证，这一次将对他表示极大的宽容：不绞死他，在弗罗森堡枪毙他就行了。美军在行刑前及时赶到弗罗森堡，救了他一命，但在此之前，他在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大街受尽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折磨。盖世太保先是用一种极为精巧的机器把金属条打入他的十指之间，把他的双手撕裂，然后“他们把我捆在一个包了毯子的架子上，然后把两个圆筒套在我腿上，这些圆筒里面全是钉子，然后用劲在我的光腿上推来推去。圆筒上还有



一个旋转的机械装置，可以把圆筒管越收越窄，直到我的大腿和膝盖全被钉子刺穿为止”。除了使用这些中世纪的刑具以外，“警督和警长们一起从后面冲过来，用大棍猛击我的后背，我每挨一下都要往前倒，因为我的双手是反绑着的，我每摔一次脸就重重地砸在地上一次。”

另一个起事者约瑟夫·穆勒是一个律师，他曾代表外国与反间谍局前往罗马，劝说教皇为反希特勒者和英

国人充当和平谈判的中间人。从1944年9月到第二年2月，他也被关在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大街的监狱里，他描述过那儿的状况：

我在牢房中常听到从上面传来可怕的尖叫声，通常要持续很长时间，然后慢慢地变成微弱的哼哼声……那些尖叫是如此之痛苦，我想肯定是被折磨者发出的……我的双手总上着铐，而那手铐的内表面是如此之粗糙刮人，只要我动作稍微大了一点，它就会把我腕上的汗毛给扯下来。日夜都被绑着，总觉得饿，而晚上又用聚光灯照在犯人的脸上，所有这些使人神经持续紧张，更不用说还有动辄长达几个小时的审问和可怕的刑讯了。

柏林的警察系统里产生了不少反希特勒计划的积极支持者，沃尔夫·冯·海尔道夫是其中较为出名的一个，过去10年中，他一直担任首都的警察总监。和他经常联系的人中，有两个是第三帝国的最狡猾的幸存者：亚瑟·勒比和汉斯·格塞维斯。

勒比是第三帝国刑事警察组织的头子，从1938年以来，他就扮演着一一种双重身份，和反对者们的组织时紧时密。他按自己的本



亚瑟·勒比于1945年1月因卷入7月炸弹事件而被捕，后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能来选择一条最不危险的道路，他按照希姆莱的旨意行事时经历的良心不安并没有妨碍他成为敌后突击队B的头子，这个组织是德国在苏联的国防军集团军里活动的。格雷维斯是盖世太保成员，后来参加了反对者们的组织，曾代表外国与反间谍局和设在瑞士的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的亚伦·杜勒斯建立了有效的联系。

在政变后的初期阶段，勒比参与了对起事者的无情追捕，但海尔道夫被捕后，勒比知道大事不妙了。盖世太保肯定会把他挖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只有两样东西可以借助了：他的专车和柏林的灯火管制，他决定利用这两个条件逃出柏林。

1944年8月23日，党卫队军官韦尔维签发了一份内参：“现知勒比失踪已达数周，此事将由盖世太保情报局负责调查。”盖世太保的通缉令上写道：“亚瑟·勒比，现年49岁……可能已化名为弗里德里希·施瓦茨博士。此人身高1.77米，脸型削瘦而有轮廓，灰色卷发，脚穿黑色皮鞋，随身携带了一个行李箱和一个有两条带子的公文包。有在7月24日后看到此人并提供详情的，可获5万帝国马克奖金。”

11月30日，党卫队领袖希姆莱给党卫队人事局下令，将勒比开除党卫队，他补充说道：“已发现的文件和其它调查结果表明勒比和发动7月20日政变的人一直过往甚密，他早已背叛了元首而转而支持政变者。”1945年1月16日，勒比的好运结束了，他的一个女朋友出卖了他。盖世太保把他抓住并送上了人民法庭，在那儿他被判处死刑。

格雷维斯后来发现自己在错误的时间呆在了错误的地点：拉森堡爆炸案后5个月，他仍呆在柏林。亚伦·杜勒斯开始并不太信任格雷维斯，但他慢慢地把格雷维斯当成了一位可靠的盟军联络员，觉得有必要把他解救出来。那时的德国，由于盖世太保的恐怖政策，几乎是人人自危。对德国人来说，他们觉得美国人又无法伪造必要的证件让格雷维斯逃出来。

1945年1月，当格雷维斯神经已快崩溃时，他获得了新生的

机会，以后，一切进行得像荒诞不稽的小说里虚构的情节一样。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听见车开来，跑了出去，却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开了过去，但信箱里多了一个大信封。我从里面先找出了一个厚金属证章——大名鼎鼎的盖世太保执行局金属证章；然后我又发现了一本有我照片的德国护照，写的名字是霍夫曼，并标明我是盖世太保的高级特工；还有一封盖世太保总部签发的信件兼通行证，上面要求德国政府和纳粹党的所有官员协助我完成到瑞士的使命。”

证章和护照都是大师级的伪造品，只有上面的照片让格雷维斯有些紧张，那是一张缩小了的全身照，而盖世太保们一般使用只露出头和肩的半身照，但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格雷维斯靠不断出示他的盖世太保证章而混出了柏林，两天以后，他总算到达了克鲁日林根的边防哨所。此时，他还穿着那个倒霉的7月20日穿的西服，头上的帽子是借来的，一点不合适，整个人显得狼狈不堪。他后来不无臧楚地回忆说，他自己的帽子给了亚瑟·勒比。

也许是天公之意吧，边境线上疲惫不堪的德国军官只是随便看了看他的证件，而同样疲惫不堪的格雷维斯则利索地给这位军官敬了一个纳粹礼，这也是他告别希特勒德国的礼节。他下一次正式出现时，是在纽伦堡审判庭上担任起诉方证人。

# K

## 清算与代价

即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希姆莱仍紧抓手中的权柄不放，做着向被中央保安局这台恐怖机器控制的附属国快速撤退的美梦。作为德国最有权势的官员，党卫队及警察头子与内务部长的希姆莱，遮护其上的是一层不可穿透的权力之茧。他以加强德意志主义为名，打着可怕的帝国部长的幌子，掌握着整个帝国的种族政策，他还是后备军的最高统帅。

即使如此，他仍害怕看到急剧变化的形势。盟军已经横扫法兰西进入莱茵河流域。苏联红军正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所有这些已经表明德军正在衰弱并走向崩溃。

在无情的事实面前，希姆莱不得不思考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希特勒无法控制灾难性的局面，德国将何去何从？退一步讲，如果局面被控制住了，谁又能取代元首的位置呢？到1944年，希姆莱逐步走向叛国之路，慢慢地与反纳粹分子取得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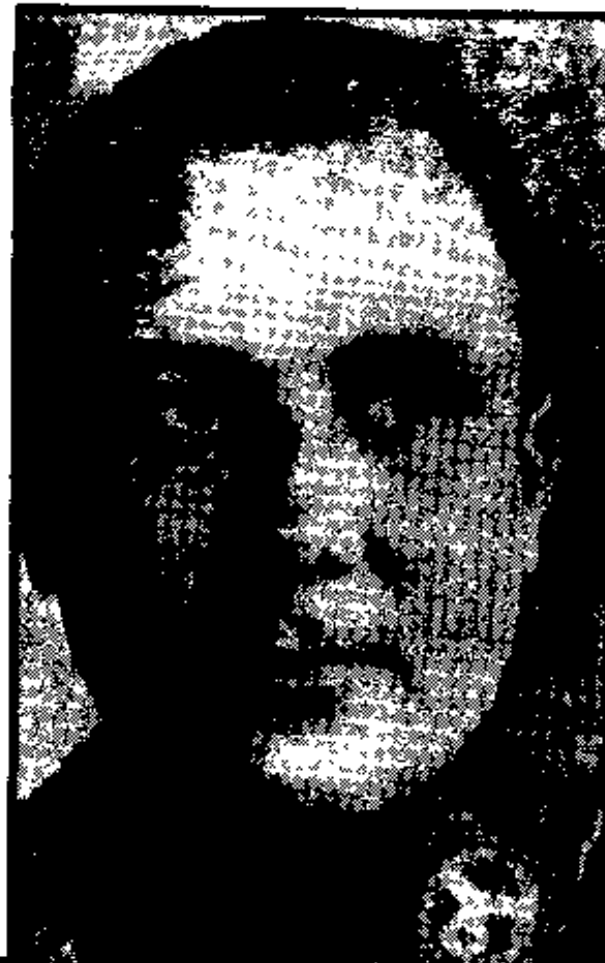
波比兹教授

与他经常保持往来的一个柏林律师叫卡尔·兰本恩。卡尔·兰本恩住在希姆莱官邸附近的一座别墅里，兰本恩的女儿和希姆莱的女儿曾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兰本恩曾多次暗示他不是纳粹德国的崇拜者，希姆莱也就轻易发现了这一个反纳粹分子。兰本恩曾与另一个主要反纳粹者——约翰尼斯·冯·波比兹教授联系过，波比

兹被指定为希特勒倒台后接任政府班子里的财政部长。

早在1943年，希姆莱就在内务部办公室见过波比兹。波比兹认为德国不可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最好的结果是相持不下，最坏的结局则是全盘皆输。他还相信英国和美国在战后将举行谈判，因为两国都害怕战后共产主义的流行。希姆莱从教授两只无边框的镜片后放射出来的苍白的眼神中将其视为一个无个性的人，而波比兹则感到他的思想观点并没有被希姆莱完全否定，他在给兰本恩的报告中保持乐观态度。兰本恩那时正往瑞士去探望他的西部联络员，不久，他就被捕牺牲了。

这种秘密的活动没能维持和延续多长时间。据瓦尔特·舒伦堡战后交待说，盖世太保截取了兰本恩与在瑞士的盟军代表的一份无线电情报。这份情报不仅牵涉到波比兹和兰本恩，而且牵涉舒伦堡本人。舒伦堡后来写道：“戈林的地位已或多或少地下降了。只有一个人仍掌握着足够的权力，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就是希姆莱。”海因里希·穆勒把关于兰本恩的材料转交给了得宠的马丁·鲍曼，鲍曼是纳粹党党务负责人（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和希特勒的亲信。希姆莱很想知道兰本恩的行踪。兰本恩被捕入狱，无疑也被盖世太保严刑拷问：与穆勒靠得最近的人必须交待希姆莱本人的活



动。很快，兰本恩就被送进集中营，令卡尔滕布鲁纳和穆勒鞭长莫及。1944年11月12日，兰本恩被处决。波比兹多活了些日子，盖世太保从他身上多拿到了些情报，随即于第二年2月将其处决。

对于希姆莱而言，看到叛国者的下场，他也不得不畏缩。希姆莱想用熟悉的党卫队万灵丹来魔术般地重塑世界新秩序，以避难所来逃避现实，但是，现实正一步步严峻起

马丁·鲍曼

1944年10月3日，在第三帝国人民法庭受审的波比兹(右)和兰本恩(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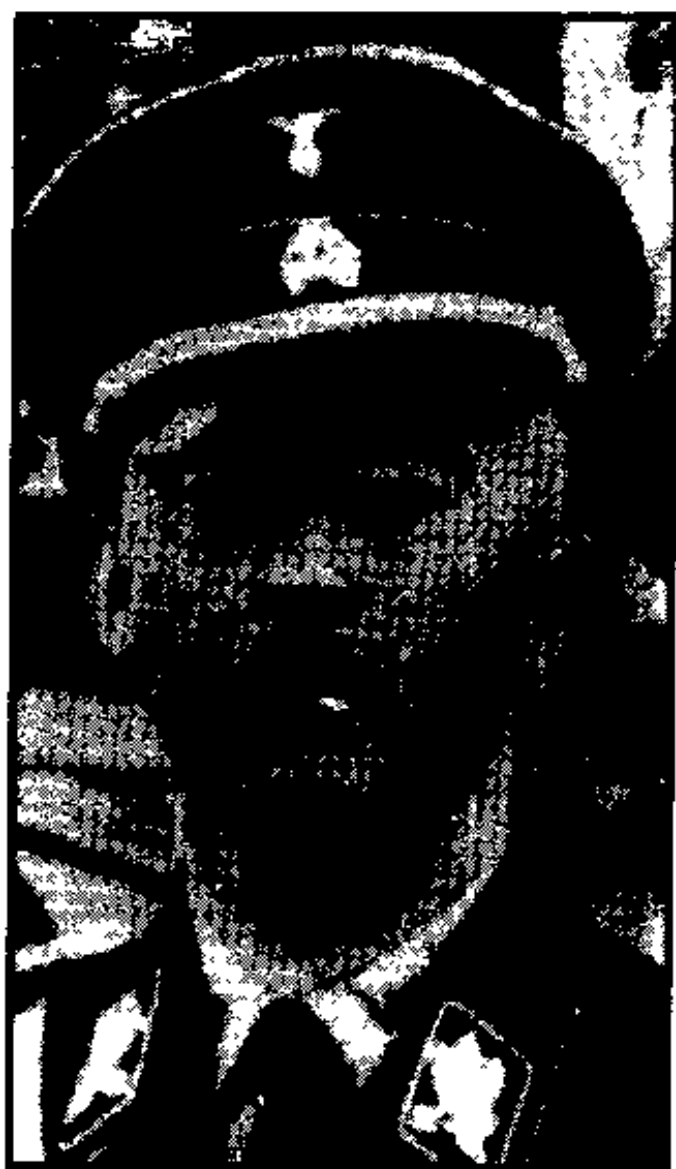


来。至1944年8月1日,苏联的前锋部队已攻克维斯杜拉,其侦察分遣部队已穿越华沙郊区地界。波兰部队此时已重装待发。华沙暴动于10月2日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波兰国内武装抵抗也以失败告终。

然而起义、反抗的烈焰是扑不灭的。除华沙暴动外,一个新危机又威胁着西线的后背。名义上独立的斯洛伐克地区又揭竿而起。党卫队保安处逮捕了反对派的领导者,而希姆莱列举了“武装党卫队”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党卫队大队长约瑟夫·威斯加博的支持下,纳粹德国驻斯洛文尼亚党卫队保安处和刑事警察头子贝格尔用4周时间就将这次暴动镇压下去了。斯洛伐克政府由一个傀儡政权变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影子。

盖世太保在6月20日镇压起义中表现得很出色,作为嘉奖和回报,它的权力也进一步扩张了。

这种情况在整个欧洲罄竹难书。1944年8月中旬,巴黎的盖世太保就像一只幽灵。卡尔-阿尔布里奇·奥伯格快速阅读了来自首都柏林的诉讼文件,为离开作最后的准备。不久,只有海默斯·诺钦及其工作人员得以安全转移。奥伯格认为他们的事业在这种情势下也必须继续。8月18日,他将1600名来自法国巴黎近郊贡比涅的囚禁者驱逐去德国。这只是奥伯格一个人在巴黎的独唱,而不是整个法国的情况。在同一天,奥伯格、诺钦和盖世太保剩存分子离开巴黎前往维特尔,建立临时的指挥所,这个地方是德国最高统帅部设计指定的,作为法国西部稳定的前沿。



战争后期,希姆莱爬到了权力的顶峰。

对前途无光的事业如此勤恳，并没给奥伯格之流带来多少回报，至少希姆莱没有表示感激之情。苛刻地讲，戈林使他们于6月20日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一齐被捕。他们的勇气和忠诚倒成了问题。卡尔滕布鲁纳接受了上司的谴责，提醒诺钦去柏林，在那儿，诺钦最后受命帮助组建当地新的党卫队保安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奥伯格打击了党卫队，结束了战争。

最后，他住在法国孚日省区的代尔街，后来他和随从人员被迫不断迁移，当他们穿越莱茵河时，投入了希姆莱的怀抱，当时希姆莱是上莱茵集团军群总司令，希姆莱将他收罗于武装党卫队中。1945年5月8日，奥伯格的工作转入地下：海因兹在靠近基茨比厄尔的克奇贝格和特洛林村庄有一段匿名时期但其实身份很快就恢复了。8月奥伯格被移交给法兰西政府。他后来被判除死刑，但直至1959年12月还未执行，最后的判决定为20年劳役。诺钦最初也是被判死刑，最后也改成劳役。

自1944年秋开始，盟军就看到纳粹德国失败的必然趋势，如果捣毁一些盖世太保组织机构，这一趋势将会大大加强。在英国特种行动执行组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发起下，对阿休斯的盖世太保指挥部实施集中轰炸的命令得到实施，阿休斯盖世太保指挥部里有关于抵抗运动的许多文件资料。这次空中轰炸

荷兰阿姆斯特丹盖世太保头目威廉·拉格斯。





英国蚊式飞机

意在破坏，不仅要捣毁那些资料，而且要消灭那里的盖世太保分子。这次空袭任务交由皇家空军的蚊式轰炸机中队第二战略空军组执行。该战斗组素以高速和灵活著称，非常适合这次任务。第二组曾成功地以低空飞行轰炸了亚眠盖世太保指挥部。

1944年10月31日，英国皇家空军3个中队的蚊式飞机，每个中队6架飞机，从北苏格兰飞往丹麦，突袭阿休斯盖世太保总部，将其文字资料炸为灰烬。在如期两周对阿休斯、凯温克霍恩的空中轰炸中，一位领导丹麦地区战略情报局工作的美国官员与英国第二战略空军小组的高级情报官员，就如何对哥本哈根谢尔赫斯地区盖世太保指挥部实施同样空袭进行了商讨。这个计划的密码代号为“迦太基”。

在准备空袭的过程中，面临着丹麦地区的抵抗，危险性十分明显。哥本哈根盖世太保已采取了三个重要举措——对许多抵抗团体的直接领导者的拘捕、对邻近地下武装的领导人的逮捕并扣留了一名与地下新闻机构密切联系的反抗者。这三个因素加剧了“迦太基计划”的紧要性。接管这项任务的18个蚊式飞行支队主要是轰炸谢尔赫斯的基地设施，避免对住在上层的囚犯造成伤害。

1945年3月21日，有“无畏者”战机护航的飞行队起飞。上午11点14分，3架飞机的第一次攻击波开始，炸弹准确地投落在谢

尔赫斯的地面。然而，第四攻击波的炸弹击倒了一根高高的电线杆，电线杆倒向邻近的亚克教会儿童学校的弗德克堡村林荫道上，86人死亡，包括42个躲在防空洞里的儿童和18个成年人。谢尔赫斯地区遭到的灾难要轻微一些。35个死者里包括9个丹麦囚犯，他们被关在顶层，还有26个住在低层的盖世太保分子。但是被炸死的盖世太保中没有这个地区盖世太保的头头们：甘瑟尔·潘克、卡尔·海因兹·霍夫曼和他的主要助手奥托·波文塞潘。他们恰好因参加一个葬礼，不在办公室而幸免一死。

即便如此，一位抵抗运动人士曾写信给伦敦，盛赞“全城都在为谢尔赫斯空袭欢欣鼓舞”。据可靠消息，有30个丹麦籍作为人质的爱国者获得了自由，其中有2名领导者。幸免于难的盖世太保仍试图马上重建其秘密档案材料，但一切为时已晚。

在挪威，纳粹分子仍冥顽不化，虽然他们知道离失败已经不远了。纳粹驻挪威全权代表特博文和警察局长威海姆·里得斯，重返斯高加姆这块从王储奥拉夫那儿征用来的豪华驻地，他们俩都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特博文明白他无法逃脱死亡的惩罚。而对里得斯来讲，他对在任职期间警察局犯下的酷刑和谋杀负有不可推诿的完全责任，而这足以对他进行判决。

接下来的是一幕幕黑色喜剧。特博文和里得斯都一直处于酩酊之中。里得斯勇气顿失，拿起手枪自杀了。特博文拖着沉重的脚走出私人花园的高尔夫球场，然后点燃了一颗炸弹的引线。一块块覆盖着鲜血的水泥板最后被悄然移去。

挪威警察局长和党卫队头目约纳斯·李，在奥斯陆摩纳加顿街19号无谓地努力去重建警察指挥部（中心）。这一计划失败后，他又返回奥斯陆郊区的一个农场上，将武器、弹药及汽油桶埋进沙坑。当四周围绕着地下抵抗运动者时，他也拔枪自杀了。

至1945年前几个月，荷兰人希望他们已经告别可怕的恐惧。但一个简单的事件将形势导向无可避免的流血。1945年3月6日深夜，一个抵抗者组织“荷兰核心”的成员射杀并严重伤害了当地



汉斯·阿尔伯特·罗托

德国秘密警察局的刽子手——汉斯·阿尔伯特·罗托。这件事并非有意而为，抵抗者仅仅想夺得一辆军车以为“荷兰核心”劫取粮食物品。不久，这次袭击事件遭到报复。死刑犯的定义也加宽了，不仅包括抵抗运动分子，还包括如斯科恩加斯所说的“抢劫者和破坏宵禁者”，后者出自受伤的罗托之口。

战后，罗托的伤还没全好，在法庭上，他为自己辩护说，他惩罚了斯科恩加斯，试图逃脱制裁。没有人相信他的话，1949年3月25日，他被处以绞刑。斯科恩加斯也被处决了。英国法庭在对他进行审判时确证，他于3月8日受希姆莱直接指令杀害了117名荷兰居民。德国中央保安局和在荷兰的德国代表处之间的电文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和斯科恩加斯之间联系的记录。所以，法庭认为斯科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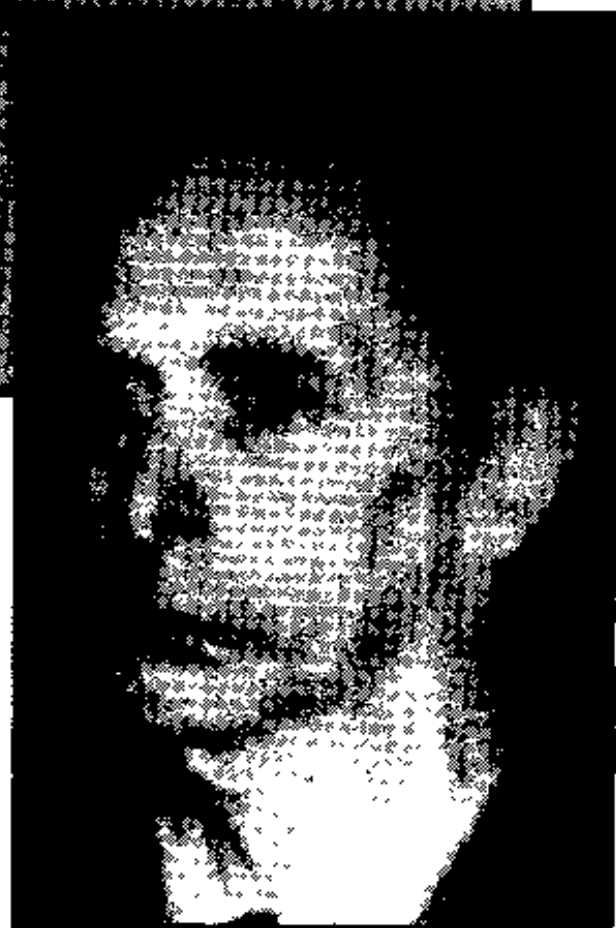
加斯凭自己意愿而无上级指令擅自实施了一些恐怖计划。

德国的形势在继续恶化，希姆莱加强反叛活动以尽早结束西线战争。希姆莱与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康特·凡克·贝尔纳多特举行过多次会晤。开始希姆莱非常谨慎小心，只是作出一些如释放囚犯的让步，但后来就一步步走向出卖元首的道路。最后，希姆莱甚至质问自己：希特勒的失败在所难免，他本人是否将成为自然的继承者？当然，东线战争仍在继续。贝尔纳多特将希姆莱的所作所



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成员为劫取粮食而炸伤了罗托，这是当时的枪击现场。

战后在法庭受审的罗托，1949年3月25日他被判处死刑。





为传达给瑞士政府，并通过它传递给艾森豪威尔将军。

无疑，这种谋划是荒诞的。而希姆莱的阴谋并不能使他安然无恙。不仅他的计划被盟军泄露出去了，而且这些材料也为华盛顿的路透社掌握了，他们立刻向全世界广播了这条新闻。

戈培尔手下一个职员恰巧从斯德哥尔摩电台上听到了这则消息，他立即向马丁·鲍曼汇报，鲍曼是个以搞阴谋为生的人。根据幸存者的见证，希特勒在苏联军队轰炸帝国总理府同时获知了这则消息。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希特勒的暴躁脾气又发作了。莱契形容当时的情形说，希特勒暴怒得像一头狮子，疯了似的将这则消息扔到每个人的手中，好像想得到事实真相。

希特勒的自怜转变为嗜血狂。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的姐夫、党卫队大队长赫尔曼·菲基伦将军，是希特勒和希姆莱之间的联络官，他每天两次到地堡去作军情简要汇报。有一次他缺席了，因为他想与一个女人找个地方躲起来。希特勒发现后，菲基伦被从地堡中拖出来，交给海因里希·穆勒审讯，这可能算是盖世太保的最后一次任务。莱



艾森豪威尔将军

爱娃·布劳恩



契稍后于4月28日离开了地堡，后来遇见了美国记者詹姆斯·奥丹纳，他说菲基伦被判了死罪并被处决。

莱契从柏林地堡逃出来后，地堡爆炸，大火从希特勒住地一直烧到柏林以北200英里的波罗的海岸边。与莱契一块逃亡的罗伯特·冯·格雷姆将军在希特勒的最后一次提拔中晋升为上将，他因重伤被困在地堡里，束手无策。在布隆，莱契和格雷姆惊奇地发现北部军队总指挥卡尔·



爱娃的姐夫赫尔曼·菲基伦，他也许是盖世太保的最后一个牺牲品。

邓尼茨海军元帅与希姆莱仍能和睦相处。希姆莱此时仍有一帮令人畏惧的党卫队随从人员紧跟着他，要逮捕他是不可能的。而且，邓尼茨和希姆莱一样认为只有戈林才是希特勒唯一当然的继承者。

直到4月30日，邓尼茨才得知，是鲍曼而不是希姆莱被指定为继承人。鲍曼甚至没有通知邓尼茨希特勒已于当天下午3点30分自杀。在记忆中，邓尼茨曾收到另一则命令：“新叛国者。根据敌方电台，希姆莱要经由瑞士投降。元首希望你能快如闪电、狠如钢铁，处置所有的反叛者。鲍曼。”

随着第三帝国濒临瓦解的边缘，邓尼茨很快将自己从公务中与希姆莱分离开来。他写信给希姆莱：

帝国部长阁下：

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决定撤销对你的帝国政府成员和内务部长、预备武装总指挥和警察局长之职的支持。现在，你的事务和机构已被取缔。非常谢谢你为帝国所做的工作。

不知道希姆莱收到了这封信没有。邓尼茨于 1945 年 5 月 23 日被捕后，盟军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这封信的复印件，但邓尼茨并未签署。

在德国投降前 15 天，希姆莱完全被架空了，毫无决策权。这个前党卫队领袖又重新回复一介平民的地位：一个奇怪的政治流浪者。被剥夺权力之后，希姆莱漫无目的地在乡间游荡，最后与秘书和随从定居下来。5 天后，他们向南穿过纽豪斯到布雷默沃镇去，在经过盟军军管地区时，他们被迫停下来接受盘查审问。希姆莱终于



德国投降后，希姆莱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开着车在柏林市郊到处逃跑，最终被英国第二集团军抓获。



希姆莱的尸体被裹在一块军毯中。

放弃抗争，被带到英国第二集团军总部吕内堡。在那儿希姆莱被捆绑着搜了身。

事发后，希姆莱在口香糖中加入了氰化钾。一名美国情报官员5月23日从蒙哥马利司令部赶来，并让医生检查了希姆莱的口腔，希姆莱坚决不肯服药，因此尽管医生拼全力想救活他，仍然无

济于事，他在12分钟后迅速死去了。这位前党卫队领袖、德国盖世太保头目、自称撒克逊国王的化身的纳粹枭雄，就这样在一块军用毯子上死去了。后来，他的尸体被一辆卡车

1945年5月23日，英国情报人员来到吕内堡关押希姆莱处调查其死因，结果发现这个装氰化钾的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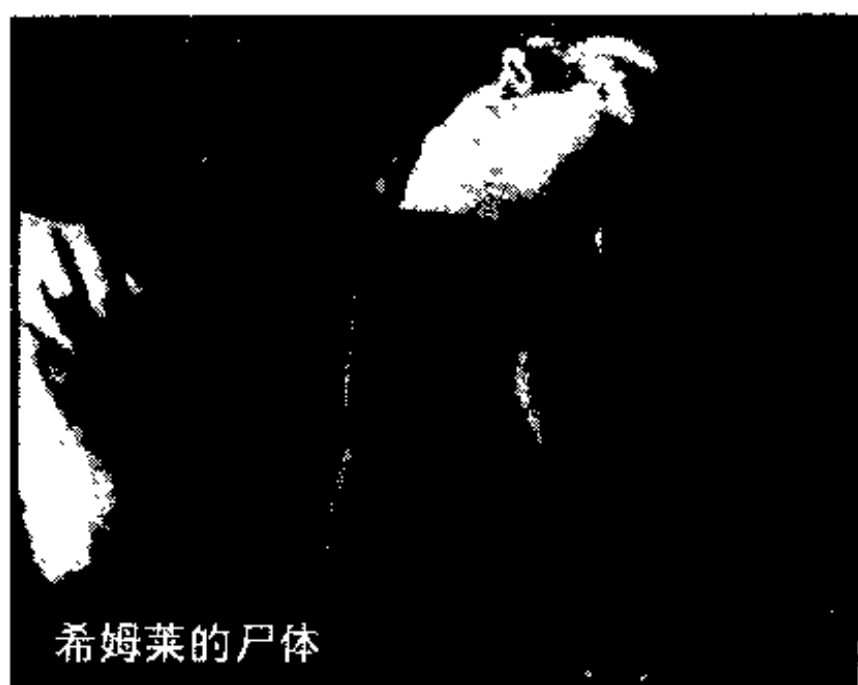
运到吕内堡的赫斯，埋在一个不知名的土堆里。

17个月以后，1946年10月16日凌晨4点，戈林这位前帝国元帅的尸体也被送出去埋掉。戈林的尸体被置于一辆载重量为2吨的卡车上送往火葬场，后面跟着一队

荷枪实弹的精干的美国兵。戈林的尸体上没有丝毫受过绞刑的痕迹。他成功地骗过了看守监狱的宪兵吞服氰化钾自杀。

在纽伦堡的审判庭上，戈林严辞抗辩，常常富有斗争性，偶尔又显得非常不安，希姆莱用种族灭绝的狂想将现实世界玷污得一塌糊涂，而戈林则大张旗鼓地过着安闲奢侈的生活。戈林自己也承认对此毫不在意，以第三帝国战时武器与装备部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的话来说就是：“他愿意在纸醉金迷中度过一生。”

然而，戈林不会忘记他是希特勒的指定继承人，一旦希特勒去



希姆莱的尸体



邓尼茨(右)与施佩尔(左)



在埋葬希姆莱的树林中，盟军偶然还发现了被纳粹杀害的数百名无辜者的尸骨。



32年后，当时负责掩埋希姆莱尸体的英国下士雷·威斯顿和比尔·奥特雷回到德国，来到希姆莱墓地。



世或无法维持统治，他将取而代之。戈林翻出任命书，于1945年4月23日致电希特勒说：“如果到今晚10点我还没有得到你的答复，我就认为你已失去行动自由，任命书满期生效。”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希特勒的严重失算所致。希特勒已无法控制局势，只得将职权转交给鲍曼，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戈林很快被削职夺权，他的空军部队转由雷特·冯·格雷姆接管。戈林被逮捕监禁后，试图派出使节代表他与最近的美国军队联系。他在此期间虽然服从拘禁，但仍把自己看作希特勒的全权代表。他想卖身求荣，和艾森豪威尔“一对一”地举行单独会谈，但这些努力都彻底泡汤了。

另一个超级纳粹战犯卡尔滕布鲁纳也和盖世太保们一块站在





1949年5月21日上午10时,当了3周德国元首的邓尼茨元帅(中)宣布投降,这是他与约德尔将军(右),施佩尔博士(左)步出被盟军随军记者包围的办公室。

一名苏联红军战士站在希特勒自杀后焚尸的土坑前。



戈培尔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为自己辩护。





在审判间隙,戈林在吃饭,他希望自己能在柏林像一个战士一样被枪毙。

服毒自杀后的戈林尸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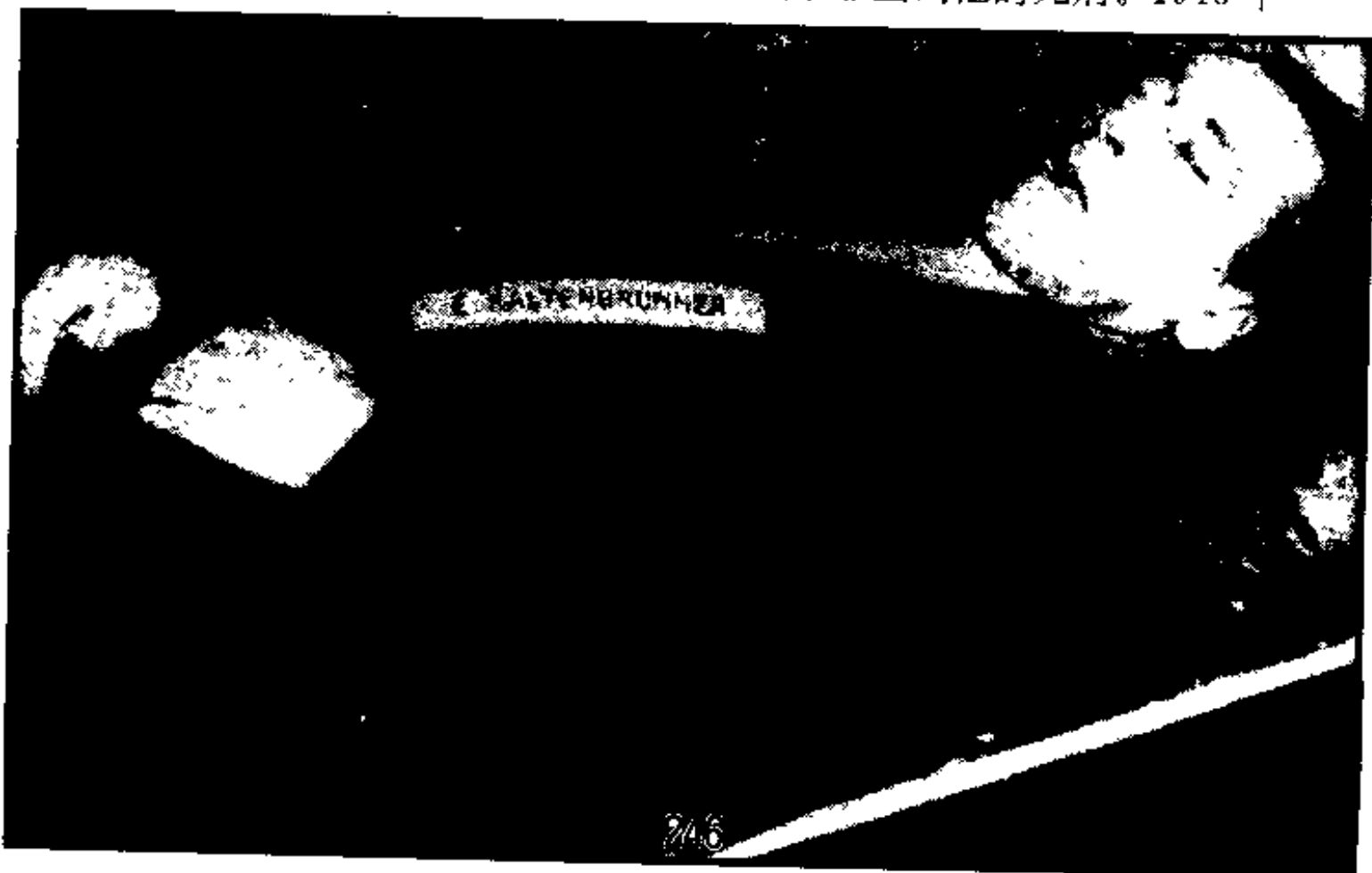


纽伦堡的被告席上，卡尔滕布鲁纳称“讨厌的大笨蛋”，曾将党卫队视为精英统治工具。在纽伦堡法庭上，戈林桀傲不驯、大言不惭、张狂吹嘘，而长着一幅凶残面孔的卡尔滕布鲁纳则痛哭流涕、俯首认罪，悲叹无人为他辩护，而他将不会得到公正的裁决。在经过一阵顽童式的反抗之后，卡尔滕布鲁纳提出抗议：“我仅仅履行了一个情报组织该履行的职责。我拒绝当希姆莱的替罪羊！”

卡尔滕布鲁纳面对一大批由自己亲自签发的命令和由中央或地方盖世太保发送的谍报，既不否认反驳，也不将这些罪责推到希姆莱和穆勒身上。他为自己辩护说，他只是被任命为中央保安局的头目负责重建帝国政治情报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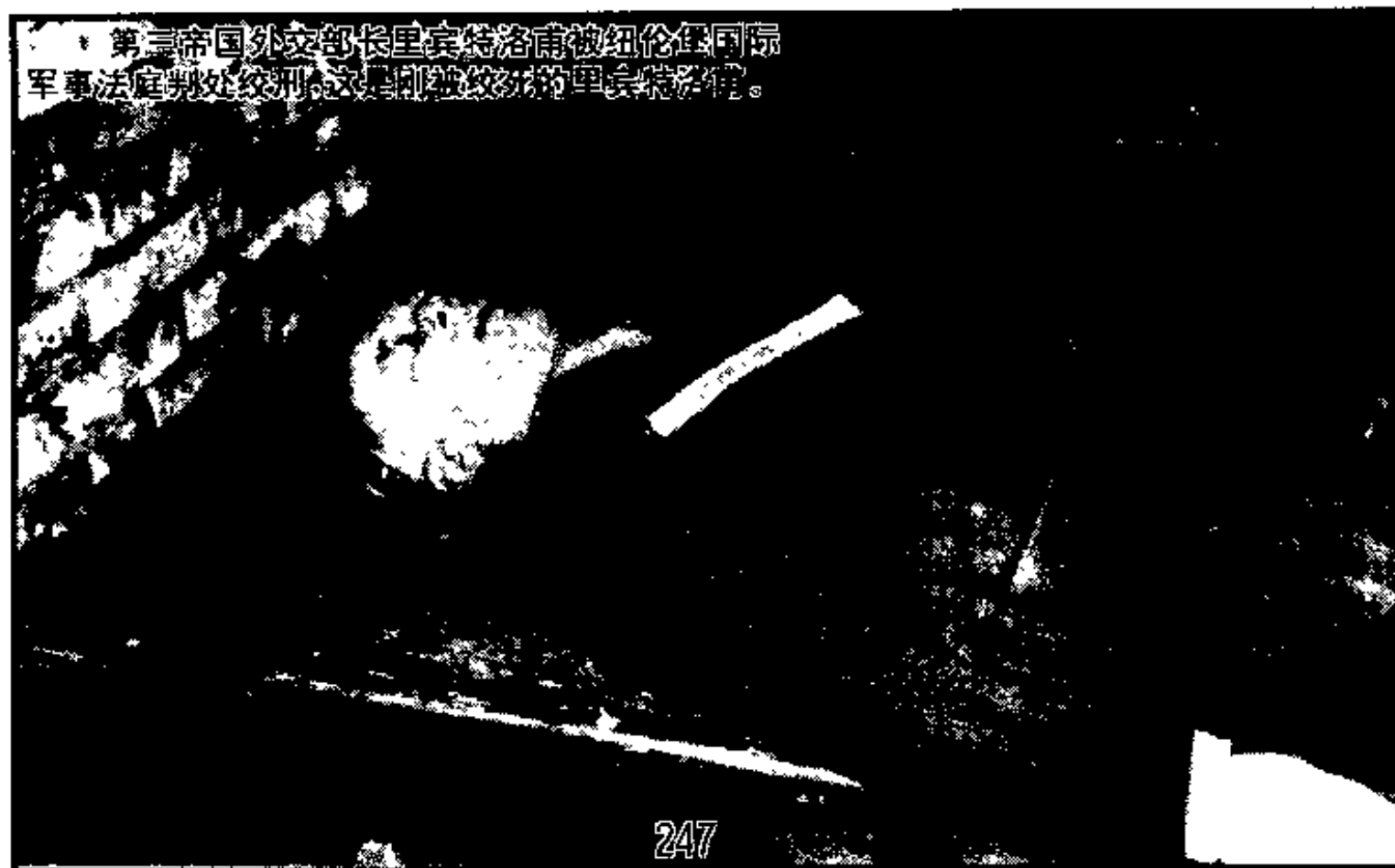
这是一种荒谬的狡辩。一个令人发指的例子是，卡尔滕布鲁纳曾命令艾希曼将匈牙利的犹太人驱赶到 120 英里外靠近维也纳的斯特拉斯霍夫集中营。3.5 万名犹太人于 1944 年 10 月 20 日自布达佩斯步行前往该集中营，途中他们经历了雨雪、冰雹等恶劣天气。他们缺衣少食，甚至光着脚丫，数千人在路上倒毙或者被杀。

法庭没有对卡尔滕布鲁纳推卸责任的陈词滥调给予同情。法官在第三和第四次庭审中以反人道战争罪宣判他的死刑。1946 年





1946年10月，邓尼茨(被告席中站立者)在纽伦堡出庭作证。被告席前排左起：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滕布鲁纳，在被告席中还有纽赖特、施佩尔、约德尔、巴本、弗兰克、赛斯-英夸特、罗森堡、雷德尔、施特莱彻、沙克尔、弗立克等。



第三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这是刚被绞死的里宾特洛甫。



迪尔斯死于1937年一次被击中。

10月15日，卡尔滕布鲁纳高大的身躯被吊上了绞刑架，值得一提的是，他吊在绞索上整整15分钟才死去。

直至现在，战争的焦点才转到盖世太保。1945年2月3日，盖世太保柏林总部也元气大伤。战争最后阶段盟军的飞机和坦克轰炸使破坏程度进一步增大了。自3月26日起，苏联部队在朱可夫的指挥下，大举向柏林城压去，盖世太保总部拼死抵挡，但已毫无用处。一场恶战后，柏林市的统治者于1945年5月2日向盟军最后投降。

直到投降前，盖世太保仍借着工事掩体在缺水断电情况下继续工作。3月23日夜晩，大部分盖世太保仍坚守自己的阵地，并被分派到战斗激烈的地方参加战斗。当他们驻守的掩体工事被彻底摧毁后，只有6个人幸免于死。

3月30日下午3时左右，希特勒和爱娃退回地堡，元首用重型7.65毫米口径瓦尔特手枪结束了自己的性命，爱娃服毒自杀。至此，盖世太保的庞大机器已不复存的。血腥、流血也随之消失了。出人意料的是，海因里希·穆勒，在3月底还在希特勒的密室露过面。瓦尔特·舒伦堡回忆说，穆勒与苏联情报机关保持着长期的联系。许多寄希望与苏联合作的人都被拘禁在劳工营里。但是，据瓦尔特·舒伦堡说，1950年曾在俄罗斯做过战争囚犯的一位德国官员声称于2年前在莫斯科见到过穆勒。

鲁道夫·迪尔斯，则开始和盖世太保一样做所有的事，但后来





战后的艾希曼

慢慢地聪明起来，只是吃吃喝喝、玩乐玩乐而已，也不参予谋杀希特勒的活动，这恐怕是他能成为幸存者的主要原因。战后，迪尔斯回到原来的岗位，做一名忠实的内务工作者，这也是他最拿手的职业。1957年，他在一次狩猎中丧命。

在德国人的意识里，盖世太保的总部遗址已逐渐变得模糊了，那些未受

处罚的前盖世太保、党卫队和国家保安总局分子可能也会觉得松了一口气，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觉得安全而轻松了。但至少，他们中有2个人并没有得到这种轻松。

阿道夫·艾希曼是其中最为残暴的一个盖世太保，他化名奥托·亨尼基，长时期在阿根廷安然无恙。借着写上假名的伪造身份证，犹太地区的盖世太保和国家保安局将他移民到南美洲。在南美洲，他又起用另一个假名：雷卡多·克里蒙特。至到1960年，以色列当局终于找到了阿道夫·艾希曼，并在阿根廷的心脏地区实施了一次突袭行动，抓获了逍遥法外多年的艾希曼。

艾希曼戴着眼镜，从法庭的玻璃棚外看，一幅很官僚的模样，就像一个高效率的政府职员。15年前，他的军阶较低，不久他就成为第三帝国权倾一时的人物。1944年，他受命去布达佩斯负责掌管匈牙利的“犹太人问题”，其权力更进一步膨胀了。匈牙利当时是轴心国之一，仍享有政治独立，境内的80万犹太人也过着相对和平的生活。艾希曼一到布达佩斯，一切都被改变了。他从莫索森集中营精心挑选人员组成一个特别突击队，该队在盖世太保的配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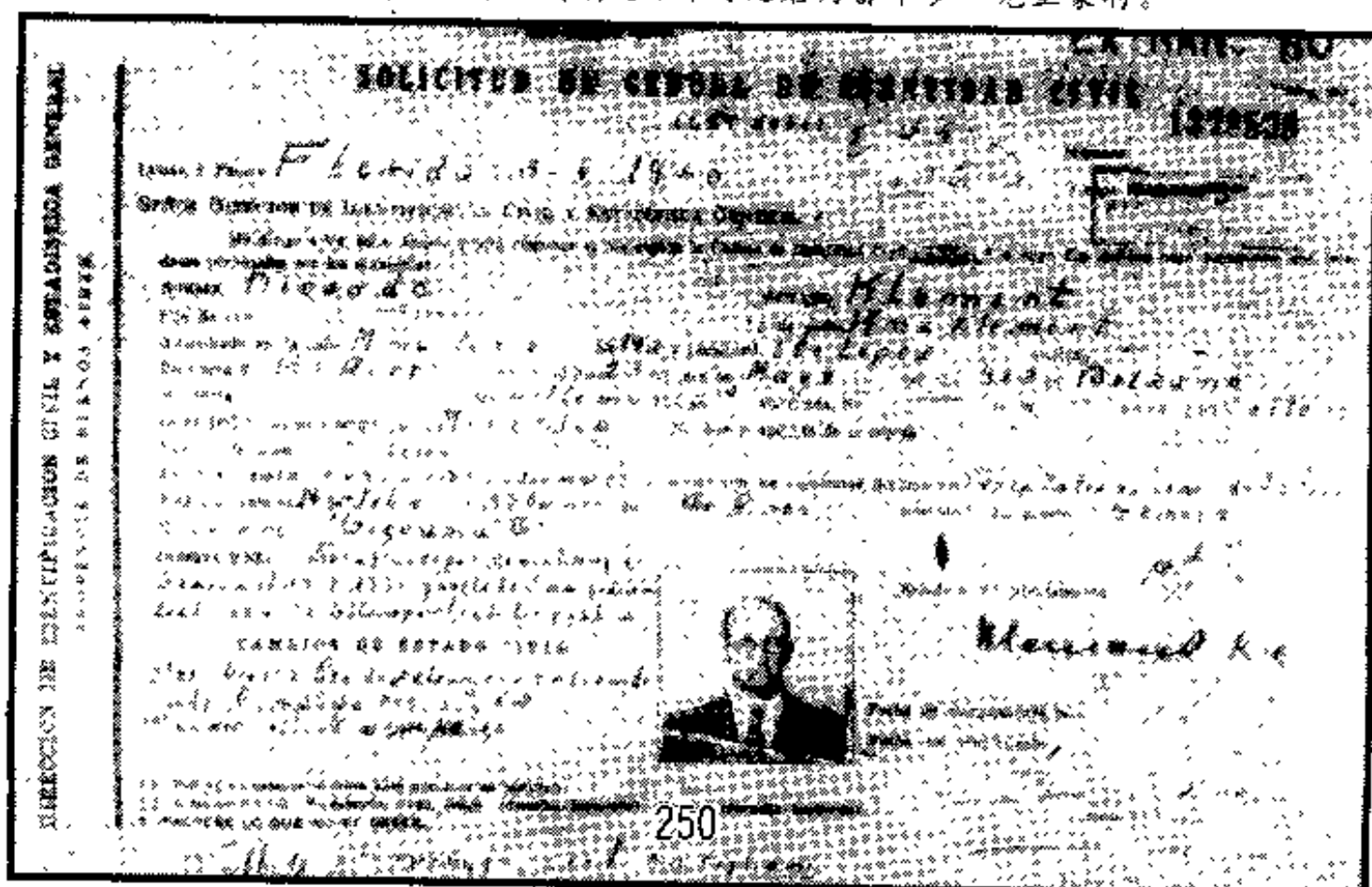
艾希曼一双杀害无辜的双手

有权集合犹太人并将其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匈牙利摄政者弗兰克·斯扎拉斯是个反闪米特的法西斯狂，并领导着法西斯箭十字军，他的傀儡政权与另一个狂热的党卫队追随者、第三帝国全

权代表埃德玛德·韦斯麦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这更加助长了艾希曼的嚣张气焰。不久，艾希曼政权受到威胁：希姆莱正在与盟军协商，命令停止种族灭绝计划。艾希曼签述的将 1500 名犹太人驱逐出境的命令受阻，装载犹太人的火车被遣回。但在卡尔滕布鲁纳的唆使怂恿下，艾希曼不听从希姆莱的命令，擅自集合这 1500 名犹太人，并把他们秘密逐出境外。

露西·大卫道卫兹在她的一本名为《1933~1945 年的反犹太人战争》中讲到，她家里有两人先后在华沙和特布林加失踪，直到 1945 年 4 月，匈牙利才最后摆脱纳粹的控制，“约有 45 万多犹太人，占大匈牙利犹太人的 70%，遭到驱逐、谋杀或在德占区死去。

艾希曼的一张假身份证，所用化名为雷卡多·克里蒙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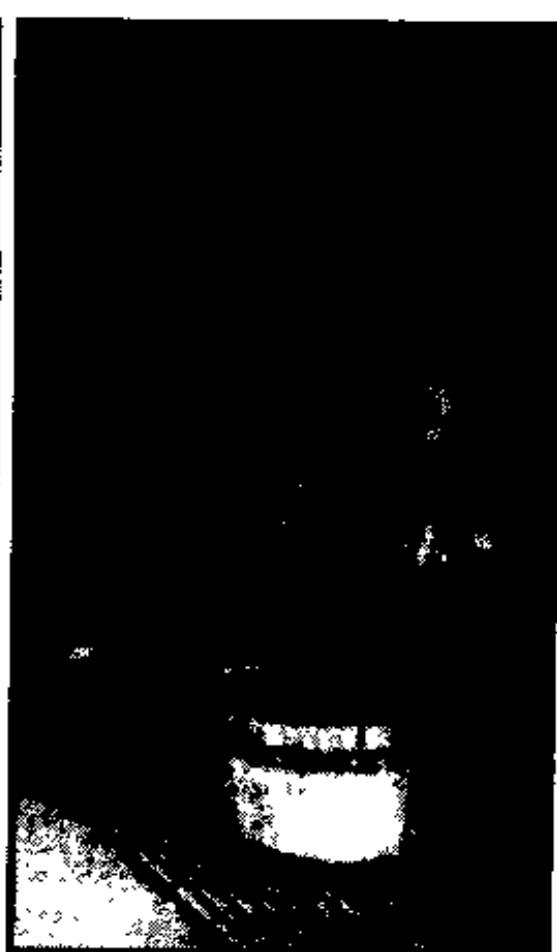
盖世太保抓  
捕的游击队员被  
带到布达佩斯执  
行枪决。



布达佩斯贫  
民营门外的牌子  
上写着“非犹太  
人禁止入内”，贫  
民营是万塞会议  
的副产品。



布达佩斯一个埋葬犹  
太人的公墓前挤满了无家  
可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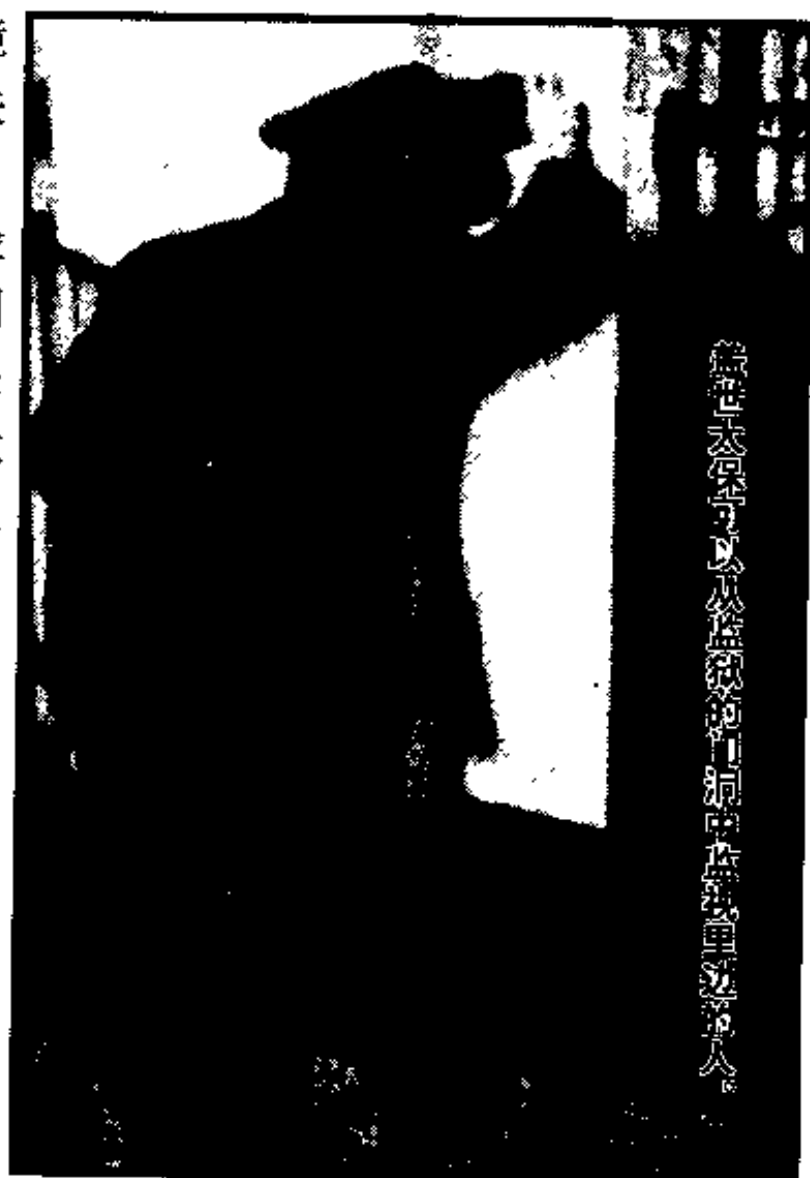


布拉格郊外的特里金犹太人贫民营里的住房(左图)和卫生间(右图)。

在小匈牙利(1938年前)境里,约有一半的犹太人消失了。”

在法庭上,艾希曼一脸正经,显示出极度迂腐和刻板,正是他驾驭着残暴的杀人机器,驱逐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到特雷布林卡、麦德尼科、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在以色列,艾希曼面对义正辞严的审讯,对事实和他的残酷行径供认不讳,其供认状长达3500余页。艾希曼有罪确认无疑,1962年5月31日他被判处绞刑。

艾希曼案结后的许多



年，还有许多战犯先后走上法庭，但 1987 年对“里昂屠夫”巴尔博（又译巴比）的审判最具戏剧性。巴尔博想以克劳斯·阿特曼的化名掩盖过去，在波利维亚获准居住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最终被带到了法庭上。

在里昂开庭审判前，巴尔博见到了以前的受害者。1983 年 5 月的一个早晨，约瑟夫监狱的门打开了，接着是 5 秒钟混杂的噪音，一位警察司机驾着一辆货车冲进人流中。当货车在城里开了 2 至 5 公里时，车里那个戴着手铐的人，被颠簸得前俯后仰、头发飞扬。这

“里昂屠夫”巴尔博 1987 年终于被送上了法庭，1991 年他死于狱中。





事隔多年，巴黎市民到法庭作证时，仍对盖世太保的暴行心有余悸。

就是巴尔博，此时他正被送往鲁恩的蒙特拉克城堡，在那儿，巴尔博曾用酷刑折磨、致疾、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在蒙特拉克城堡，巴尔博见到一个 82 岁的老妇，她是 1944 年从里昂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最后一批囚犯中的一个。法庭以这次行动为证坚持对巴尔博的罪行进行进一步调查，重新对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时期的各种暴行进行验证。据说，这位无名老妇是盖世太保在里昂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见证者。有一点十分必要，那就是法庭不仅仅是为了复仇，而更要以此对盖世太保的行径和暴虐作一个真实的纪录，这才是审讯的最终目的。

直到手铐加上 72 岁的巴尔博的手腕，并最后宣判他死刑，愤怒的里昂人民的情绪才平缓下来。40 年前的里昂，许多家庭夜夜无眠，轻者造成了严重的意识障碍，重者几乎丧失了记忆能力。在咖啡厅的餐桌上，人们既不敢公开读书也不敢大声议论巴尔博和他暴虐的统治。

在罗纳—阿赛斯审判庭上，公诉人皮埃尔·特鲁奇估计巴尔博应对 842 名送往集中营的人负责，其中 373 人已被确认死去。特鲁奇问道：“哪个审判庭曾经接过受害者如此之众的案子呢？”其中



52 个孩子——有 44 个从家乡送往毒气室。纳粹党暴行激起了法国犹太律师萨基·克拉斯菲尔德这个著名的捕抓纳粹残余分子的猎手的动力与勇气，他的父亲在奥斯维辛为毒气所杀死，他的妻子贝蒂是德籍辩护律师。他一直在寻找巴尔博的踪迹，经过长期斗争，终于将这个恶魔带到了法庭面前。

由于大量盖世太保资料的流失和毁损，有人会不可避免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事情已过去很久了，何必还这么麻烦而将一个老人带上法庭？巴尔博毕竟不是艾希曼，不是那些惨无人道的计划的最终决策者和支持者，而只是希姆莱机器上的一个小丑，他在党卫队保安处中的官阶从来没有升迁到地区盖世太保分队长以上。在被德国占领的欧洲，有成千上万个像他一样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并未受到正义的惩罚。

为什么要将他一个人带上法庭呢？

在里昂，至少当年那些备受盖世太保迫害的孩子们和法国最伟大的抵抗运动领袖让·穆兰的遗孀能懂得这次审判的意义。穆兰的遗孀雷莉已年逾 70，老迈衰弱，据说她也为“里昂屠夫”的被捕而庆祝。



巴尔博的家人说巴尔博是一个尽心尽力的丈夫和父亲，他对自己的一个儿子的去世十分悲伤。然而，也有从巴尔博的严刑和暴虐中余生的人说，“他信奉上帝”，他常提醒盖世太保头头们远离残暴，多受苦难。在里昂法庭上，巴尔博已是个颤颤巍巍的无用的老头，他没有提出任何辩护和抗议。

巴尔博 1991 年 9 月 23 日死于狱中。很少人会记住两代以前曾施过暴行的人物，但是，盖世太保在里昂的肆虐横行却永远为历史铭记。尽管时光飞逝，正义还是宣布了一个不容忽略的罪大恶极分子的下场。

纽伦堡的犹太人陷害者施特莱彻，这是刚被绞死的施特莱彻。



第三帝国义务劳动全权总代表沙克尔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这是刚被绞死的沙克尔。





纳粹波兰总督弗兰克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这是刚被绞死的弗兰克。

纳粹荷兰总督赛斯-英夸特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这是刚被绞死的赛斯-英夸特。



第三帝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这是刚被绞死的凯特尔



第三帝国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上将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这是刚被绞死的约德尔。



第三帝国原内政部长弗立克博士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这是刚被绞死的弗立克。





# 历史的见证

1990年冬季，在马丁·克罗比斯大厦里举办了一次19世纪德国统一和俾斯麦生平展览，这个大厦位于前东柏林，吸引着大批人来此参观游览。而附近还有另一个德国历史展览正在举办，这是一个非常难办而必须去办的展览，它不是展示德国的荣耀和成功，而是失败和耻辱。

第二个展览的公开性稍弱一些，其名称为“恐怖旅行”。这个展览恰好在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街当年盖世太保的总部里举行，这座楼将要修复而成为一个博物馆。展览揭示了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发展历史，展品主要是各种放大的文件和照片。确实，这座楼除了作博物馆外没有什么其它用途，这座楼的残余结构已千疮百孔，那些小房间和地窖只配作厨房和收藏室用。楼上曾是盖世太保住过的地方，在电影里，盖世太保的形象往往被刻画成穿着皮衣、戴着薄边帽子的虐待狂，他们蜂拥而入犹太人的房子，将这些犹太人

逼进充满毒气的房间。而在那些以文笔谋生的人的笔下，盖世太保则被描绘成一般家庭成员，他们照样星期天去郊区锄草割叶，间或听听备忘录，批阅批阅文件，表现得如同一个普通公民。

1987年，在盖世太保总部废墟的挖掘中，找到了许多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一对漂亮的青年夫妇——哈罗·斯库兹一波森（一战时德国舰队司令冯·托比兹的外孙）和他的妻子丽坡苔丝，

当年盖世太保吊死所谓「政治犯」的铁钩子。



盖世太保给“囚徒”戴的铁镣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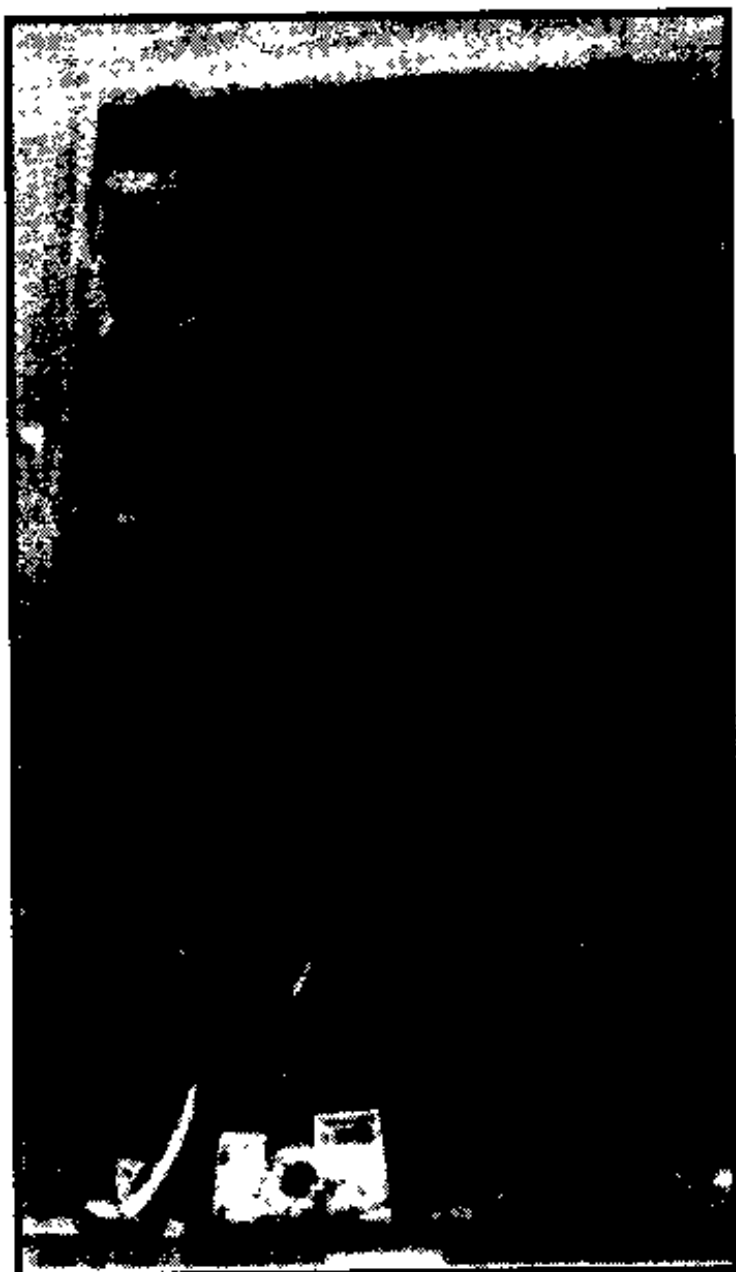


他们均是抵抗者（盖世太保称之为“红色交响乐团”）队伍中的重要人物。斯库兹在帝国空军司令部任职时，曾向苏联提供军事情报，并进行其他反纳粹活动。1942年8月30日他被逮捕，并送至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街接受审讯和酷刑，12月19日被判处死刑。3天后，他被押送至普洛特金斯监狱。丽玻苔丝后来也被逮捕，在普洛特金斯被处死，当她被推向断头台时，仍高声哭叫着恳求：“救救我年轻的生命。”

并非所有在柏林的盖世太保中的幸存者都如此冷酷可怕。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街56~58号有一座靠近威赫麦因湖的郊区别墅，被开辟为博物馆（展览馆），这个地方在

1913年前一直是党卫队保安处工作人员的娱乐中心。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在此回顾了反犹太计划的巨大成绩并为将来作了规划。在这次万塞会上，海德里希对每个公司总裁表示好感，他向听会各位出示了确凿的统计数据：那时在波罗的海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已有50多万犹太人被杀害。万塞会议继续研究了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投资计划。

20世纪90年代，如果走进这栋别墅，将迎面看到一根绳索。经过长时间的修复，地板已恢复为会议召开时的样子，连白兰地都照当时的模样模拟摆置在适当的地方。屋子中间是一张桌子，桌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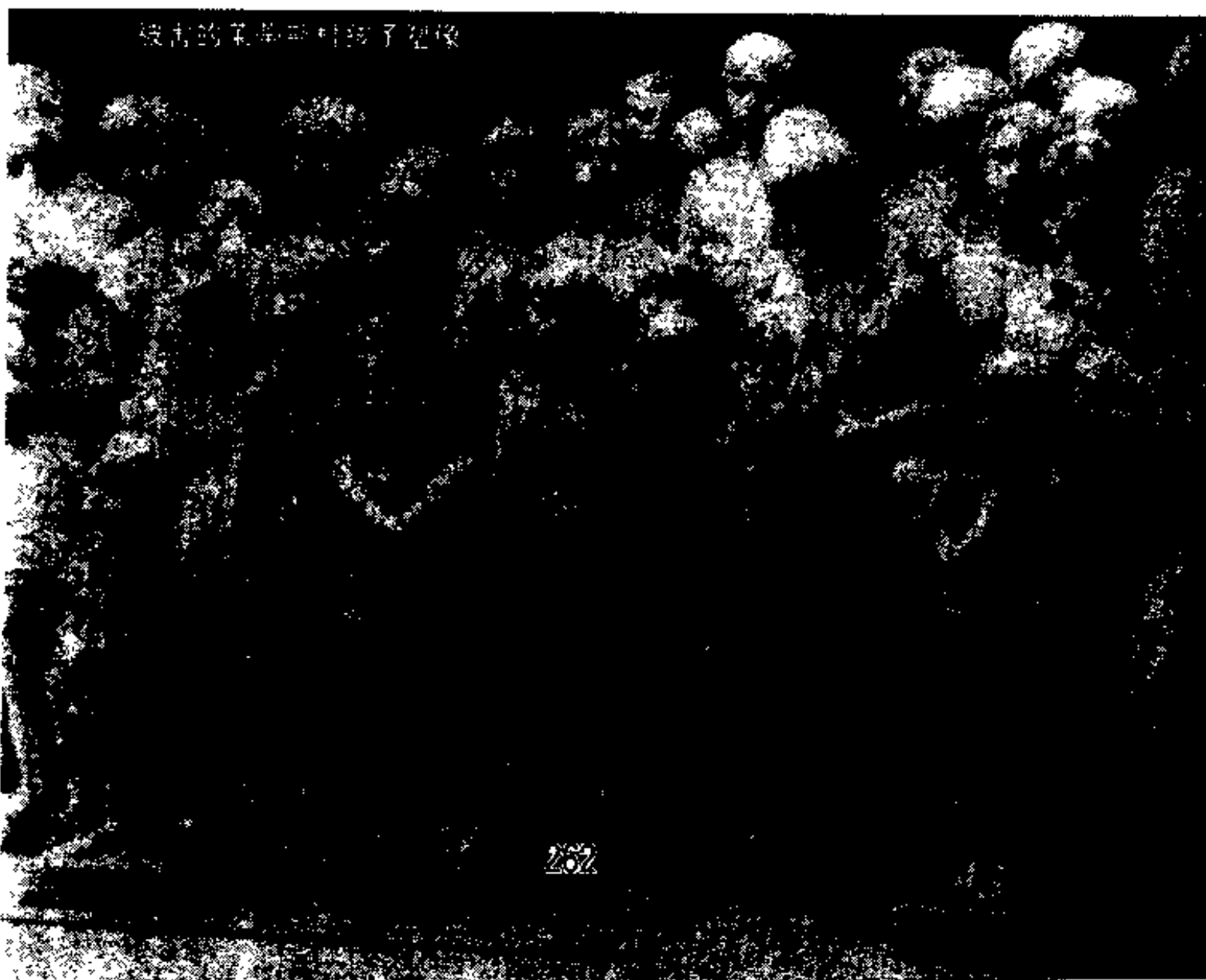
布拉格圣赛日尔教堂墙上的弹孔依旧醒目，台阶上是参观者献的花环与鲜花。

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由阿道夫·艾希曼起草的会议草案。但今天,这栋别墅已不仅仅是一个毫无感情的展览馆。从纳粹德国的反犹太文化中可以看到其深刻影响,透过犹太人日常生活看到其特殊性,在德占区的任何国家的犹太人都深受德国反犹太政策的残害。这种政策和原则都是在这次会议上详细规定的,大屠杀和自由枪杀犹太人都是由这次会议带来的。

对于任何来此的参观者来说,呆在这栋房子里是十分肃穆沉重的。正如德国犹太人委员会和柏林犹太人联盟的主席海因兹·凯林斯基所说:“1942年1月20日,在这间屋子里,文明社会的围栏被践踏了。一群野蛮人大吼着要改变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会议之后发生的一切正是它的结论带来的后果,非人道主义赤裸裸地横行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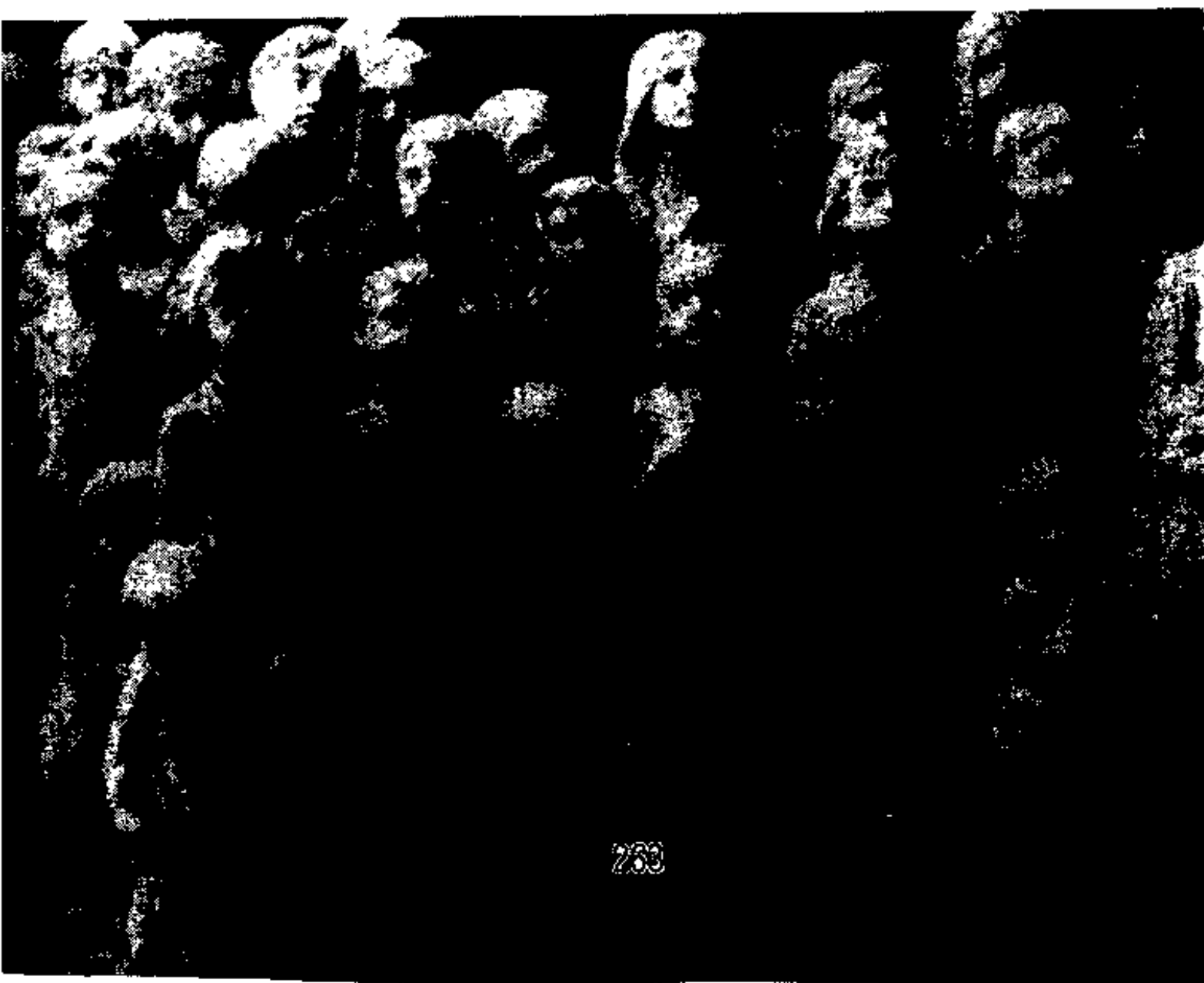
盖世太保的触角遍达每一个被占国。“红色交响乐团”组织的另一个受害者约翰·温泽尔,曾与谍报机关的其他成员一起为本

被击的莱昂斯村孩子塑像



杰明的谍报网工作，他被送往位于安德沃普和布鲁塞尔之间的布林顿集中营，受尽了酷刑折磨。盖世太保将许多受害者送进用刑室，用尽各种酷刑。今天，人们称这些可怕的废铁具为布林顿城堡里的国家文物，房子里还有许多骨灰缸，里面装着达豪、奥斯威辛、毛特豪森、拉文斯布吕克和麦德勒克等集中营受害者的骨灰。

在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街8号，威赫麦因别墅和布林顿是国家警察局暴行的见证和附属的杀人机器与恐怖机构，其他地方盖世太保的遗迹则显示出盖世太保对无辜者的惨绝人寰的屠戮。在阿姆斯特丹普林森格拉特大街263号，发现了安·弗兰科斯在为期两年零一个月的监狱生活中所写的日记，日记一直持续到1944年8月4日盖世太保处死这个年轻的犹太人为止。在安·弗兰科斯住的监狱的墙壁上，贴着她喜爱的电影明星的照片，她被带走之前，这些东西都保存得好好的，盖世太保将她处死后，也捣毁了这些东西。





战后来蒂斯村的妇女在追悼她们被德寇杀害的亲人。

但是，不是所有盖世太保在欧洲留下的遗迹都可被看作死者的纪念碑。战争结束后的前几年，布拉格附近的莱蒂斯村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有一个大坟墓，上面插着一个高耸的木制十字架。要重建家园几乎是不可能的，德国士兵和苦力已将破损不堪的房屋夷为平地，他们砍倒树木，损坏公路和铁路，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覆盖着泥土的无路可走的荒地。

今天，那些幸免于1942年6月10日大屠杀的人，能够与其子孙后代一块生活在一个崭新的莱蒂斯城。在一栋两层楼的学校大门口上，贴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幸福学校”。原先莱蒂斯有99个孩子，战后，只找到了16个。现在教堂的所在地——十字架的底座在过去就是盖世太保杀人的牧场。

希特勒曾妄图将莱蒂斯这个名字从地球上抹去，显然他失败了。纳粹的暴行震惊了整个世界，特别是英国，刺杀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人就是在英国诞生的。英国中部特伦特煤矿区成立了个英“莱蒂斯要生存”委员会，并重建像模范采矿社区一样的村庄

为了重建莱蒂斯，建筑家们公开进行竞争，1949年圣诞节，首批新家园的钥匙分发了下去。另外，1955年6月19日星期天“和平与友谊花园”在山坡上开张。无数的鲜花和花环掩盖了昔日这块荒芜的地区，红色新房顶在灿烂的朝霞中分外醒目。

现在，莱蒂斯地区又面临着新的破坏性威胁，从生态污染到工业损害。莱蒂斯50周年纪念委员会从英国发出呼吁，集资在沿街和村庄周围种树造林，以应付严重的污染。完全可以相信，莱蒂斯将获得新生，再现生机，而这正是纳粹想要彻底破坏的。

而盖世太保自身却无法再生和复活。整个纳粹德国和被占领国在战争末期都受到盟军飞机的轰炸，其军营、据点、办公室和其它盖世太保活动的地方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柏林的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街或布格拉的审讯室已不复存在。

盖世太保不仅动用了残酷的刑具，而且还建立了大量的卷宗档案，其中记录着无数的私人秘密，这些卷宗档案与刑具一样可怕。例如，当苏联红军到达亚布拉切斯托斯王子街8号时，就曾得到一团乱糟糟但仍很完好的卡片索引，上面表明有“柏林嫌疑

被盖世太保送到德国“教化”的莱蒂斯孩子之一玛利亚。杜拉北洛娃战后与她的母亲幼后重逢。



犯”。苏军进驻后，这些卡片大部分都被捣毁。

这些纸张材料在地毯式轰炸中或在烈火里、在大风中、在泥路上或在废弃的卡车上被烧毁、吹散、腐烂、丢失，还有一些被德国人自己毁了。也有一些卡片历尽沧桑，辗转保存下来了，后来它们都被送上了法庭，维护了正义或者为历史学家研究纳粹主义提供了最权威的备忘录。

例如，柏林的档案中心里，陈列着一个书架，上面装着刑事警察局单独实施洗劫方案的报告。它本身向世人证明了纳粹德国秘密警察机构的欺霸铁腕和独裁者罪恶行径的丑陋面孔。

警钟长鸣，醒明世人。历史是一面镜子，借鉴过去可以窥视未来。全世界都企盼一个和平、友谊、美满的地球，法西斯独裁肆虐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

这是1945年盟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发现的  
大量尸堆的一部分。





一个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匈牙利犹太妇女被盖世太保折磨得不成人形。



1945年2月28日，盟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发现了大量的尸体。这是一个与母亲一起死亡的尚未出世的婴儿。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before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A3MDk2NTluemlw",
    "filename_decoded": "10709652.zip",
    "filesize": 6291092,
    "md5": "5cddc9c251a38a69ce6fa790faddde1",
    "header_md5": "b8bec8346bae06fe8ef0ab081503c88c",
    "sha1": "40ec5fc333108455f182f4cc0dd6411d49bc1da6",
    "sha256": "5532afc175f89666e571b3121c784f7f77e2536e69381a57ab59587d177b76e4",
    "crc32": 891528658,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6308330,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267,
    "pdg_main_pages_max": 267,
    "total_pages": 289,
    "total_pixels": 0
  },
  "after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A3MDk2NTluemlw",
    "filename_decoded": "10709652.zip",
    "filesize": 26402308,
    "md5": "a089c1114b1e373d9c06d70ffeae583a",
    "header_md5": "610b422b347ef0d4850c69b186ecdaed",
    "sha1": "a7ca8b585f443a0250c18fe00a00d854d669abf7",
    "sha256": "2e03e6eef33d6a672228e21c838d3ea238af8ab6ce387821594a037ef172b0a7",
    "crc32": 3412949355,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6618104,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267,
    "pdg_main_pages_max": 267,
    "total_pages": 289,
    "total_pixels": 293433600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